

以林副统帅为榜样

永远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努力学习！忠实执行！

热情宣传！勇敢捍卫！

努力学习！忠实执行！

热情宣传！勇敢捍卫！

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以林副统帅为榜样

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坚信不疑！坚定不移！

斗私批修！革命到底！

坚信不疑！坚定不移！

斗私批修！革命到底！

chineseposters.net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永远胜利！

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 批判旧世界 建设新世界

YI MAO ZE DONG SI XIANG WEI WU QI PI PAN JIU SHI JIE JIAN SHE XIN SHI JIE

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就会逼你关心它

相信你我在成长中，都接受了无数的“教育”：政治，是肮脏的，是不该参与的。

中国人似乎有个共识，就是不该谈论政治。已经荒唐到什么程度了呢？不过是关心下社会，关心下现实，也会被骂愤青，骂偏激。看看你的周围，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他们在关心什么？鸡汤？谣言？娱乐？等等……他们很热衷。但就是不愿意关心政治。

可他们并不明白的是，这是一个一切都是政治化的国家。即使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也会来关心你！严重的通货膨胀，你工资赶不上物价上涨，是政治。有人家不幸被强拆，是政治。为什么那么多人报考公务员？是政治。哪怕仅仅你只是去办个证件，跑很多趟，被黑脸很多次，也是政治。此国的一切的源头，都是政治。政治，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最简单的例子，发改委宣布养老金将在 2035 年耗尽，关心政治的人会明白这件事的原因，结果，怎么做。而不关心的，不敢关心的，等到的，也只是养老金耗尽后在饭桌上骂骂咧咧罢了；如果你还觉得无关紧要，看看 1998 年大下岗吧！害死了多少无辜的、坚信不该关心政治的老百姓！！

柏拉图有句名言：拒绝参与政治的惩罚之一，就是被糟糕的人统治。这是智者之语。可惜很多人不理解，甚至连听过都没有。中国历史总是不断的轮回，有时候真的不得不怀疑，这可能是报应。

还有一种说法是：你以为你比政治家看的远？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血淋淋的例子，不被逼到绝路，百姓始终认为皇帝什么都行。

——《星火手册》

目录

目录.....	3
理论专题	5
关于“人性本恶，所以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的问题.....	5
关于“左壬（棍）就是不满现在的生活，想打倒资本家，自己做资本家”的问题.....	5
大跃进专题	7
关于“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的问题.....	7
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纯属捏造”.....	7
《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序言.....	20
我为什么要写“关于饿死三千万”真相一书？.....	22
坚决清除泼向中国共产党的这盆污水——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处谬误的分析.....	27
再论中国大跃进时期所谓饿死 3000 万人的问题.....	32
以五八年浮夸风中的赵紫阳为例——谈谈“高产卫星”的产生机制与死亡人口数字把戏.....	35
“饿死三千万”质疑.....	50
“饿死三千万”，最后一根毒刺.....	57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专题	101
关于毛泽东文革前有实权“一呼百应”的问题.....	103
关于反右派运动的发展及其扩大化的问题.....	105
关于校园内的斗“牛鬼蛇神”的问题.....	107
关于舒庆春（老舍）的问题.....	108
所以当时出现这种情况（知识分子在文革运动中受到的打击）进行保护和制止没有呢？.....	116
关于红卫兵砸岳飞墓的问题.....	117
关于各种坟墓（陵墓）被砸烂、主人被焚骨扬灰、文物被摧毁的问题.....	117
所以当时出现这种情况进行保护和制止没有呢？.....	118
关于华罗庚“图书馆也不让进，十几年看不到文献”的问题.....	119
关于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因上报获奖人数太多而不能获奖的问题.....	120
关于“鸡血疗法”的问题.....	121
关于“八亿人民八部戏”文革时期文艺作品匮乏的问题.....	123
关于《相对论批判》、“打倒反动学说相对论”的问题.....	128
苏联专题	134
关于“卡廷惨案”的问题.....	134
关于二战苏军打赢德军靠美援的问题.....	134
关于二战苏军的莫辛纳甘步枪 X 人一把的问题.....	134
关于二战转折点的问题.....	135
苏联问题研究的不多，需要专业人士帮忙。.....	135
人物专题	136
关于刘少奇的问题.....	136
“刘少奇死前没有医疗医护”.....	136
关于刘少奇个人的行为理论的问题.....	137
关于彭德怀的问题.....	139
（一）关于大跃进.....	139

（二）关于庐山会议.....	140
----------------	-----

理论专题

关于“人性本恶，所以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的问题

评：能这么说的概率学历不高，没学过哲学，大概就是虽然我不懂马哲，但是我认为……最低劣的手法之一

关键词：人性 自私

驳：

人在发展过程中，都是是要逐渐抛弃趋利避害的动物性，转化为社会性的。人性是不断变化的，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人是什么样的，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永恒的人性是不存在的，整个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无产阶级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教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关于“左壬（棍）就是不满现在的生活，想打倒资本家，自己做资本家”的问题

评：请不要把自己那齷齪的思想强加到别人的身上。如果你也不满你现在的的生活，请不要攻击那些想为你好的人；如果你满足于现在的生活，何必拒绝一个让所有人都能过上更好生活的社会？

驳：

没错，我们就是不满于现在的生活。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我们共产党人就是为了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想让生产资料公有，让人人都可以做“资本家”。

理论部分《星火手册》有几个，但我认为依旧不够多，不够好，日后再加吧。

大跃进专题

关于“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的问题

关键词：

三千万 四千万 五千万 六千万 七千万 八千万

评：

这不就和赵国揪着日本人一样吗，要你道歉你就得道歉，不道歉就是共匪。挨家挨户搜刮道歉，搜集一万份乃至十万份都不够，而且找和一共毫无继承关系的左壬是不是啥 b 了一点，真这么关心历史死活问题应该直接上访北京啊。

——Jack 黄豆炖马

死亡人数的大小与发言的人的心情呈反比，从 2700w 到现在的 8000w，一个个都不能自圆其说。张口就来死多少多少万的，自己一定没多少水平。死多少惨不惨他们是真的不关心，但是反共反毛才是他们最关心的。

可以引用的资料：

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纯属捏造

作者：张宏志

不知从那个阴沟里吹来一股阴风：“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请大家冷静的想一想，当时中国人口总数是 6 亿，假定真的饿死 3000 万人，平均每 20 个人中就有一人饿死。那将是：“饿殍遍地，野狗成群，四散逃生的难民，抛妻舍子，家破人亡，中国大地满目凄凉。”这是多么凄惨的景象。现今 55 岁（大跃进时 10 岁）以上的人。估计约有 4.5 亿，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试问，他（她）们有谁见过那种景象呢？没有、没有一个人见过。因为那是谎言。在 4.5 亿人众目睽睽之下说谎，可见谎言泡制者是多么的无耻！

饿死 3000 万人之说，究竟是怎么来的？

原来，1983 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将 1949—1982 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予以公布（1983 年出版的《统计年鉴》）。美国的人口学家从这个材料中估算出 1958—1963 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 2700 万（2680 万）。这个数字被人“移花接木”，说成是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我们不知道谁是玩手段的第一人，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善长讹赖的老手！如是“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在国内外就这样流传了近 20 年。为什么无人对此进行批驳呢？因为它适合了一些人的政治需要，一些反对人民公社，而主张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兴高彩烈。他们说人民公社、大跃进饿死那么多人，还不应该把它反掉吗？！换言之“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就是一些人为搞资本主义所制造的借口，对这种谣传必须给予彻底驳斥！

户口登记数字及其计算方法科学吗？

现从国家统计局 1983 年公布的 1949—1982 年的统计表中摘出 1957—1965 年 8 年的统计数字。（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 WWW. xgc2000. com 下称“李文”）

年份	年末总数人口(万人)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1957	64, 653	34.03	10 • 80	23 • 23
1958	65, 994	29 • 22	11 • 98	17 • 24
1959	67, 207	24 • 78	14 • 59	10 • 19
1960	66, 207	20 • 86	25 • 43	—4 • 57
1961	65, 859	18 • 02	14 • 24	3 • 78
1962	67, 295	37 • 01	10 • 02	26 • 99
1963	66, 172	43 • 37	10 • 04	33 • 33
1964	70, 499	39 • 14	11 • 50	27 • 64
1965	72, 538	37 • 88	9. 50	28 • 38

（“李文”）

“上述数字公布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的反响。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都报导了 1960 年人口总数净减 1000 万的消息，共同社说是‘和平时最大的人口事件’。

“各国的人口学家认为上述所公布的数字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指出某些数字间存在着一些矛盾。这表现在各个年度人口出生率减死亡率所得出来的自然增长率，与本年总人口减上年总人口得出来的增长率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又不能用“机械增长”即国际移民来解释，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移入移出的人数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黑体系引者加，下同）他们希望有更准确、更系统、更详细的资料，以便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人口的变动，其中包括弄清‘大跃进的人口后果’的数字。

“国外研究中国人口的著述中，影响较大的是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teyJCoale）提出的研究报告。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带领他的助手进行了详细研究，写成《从 1952 年到 1982 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作为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及教育委员会的《人口与人口学第 27 号报告》公开出版发行。

“科尔在前述著作中对‘大跃进’引起的超量（非线性）死亡人数作了研究和估算。书中说：‘按官方开列的死亡率计算，1957 年的死亡数为 590 万，1964 年为 802 万，这些年的死亡数量从 590 万到 802 万的线性趋势，可算出 1958 年至 1963 年（线性）死亡总数为 4180 万。由官方记录得出的死亡人数为 5740 万，照此计算，困难年代超量死亡数约为 1600 万。’书中又说：‘1957 年和 1964 年经过对少登记数调整后的死亡数为 1040 万和 940 万。按照线性趋势，1958—1963 年调整后的死亡总数为 5940 万。实际死亡总数为 8620 万，超过线性趋势的死亡数约为 2700 万’。（按：引文中的线性死亡，即正常死亡，超线性死亡，即非正常死亡。下同——引者注）

“美国人口及人口学委员会于 1984 年 7 月 10 日为科尔上述著作的出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合众社、美联社和西方其他大通讯社在报导中都说到上述超线性死亡数字。

“法国人口学家卡洛没有估算‘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但他对科尔的研究结果表示了某些保留，并认为‘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他在《为便于分析中国人口统计资料的建议》一文中写道：‘无论如何，历史学家需要这样一个估算。我们建议中国同行对这些数据进行科学的调整，并说明调整方法。’”（“李文”）

“蒋正华（按：时任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引者注）以历年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死亡人数，其中 1958 年至 1963 年共死亡 8299 万人；同时按这 6 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为 6602 万人。这样可以推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 1700 万人（1697 万人）。”（“李文”）

“科尔估算的 1968 年至 1963 年实际死亡人口为 8620 万人，减去线性死亡人口 5940 万人，超线性死亡人口为 2680 万人。约为 2700 万人。”（“李文”）

“但要指出，在这里面有一个例外的情况：按 1957 年户口登记的年平均人口 63741 万人所推算出的死亡人数与科尔书中给出的 1957 年死亡人数有较大距离。那么，是不是科尔书中给出的 1957 年死亡人数是根据另外的年平均人口计算的呢？笔者计算的结果是：（1）按科尔书中给出的户口登记 1957 年死亡人数 590 万，死亡率为 10.8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 54630 万人；（2）按科尔书中给出的他所估计的 1957 年死亡人数 1040 万，死亡率 19.0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 54737 万人。这样倒推出来的两个 1957 年人口数比 1953 年全国人口普查的 58260 万人（这个数字是科尔所肯定的）还少 3500 至 3600 万人；而且把 1957 年与 1958 年的 65324 万相比，一年内猛增 1 亿多人，是难以设想的。因此，笔者（按：即李成瑞）认为科尔书中给出的 1957 年两个死亡人数与相关数字间存在着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黑体是引者所加。下同）至少在科尔作出新的解释前是这样的。”（“李文”）

“经笔者（按：即李成瑞——引者）对 1957 年死亡人数进行技术性修订，即按表 5（按：此表本文略——引者）中其他所有年度同样的方法，按官方的人口统计的 1957 年平均人口为 63741 万，依照科尔重估的这一年死亡率 19%计算，死亡人口为 1211 万人。把这个数字与科尔计算的 1964 年的死亡人口 940 万联系计算，则 1958 年至 1964 年的线性死亡人口为 6462 万人，与科尔估计的 6 年实际死亡人口 8620 万相比，超线性死亡人口为 2158 万约为 2200 万，这一数字的修订由笔者（按：即李成瑞——引者）负责”。

从以上引用的材料中看到，对 1958—1962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依据同一材料（1958—1962 年人口登记），三个人得出三个结论。蒋正华：1700 万（1697 万）；科尔：2700 万（2680 万）；李成瑞：2200（2158 万）。

再则，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与学者们推论出的数字，存在着重大差别。

“两位学者对 1958 至 1963 年年死亡人口总数的估计相差不算大。科尔估计为 8620 万人，蒋正华估计为 8299 万人，相差 321 万人，占死亡人口总数 3.8%。这个差额，在两个估计的非正常死亡差额 983 万人中，约占 1/3，是一个次要因素。同户口登记的 6 年死亡人口 5740 万相比，科尔的估计数增加了 2880 万，即增加了 50.2%，蒋正华估计数增加了 2559 万人，增加了 44.6%，增加幅度相当大，只是增幅高低的有些不同。

“两位学者对 1958 至 1963 年正常死亡人口的估计差距悬殊，这是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研究结果不同的主要因素。科尔估计 6 年的正常（线性）死亡人口为 5940 万人，蒋正华估计为 6602 万人，相差 662 万人，占正常死亡人口的 11.1%。这个差额约占两人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差额 983 万人的 2/3。”（“李文”）

上述情况告诉人们，这种单纯的数字推论和估算，科学性有多大，可信度有多大？！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登记，同样也是漏洞很大、很多。例如，1959 年与 1958 年相比，1959 年的出生率减少了 5 个千分点，死亡率增加了 3 个千分点，在死亡率增大，出生率减少的情况下，而人口却增加了 2000 万。这 2000 万人是从那里来的，除非用机械增长，即移民来解释。1962 年比 1961 年又增加 2000 万人。这两年人口出生率，1961 年为 18.02%，1962 年为 37.01%，1962 年与 1961 年相比，增长了 19 个千分点，即增长了 50%还多；人口自然增长率 1961 年 3.78%，1962 年为 26.99%，1962 年比 1961 年增长了 8.5 倍。虽然 1962 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但是，人口死亡率、出生率、自然增长率以及人口年增幅的这种无规则性，是不可思议的，只能用“统计有误”来解释。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材料公布后，美国官方反映最敏感，最强烈。他们紧紧地扣住 1958—1962 年的材料大做文章，做大文章；他们似乎从这些材料中看出了破绽，很快地确认了 1960 年人口总数净减 1000 万，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笔者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材料中，人口变动的这种大起大落，不能不使人怀疑这个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和材料编制人的责任心，人们有理由指出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人口登记，和国外研究者、报导者们的失真、失实，失掉客观性？

下面看科尔研究方法的粗糙和片面：

“第一，科尔是从生育率开始，经过一系列推导，求得两个普查间隔期的不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总数。

“第二，科尔在推算出两个普查间隔期的死亡人口登记平均漏报率之后，对于如何将平均漏报率分配到各个年度（作为推算每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主要依据）这一重要问题上，是根据未作详细说明的‘假设’来作出的。”（“李文”。黑体是引者所变，下同）

“第三，科尔对各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估计，始终是围绕粗死亡率即全年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进行的，而没有研究每个年龄组人口的死亡率。他虽然编制了两个普查间隔期（1953—1964，1964—1982）的5岁为一组的简略生命表，但没有编制各个年度的生命表，因此无法用来推算各个年度的死亡人数。（“李文”）

“第四，科尔对于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数，认为是线性趋势，按两点间直线来计算。因此，起点年数值与终点年数值的高低，对6年总数起决定作用。这两个点的数值估计，因种种原因有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偶然性、随意性，从而对计算结果产生较大影响。”（“李文”）

统计学是科学，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无论是统计工作、或是研究工作，都是由人来做。如果统计者提供的材料是真实的，而研究工作出现片面性；或者研究工作无误，而统计材料失真；或统计者、研究者都出现主观随意性，那么科学就会变为荒谬！我们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材料，人口研究专家得出的结论，都有失真，失实和失掉客观性之嫌！因为它和客观存在的历史不相符，主观和客观不统一。研究人员的数字推论，必须以客观存在的事实来验证；而不是按数字推论的结果去描述历史。

198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人口登记后，如前所述，外国主要是美国的专家很快发现了1960年中国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于是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立即报导了这一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共同社一声呼唤，国内外一些人，拍案而起，一齐鼓噪，越喊叫愈离奇，在这个反华声浪中“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出笼了。以讹传讹，传了近20年。汉语中有一句讽刺性成语：真作假来，真亦假；假作真来假以真。假的就是这样变成“真”的了！

一切善良、正直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样的历史：美国帝国主义，一向仇视中国共产党，一向仇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向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美国帝国主义一直是国民党镇压中国共产党的帮凶和靠山。抗战胜利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和美国空军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赖在中国，帮助蒋介石集团打共产党。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三大决战胜利后，1949年3月，美国政府作出决策：台湾对于美国在西太平洋战略有着重要地位，美国的目标，是决不能让台湾和澎湖落在中共手中。从这时起，美国霸占了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1950年9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其矛盾直指中华人民共和国。1951年5月18日，美国操纵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议案。1973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白宫会见台湾国民党副总统严家淦，表示：美国将继续同台湾保持“外交及其他友好关系”，“美国决心信守对中华民国的协防承诺”。美国政府现在更加疯狂地支持“台独”，妄图把台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分割出去。中国人民深深懂得共同社所喧嚣的“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不过是帝国主义者人工制造的反华借口。至于国内那些别有用心者，人们早就看清了他们的嘴脸，他们想把“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强加给毛泽东。“反毛必反共，反共必亲美”，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我们要做的是还历史以本来面貌。1958—1965 年中国人口确实发生了变动。这种变化，用人口学研究中的某个公式是无法说清的。还是法国人口学家卡洛先生说得好，“中国人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

关于出生率从 1958 年至 1961 年呈下降趋势问题。

考虑这个问题，有两种人两种思路：一种人说，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的人们被饿得奄奄一息，怎么会生育呢？这种人出于对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敌意，丑化、诅咒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他们所追求的是私有制、资本主义。另一种人则主张进行深入的社会分析，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寻求答案。我们认为：

其一，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大力抓教育，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普及基础教育，当时的教育制度是 12 年，基础教育的实施，改变了传统的早婚（十五六岁结婚）习惯，这个婚嫁真空的时间窗恰好落到了六十年代初（1949+12）。

其二，从五十年代初期，国家大力宣传废除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主，婚姻制度的这一变化，破除了早婚习惯，由此造成的婚嫁真空时间窗，尽管比较含糊，但我们仍然认为它对 1958 年以后出生率下降是有影响的。

其三，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是中国工业打基础的时期，大约 5000 万农民转为工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初期，1958、1959 年两年又有 2000 万农民转为工人，在这 7000 万工人中，单身约占 95%，即 6950 万人，由此而造成的婚嫁真空时间窗，虽然其时间界定含糊，但完全可以判定它对 1958 年以后出生率下降产生影响，当是确定无疑的。

其四，1958 年、1959 年、1960 年，3 年间参加农田基础建设和水利工程的农民，不少于 4 亿，这么广大的青壮年男女，从小家庭生活转变为大集体，占全国人口 70% 的青壮年男女，其婚、嫁改变常规，必将对出生率产生重大影响，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搞清了上述社会历史环境再来评述出生率下降，就会知道，出生率下降是诸多社会因素造成的，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经济困难的结果；而那些把出生率下降看作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给中国带来的灾难的人们，假如你们不是出于偏见，相信你们是会修正自己的看法的。而对于那些出于偏见的人们，对他们不想说些什么，他们的立场决定了他们决不会承认真理，除非改邪归正。

关于 1958 年至 1961 年死亡率呈上升趋势问题

这里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主要是粮食短缺，一直持续了 3 年。营养不良使一些年老多病或体质衰弱者，对疫病抵御能力下降，故而使一些人在连续饥荒中早亡。这种情形是在全国范围零星持续 3 年发生的。它不引起社会振荡，不会使人感到恐慌，仍属正常死亡。而饿死人则是另一种情形。举例说，一个五口之家，其中一人因饥饿待毙，其他 4 人必会救助，而不会眼睁睁的看着其死亡。一家如此，一个村亦然。一家有难，其他家决不会坐视不顾。不要忘记那是人民公社时期，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之一，就是互助。因此，一旦发生饿死人，即是区域性、群体性，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必将震惊全国，瞒是瞒不住的。

其二，广大群众运动中的意外事故（伤和病）。前已述及，1958 年、1959 年、1960 年，3 年中约有 4 亿农民投入农田基础建设和水利工程，挖掘的土石方，年平均约 1.5 亿立方。而许多工程都是民办的，自筹经费。如河南省林县红旗渠工程，1960 年开工，1969 年竣工。还有大量民工投入铁路建设工程。这样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意外事故和疫病发生是难以避免的。这里虽然没有意外事故和疫病死亡人数的统计表，但这是死亡率增大的原因之一是成立的。这个代价是有意义的，它为中国的经济建设、铁路建设、特别是水利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设计灌溉面积达 10 亿亩。这是整整一代人的贡献。今

天分享着大跃进成果的人们，应该饮水思源。一些人所以要诅咒大跃进，不是大跃进做错了什么！只因为大跃进体现了社会主义风貌，人们的无私奉献、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自力更生精神。而这些是与一些人追求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故为他们所不容。他们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锁国”，“驱使人们去做不必要的牺牲”。

其三，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死亡。1960年“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省，直接死亡5000余人。（《灾情报告》第378、第379页）1961年，“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4.9%。（《灾情报告》）仅举以上两例，灾害造成的直接死亡，怕是不仅如此。

一切害怕社会主义的人，无不攻击大跃进。“大跃进饿死三千万”就是这些人骗造出来的。倘若发生集体饿死人事件，不仅震惊全社会，同时也会在历史上留下阴影；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尔今已经过去40余年了，一些反对毛泽东、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利用他们手中的一些便利条件，翻箱倒柜，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历史翻了个底朝天，除了40余年前早就暴了光、任人皆知的“信阳事”外，有谁翻出了新的“信阳事件”呢？没有，一件也没有。

三年经济困难有无饿死人

有的。个别地区确实发生了饿死人的事件：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第一个信息，是1959年春旱。1959年出现严重春旱之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防灾抗灾是非常注意的。4月17日，毛泽东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亲自拟定题目《十五省三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在三天内用飞机运粮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危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20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66年版）。24日，他又对东部沿海发生风暴的报告批示：“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呀要有此种气概。”（同上，第217页）

不过这时，就全国形势而论，并不严重，所以，在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逼债的情形下，1959年仍出口粮食41.6亿公斤。

1960年3月，习仲勋送来安徽“饿死人事件”的群众来信，毛泽东、周恩来等对全国经济形势的严重性开始关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灾情非常关心，对灾区人民十分关爱，1959—1961年，国家通过调入，进口等办法，向农村返销了大量粮食，3年共计546.6亿公斤，占总征购量的34.4%。（《当代中国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1959年底，至1960年底爆发了农村缺粮高峰，全国农村平均每人消费量由1957年的204.5公斤，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336页）

农村的严重缺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会议的《十年总结》讲话中主动承担了追求高指标错误的责任。11月3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起草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和市场问题的汇报提纲》指出了粮食多征购的问题。“1958、1959两年大约多征贸易粮200亿斤左右。”（《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8页）从1961年开始，国家大量进口、调拨粮食：1959、1960、1961年调入粮食量分别为—589.8、—169.5、—409.4万吨，进口粮食量分别为0.2、6.6、581万吨，向农村返销。净征购粮率降为17.5%。

事实上，因为各地受灾程度不同，粮食的减产情况也不同，灾害集中和持续的地区，缺粮情况比一般地区严重得多。如湖北省工作组1962年9月3日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谷城、光化、襄阳三县被调查的13个遭受旱灾的大队，特别严重的，群众根本分不到口粮；

严重的，每人每月平均 4-6 斤；一般的，每月 10 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 册第 173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而且，各年缺粮程度及人口也不是平均的，如 1960 年粮食减产最多，这年形成的缺粮人口也比上年增加 68%。高达 2.18 亿。

中共中央的种种努力，其社会效果是积极的，三年饥荒未酿成大灾难，即没有发生地区性、群体性、普遍性的死亡事件。饿死人的事仅仅是个别地区、个别人、个别现象。这种现象不仅灾年、常年也在所难免，即使是今天人们偶尔仍可看到饿殍。

河南省信阳地区发生的饿死人事件（史称“信阳事件”），诚然与三年自然灾害有直接关联，但主要是人祸。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导致的。笔者将以专题附录于后。

科尔的统计数字不可信

现在把话题转到人口学方面来

人口学是一门科学，它可以从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人口变动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口学研究所得的结论，其正确与否，用什么来检验？只能是社会实践。不是人口学决定社会运动，而是社会实践检验人口学；前者是第二性的，即社会运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后者是第一性的，物质的，它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我们所坚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下面从三个方面对科尔的统计数字进行验证。

关于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

科尔的研究工作所使用的中国官方公布的 1958—1964 年人口登记数字。这个统计材料其客观性、真实性是要大打折扣的。数字本身有无法解释的矛盾，本文已在前面说过了。

科尔的研究方法过于粗略

科尔线性（正常）死亡人口，其计算公式，是起点数加终点数，被 2 除。科尔估算（注意是科尔的估算，不是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1957 年死亡人口是 1040 万，1964 年死亡人口是 940 万，二者相加是 1980 万，再除以 2，等于 990 万。如是科尔得出结论，1957—1964 年，中国年平均死亡人数是 990 万。以此推算，1958—1963 年线性死亡人数 5940 万。这么粗略的推算方法，科学吗？其结论客观、真实吗？

人口学研究方法的瑕疵

人口学中按出生率或死亡率计算出生人口或死亡人口，都是以年平均人口为基数的，年平均人口在理论上应按 365 天的人口平均计算。但这种方法实际上难以做到，通常使用的简便方法是以上年末的人口加本年末的人口除以 2，得出平均值，作为本年平均人口。

再如，制成一张人命表，需观察一批同龄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需花费 100 年左右时间，实际难以做到，即使做到已成为历史的追述，失去观察分析现状的作用。一般使用的简便方法，是根据一年或几年统计资料，来确定一批人分年龄的死亡率，并算出平均预期寿命。

以上所述，中国官方公布的人口登记数字，其准确性是要大打折扣的；而科尔的研究方法又过于粗略；再加上人口学研究方法的瑕疵，因此科尔的研究结果，1959、1960、1961 年 3 年，中国非线性（非正常）死亡 2700 万人，是不可信的。

现在的问题，是依据科尔的结论撰写中国历史呢？还是以中国的历史事实去检验科尔的结论？我们坚持的是后者。

需要说明，科尔作为人口学家，他所进行的工作是科学研究，其结论对与错，都是研究工作。

而另外一些人，把科尔的研究结果用“移花接木”的卑劣手段，诬称，“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他们制造这个谎言，是用来打毛泽东，丑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曲解社会主义，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摇旗呐喊！

附录

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河南省信阳地区、首先是遂平县，最早刮起浮夸风、

“共产风”，越刮越大，迅速刮遍全信阳地区。由于“左”倾错误肆虐，终于导致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河南省“左”倾错误的根子，是时任河南省省长的吴芝圃。早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就吹牛皮，说今年河南要增产几百亿斤粮食，并实现水利化……毛泽东批评吴芝圃说大话，搞高指标。吴芝圃置若罔闻，越搞越离谱，甚至提出取消商品，取消货币，实行直接地物质分配，搞供给制。越走越远，终于和刘少奇走到了一起。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报导还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公社、修武公社（全县一社）和遂平公社（全县一社）党委的汇报”（详见本书第三章）。如是，遍及河南全省的“左”倾错误，获得了刘少奇支持。吴芝圃利令智昏，乘势将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钰、副秘书长王庭拣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一跃而为一把手，当上了省委书记。其后，吴芝圃便昏昏然起来。郑州会议上拒斥毛泽东的批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给吴芝圃写了亲笔信，信中说：“你不要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而吴芝圃却始终固执己见，坚持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继续刮他的“共产风”。吴芝圃的“左”倾错误，直到1959年11月发生饿死人事件后，适才一步一步地暴露出来，1960年2月彻底败露。“信阳事件”发生后，吴芝圃仍没有丝毫悔改之意，继续搞他的“左倾，将责任全部推到下面，把大批基层干部打成反革命。吴芝圃如此横行霸道，毛泽东的指示他不听，那么他听谁的呢？这里我们想起毛泽东一句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人们不禁在问，吴芝圃是什么派呢？

“信阳事件”进一步告诉人民、告诉历史，当年毛泽东在纠正以刘少奇代表的“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处境是多么孤立，工作是多么艰难？！

当时在信阳行政公署任专员的张树藩，临终前写了一个回忆材料，千秋功罪，留给后人评说。

兹将全文附录于后：

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事件

路石按：对于共产党前进中的失误，应该正视它，分析它，弄清事实真相，总结教训，这不仅对那些夸大事实借以攻击共产党的别有用心者是一个有力的回击，同时也是对一贯形“左”实右的……（人们）所犯罪行的批判。

1958—1959年前后，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置毛主席的多次批评于不顾，实行“左”倾（即形“左”实右——读者）蛮干、高估产、高征购，大刮浮夸风、“共产风”，造成了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对于当时中央对吴芝圃“破坏民主、堵塞言路，‘左’倾蛮干，死不回头”的批评，至今河南的许多过来人仍记忆犹新。虽然吴芝圃也承认“对河南五千万人民犯了罪”，然而“文革”中，饱受其害的人民对“信阳事件”又旧事重提，此时吴芝圃已调离河南，而追随吴搞浮夸风的省委副书记杨蔚屏、赵文甫首当其冲被群众批斗。1967年7月，杨、赵被中央定为“走资派”。……揭批“四人帮”中……邓小平还亲目为早已年老病死的吴芝圃召开“平反”大会。…… 本文作者张树藩在发生“信阳事件”时任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1993年，张树藩同志出于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感抱病写出了这篇信阳事件的回忆。世纪末的一天，笔者在北京看望了张树藩的妻子李瑞英同志（信阳事件的见证人之一）。此时张树藩同志已过世。李瑞英同志把这篇遗作送给了我们。同时我们还拜访了当年被吴芝圃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潘杨王”中的杨钰同志，他语重心长地说：“说假话是要死人的啊！”还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1958年毛主席在专列上听吴芝圃汇报后，指着窗外光秃秃的山头说：“你一年能搞成绿化？我不信”（关于毛主席对吴芝圃的批评见附件）。联系当今不也是在说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吗？

鉴于毛泽东论坛《三年自然灾害真相馆》开馆之际，献上此文，供同志们参考。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该区有大约一半的面积曾经是大别山、桐伯山老革命根据地。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地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桐油、药材和猪鸡鱼鸭等，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

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地区，在 50 年代末的“大跃进”期间，由于浮夸风、“共产风”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为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事件发生时，我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虽然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这一时期的血的教训，无时不在我的脑海中翻腾激荡。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现场会

1958 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喳蚜山群众为了兴修水利，要求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我们地委同意了群众的这个要求。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提名叫人民公社，喳蚜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 8 月份，全地区实行公社化。

1958 年夏收中，当时在喳蚜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 3200 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 7320 斤的更大浮夸典型。他们是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谎报的，当时我就不相信。地委书记路宪文跟我说出现如此的高产典型时，我说那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可能。我想一亩晒场能晒多少，怎么会一亩产几千斤小麦呢。于是地委就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县实地调查，回来说是真是的。然后我亲自到现场察看，证明并不真实。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以后，谁要是说是假的就挨批斗，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 1.2 万多人次。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信阳县有名的鸡公山公社浮夸到亩产万斤水稻，有个别的地方浮夸说亩产几万斤，还出现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典型。不过，1958 年毕竟是大丰收，虽然由于大办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 10% 左右的粮食，但群众生活没有出大问题，这年全区完成征购任务 16 亿斤。

在当年的大办钢铁和工业运动中，同样是浮夸成风。且不说炼钢的质量根本不行，数量也都是假的。许多地方把日产几百斤说成几千斤，商城县更绝，竟浮夸成日产 6000 吨。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开了一次全国大炼钢铁的现场会。事先我也去商城看了一次，认为是假的，有的小土炉一天费很大劲才能炼出几十斤，好的也仅是二三百斤。回到地委，我就和路宪文谈了我的看法，并说这样下去我们会犯大错误的。路当时对我的看法不同意，并说群众运动，气可鼓而不可泄，你看消极面太多了。所谓“看消极面太多”，就是我看有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随便打人，将山林松木乱砍滥伐，砸群众的锅来炼钢等做法，深感不安，认为得不偿失，并预感到要犯错误。

到 1959 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欠收或无收。当时地委几个书记分工，我主管农业、政法、财贸三条线。为了让全区各县市领导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我在 8 月初召开了一个各县市有关负责人的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秋收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将灾荒消灭在春节之前。但这个会议事先未经地委讨论，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彭德怀）的会议，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地委办公室汇总后，召开党委会讨论。当时地委 9 个常委中，8 个认为 1959 年农业生产比 1958 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 72 亿斤，而 1958 年不过 56 亿斤。我在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欠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 30 多亿斤，最多超不过 40 亿斤（后来证实只有 20 多亿斤，我说的也多了）。

“反右倾”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

8月底9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省委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路宪文不去，让我去参加。我先将地委集体讨论定的72亿斤总产说了，接着谈了我在地委常委会议上谈的意见。这便引起省委对我也有了看法，第二天就问路宪文说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路宪文向我问明情况后很不高兴，马上召集在省里开会的各县、市委书记，让重新报产量，各个县、市委书记开始都低头不谈，在路宪文一再逼迫下，才说：不是在家里都报过了嘛，还报什么？路说，有人可不是这么认识的。这很明显就是要发动大家把矛头对准我了。当时我不管怎么样，又在会上谈了我的看法，并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虽然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反右的，但不能因为怕反右就不实事求是。我说完后，县、市委书记没有一个说话的，可见大家是了解情况的，只是不敢说实话而已。随之扩大会议按省委意图要各地、市找右倾典型，展开批斗。尽管省委已把我定成严重右倾分子，可批斗就是发动不起来，没有一个对我批评的。路宪文无奈，抓住一个说点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这也算信阳地区在扩大会议上找到了一个所谓右倾分子。随即撤销了曹明的县长职务。

扩大会议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先到西平县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县。县委正在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瞒产动员，然后讨论报瞒产多少。我参加了会议，看到很多人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即感受到其中大有问题。于是我就下到两个公社看了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出现浮肿。我看到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征购已透底，人民生活无着落，已出现浮肿和外逃现象，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我说，瞒产可能有，但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生活问题，然后有什么问题再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他们县超征购了700万斤粮食，就让他们先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人提出动用国库粮食请示省里批准，我说来不及了，等请示批准后再拿出来会饿死人的，你们不要怕，一切问题由我负责。我跟县委商定后，一方面让我的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一方面开仓放粮安排群众生活，使这个县基本上没有饿死人。后来戴帽批斗时，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余德鸿同志也受牵连挨了整。

其他县的情况就不同了，都说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还召开了一些现场会。如鸡公山公社现场会，在场里圈着很多所谓瞒产粮食，其实就上边是一层稻子，下边全是稻壳子，完全是弄虚作假。类似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出现，这就不可能不把群众置于死地。群众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了，有的党员被开除了党籍。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路宪文在省委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的信一律扣压，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万多封。即使如此严格限制，还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信。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记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三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要查处。

在群众已处于死亡线上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开始杀牛吃，当时我虽然已被列入地委常委的批斗对象，但还未停止工作。在批阅公检法送来的案件时，看到群众杀牛的案子我就深感问题的严重，开始批了几件都是从轻处理的。到1959年10月，杀牛吃的越来越多了，尽管

报告上写的杀牛人都是如何坏，还加上了“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等罪名，可是我清楚地知道这都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干的。从此我就不再批处这类案件了。

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原来进行的包工包产试点也被批为右倾。这本来是地委农村工作部长延炳玉布置各县搞的，现在不认账了，把责任都推到下边。为此将息县、淮滨等数县农工部长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鸿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到反右时，马不敢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去搞的。就这样，马龙山为了杀人灭口，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发动批斗，将张福鸿打死了。然后说张畏罪自杀，立即埋掉了。

大量饿死人的情况震惊了中央领导

由于我在地委常委批斗会上一一直拒不认错，常委们就给我总结出了四条“严重右倾错误”：

（1）把 1959 年的特大丰收说成大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说，到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并在县、市委书记会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

（2）在 8 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得那么严重，否定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

（3）到遂平县进行反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一斤粮食，反而不请示报告省委，私自动用国库粮 700 多万斤。

（4）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的作风。

路宪文带结论性地说：你老张每次下乡，回来都向我说消极方面的问题，对 1958 年的小麦亩产 3200 斤和 7320 斤你不相信，对大办钢铁也不相信下边报的数字等等，这不是右倾又是什么？我劝你要老实检查，从此你也不要工作了。

此后，我除参加地委和专署组织的大小批斗会外，就是在办公室看书报。地委、专署召开的一切会议不仅不让我参加，会议的文件也不让我看，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了。我的秘书余德鸿也因同情我的观点而被撤职批斗，从此再没有一个人敢接近我了。但在专署党组织扩大会议上可以看出，没有一个人是在真的对我进行激烈的批斗，大都是轻描淡写地提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没话找话，应付了事。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是同情我的，事后证明也确实如此。

有一天，余德鸿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进来，他很害怕不敢来。我说小余你怕什么，不是也和我一样吗？进来谈谈话也好嘛。余进屋了，我问他一些情况。他说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滨老家两次。我问他两次回家干了什么，他说，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爷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问怎么半个月四个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么病死的。余说是瘟疫传染的（当时饿死的人统统说成是瘟疫，不能说是饿死的）。这使我感到问题更严重了，因为我知道余秘书的家还算是比较富裕的。于是我又对余说：事到如今，你对我还不敢说句实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时余的眼泪流下来了，哭得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才说出都是没有吃的饿死的。听后我也难过得掉了眼泪。接着我又追问：你们村饿死多少人？余说他没有多出家门，光知道他们村西头就饿死一半多，有不少户饿死都没有人埋。听到这些情况后，我的脑子像炸了一样。余离开后，我当即跑到地委找路宪文。路不在，主管党群的副书记王达夫在办公室，我就把余德鸿谈的严重问题向王讲了，并请地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挽救。事后了解，地委仍未采取紧急措施，始终不敢承认是饿死的，全区统一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而死的。直到 1959 年 11、12 月间，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以路宪文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报告，要了粮食。当时省委并不是不知道信阳地区的问题，省委主管财贸的副书记宋致和就曾在信阳到潢川县的公路两侧看到过几个饿死的人，省纪委书记刘名榜是信阳地区新县人，他回老家时，也在路上看到过死的人没埋和乡亲的饥饿情况。但那时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出来为人民说句实话。

地委召开大、小会议批斗我的过程中，也正是信阳地区饿死人最严重的时期。由于我坚

持不按省、地委要求作检查，不承认错误，批斗了两个月也就停下来了。到1960年2月，大量饿死人的问题总算制止了。路宪文有一天找我谈话，说你从今天起就开始工作吧，未再谈及检讨错误的事，并说中央内务部来了一个处长要到淮滨检查灾情，你可以陪这位处长下去看看情况。就这样，我的所谓严重右倾错误也不了了之，并从此开始了工作。

我跟内务部郭处长到了息县、淮滨两个县，郭处长看到灾荒十分严重就问我到底饿死了人没有。我说有，而且还不少。郭处长问饿死了多少人，我说自己从去年9月底就开始挨批斗，你来了我才开始跟你第二次出门，对全区情况也不了解，只能估计一下，饿死的人可能在20万到30万之间。郭处长一听就感受到问题的严重了，只待了两天，就回内务部了。事后得知，郭处长回去后向部领导谈了我说的话，部领导马上就让他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同样感受到问题严重，又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马上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他们经过三个月的调查了解，越查问题越严重，最后结论是饿死的人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

他们将调查结果向省委汇报后，省委不是正视错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掩盖。不仅未对信阳地委严厉批评处理，省委书记吴芝圃还对路宪文说，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1960年7月中旬，省委还派副书记杨蔚屏、李立和纪委书记刘名榜等在鸡公山上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地委扩大会议，统一认识，缩小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肯定“大好形势”，也就是贯彻省委捂盖子的精神。在这个会议上也说要发扬民主，让大家提意见。路宪文在总结性发言中，也做了一些轻描淡写的检讨，但根本没有涉及到问题的实质。我当时认为，路的讲话实际是表达了省委的意图。

我在这次鸡公山会议上作了三次发言，以承担责任、严格自我批评的态度，指出了一部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又触怒了省、地委领导。地委路宪文、延炳玉、王达夫、武建华等常委背着我连夜召开秘密会议，作出决定，下一次会议要以批斗我为中心。他们说张树藩要翻案。必须批判。我知道他们又要把矛头对准我后，找到新到省委当副书记的李产，谈了我的看法，并揭露了他们的阴谋。李书记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并安慰我说，不要怕，你谈的情况我都明白了。我估计李书记随即与杨蔚屏、刘名榜等省委来的负责人，研究了我说的话，决定会议不能再转到批判我的问题上了。于是当路宪文等向杨蔚屏汇报地委常委已决定将会议转向批我时，杨说不能再批人家了，现在得让人说话。

这时候，副省长王国华上山来了。他是信阳确山人，老红军，对信阳地区饿死这么多人非常痛心，非常气愤。他在会上指名道姓地严厉批评了路宪文，说张树藩、李瑞英两口子为群众说了实话，你们却整了人家。（我的老伴李瑞英1959年6月1日至7月1日曾带调查组在当时称万斤红旗乡的鸡公山搞经济调查，不但没有调查出亩产万斤水稻的高产量，反而给路宪文写报告要21万斤粮食安排群众生活。为此，路说她是否定大丰收，为富裕中农叫嚣。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后，李瑞英被调到省委党校，在全校学员和省、市直理论辅导员一千多人的大会上接受揭发批判，全省出名。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听说李瑞英不服，十分恼火，说因李态度不好，要加重处分，撤销专区妇联党组书记和主任职务，仅保留地委委员。）王国华的发言对会议震动很大。他是第一个点名批评路宪文的，也是第一个为我们说话的。

这次鸡公山会议决定逮捕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并要求将其判处死刑，主要因马主持打死了书记张福鸿。其中的文章事后才看清楚：省委是想用杀马一人表示对信阳地区发生的严重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还是为了捂盖子（对马定死刑报中央后，毛主席说，我还没有杀过一个县委书记，判死缓吧）。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问题查清报告党中央后，毛主席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来到信阳地区。这时省委书记慌了手脚，也仓促组织了六七百人到信阳，全面改组各级领导班子。先派省农工部长赵定远任信阳地委书记，省统战部副部长赵子平任副书记，高祥辉、刘

策分任地委组织、宣传部长；中央派的干部分别到各县、社任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主任等。原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停职检查，其他副书记、部长靠边站检查，原有 9 个地委常委仅留下我和纪委书记邱进敏没有动。

就在地县委彻底改组之时，中央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陶铸、王任重两书记，在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地委决定让我负责在第五步兵学校招待所招待他们。就在招待所会议室里坐下喝茶时，吴芝圃说话了。他的原话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吴指着我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问题吗？”本来我事先没想对中央领导说什么，但在吴说了这样一翻谎言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说话了。

我的原话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上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他敢批斗我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产时地委定的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产，又拿出 700 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才给扣上严重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谈什么？”这时，我看到吴芝圃的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我还想再具体谈谈时，陶铸同志阻止我说，不要再往下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判错你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啦。这样，我也就不说了。

第二天，吴芝圃和戴苏理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为什么省委书记和秘书长没经过地委亲自到县里逮捕杨守绩呢？就因为杨在 1959 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这显然又是为了捂盖子、掩盖省委错误而采取的行动。

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 8 人，其余县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 20 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用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这么多干部怎么会都变成了反革命，怎么能如此残酷地镇压呢？我想不通。本来地委决定让我负责抓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由于我感到这样做不对头，就拒绝担任此职，并在地委常委会议上忍不住大哭起来。我边哭边说：我在信阳地区工作十几年，和广大党员、干部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么多人怎么变成了反革命。我和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我领导去整他们，我确实下不了手，还是让我主管生产救灾工作为好。事后，就因为我没有服从省委、地委决定，还提出不要这样整干部，在运动初期划“三种人”（明白人、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糊涂人）时，把我划为“糊涂人”，那些自己应对信阳事件负责、事后却大整基层干部的人倒成了“明白人”。我虽不服气，但心想随你们划吧，历史最终总会是公正的。

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信阳事件的发生，与此前河南省开展的一些错误的政治运动有很大关系。1958 年，河南曾发生过震动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在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等人的主持下，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钰、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这些极“左”的做法使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瞪着眼说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记得在 1958 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

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这样一些异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又推向了高潮。

这就是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实不止信阳，全省各地都有饿死的人，只是信阳更多一些。因此，信阳事件，实际上也是河南省事件，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应负主要责任。

吴芝圃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长期当中学教员，抗日开始就参加部队工作，在新四军四师当政治部主任。他对地方工作是外行加个人主义，再加上用人不当，把品质恶劣的人用作高参，终于造成大错。本来吴芝圃在河南威信是高的，经过反潘复生之后，威信就大大降低了。群众说：“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这种民谣不少，说明谁是谁非人民看得最清楚。

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是多么听话，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一九九三年 于病中

附：毛主席对吴芝圃的批评 路石摘录

（一）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主席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主席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二）毛主席亲自主持两次郑州会议，会上毛主席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大队为基础。毛主席到武昌后又亲自给吴芝圃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他：“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

（三）1958年，吴芝圃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实现四化（即：粮食达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扫文盲”，毛主席在会上批评说：“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会后又把吴芝圃叫到武汉，说：“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最后毛主席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风，就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

（四）1958年4月29日，毛主席《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中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要管现实可能性……，吹上一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收获多少就多少，不可讲不符合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对人民有利，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自己，二害人民，总是吃亏。”而吴芝圃却吹嘘：“一九五八年夏季粮食产量二百二十三亿斤，平均每人达450斤以上。”“一九五八年全省每口人合到一千五百斤左右的粮食。”为他的高征购打下基础。

《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序言

杨松林先生所著“真相”一书，全面、客观地分析了1959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我国部分省份发生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对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量、造成这个重大悲剧的原因和教训，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公正的评述。

“三年困难”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影响深远。建国后最初的十年里，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均取得伟大成就，人民生活大为改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享有崇高威望。1957年“一五”计划胜利完成，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在凯歌猛进时陡然遭遇三年天灾，粮食产量锐减，加上政策失误、调整不及时，从1959年底开始，饥荒向全国蔓

延，部分地区的农村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直到1962年情况才开始好转。

和旧中国曾经发生过的无数次饥荒相比，“三年困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有的一次饥荒，而且影响遍及全国城乡，在严格的粮食定量配给制度下，不分上下，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尝过挨饿的滋味。所以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小娃娃也已步入老年，但它留给全社会的创痛记忆至今难以消退。

感性的记忆不等于理性的分析。因为每个“过来人”的经验都只是局部，谁也没有“亲眼”看见“饿死几千万人”。要准确还原当时的真相，不仅需要经验，也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具备从宏观上把握全局的能力。

本书作者作为当年的亲历者和一位严肃的学者，本着对国家的责任感，大量阅览有关文献，遍访各界人士，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拿出了富有创见的成果。

有关三年“困难时期”的研究成果中，关于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的估算，因统计资料的不足与杂乱而倍感困难。从1000万到4000万，越估越高。

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首次公布了1958年—1961年的人口数据。第一栏是年底人口数，第二栏是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理论上，年末人口-年初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即两栏数据必须吻合。根据第一栏，1960年、1961年年末人口分别比上年增长-1000万、-348万；第二栏由“出生人口-死亡人口”推算，1960年、1961年则分别比上年增长-305万、250万。两组数据存在明显差异，且第一栏反映的人口净减少数字触目惊心。

实际上，1955年—1980年，两栏数据每年都相差上百万。1964年、1982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之间也存在着矛盾。

1982年前的人口统计数据，来自公安部系统的历年户籍登记。简单地认为政府部门“造假”是不严肃的。不搞清楚其中原因，研究就缺乏事实的基础。但是，此前所有的研究者都绕开了这个难题，或采用非权威数据，或主观挑选、编造数据、生造算式等，这就很难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而社会上流行的“饿死3000万”的说法，恰恰就是来自这些中外“权威”的论证。

本书的研究，从搞清楚当时的户籍管理、人口统计办法入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及对应的社会状态，对1953年—1980年期间的人口数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部分采用孙经先的观点)。

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建立于50年代初，先城市后农村，至1960年基本完备。这一时期，城乡间有数千万人的迁徙活动，出现了上千万的户口重报、漏报，户籍人口数严重偏离实际人口数。又因政策调整使户籍人口数出现大幅起落(而非实际的人口自然增减)，或称户籍人口的机械性增减。

1955年—1960年工厂大量从农村招工，很多人获得城市户籍而不注销农村户口，累计1000多万。1960年底动员约2500万人返乡，部分人返乡后自动恢复原户口，户籍人口机械减少约1000万；部分人滞留城市导致户口迁入漏报，其后十几年陆续纠正补报，其间城镇和农村户籍人口每年都出现机械增加。

1960年、1961年，大量农民逃荒，此时出生的儿童漏报户口，待情况好转后回乡补报，多登记为1962年生(1964年人口普查时发现)，推算有500多万人。

1953年—1958年，农村漏(瞒)报死亡人口约800万，1959年—1961年，农村生产队建立集体户口，按规定需补登死亡，表现为户籍人口减少、死亡率提高。

作者据此推算：(1)1960年—1961年没有1348万的人口凹陷，而是有1241万的人口增长；(2)扣除正常死亡人口，1959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350万~400万。

这样，作者对这一时期《中国统计年鉴》人口数据的矛盾和人口变动的规律，从正面给出了完整而恰当的解释。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符合情理，理论自恰的解释，不愧为一家之言，值得学界重视。

六十年前的中国，一穷二白，人口众多，农业基础薄弱。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治国经验不足，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中，失误和挫折在所难免。尽管作者证明了，“三年困难”中非正常死亡人口远低于流行的“饿死 3000 万”之说，但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犯了这样大的错误，也是愧对人民，愧对历史的。要客观全面地认识当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弄清前因后果，举一反三，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本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

研究教训有不同的出发点。人民曾经对共产党的领导无限信赖，对闹出如此大的祸事痛心疾首，批评当时的政策错误与领导责任，带上个人情绪也难免。

有人将发生饥荒的原因归结为人民公社制度和集体经济，这说明他们既缺乏中国农村制度演变的知识，也缺乏宏观的历史把握能力，偏见使他们戴上了有色眼镜。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中外学者，选择性地叙述史实，任意歪曲历史真相(如三年风调雨顺、国家不进口粮食等)，极力夸大灾难规模和政策失误，上纲上线，无非是要彻底否定新中国的前三十年。

多年来，理论文化界不少人，借“思想解放”之名，极力营造崇拜资本、蔑视大众、诋毁革命和爱国主义的舆论。或者任意歪曲和解读历史，或者任意解释当代，对当前种种社会弊端指鹿为马(如不顾巨大的劳资鸿沟，一味指责“国企垄断”导致贫富分化)，连起码的事实和基本逻辑关系也不顾了。

欲灭国者先灭史。主张在中国搞“欧美模式”的人，不会看不到当今资本逻辑泛滥造成的社会危机和自身社会基础的脆弱，为此就更要清算历史，从根子上否定中共领导的革命、颠覆当代中国基本制度的合理性。科学地认识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关系到中国

我为什么要写“关于饿死三千万”真相一书？

作者：杨松林

我想力图全面、客观统计和分析 1959-1961 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及原因，还原历史真相！用简洁、科学的方法拆穿那些国内外所谓“权威专家”之流，是如何把非正常死亡人数奇迹般扩大 10 倍的，以此来驳斥“饿死 3000 万”这个弥天大谎。

2009 年春在北京碰见浙江大学的河清先生，他说他在主持编写一套丛书，要我写一本关于中国“困难时期”死亡问题的书。我答应了，写了大约 10 万字。这套丛书没出，也就没往下写。此后虽然一些朋友说这个课题很重要，但觉得出版困难，一直没再动笔。

2011 年春读了一篇关于苏联解体的文章。文章介绍了关于戈尔巴乔夫推动的“重评苏联历史”中“解密”斯大林迫害死多少苏联人的“研究”：从几百万到上千万，再到几千万；还分析了苏联人听信这些结论对苏联解体 and 苏共解散的作用。看着看着脊背有些发凉。

苏联为什么解体的说法有很多。

开始说是有“特权阶层”。实际上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低基尼系数的社会：苏共总书记与普通劳动者工资差别不过数倍，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以及城乡居民之间几无差别甚至倒挂。而那点所谓“特权”即使在西方国家也算不上啥事儿。“阶级斗争说”显然说不通！

后来说是计划经济体制僵化，与西方差距越拉越大，80 年代经济增长缓慢，最终到了“崩溃边缘”。可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苏联人均国民收入 1980 年已达到 9554 国际元，美国是 11528 国际元。僵化的经济体制能让苏联人均收入从不足美国的五分之一在三十年里变成五分之四？收入差不多，分配更平均，美国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一定比苏联老百姓好？西方国家刚经历 70 年代焦头烂额的“滞胀”，80 年代年均增长不过两个多百分点，比同期苏联还低。数据不支持这个说法。

最新说法是，一党执政不民主，垮了台。可不民主的国家多的是，海湾六国个个酋长当

家。人家沙特皇族和国家干脆一个姓，也没见垮台。

有点靠谱的说法是，“社会帝国主义”与美帝国主义斗法烧钱、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在阿富汗没完没了地烧卢布——这倒真会耽误改善民生。

不过有一点肯定会起作用。假如有人“解密”说这个执政党曾经不分青红皂白搞死了数千万人，每几个苏联人中就有一个死于非命，而且大多数苏联人都相信了，结果会怎样？结果多数苏联人会认为苏共是“反人类组织”，没下台是老天瞎了眼！这种草菅人命的制度早该完蛋了。民心向背见胜负，就算戈尔巴乔夫拼命撇清自己，一个有“犯罪前科”的组织的总书记能有个好吗！

这很像老戈指使人往一把枪里装弹药。既然枪口对着斯大林和“前苏共”，当然是威力越大越显得自己与“老路”切割的决心大：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再到几千万。火药装满了，扣扳机的是叶利钦——轰——一声，已经是新思维的苏共、苏联，连同戈尔巴乔夫先生自己，都找不到了。

等 90 年代前苏联档案解密，当人们知道斯大林时期包括处死和死于劳改营的人总计不足百万(包括刑事犯罪)时，晚了！

想到这里，已经不是这本书该不该写了，而是自己有没有能力写了。

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已经有很多专家就此进行过充分的论述，牌子亮出来让人景仰：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复旦大学教授、前公安部三局户政处的公安干警、《炎黄春秋》副主编……他们没有像苏联人那样“层层加码”，一开始结论就是饿死了几千万。连令人尊敬的某农业领域专家都在《广州日报》上证明当时饿死 4000 多万人，还说是“亲眼见”！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承认仅 1960 年就比较 1959 年年末人口少了 1000 万。

专家、名人众口一词，自己还有研究的余地吗？

等我深入进来后发现，研究 1959 年—1961 年中国人口死亡问题既难又不难。

说难，是因为官方人口统计中不同口径的数据之间有很大矛盾，而且口径繁多，只有综合分析，消除矛盾才能有结果。

说不难，是因为只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遵循统计学、人口学的基本规则，具备基本数学知识就够了。

专家们推荐的基本计算方法是：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当年死亡人口-正常死亡人口

这个算式虽然有毛病，但大致能自圆其说。用“官方数据”和这个算式能算出几千万“非正常死亡”吗？

实际一验算会发现不能！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人口统计“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当年死亡人口=当年年中人口×当年死亡率

代入《中国统计年鉴》人口数，1959 年—1961 年全部死亡人口为 3600 万。这个数字竟然比很多学者给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还少！

问题在于这还要减去“正常死亡人口”。1956 年—1958 年是“正常年份”，如果把这三年总计死亡的 2143 万作为“正常死亡”，那么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3600 万-2143 万=1457 万。也就是说，真的回到规范计算方法和官方数据上，没有人能计算出超过 1500 万的“非正常死亡”！

这些专家尤其是外国人口学专家都不是白当的，都清楚规范的计算方法和可应用的数据，但他们怎么依然不约而同地往更大数字上想呢？

我想可能是这个原因：

1983 年中国第一次公布了 1958 年—1961 年的人口数据。数据显示 1960 年年末人口比上年减少 1000 万，第二年又减少 348 万。两年累计比上年减少 1348 万！要知道，此前每年

年末人口都比上年多出 1200 多万。这意味仅这两年人口就比“正常年份”少了不下 3800 万。还有 1959 年呢?传说河南信阳、安徽阜阳“饿死人”主要是那一年!

减少的人口肯定是死了,这还要加上出生的。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人口统计“主要统计指标解释”可以推演出这样的算式:

当年死亡人口=当年出生人口-(当年年末人口-上年年末人口)

就是说 1960 年死亡人口=1960 年出生人口-(-1000 万)。《中国统计年鉴》上 1960 年出生约 1400 万人。这样一计算,1960 年有 2400 万人死亡,减去一年 715 万“正常死亡人口”(1956 年—1958 年死亡人口的算术平均),仅仅 1960 年一年“非正常死亡”就接近 1400 万,还有 1959 年和 1961 年呢?

这让人不往“饿死 3000 万”上想都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者就面临一个难题:按照人口统计学规范计算,这三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最多能算到 1500 万。但从年末人口减少的数量上看,这个数字应该起码有 3000 万。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为了揭开“真相”,他们另辟蹊径,各显神通。

说实话,为了搞懂这十几个中外专家究竟怎么算出几千万的数来,昏天黑地搞了一年多,90%的时间都用在上面了。等到搞清楚他们是怎么计算的,又让我啼笑皆非。

三年总计 3600 万死亡人口是研究的最大障碍,几个外国人口学者这样解决了问题:

1982 年刚成立的中国计生委搞了一次妇女婚育情况抽样调查,他们发现 1953 年—1964 年间,调查推算的出生人数比《中国统计年鉴》上的登记出生人数多出 5000 多万来。在死亡人口=出生人口-(年末人口-年末人口)的算式中,只要“出生人口”因婚育调查增加,死亡人口就会以同样幅度增加。超出登记的出生人口部分属于“漏报出生”,超出的那些死亡人口自然属于“漏报死亡”。他们推算的死亡率比登记的死亡率高出近一倍来。这样,死亡人数太少的问题就被解决了。

计算“非正常死亡”(外国专家们用的是“超线性死亡”,含义差不多)还要很多步骤,但是研究进行到这里时他们就会面临一个问题:

“漏报出生”是什么意思呢?是“孩子出生了但一直没登记户口”的意思。意思不错,会发生吗?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每年会有数百万孩子的家长坚持不给孩子登记户口吗?是个中国人就知道,肯定不会!别说那时候没户口就没粮本没布票没.....没法活,就是现在没户口也上不了学结不了婚!如果有,那一定是没来得及上户口就死亡的婴儿。这些人确实生了一次还死了一次,但一定与“饿死 3000 万”无关!

外国专家津津有味地计算了半天,没考虑到算的是中国孩子。当然,人家毕竟是学者,一头雾水以后,法国人口学家说得很中肯:“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

一一指出这些学者论证的错误篇幅太长,但有些研究还是值得说说的。

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以下简称《墓碑》)在中国影响巨大,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在这本 1100 页的巨著中用“官方数据”计算出“困难时期”中国“饿死”了 3600 万人。读完《墓碑》我惊讶地发现,杨先生从头到尾没有用“官方数据”“计算”出 3600 万。他用了五个违反统计学和人口学规则的计算方法才得出“1958 年—1962 年非正常死亡 2098 万人”的结论。他的 3600 万是通过在王维志同志的研究上加码实现的。爱“求甚解”而不“好读书”的流行文风让人惊叹!

问题在于,做过公安干警的王维志同志的算法更不靠谱!

王同志怀疑当年的同事们“造假”,于是把 1961 年的年末人口“减掉”1500 万,再把 1959 年—1961 年三年的自然增长人口“减掉”1361 万。然后代入死亡人口=出生人口-(年末人口-年末人口)的算式中,计算出这三年“非正常死亡”3378 万。

且不说王同志自创一组人口数据的问题,关键在于这位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人口统计专

业的毕业生、社科院人口所的专家用的是个“不等式”！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年末人口-年末人口

但是代入《中国统计年鉴》给出的人口数：

出生人口-死亡人口 \neq 年末人口-年末人口

用“年末人口-年末人口”计算，1960年比1959年少了1000万，用“出生人口-死亡人口”计算只少了305万。同样算法1961年没有比上年减少348万而是增加了250万。关键是，1955年—1980年这两组数据年年相差几百万。也就是说，如果实际运算，只能把这个算式看作不等式。

如果坚持认为是等式，就会计算出这样的结果：1964年死亡人口=2733万(当年出生)-1327万(比上年增长)=1406万。减去700万正常死亡人口，“非正常死亡”706万。按等式计算，1962年—1964年的三年能算出约1500万“非正常死亡”来！

先不说为什么人口统计数据会产生这么大的矛盾，起码在搞清楚以前不能把这个实际的不等式当作等式来用。但是这个不等式不仅王维志同志用了，其他几个专家包括外国专家也用了。

起码有三个学者另行设计了计算“非正常死亡”的新算式。让我目瞪口呆的是，这些算式看起来眼花缭乱，但把算式一推演，发现他们算的根本不是什么“非正常死亡”而是别的东西，甚至说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也就是看了他们的研究，才对自己没学过高等数学就胆敢研究这个问题有些释然。

开始我还是尽量用学术文风分析评论这些研究。当注意到他们竟然没有一个不是靠违反人口学、统计学基本规则，不是靠没有统计意义的人口数据或者编造、挑选人口数据得出结论时，慢慢感觉自己在干一件“脏活”，文字也不知不觉退化为网络语言。如果读者对第一编调侃的文风不喜欢，在这里先道歉了。

恰好2011年初再次动笔时，在网上看到徐州师范大学孙经先教授一篇文章，觉得孙老师的分析逻辑周延、事实清楚，就设法与他联系。后来在郑州、北京、济南、徐州见了几次面。通过讨论，对研究1959年—1961年中国人口死亡情况有了信心。

人口统计是一个尽量反映人口实际情况的活动。这项工作既牵涉到统计的方法的科学性、手段的完备性，还牵涉到迁移漏报、出生漏报和死亡漏报的影响，严格来讲只能逼近实际而不会等于实际。死亡问题研究是依据人口学和统计原理，对户籍登记、人口普查得到的各种人口数据(包括国外同类国家的人口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以历史原貌为基础消除各口径数据之间的矛盾，找到一组最逼近实际的数据。

不少研究者对饥荒期间的死亡情况进行了广泛、大量的调查，访问了当事人，写出了很多感人的情节。我对这些专家的努力表示钦佩，并同意他们认为这一时期发生过大量饥饿至死事件的判断。但我也清楚，经过挑选的个别加起来不等于整体。我在信阳、驻马店、南阳、安阳等地进行了调查，目的是两个：一是确认一些地方确实发生过死于饥饿的状况；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安局和民政局工作人员，尤其是当年从事户籍工作的老干部了解当时户籍管理规定和实际管理情况。这里，我对信阳市党史办、统计局，光山县党史办，新县公安局和遂平县公安局帮助过我的同志表示感谢。

研究人口问题首先要了解户籍管理办法，了解人口数据是怎样统计出来的。

1982年前，《中国统计年鉴》的人口数据是公安部门通过户籍登记得到的。基层户籍管理部门对居民的出生、死亡、迁入、迁出进行登记并以此增加或减少户籍人口。数字逐级汇总形成全国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年末户籍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是根据实际登记的出生人口数、死亡人口数和年末人口数推算出来的。1953年、1964年和1982年进行过三次人口普查。这三次人口普查除了上述口径外，还增加了普查当年各年龄段的人口数。一般认为，

人口普查的数据更接近实际人口情况。这样，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可以对户籍登记得到的口数进行修正。

依据以上方法和数据，在孙经先教授研究的基础上，我最终推算出的数字是：

1960年—1961年并没有1348万的人口凹陷，而是有1241万的人口增长。

1959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在350万~400万之间。

这里，所谓“非正常死亡”是“按照1959年—1961年前后年份死亡人口为标准，这三年死亡人口多出了350万~400万”的意思，也被称为“超量死亡”或“超线性死亡”。至于这数百万人的死亡原因是什么，并不能依靠上述研究作出判断。如果根据这期间农作物大幅减产、记载和回忆出现了大面积饥荒和因饥饿死亡而判断这些人的死亡与饥饿有关，我认为判断是客观的。

在调查中很多人回忆说有非常多的老年人扛不住饥饿而死亡。通过1953年和1964年人口普查中各年龄段人口数可以证实这种说法。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64年40岁~64岁各年龄段人口数比1953年增加20个百分点，但65岁以上人口却比1953年减少了1个百分点。同时，东北、山陕、东南一些受灾较轻的省份65岁以上人口有十几个百分点的增长，而豫、皖、鲁、川、甘等饥荒严重的省份65岁以上人口减少了一二十个百分点。这就可以证实饥荒严重的地区60岁(当时60岁)以上的老人超量死亡比较多。把灾害较轻省份的增长率作为65岁以上人口“正常增长率”，那么全国65岁以上人口比“正常”减少了300万左右。表明350万~400万超量死亡人口中75%~85%是因为60岁以上老人的“过早死亡”。

一个哥们儿在知道我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时嘲笑说：“你就算研究出没死3000万而是死了2700万，有意义吗？”当然数字不是2700万，但超量死亡三四百万也是执政者交代不清的事。

在大家忙着减肥的时候让人认识“因饥饿死亡”是件困难的事。

可是，历史既然是历史，就要回到历史的环境中，站在世界的角度进行认识。

50年代全球人均粮食产量250公斤左右。90年代初，全球人均产粮突破360公斤，中国提前十年实现了这个指标。人均产粮360公斤时中国人感觉吃饱了。现在议论五六十年代尤其是饥荒时期中国人肚子的事，就必须注意在当时的人均产粮情况下，肚子会有什么感觉和感觉造成的结果：

1949年中国人均产粮209公斤，新中国成立前收成较差年份也是这个水平；而印度80年代人均产粮徘徊在200公斤~220公斤上下。

中国饥荒史研究表明较大饥荒死亡人口在千万以上；艾奇逊回忆说民国时期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在《饥饿与公共行为》一书里提供了这样的数据：“印度每年会有400万人因营养不良和相关问题而过早地死亡。”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学者的调查显示当时中国人预期寿命为35岁，“人过七十古来稀”。印度这时期也是这个水平。80年代印度人预期寿命比中国少10岁。1980年，印度人口死亡率为12.6%，中国是印度的一半。

以上数据表明，人均产粮在200公斤上下的时候，无论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还是80年代的印度都会有数百万人“因营养不良和相关问题而过早地死亡”，尤其是老人。

1960年—1961年中国人均产粮212公斤。

当然，即使人均产粮超过360公斤，也难以避免因饥饿而死亡。登陆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中国网站就会看到：

2007年，全世界每6秒钟就有一个儿童死于营养不良，每天有25000人因饥饿丧生。一年有1000万！

列举以上数字并不是为当时的政府开脱，本书第三编详细介绍了我为什么赞同“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给出这样的背景是让忙着减肥的人读这本书时找到点感觉。当然，也希望

能把那支枪的枪膛里的火药抠掉一点儿。

本书第一、二编涉及大量算式和数字，很多人读起来会觉得既吃力又乏味。但没有办法，因为离开这些内容就写不成这本书。

本书第二编主要是引述孙经先教授的研究。另外，杜伦大学的王星博士在统计学方面给我以很大帮助，魏亚洲和吴维平老弟对定稿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见并对文字进行了校订，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杨松林

2013年3月15日于三亚

来源：<http://www.wywxwk.com/Article/lishi/2013/08/304777.html>

坚决清除泼向中国共共产党的这盆污水——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处谬误的分析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书的作者得出减少 1000 万人口结论呢？他们没有对我国六十年代户籍人口变动进行任何的研究，仅凭主观推断就轻率地把户籍人口的减少完全当成了真实人口的减少！

近些年来，某些人打着所谓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迎合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的需要，杜撰所谓“改写”、“重写”甚至“戏说”历史的文章，大做包括中国社会和共产党历史的翻案文章，极尽其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之能事。他们污蔑栽赃毛泽东同志、攻击诋毁中国共产党，妄图达到搞臭、颠覆人民民主专政和抹黑、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恶目的。他们与混进党和政府内的腐败分子一起，败坏了党风，污染了社会风气，毒化了人们的思想，致使本有的社会诚信严重缺失，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受到了强烈的损害。

西方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和国内的自由化分子不厌其烦地拿我国六十年代暂时困难人口非正常减少问题来说事，就是目前污流浊浪中泛起的很不可小视一股。他们把这作为毛泽东的一大“罪过”，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块“软肋”，是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的绝好“例证”。在六十年代我国人口问题上做文章，就成了他们的撒手锏，作为泼向中国共产党的一盆污水。

比如，军事科学院的辛子凌就写道：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 3755 万 8 千人，并引用某个刊物发表的所谓研究结果说，这比中共上台前 2129 年中国历史发生的 203 次(死亡人数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 2991 万多人还多 764 万！其他诸如海淀进修学校历史教师袁腾飞等人，也如是说。

一、《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第 563 页的谬误

笔者不得不深为遗憾地指出的是，刚刚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第 563 页在“继续大跃进和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标题下行文的最后，就写有这样一段话：

“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 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 1000 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 年有 9 个县死亡率超过 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事情。这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其沉痛的教训应该认真总结和记取”〔①〕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根据“正式统计”中的两个注释中，1000 万的数字注明出处是：1、国家统计局编：《1983 年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03 页；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 页。信阳地区的数字的由来是《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4 页。

那末，1983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即《1983 年统计年鉴》中的数字有无错误和造假呢？没有，没有错误，也没有造假。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既无错误，也没有造假。

那么，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和资料汇编有无 1960 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 1000 万之说？没有，也没有说。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书的作者得出减少 1000 万人口结论呢？

他们没有对我国六十年代户籍人口变动进行任何的研究，仅凭主观推断就轻率地把户籍人口的减少完全当成了真实人口的减少！

大家请看啊！三年自然灾害，仅“1960 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 1000 万”，那么三年不就正是 3000 多万吗？这与国内外反动势力和自由化分子们的说法不正好一致吗？

这可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权威研究机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向全世界公开承认了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饿死了 3000 多万人”！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书作者的这一主观推断，不仅配合了全世界所有敌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攻击和污蔑，更为严重的是，它数十倍地夸大了党所曾经犯过的而又改正了的错误，它严重地误导了社会舆论，抹黑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抹黑了在伟大领袖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求之不得的举动。

难道这不是通过向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献礼成果的形式泼向中国共产党的一盆污水吗！难道这不是通过向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献礼成果的形式射向中国共产党的一支毒箭吗！

二、孙景泽先生解开户籍统计结果矛盾之谜

六十年代，尤其是 1960 年我国人口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由于我国六十年代自然灾害影响和党内某些领导人的不实事求是、浮夸风等，1960 年到底非正常死亡多少人呢？

这是一切好心的人的一个疑问，也是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1960 年我国统计局数据之间有个不能解释的矛盾：1960 年底的户籍人数应该=1959 年底户籍人数+1960 年出生人数—1960 年死亡人数+外国移民迁入国内—中国公民迁移国外。由于国际移民当时很少，忽略不计。

可是这样统计的结果，却少了 1000 万户籍人口！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户籍人口的减少是否就是真实人口的减少呢！

孙景泽先生，通过对 1954 年(即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至 1982 年期间 29 年我国户籍人口变化的研究，解开了人口户籍统计结果矛盾这个历史之谜！也就是说，在国家统计局数据中，我国五六十年代的户籍人口的统计数据与实际人口数超出寻常的不一致之谜被解开了！

那么孙先生是如何解开这个谜的呢？

他通过研究发现，在 29 年期间户籍人口的统计结果出现了非正常变化，这一变化大大超出了统计逻辑误差。

由于工业发展和生产大跃进，我国在 1956 年至 1959 年期间出现了从农村到城市人口大迁移，由于户籍管理法规规定的漏洞(不用迁移证只凭其他证明就可以落户籍，等)和管理不严格，在大迁移中，发生户籍人口非正常大量增加现象，是由于重报、虚报户籍人口 1144 万人的结果。这些重报、虚报的户籍在 1960 年至 1964 年期间，由于户籍管理趋于严格等原因(诸如核实人口以计划供应粮油等)而被注销。

由于遇上经济困难，我国在 1960 年 9 月至 1964 年期间进行了城市人口大精简工作，形成了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由于农村当时对于户籍的依赖性差，不少人迁出了城镇户籍，而没有迁入农村，就是说，在大迁移期间，有部分人拿到迁出城镇的户籍后，不想或者没有很快迁入农村户籍。(尤其是 1960 年底拿到迁出城镇户籍的，因 1960 年初已经领到该领的票证了，就没有在当年底迁入农村户籍，这样 1960 年的户籍统计人口就减少了。〔②〕)

结果出现户籍人口非正常大量减少的现象，这是因为有 1510 万人口漏报了户籍的结果。上述漏报户籍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在 1970 年至 1979 年期间又补报了户籍。

由于上述原因，造成 1960 年至 1964 年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 2654 万，这是我国六十年代初户籍人口非正常大幅度减少的根本原因。这一减少与人口死亡无关。

孙景泽先生研究得出：关于 1960 年我国户籍人口统计比 1959 年减少 1000 万人，其中 695 万是由人口户籍迁移的原因造成的，与人口死亡无关。同时，他还研究并论证了，所谓“死亡漏报是造成户籍人口大量减少的原因”是错误的。因为漏报死亡的人口数字只可能是短期的，不可能在以后多次的人口普查中仍然保存户籍。

倒是出生漏报影响户籍统计数据结果，即减少户籍人口。例如：截止 2000 年 11 月 1 日，人口普查结果 1960 年出生的还存活(40 岁)的有 14684726 人，可是 1960 年户籍统计出生人数仅有 1391 万多人，就是说经过了 40 年了，出生的人，非但无一人死亡，反而增加了 77 万多人！根据 1959 年出生 2000 年存活的 1305 万人推算，1960 年比 1959 年实际出生应多 162 万！

根据国家统计局《1982 统计年鉴》的数据，1959 年出生 1650 万，孙先生研究并论证，如按照 1960 年实际出生人数比 1959 年多 162 万调整，那么该年出生人数应为 1811 万，与《1982 统计年鉴》的数据 1391 万比较，漏报人数为 420 万！由于 1960 年漏报出生人口 420 万，所以 1960 年实际人口比 1959 年至少增加 115 万。

由此得出，我国 1960 年比 1959 年的真实人口绝不是如户籍统计数字那样减少了 1000 万，反倒是增加了 115 万！（户籍变动少登记的 695 万加上漏报出生 420 万，共 1115 万）

同时，孙景泽先生还指出，1983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通过汇总全国户籍登记得到的真实数据，没有经过人为的修改和伪造。数据中的所有人口数字都是户籍数字，所出现的所有矛盾都只是表面上的，都可以用本文的方法加以合理的解释。六十年代初我国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包含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死亡率之中。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1960 年我国人口死亡率因出生人数漏报应当下调，具体下调幅度有待进一步研究。

1960 年我国真实人口比 1959 年增加 115 万，而不是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书的作者所说的减少 1000 万！

三、孙学文研究员已指出过因饥饿引起死亡的人数

关于我国六十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在 2009 年 12 月，几个网站就发表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孙学文研究员的文章：“毛泽东盖世功勋与日月同辉”，[③]孙在文章中，也得出了与孙景泽先生相似的结论。他在文章中写道：

关于此间出现的“非正常死亡”问题。由于 1958、1959 年和 1962 年都比上年新增人口 1200 多万人，不存在非正常死亡的问题，问题出在 1960-1961 年，这两年总人口分别比上年减少 1000 万和 348 万人（顺便说一下，改革开放 31 年来，每年人口死亡总数在 800-1000 万左右），表现在这两年人口死亡率高达 25.43‰和 14.24‰。考虑到出生率等因素，西安交大蒋正华教授采用历年生命表参数计算和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对美国科尔教授线性公式计算结果进行技术性修订（因存在矛盾或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他们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在 1691—2158 万人，那种估算在 3000-4000 万人以上则是高估。

至于说“三年大跃进活活饿死了 3755 万人”，那完全是复辟狂捏造。因为这是毫无根据的信口雌黄。人口专家一般讲的是“非正常死亡”，包括饥饿死亡及由营养不良引起其他疾病死亡、自杀、他杀及各种交通事故和自然灾害（如地震灾害、火灾、矿难、台风）等死亡，还包括一个大项，即营养不良造成出生率的下降而使新出生人口减少。前文引用蒋正华、李成瑞和美国科尔教授测算的数据是“非正常死亡”，而非复辟狂所说的“活活饿死的”。如果只算饿死的，不包括少出生的人口，那么把所有死亡人口全部算作“饿死的”也根本不到复辟狂捏造的 3755 万人的数字。按复辟派的说法是“三年大跃进”饿死人，是指 1958-1960

年，不包括 1961-1962 年开始经济调整时期。我在前文已说了，1958 年、1959 年和 1962 年比上年新增人口都在 1200 万人以上，比 2008 年新增人口 673 万人增长将近 1 倍(以本年底人口总数减去上年底人口总数得出)，得出这三年不存在“非正常人口死亡。”

那么只剩下 1960 年存在“非正常死亡”的问题，按国家统计局后来经过核实的死亡率测算，1960 年死亡人口测算公式是：上年底总人口×当年死亡率，即 67207 万人×25.43% =1709 万人，虽然复辟狂未列入 1961 年开始调整的年份，但因为 1961 年年底总人口比上年减少 348 万人，我认为存在非正常死亡问题，按上述计算公式计算，1961 年各种原因死亡人数为 940 万。把这两年死亡汇总共计只有 2649 万人，比复辟狂所说的 3755 万人少了 1106 万人；况且中国历来统计，病死的要占死亡人口的绝大多数，至少占 80%以上，2008 年包括恶性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病、呼吸系病、损伤和中毒、内分泌营养和代谢及免疫疾病，消化系统病(包括营养不良和冻饿夭亡)、泌尿、生殖系病、神经系病和传染病等十种疾病死亡人数占城乡死亡总人数的 92.55%和 93.53%。即使按 80%最低比例扣除疾病死亡，也应该从这两年总死亡中减去 2119.2 万人(2649×0.8)，那么充其量称为饿死或营养不良引起死亡的为 529.8 万人。

前文我将 1960-1961 年与 1959 年相比，这两年多死亡 721 万人；与 2008 年相比多死亡 783.4 万人。按 80%病亡扣除，其中因饥饿或营养不良引起死亡的人数充其量在 144.2-156.7 万人。仅及复辟狂捏造的 3755 万人的 3.8%-4.2%之间。也就是复辟狂们在这里夸大了 23-25.1 倍。

这两年确实存在饿死人的问题，尤其是在我的家乡——安徽部分农村，这与当时粮食生产浮夸风和随后的高征购政策有关，但粮食放卫星和随后的高征购政策不能只归罪于毛泽东一个人，用邓小平重新复出后所说，当时毛主席头脑发热，刘少奇、周恩来和我，头脑都发热，只有陈云未吭声。但陈云、薄一波等在 1958 年钢铁产量翻一番运动中提倡土法炼钢，也有责任。“三面红旗”都不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而是别的领导人率先提出。〔④〕

该文发表在 2010 年 1 月，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书的后记是 2010 年 12 月写的！对于这篇研究我国问题包括人口问题如此重要的文章已经发表了整整一年。在此要提醒人们注意的是，早在这年的 4 月 21 日乌有之乡就发表过名为邈邈道人题为“五六十年代人口统计数字的困惑”〔⑤〕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就对六十年代真实人口大量减少提出了非常有力的质疑。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书的作者们，是没有看过这些文章呢？还是看过文章之后对其观点不以为然呢？若是前者，那就说明他们生活在信息社会时代，在网络作为信息最新和传播速度最快的载体时代，却无视网络的存在，看来他们确实是落伍了。由于他们视野的渺小，眼界的狭窄，导致他们头脑的僵化和偏执，才得出那样错误的结论。他们脱离了社会，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甚至也脱离了中国学术界！他们丧失了研究和撰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应有素质，辜负了党中央、数千万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殷切期望。若是后者，他们就把中国传统正直文人的那点良知和德行丧失了，那就是执意与中国共产党的敌人同流合污，与人民为敌，从而才故意向我党泼污水！

但愿他们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四、承认和改正错误是有力量和自信的表现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历史书籍的编纂，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件极为严肃的重大事项。它不仅如江泽民同志所说起着“资政育人”〔⑥〕的重要作用，也是关系到对党、对人民、对历史是否负责的问题，同时也是对党史撰写者党性和史德的一次检验。党史著述，既根本区别于文学创作的所谓“戏说”，也不同于某人传记的撰写，它是一项通过认真、严谨和艰苦的科学研究，从而准确、全面、客观、公正地再现党的历史真相的工作。

建国后，五十至七十年代，我国的社会风气和人们的道德状况，得到全世界一切正直人

士的高度赞誉。仅《邓小平文选》第2、3卷中，就有五次明确地谈到，那时我国的社会风气“是健康的”、“是非常好的”、“社会秩序很好”。〔⑦〕我国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社会风气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毫不夸张地说，达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不仅数千年旧社会积淀下来的污泥浊水，诸如吸毒、卖淫、赌博、绑票等，荡然无存；而且人际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助人为乐，团结互助，蔚然成风；尔虞我诈、欺蒙拐骗现象很快消失；夜不闭户、拾金不昧等中华民族世代渴望的优良道德成为真正的现实，友好、合作、助人、救人的感人事迹随处可见。当时的社会犯罪率和自杀率是属于世界上最低的国家！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雷锋式的好公民，成千上万！人间确实是充满了真正的爱！这种面貌和状态的形成为各种因素，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它与建国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绝大多数党史研究者不仅具备高尚的史德，而且具有高度的党性，他们的著述经得起历史检验，确实发挥了资政育人的作用不无关系。

作为当时在校的大、中学校的学生，他们不但通过其他各种途径，而且也通过阅读包括党史之类的书籍报刊（六十年代普通高校开设有三门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历史），如“红球飘飘”丛书等，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想当年，争做“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三好”学生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争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共产主义接班人是一种自豪和时髦；学校的好风气和社会的好面貌，令那个时代的人们终生难忘。邓小平在1980年谈到那个时代的时候说，是“值得回忆的”，目前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中，不少就是那时的过来人。

薄一波同志在给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的信中说：“要写出一部真正好的、站得住脚的、传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绝非易事，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史实资料收集、核实、研究工作。希望全体参与此项工作的同志能够发扬拼搏奉献精神，并以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严谨、精炼的文风来写作，把撰写这部巨著当成一项伟大的事业来完成。我认为，写历史很重要的一点是尊重事实。古人赞誉良史‘在齐太史公，在晋董狐笔’，讲的一个实字，内容要实，文风也要实。”〔⑧〕

显而易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书的作者们并不是这样做的！

谎言，只能欺骗于某时、某地和某些人，不能在所有时间、任何地方欺骗所有的人。列宁早就尖锐地指出：“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是本身有力量和自信的表现，有错不要紧，知错改错是中国共产党人优良的传统作风。“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⑨〕笔者相信，作为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们，即该书的作者们，大概不会对《毛泽东选集》中的这段话生疏吧！党史工作是党的建设的重要部分，笔者相信并期盼，《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一书的作者，尤其是负责同志，是会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是把党的声誉摆在个人所谓的“面子”之上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前夕，他们主观上绝不会故意向中国共产党来泼这盆污水的，他们是会发现和改正这一严重错误的，是会主动自觉地坚决清除这盆泼向党的污水的！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第563页

〔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说：“1959年、1960年、1961年那样的严重困难，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很快就克服了。那是值得回忆的，两千万职工下放，走群众路线，讲清楚道理，大家并不埋怨，现在就不容易。”（《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68页）

〔③〕首先发表于2009年12月31日乌有之乡，之后登在毛泽东旗帜网、主人公等网站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孙学文研究员的文章：“毛泽东盖世功勋与日月同辉”，见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12/123057.html> [⑤]邇邇道人：“五六十年代人口统计数字的困惑”，见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04/80217.html> [⑥]转引自《薄一波书信集》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年 1 月，第 811 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77、233、296 页；第三卷，第 153、318 页

[⑧]转引自《薄一波书信集》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年 1 月，第 808—809 页

[⑨]《论联合政府》，见《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1097 页

作者：巩献田

来源：<http://www.wyxxwk.com/Article/lishi/2013/05/301812.html>

再论中国大跃进时期所谓饿死 3000 万人的问题

作者：乌特萨·帕特奈克 远航一号编译

帕特奈克是印度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本文最初于 2011 年 6 月 26 日在印共马机关周刊《人民民主》上发表，后由美国《每月评论》网上杂志转载。与其它驳斥饿死 3000 万的文章相比，帕特奈克的这篇文章，说理更加充分，论证更加严密，事实逻辑充分，无懈可击。

(帕特奈克是印度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本文最初于 2011 年 6 月 26 日在印共马机关周刊《人民民主》上发表，后由美国《每月评论》网上杂志转载。编造“饿死 3000 万人”的谎言是反毛反共势力攻击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武器”。印度马克思主义者帕特奈克在这篇文章中以翔实的说理和论据，彻底批判了所谓饿死 3000 万的“学术根据”。与其它驳斥饿死 3000 万的文章相比，帕特奈克的这篇文章，说理更加充分，论证更加严密，事实逻辑充分，无懈可击。)

三十年前，有人掀起了一场恶意诋毁毛泽东的运动，编造说在 1958 年至 1961 年中国的大跃进时期有 2700 万至 3000 万人在饥荒中饿死，造成了广泛的恶劣影响。这些恶意攻击的始作俑者，是北美的两个人口学家，A·J·科尔(1982 年发表的“1952-1982 年中国人口的迅速变化”的作者)和朱第思·班尼斯特(1987 年发表的“中国的人口变化”的作者)。这两名人口学家得出了耸人听闻的结论，可是却没有人愿意花功夫去了解一下他们是采用怎样的十分可疑的研究方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这些所谓“估计”后来又被阿马提亚·森(译者注：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广泛宣传。森据此还发展了一套理论，说什么由于印度有民主自由特别是新闻自由，因而得以避免大饥荒，而由于中国缺乏新闻自由，整个世界当时根本不知道饥荒发生了，只是到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依靠两个北美人口学家的辛勤努力，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资本主义的新闻媒体自然乐于重复森对这两位人口学家的高度评价，从而不厌其烦地反复宣传所谓“饿死了 3000 万人”，以至于在读者头脑中这已经不是虚构而是成了历史事实。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几年前出版过一期关于中国的专刊，其中有三篇文章反复声称当时饿死了 3000 万人，然而该杂志却拒绝发表笔者驳斥这一论调的致该杂志编辑部的信。2006 年，斯拉沃伊·齐泽克(译者注：原籍斯洛文尼亚的世界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为新版的毛泽东著《实践论和矛盾论》英译本做序时，也重复了饿死 3000 万人的说法，似乎这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

要论证中国在大跃进期间饿死了几千万人，通常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将所谓“人口赤字”笼统地说成是饥荒造成的死亡。第二个办法是设法推算出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的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先来看论证“饿死 3000 万人”的第一种办法。根据中国官方在 1953 年和

1964 年分别进行的人口普查所得出的人口数字，可以推断，如果中国人口按照在 1958 年以前的速度继续增长下去，那么在 1959-1961 年期间就会比实际人口水平累计多增加 2700 万人。这种“人口赤字”被当成是与饥荒死亡一回事。但是，这其中至少包括了 1800 万原本就没有出生的人。1958 年至 1961 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由 29% 下降到 18%，因此而减少的出生人口被当作是饥荒死亡。中国人民是非常富有才华的，但是即使是中国人民也还没有学会未生即死的艺术。

任何人，特别是学者，在这个问题上都负有基本的责任，必须清楚明白地说明事物的本来面目。所谓“中国在饥荒中有 2700 万人死去”的说法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是，有 2700 万活生生的人被饿死了。但是这些人实际上原本就没有出生，将本来就没有出生的人说成是死了便是歪曲事实。

从 1953 年到 1958 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由原来的 20% 下降到 12% (而印度的人口死亡率只是在又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才下降到中国 1958 年的水平)。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建立了农业合作社，中国得以发起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消灭了传播传染病的害虫，并在农村地区建立起了基本的卫生制度。中国农村地区的死亡率在这个期间大大下降了，这是毫无争议的。在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广大农民全面地投入到农业基本建设的劳动中，在若干年的时间里，正常的农民家庭生活被打乱了。妇女大量参加劳动，加上大批壮劳力都投入到水利建设中，为此成立了公社食堂，小孩也交由托儿所管理。这样大规模的集体劳动导致 1959 年以后出生率大幅度下降。

在 1958 年以后的三年，人口死亡率有所上升。但是，首先要搞清楚基本事实。在中国全国连续三年歉收，旱灾、涝灾、虫灾分别影响到全国的不同地区。粮食产量由 1958 年的 2 亿吨下降到 1959 年的 1 亿 7000 万吨，又下降到 1960 年的 1 亿 4350 万吨，1961 年略微恢复到 1 亿 4700 万吨。也就是说，粮食产量减少了近三分之一，产量下降的幅度超过了印度在六十年代中期由于旱灾所引起的粮食危机。当时印度的粮食产量下降了约四分之一。

中国的粮食产量下降与人民公社的成立是同时发生的。于是那些本来就反对人民公社的学者们将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说是因为人民公社的成立导致了粮食减产。事实上，人们更有理由做出相反的论断。粮食减产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无论有没有人民公社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是在人民公社下建立了平等的分配制度，粮食减产的影响会更加严重。不仅如此，如果不是靠集体劳动在人民公社期间修建了 46000 座大中型水库，中国在以后年份遇到旱灾的时候就会蒙受更大的损失。1965 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就恢复到了 2 亿吨。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自然灾害最严重的 1960 年，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仍然显著高于印度。

1959 年粮食减产，中国官方的人口死亡率由 1958 年的 12% 上升到 1959 年的 14.6%。1960 年，死亡率进一步上升到 25.4%，次年下降到 14.2%，1962 年更进一步下降到 10%。显然，1960 年是一个非正常的年份，与 1958 年的死亡率相比意味着 1960 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800 万。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 1960 年，所谓“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也与印度同年的人口死亡率相差无几。印度当年的人口死亡率为 24.8%，而这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没有人对此大惊小怪。如果我们以中国在 1958 年所取得的非常低的 12% 的人口死亡率为标准，那么在 1959 年至 1961 年期间，中国累计非正常死亡 1150 万人。这是对于可能发生的“饥荒死亡”可以做出的最大估计。然而，考虑到中国当时非常平等的分配方式，即使是这个估计也是令人生疑的。因为即使是在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仍然显著超过印度的水平，而印度在六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并没有发生普遍的饥荒。

与中国的巨大人口规模相比，上述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并不算多。这远不能满足西方各大学学者的需要，因为他们一贯反对社会化的农业生产方式。科尔和班尼斯特为他们提供了反对人民公社所需要的弹药。至于科尔和班尼斯特是如何得出了比最大可能数超出三倍的“饥荒死亡”人数，这不是这些学者所关心的。让我们进一步研究一下科尔和班尼斯特是如

何得出“饿死 3000 万人”的结论的吧，我们发现这个数字是根据完全站不住脚的假设编造出来的，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

在 1982 年的人口普查中，有一项包括 100 万调查对象的关于出生率的调查，覆盖面仅为中国人口的 0.1%。根据这项调查，科尔和班尼斯特推断在 1953 年至 1964 年期间，实际出生的人要比官方纪录多出成百上千万。他们无视 1953 年的人口普查。根据那次人口普查，中国当时的人口出生率为 37%。1953 年人口普查的样本要大得多，包括了 5% 的家庭，并且是专门为了收集关于出生和死亡的官方数据而设计的。

根据 1982 年的调查，科尔和班尼斯特推断，五十年代的人口出生率高达 43-44%。如此武断地采信根据许多年以后的回忆而得出的有关多年以前的高出生率，这是毫无道理的。我们知道，根据多年以后的回忆而做出的回答是不可能准确的。科尔和班尼斯特据此推断，在 1953 年至 1964 年期间，总共多出生了 5000 万人。然而，在他们看来，1964 年的人口总数，6 亿 9400 万人，却并没有因此而增加哪怕一人。也就是说，他们完全不采信官方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却愿意采信官方的人口总数。这种机会主义的做法对于他们来说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他们据此就可以推论说，这多出生的 5000 万人在 1953 年至 1964 年期间全部死掉了。

但是这些额外出生的和额外死亡的 5000 万人仍然不能使人口学家们满意。他们根据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人口死亡率下降的线性趋势，声称 1958 年以后死亡率本来应该继续快速下降，而凡是超出线性下降趋势的部分都是额外的“饥荒死亡”。这种线性趋势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死亡率的波动必然是非线性的。死亡率不可能按照原来的速度继续快速下降，下降曲线会变得平缓，不可能下降到零。通过这种方法，科尔和班尼斯特最后得出结论，在 1953 年至 1964 年期间，中国累计额外死亡 6000 万人，比官方统计的死亡总数足足多了 65%。

这样凭空制造出了 6000 万的额外死亡人数以后，两位人口学家便着手将这多死的几千万人分配到 1953 年至 1964 年间。他们又一次武断地决定将更大比例的死亡人口分配到大跃进期间。科尔将 1960 年的死亡率由官方的 25.4% 调高到 38.8%，班尼斯特则更加大胆地调高到 44.6%。在采用了所有这些聪明的办法以后，终于得出结论，在大跃进期间一共“饿死了 3000 万人”。既然已经违反了一切逻辑准则，这些所谓学者不妨更加大胆一些，不妨将这多死的 6000 万人全部算到大跃进期间。既然可以得到一整头羊，何必只要一块羊肉？

与这场统计“估计”的闹剧相比，我们几乎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公认的学术准则和基本的学术诚实受到如此粗暴的践踏。而那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本来应当更加深思熟虑的，然而，他们却表现出最轻率的幼稚和不负责任，不做任何调查，便广为宣传这种纯属胡说八道的所谓“估计”，使这种“估计”成了所谓“历史事实”。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也诽谤了并继续诽谤着毛泽东，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和爱国者。他们在无意中实践了戈培尔的名言：要说谎就要说弥天大谎；只要不厌其烦地重复，弥天大谎也能成为真理。

3000 万不是一个小数字。1846-1847 年，100 万人在英属爱尔兰因为饥荒而死去，当时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1943-1944 年，300 万人在孟加拉大饥荒中饿死，这次饥荒是众所周知的。然而，据说 3000 万人在中国饿死了，而当时居然没有人知道饥荒发生了。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大饥荒根本就没有发生。那些反复引用饿死 3000 万人的所谓知识分子，自以为聪明，其实不过是大蠢若智罢了。如果一个人说 3000 万人死于饥荒，而当时居然没有人知道这场饥荒，包括当时在中国的外交官以及国外的中国观察家对于这件事居然都没有丝毫的察觉，那么这个人不是蠢到家了吗。与那些编造饿死 3000 万人的始作俑者相比，那些轻信这一说法而且还不加思考地反复重复这一说法的人，实在是更加愚蠢。

来源：<http://www.wywxwk.com/Article/lishi/2013/08/304882.html>

以五八年浮夸风中的赵紫阳为例——谈谈“高产卫星”的产生机制与死亡人口数字把戏

作者：老田

一、1958年省委书记的政绩需要与浮夸风的兴起

1955年年底毛泽东主持两次省委书记会议，商议定出了《农业四十条发展纲要》，要求在1956-1967年十二年内，依靠农业集体组织，兴修水利和采取各种增产措施，把粮食亩产提高到“四五八”目标——黄河以北地区亩产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长江以南达到800斤。

有的省委书记为了表示自己能干，有作为，就谋划着提前实现，其中最突出的是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和主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赵紫阳，他们在1957年就上报中央说广东辖区内部的潮汕某县已经平均亩产过了1000斤，叫做“千斤县”，这个假典型材料经过书记处某责任人（陶铸的哥们）未加任何稽核而认可，并作为已经核实的材料上报毛泽东（可能是为自己的哥们争取政绩），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表扬了陶铸赵紫阳诸人的能干：“有规划比没有好。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紧，‘四、五、八’就有危险，抓紧即可完成，要靠精耕细作吃饭，我国将来要是世界上最高产国家，现在已拥有潮汕千斤县。‘四、五、八’是否可以再提高到‘八百、一千、一千二’，我看可以，还有二、三十年就行。”（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卷，第238页）本来毛泽东组织拟定的《四十条纲要》只要求在1967年之前，实现四五八目标，但是陶铸和赵紫阳一年就搞出来一个千斤县，可见他们是多么的能干，毛泽东是多么的保守啊！

千斤县这样的政绩工程，不是那么容易让人信服的，毕竟共产党高官中间职业农民出身的一大堆，估计跟毛泽东不相上下的保守分子不少，所以需要额外做些说服教育工作。陶铸自己就亲自出马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可能陶铸的观点在广东省委内部还有异议，很快，赵紫阳就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及时的回应，并在当年的《红旗》杂志第六期上发表署名文章《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说“密植一定能够增产，密植不会带来倒伏危险，密植后出现的突出问题是劳动力不足和肥料不足。”（第13页）还在文中推广他所总结的广东先进农业经验——复式插秧法，每一个坐在书斋里的人都很容易想到，如果要让水稻产量短期内提高十倍，高产又不能一粒稻谷长成十粒那么大（这个方面造假有困难），那么剩下的方法就是让水稻植株多出十倍来（这个可以通过密植来实现）。可以说，赵紫阳不仅通过书记处里头的哥们，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政绩工程样板的认定，而且从理论上解决了高产的难题，从而设计了1958年各地高产卫星都一体遵循的制造原理。

这个通过书记处稽核的“千斤县”假典型，给各个省委书记以强烈的刺激，各省争先恐后搞“千斤县”典型，四川的李井泉是在新昌县搞“千斤县”典型，湖北王任重是在孝感县搞千斤县典型。为了把自己的典型做得比陶赵的典型更有说服力和可信性，王任重理性地考虑到不可能每一块田每一个公社的产量完全同步和一致，曾任《孝感报》编辑的老魏，亲身经历了王任重的千斤县试验：“王任重说‘千斤县里必定有某产几千斤的公社，亩产几千斤的公社里头必定有万斤田’。”（对老魏的访问，2005年10月）所以，一个千斤县要有说服力，必须经过“高产卫星”的经验。王任重自己亲自担任孝感千斤县的指挥长，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是副指挥长，还邀请华中农学院的白教授作为顾问，在孝感北门立了一块千斤县的大牌子。这样，到了水稻收割季节各种各样的高产卫星就出来了。

王任重在文革初期曾经写过抗辩书，就他在1958年的表现进行辩解，说自己是老老实实向中央说假话的，不承认个人政绩上的迫切需要这个关键的内在动机，他还辩解说每个省

都上报增产一倍以上，基于法不责众的道理，所以就不能说各省都一致地欺骗中央，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他是这样进行自我剖白的：“我在四月下旬到襄阳地区参观，根据赵修的汇报，提出了‘一季捞全年，全年翻一番’的浮夸口号。全省各地县区社，经常修改计划指标，层层压任务。这样浮夸风就刮起来了，到了小麦收割的时候，相信了光化有一块地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斤小麦的假报告，提出了‘低产赶高产’‘翻一番拐个弯’等错误的口号。本来已经浮夸了，仍然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这样大家比赛搞‘浮夸’，搞形式主义，在技术改革，农具改革中都出现了‘瞎指挥’与强迫命令的现象。对于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讲的，要有劳有逸，一张一弛，冷热结合，压缩空气等重要指示，我们也传达了，但由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首先我自己就发烧到四十度，发昏了，如何能使其他同志冷静下来呢？到秋季我们发烧，浮夸到了极点。”（王任重《十七年来我在湖北工作的情况》，载 1967 年 9 月「湖北省直红司「斗、批、改」办公室省委机关总部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罪行录》第一集）

王任重的说法是有依据的，多数省委书记们都参与了浮夸风，正是因为这样，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批评，才被恰如其分地认定为是“向着党的多数进行猖狂进攻”。

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干部，主要责任在省委书记一级的政绩比赛，这一点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当年在报章上吹得最厉害的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他跟各中央媒体关系良好，能够有效地动员这些媒体的版面为他的政绩需要服务。局部问题饿死人最严重的河南信阳和安徽北部淮河流域，而作为一个省饿死人最多的则是四川。任何了解五八年浮夸风兴起过程的人都清楚，是各个省委书记应该为高产卫星负责，在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上“周惠在同别人闲谈时，半认真半开玩笑说，1958 年无非三种人：官僚主义；不讲真话（圆滑）；看风使舵。又说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这话传出去了，引起轩然大波。”（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南方出版社 1999 年，第 25 页）这些情况，那个长期自称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完全了解——浮夸风是如何兴起的以及应该是什么人负责任，但是他本人负有“中央领导”交托的任务，所以要竭尽所能地歪曲事实，先把浮夸风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联系在一起，与省委书记们的政绩需要撇开，就这样“拐个弯”之后把责任扣在毛泽东头上。李锐之所以这么说，并不完全是因为他天生喜欢撒谎和颠倒黑白，而是服务于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有关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

二、党阀与学阀的紧密结合

1958 年的高产卫星，主要的动力是来自于省委这个级别，对下是一吹二压三许愿，胁迫公社干部和社员参加。与底层干部和社员的被动参加不同，知识精英中间却很不同，有不少人“尖子人”是主动加入高官们的政绩合唱团的。

著名的于光远先生就参加肯定政绩工程的事业，他在 1958 年《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文章《小麦增产对于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革命意义》，文章告诫：“我国科学家和科学机关面前摆着一个重大的任务，那就是广泛地调查研究农民丰产的经验，虚心地学习群众中的新的担暇，并且加以分析和综合，集中和提高，作出科学的总结，以便使这些经验推广开去，帮助广大的农民群众掌握这些经验，获得更普遍的丰收。”（第 27 页）对于省委书记们的政绩论证需要，于处长把握的是多么及时啊，于光远能够从中宣部处长位置上脱颖而出到后来的高位，与他总能及时地反应高官们的迫切需要的敏锐嗅觉是分不开的。

省委书记们唯恐落后，广东能够实现的我们也能实现，这个政绩需要很容易理解，但是也有很多知识精英都出来为高官们的政绩需要服务，都写文章论证高产如何符合科学原理，很多文人都写文章扣帽子说不相信高产的人就是右倾，著名的吴象先生就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为了实现千斤县——记晋中十县农民的的决心和干劲》发表在 1958 年 8 月 13 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说“从我们到过的地方看，每个县毫无例外地都有为数不少的双千斤乡、五千斤社、万斤生产队，至于万斤以上的试验田，更是举不胜举。”吴象还在他的文章中间说

得活灵活现：“麦子大丰收确实是一把万灵的钥匙，能使任何顽固保守的人开窍。刘三才他们的大麦试验田原定的指标是三千斤，竟把社里一个名叫温四才的老汉气急了，他赌咒：‘你们真能打下三千斤，我拚上脑袋！’直到麦子登场，他看着事情不妙，还是不大相信，但打的结果不是三千斤，而是五千七百零二斤。老汉服输了，当刘三才突击组再试验在回茬地产万斤谷子的时候，他就变成了积极的支持者了。一个夏天，出现了多少温四才式的喜剧，有多少温四才式的人物经历内心深刻的变化啊！”文革初期五一六通知中间猛烈批判“党阀”和“学阀”的结合，扼杀真理，愚弄老百姓，败坏共产党的信誉，最主要的例证都是出现在1958年的浮夸风期间。

除了省委书记之外，上面也还是有人乐于搞一些所谓的“大跃进”的。刘少奇在这个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和发明，可惜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选《刘少奇选集》的时候，选择性地遗忘了五八年夏天到六一年春天整整三年时间，没有一篇文章入选，当然这样的小小疏忽显然不是偶然的。笔者手头有一套文革期间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选的《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 1958.6-1967.7》，该书在被中央文献研究室所“遗忘”的两年跨度中间，收入了刘少奇十七篇谈话、讲话和信件，其中很多独具特色的讲话，颇具刘氏特色和神韵，本不应该被忽视的。例如他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1958年6月14日)中间讲组织生活、消灭家庭问题；同北京日报社编辑的谈话(1958年6月30日)讲党员应该做党的驯服工具的问题；在南通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9月23日)、在苏州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9月24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27日)中间谈大干快上和供给制的问题等等，这些能够说明历史真实、体现特定时期“时代潮流”的重要文献，结果都被文献编选者给屏蔽掉了，今天的人们完全无法读到了。

小平认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组成人员是“毛刘周朱陈邓”，在这个最高层次上，对于浮夸风和瞎指挥比较感兴趣的是刘少奇；在国务院主管官员中间，对浮夸风推波助澜最力的谭震林（他手底下的刘西瑞先生就是根据谭的非凡见解写出了58年最著名的文章《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高产》）；在各省省委书记中间，政绩宣传工作做得最好的王任重，以“亩产万斤”检索1958年的《人民日报》，所得文章一共23篇，其中6篇出自湖北，可见《人民日报》对湖北省委书记的政绩需要的响应程度，在全国省委书记中间都是最高的。

刘少奇与全国妇联谈话中间说家务劳动社会化、消灭家庭，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的胡绳就赶写了《家务劳动的集体化、社会化》的文章，发表在《红旗》第七期上，他说：“人们不能不感到，每一个家庭单独做饭，单独磨面，单独缝衣做鞋，单独带孩子，是多么不经济的事情。一方面，家务事消耗了大量的劳动，另一方面，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迫切地感到劳动力的不足。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使家务劳动集体化、社会化。”“所以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的建立是由于在合作化基础上的生产大发展而来，并且是有益于生产的更大发展的。”（第24页）按照胡绳先生的精明算计，基层干部要是再不办公共食堂的话，简直是白痴一个。

邓小平处在书记处的位置上，虽然跟刘少奇相比他鼓吹浮夸风没有那么厉害，由于他在一开始就照顾哥儿们义气扶持了广东千斤县假典型，当新的假典型出来时，即便是他有所发现也不可能进行纠偏工作了，正如民间谚语所言“打铁要靠自身硬”，他自己高抬贵手帮助了第一个假典型之后，对于此后的假典型也只能是照章办理，否则在官场中间难免大失人心。

八五年高官的政绩需要和文人们如蝇逐臭式的捧场，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文革期间毛泽东提出党阀与学阀相结合的问题，其经典案例和现实针对性只能出自难忘的1958年，1966年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是这样说的：“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的批

语和修改（一九六六年四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42页）

刘少奇后来把高产卫星和浮夸风栽在《人民日报》头上，似乎省委书记的政绩需要和文人们的热烈追捧都毫无影响，仅仅是人民日报编辑们发表文章时不够慎重，他说：“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天天用大字登头条新闻，今天说那里生产如何好，昨天说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你们想用这些典型事例来指导实际工作，典型本身就不真，怎样能指导实际工作呢？”“三年来，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这些，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恶果。你们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在这个问题上使我们党在国际上陷于被动；报纸宣传大办万猪场，结果是祸国殃民。”“报纸威信很高，大家都以为《人民日报》代表中央，《人民日报》提倡错误的东西，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所以，这几年很多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人民日报搞了这样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可以说，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害处还大。”（刘少奇：关于人民日报工作的讲话，1961年5月1日，载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我不清楚刘少奇先生这样的批评，人民日报的编辑们是不是完全服气。

三、高产卫星戛然而止

在高产卫星和瞎指挥过程中间，从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合伙胁迫公社社长（实际上就是千斤县的指挥长和副指挥长们），要求基层干部组织群众搞不得人心的辍秧法，这样的安排除了可以增加省委书记在全国性媒体上露脸的机会之外，不会给基层群众和集体带来任何好处，此种高产卫星典型只能给底层老百姓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无价值的劳动投入。由于有省委书记以下各级官员的参与，基层干部和群众往往难以有效抵制，如果没有各级高官共同施加足够大的压力，显然，就很难让底层干部和老百姓大量投入此种毫无产出的劳动。高产卫星的动力到底是来自基层还是高层，毛泽东非常清楚，后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毛泽东：党内通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毛泽东1958年三四月间连写三份党内通讯，四月底的一份还要求直接捅到最底层的生产队长层次，这实际上是真正的第一次甩开党的多数，利用个人影响去进行重大政策纠偏的。当时他的判断已经很严重：“面对‘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猛烈的‘共产风’，毛泽东很着急和担心，怕出现更大的破坏。现在又是春耕在即。他要迅速扭转这个局面。他认为这是可能的，根据河南的经验，就是各省立即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竿子到底，作出统一决定，贯彻实施。三月二日凌晨四时半，他再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三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信，手稿，1959年3月2日。）”（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二十二章《纠“左”的努力（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毛在1959年春天认为可能出现苏联集体化之后的严重恶果，来不及通过党的会议协商和正式的程序安排来进行纠偏，迫不及待地利用个人名义写党内通讯，试图利用个人的超常影响力来实现部分的纠偏工作，并劝说高层的热心人转思想弯子。

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毛泽东曾经顺道访问孝感千斤县，11月14日“在湖北孝感火车站专列上接见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副书记王延春、副秘书长梅白及全国劳动模范官木生、勤俭持家模范晏桃香、长风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朱朝启等。梅

白汇报全省大跃进的典型，当他提到长风人民公社复员军人、团支部书记官春官创造的‘万斤田’，亩产万斤稻谷时，毛泽东说：‘我不相信’。问朱朝启真实情况，朱朝启后来（1989年）说：‘我实在有些心虚自责。大跃进时代，在那种特定环境，我哪有勇气向毛主席报告真实情况啊！我只盼主席不再追问，快快结束这个话题，害怕说长了捅了漏子下不了台。’”（转引自：顾龙生主编《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第 434 页；原文《毛泽东的孝感之行》，载《湖北档案》1989 年第 6 期）朱朝启的害怕是有道理的，试问学阀追着党阀屁股大唱赞歌的年月，谁还敢坏了省委书记苦心经营的政绩典型呢？

毛泽东丝毫都不相信亩产万斤的卫星典型，在全会期间的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毛泽东召见吴冷西和田家英：“毛主席把我和田家英找去谈话，主要是谈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的问题。他特别提醒我：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毛主席说，一定要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得体积小些，不要虚胖子，要结实些。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也这样。去冬今春修了 500 亿立方水利工程，今冬明春就不要再搞 500 亿土方了，要减下来。”

在同一次谈话中间，毛泽东还附带提到了各路诸侯们的政绩需要和投资胃口，实际上也是要人民日报的报道与这些“政绩狂”保持距离：“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 1959 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 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 3000 万减为 1800 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 12 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 1959 年要修 2 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 5 年内才修 2 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吴冷西同志写的《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八章《实事求是》，新华出版社 1995 年）

毛泽东在六中全会期间与吴冷西谈完之后，竟然不让睡觉，要他连夜坐专机回北京向正在召开的新闻工作会议传达，此后，报章上的假卫星典型戛然而止。不过此前放出来的高产卫星已经为数不少：“《人民日报》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八日以‘卫星社坐上了卫星’为题，报道了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有 5 亩小麦亩产 2105 斤；同月十二日，又报道该社发出第二颗‘卫星’，2.9 亩小麦试验田亩产高达 3530 斤。仅过几天，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小麦试验田亩产 4353.8 斤的报道传遍全国。从此，展开了一场‘卫星’竞赛活动，‘卫星’越来越多，单产越报越高，各种虚报浮夸数字一度充斥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广播。据不完全统计，从六月上旬到十一月中旬，仅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各种‘卫星’就达 39 次之多。”（《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第三章第一节）

四、作为政治紧箍咒的浮夸风问题

由于这些省委书记多数都不愿意做自我批评并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结果，这些未被追究的政治责任，始终存在，在新中国政治场域中间发展成为一个“紧箍咒”。文革期间，各地省委书记因为执行刘少奇把文革当第二个反右来搞，算是犯了资反路线错误，基本上都受到各地造反派群众的批评和冲击，又因为多数人在 66 年冬天领导党政系统干部罢工，结果新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成立之后就靠边站了；军队支左干部占据主导地位的革委会期间，继续把 58 年浮夸风的紧箍咒好好地念了几遍，高官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承认错误并在群众大会上做检讨，这个后来被高官们在回忆录中间称之为“政治迫害”。

1971 年林彪事件之后，文革初期犯“走资派错误”的省委书记们被逐步恢复职务，1979 年开始万里、胡耀邦等人要搞分田到户，全国的省委书记中间只有辽宁的任仲夷、内蒙周惠

和贵州的池必卿三个支持分田，90%的省委书记持明确反对态度，所以这个分田到户搞的拖泥带水，拉锯了好几年才分下去，中央一号文件都连续发了六个。

万里后来回忆了分田的艰难，他对别人讲：“1980年初我到中央工作，进了书记处，分管农业，这个难题可大了。……上层领导机关基本上还是推行“农业学大寨”的那一套，对农村改革，特别是对包产到户，抵触情绪很大。我分管农业，依靠原来这套‘机器’来开展工作怎么行呢？还有不少省的领导思想也不通。我跟耀邦讲，中央决定中规定不要包产到户，我们支持农民的正当要求，会始终被看做‘违纪’‘违法’，这样不行啊！是不是先开一次省委书记会，大家通通思想。5月31日，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热情赞扬肥西和凤阳的包产到户。此后情况有了好转，但还是吵吵嚷嚷，全国性的争论并没有停止，有些反对的人手里拿着权，他不同意你就干不成。于是，决定9月份开一次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

“那时候，农业部门的一些领导，认为包产到户破坏了集体经济，阻碍了机械化、水利化，思想很不通。我兼农委主任，农委里思想转过来的也不多。我就抓了个杜润生，他是邓子恢时代农村工作部的秘书长，实际经验多，也有理论水平，又比较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我就请他来主持起草会议文件，对文件作解释、说明。我的意思是想把“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或“支持包产到户”。但是，会上争论很激烈，看来通不过。公开赞成比较突出的，一个是贵州的池必卿，一个是内蒙古的周惠，一个是辽宁的任仲夷，这是少数；多数表示沉默，有的还坚决反对。”（张广友 韩钢《万里论农村改革》，载三农中国网站）

在1980年代早期，改革设计师们始终是少数，搬动了邓小平这样的大腕出面讲话，反对意见还是压不下去——“吵吵嚷嚷”，为了以少数人意志去压倒党内大多数，值得又开始念紧箍咒——通过竭力宣传浮夸风和饿死人的因果关系，威胁那些继续在领导岗位上反对分田到户的人；李锐等人实际上就是服务于这个需要，表面上是从事“非毛化事业”，但是在现实政治场域中间，是少数改革派威胁多数反改革派——是要形成对那些反对分田的省委书记们造反追究政治责任的潜在压力，以便农村改革顺风启航，通过攻击毛泽东，在实际上威胁王任重（此时是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和90%反对分田的省委书记（这些省委书记中间绝大多数在大跃进时期都曾经在省委书记任上干过，对浮夸风兴起和蔓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为“浮夸风”需要与政治需要联系在一起，要作为少数强迫多数的政治紧箍咒来使用，所以，就需要扩大浮夸风的宣传效应。因为只是需要威胁高官改变政治态度，并不是真的要实事求是地追究责任，所以，宣传口径中间充满着政治机巧：首先是要把所有的责任挂在“极左路线”名下，把责任和因果逻辑搞乱，然后说是人祸，预留下追究政治责任的“张弓待发”态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大跃进概念的内涵重新定义为1958-1960年三年时间，而不是具体政策和战略，这样就能够方便地把三年时间内发生的一切事情，无论应该由什么人负责的事情，都挂在大跃进的帐户下面，从而留下一个按照实际政治需要解脱多数人的空间；第三步就是掩盖并篡改数字来放大负面影响，从而轻而易举地预备好了一个舆论氛围：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罪魁祸首都罪该万死。这样的宣传就对那些对浮夸风有责任的省委书记们，形成极大的政治威慑力，造就这样一个态势：不管在任何时候只要小平同志愿意抛出谁，谁就很容易陷入万劫不复的处境中间，这极大地瓦解了反对分田的书记们的政治意志，确保反对意见全部被维持在“保留”状态。本来王任重是坚决反对分田的，但是他的浮夸风问题最为严重，现在面临着追究政治责任的危险，只好隐忍不发，离开副总理岗位去当政协副主席算了，这再一次证明了“打铁要靠自身硬”的道理。

根据这个政治需要，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数据就被人为地做了手脚，1980年代初期发布的人口普查和统计局数字中间，因为数字修改时经过未经仔细校核，同一个系列的数据相互之间矛盾很大，导致增长率数字和年度人口数字无法吻合，这显然是某个奉命篡改数字的官员不认真工作、敷衍了事带来的恶果。按照许涤新的研究，关键差距在于人为地放大了1959年的人口数字，导致1961年之前的数字都不准确。当然，许教授不方便说这是中央

某人授意的、同时跟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有什么关系，他把这个不合理的数字放大，盖在各地的“浮夸风干部”身上，认为这些干部出于显示大跃进政绩需要，不愿意承认 1959 年的粮食困难和人口减少。按照许教授他们的研究：“三年累计，按总人口计算减少 135 万人，按自然变动增加 622 万人，两者相差 757 万人。从一九六四年普查结果看，三年困难时期里这两个数字都有一定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是困难时期的第一年，这一年里出生人数减少、死亡人数增加的现象已经开始。这一年自然增长 677 万，比前一年增长数下降 40%是比较接近实际的。而总人口增加 1213 万，只比上一年少增 128 万人，增长率仍保持在 1.8%是不符合实际的。原因是，当时不少地方政府不相信人口增长速度已减慢，特别是浮夸风盛行，有些地方为维持较高的增长率有意多报人口。从一九六〇年来看，总人口减少 1000 万人，自然变动减少 304 万人都偏低，实际人口减少还要多。一九六一年总人口继续减少，而自然变动却增加 249 万。两者方向相反，数字也都是不准确的。根据一九六四年普查资料计算，在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的三年中，总人口增加数和自然变动数不一致，主要是一九六一年以前统计不准造成的。根据一九六四年普查资料回推，一九六一年人口应当是 64508 万人，比原统计数大约减少 1486 万。”（参见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书，第一章第一节）

本来，在困难时期过后，中央办公厅曾经汇总过非正常死亡数字的，根据曾经在中办工作的同志介绍，这个数字在 700-1000 万之间。另外还有一个数字，是公安部掌握的三年时间内全国总的人口死亡数量，1962 年七千人大会期间，纪登奎亲口问过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谢告诉他三年总共死亡人数 2500 万人（访问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2007 年 4 月），如果考虑正常死亡率为千分之十，则非正常死亡人数在 500-600 万人之间。因为不能很好地满足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所以，这两个有依据的数字都没有发布，而发布的却是那个许教授认定有明确疑问的数字。

年份	统计局发布的三个数据			按照 64 年人口数回推		按照 53 年人口数上推	
	死亡率	增长率	年末人口	计算人口	差额	计算人口	差额
1964	11.5	27.64	70449	（1953、1964 年是人口普查年份，年末数据较准确）			
1963	10.04	33.33	69172	68554.2	-617.8	69948.4	+776.4
1962	10.02	26.99	67295	66343.0	-952.0	67692.2	+397.2
1961	14.24	3.76	65859	64599.4	-1259.6	65913.2	+54.2
1960	25.43	-4.57	66207	64357.4	-1849.6	65666.3	-540.7
1959	15.59	10.19	67207	64652.9	-2554.1	65967.8	-1239.2
1958	11.98	17.24	65994	64000.7	-1993.3	65302.3	-691.7
1957	10.80	23.23	64653	62916.1	-1736.9	64195.6	-457.4
1956	11.40	20.50	62828	61487.7	-1340.3	62738.2	-89.8
1955	12.28	20.32	61465	60252.5	-1212.5	61477.9	+12.9
1954	13.18	24.79	60266	59052.6	-1213.4	60253.6	-12.4
1953	14.00	23.00	58796	57624.1	-1171.9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死亡率数字，59-61 年的未能延续整个五十年代的下降趋势，有反常上升，若把当时的支持死亡率定在 10%，那么按照超出正常死亡率水平来简易计算，59 年超出 4.59‰，60 年超出 15.43‰，61 年超出 4.24‰，分别计算出来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非正常死亡人数 59 年 302.91 万，60 年 1037 万，61 年 280.72 万，合计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1620 万人。（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 1 页）如上所述，不管这个数字是否包含浮夸，只要是同一个系列人口数据，死亡率和出生率数据都产生于年末人口数据形成之后，在年末人口数据、与死亡率、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数据之间，绝对不会出现自相

矛盾的情形，因为后三个数据都是在第一个数据汇总之后，经过计算得出来的。但是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恰恰不能让这几个指标相互吻合，这只能说明相关数字已经经过“事后的”篡改，而改动数字时又没有进行仔细验算，才会出现相互矛盾，这是显而易见的。以1964年和1953年人口数据作为基准，按照统同一序列的增长率数据进行验算的结果看，官方改动数字是以1953年数据为基准进行的，从1955年数据开始修改公布数据，修改的方式是从1955—1959年逐年改大公布人口数据，使之逐步高出实际人口数据达到1200余万，然后从1960年开始逐步改小数字使之接近于实际人口，由于改动数据时未加仔细验算（当时没有谨慎地运用计算机进行系列取值），在进行较长时间段验算和反向验算时，验算数据和公布数据的差额惊人。这个验算结果，恰好可以跟公安部死亡数字吻合，而办公厅汇总的数据略大，这个差距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困难时期部分地区有外流人口难以精确估计，上报的死亡人口中间包括了部分外出逃荒人口数。

来源：<http://www.wywxwk.com/Article/lishi/2009/09/42496.html>

再谈“活活饿死3700万人！”

作者：钱昌明

在《红太阳的陨落》中，辛子陵“污名化”毛泽东的重磅“原子弹”，就是捏造了毛泽东“活活饿死3700万人”这样一个政治谣言。然后喋喋不休反复不断地渲染，据笔者统计，他仅在书中把“饿死3700万人”的谣言，至少重复了近30次！

历史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决不能把它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在《红太阳的陨落》中，辛子陵“污名化”毛泽东的重磅“原子弹”，也是他最恶劣的一手，就是捏造了毛泽东“活活饿死3700万人”这样一个政治谣言。然后喋喋不休反复不断地渲染，据笔者统计，他仅在书中把“饿死3700万人”的谣言，至少重复了近30次！

他一会儿说，毛制造了“共产主义地狱”，“饿死了3755万人”，“酿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按：世上事能‘空前’，焉能‘绝后’!)的大惨剧！”一会又说，这一“饿死人”的事件，是“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破解毛泽东之谜的一把钥匙”(《红太阳的陨落》第4页)，竭力利用“谣言千遍，便成真理”的手法，把毛泽东的形象彻底摧毁。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饿死几千万人一说，源起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年鉴中向国内外公布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变动的人口数字。其中1960年末人口总数比上年减了1000万，这立即引起西方媒体的注意。日本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此后，西方的一批反共、反华“学者”，也包括国内的反毛人士，据此大加“研究”，并断言这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恶果——“饿死的”。以后就出现了不同版本饿死人的数字，辛氏取中的版本为3755万人。

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时中国的人口为6.5亿，饿死3755万人，这就意味着每17.3个人中就有一个是饿死的！也就是全国有近1/17的人口饿死了，这将是幅什么样的图景？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农民起义的传统与规律。凡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实极大多数都是饥民起义。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灾荒年，百姓没饭吃，政府不解决，要饿死了。为了死里求生，只能揭竿而起了！

看看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典型的，如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就是一场饥民起义。唐朝的黄巢大起义，也是起于山东、河南一带的饥民起义，黄巢本人就是山东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古代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也是从1628年的陕北饥民起义开始的。李自成起义一度被镇压下去了，仅率18骑突出重围，隐入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然而，1640、1641年中原连续大旱，李自成从巴西成功突围，进入河南，饥民们纷纷加入，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数十万人，最后发展到近百万大军，1644年终于颠覆了明王朝。

现在辛子陵给人们讲故事了，说毛泽东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制造了“共产主义地狱”，神州大地上一下饿死了3755万人！(据说饿死的人比中国古代以来2129年间，因重

大气候灾害死亡总数 2992 万人还要多!)可是,奇怪的是:人们竟然看不到饿殍遍地的景象,更看不见成群“逃荒”的人群,毛泽东治下的中国老百姓就这样“乖乖地”,居然一点反抗都没有,统统平静无声地死去了,也根本无需去“维稳”。

可惜这样的故事是违背人性求生本能的,是违背常理的,是违背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因此,就不可能是真实的。

辛氏的“活活饿死 3755 万人”说法,十足是一个“污毛”的政治谣言!

首先,它没有史实证据。

辛氏的《红太阳的陨落》出版于 2007 年,大跃进运动发生在 1958 年,也就是说,两者相距达半个多世纪。辛氏在 2007 年来写 50 多年以前的事,这叫什么?这叫写史。既然是写史,就得依照写历史的规矩办。用胡适的话说,就是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古人已死,不能起而对质,故我们若非有十分证据,决不可轻下刑事罪名的判断”,因此,“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胡适:《1946 年 3 月 2 日、7 日致刘修业的两封信》)

辛子陵的“活活饿死 3755 万人”之说,它的立论依据是什么呢?事实上他没有任何直接的历史资料证据,仅凭他自己讲的所谓“权威数据”!据说:

“2005 年 9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 1959 年至 1962 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地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

在辛子陵的嘴里,真可谓言之凿凿。据说:

“1959 年,全国 17 个省级地区,有 522 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 95.8 万人。

“1960 年,全国 28 个省级地区,有 1155 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 272 万多人。

“1961 年,全国各地区有 1327 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 217.7 万多人。

“1962 年,全国各地区有 751.8 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 107.8 万多人。

“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 3755.8 万人”。(《红太阳的陨落》第 356 页)

这是一个十足的政治谣言!因为辛子陵提供的唯一孤证,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有限制地解封”“内部公布的”“权威数据”,它是人们无法求证的。对任何无法证明的东西,能认作是史证吗?这在历史学的“考据”专业里是不能成立的。

其实“最高级”的谣言,就一定是带有两大特点:一是谣言要造得大,大到人们不敢不信;二是此类谣言又“不能查证”。只有这样,谣言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也许有人会说:辛子陵敢造这么大的谣?不会有那么大的胆吧。错!辛子陵既然敢造马克思、恩格斯的谣(说马恩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成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敢造列宁斯大林的谣(说列宁、斯大林是布郎基主义者),那他还有什么谣不敢造?他对毛泽东造的谣难道还少吗?

辛子陵除了用“内部公布的”“权威数据”来忽悠人外,他并不否认他的饿死人 3000 多万人的结论,是来自“中外民间学者对大跃进饿死人的数字进行了坚持不懈的研究”;也不否认其“1960 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 1000 万”这一统计源头。(《红太阳的陨落》第 353—354 页)正是凭着这些“中外民间学者”的“研究”成果,他才再提炼加工成为他的“活活饿死 3755 万人”的政治谣言。

那么,作为西方反共、反华“学者”唯一借口的《中国统计年鉴》(按:仅此孤证一条,历史学上本就不足为凭),其内容究竟是不是可靠,1960 年是不是真的比上一年人口净减了 1000 万呢?这也不是某个权威可以说了算的,它得经受得起历史学的考证与史实的检验。

其实,对 1983 年《中国统计年鉴》,早就有许多人提出质疑(如金小丁:《“饿死三千

万”质疑》)，许全兴：《对 1960 年人口减一千万的质疑》，等等)，认为 1960 年不多不少正好减少一千万整数的人口统计数字，失真不可信。在众多的质疑声中，比较有说服力的一说认为，根据 1983 年《中国统计年鉴》发布的这份统计中最关键的数据：

1960 年初人口是：67,207 万人，年末人口 66,207 万人，年平均人口是：66,707 万人；还是按照《中国统计年鉴》发布的当年出生率 20.86‰ 计算；按照平均人口乘以出生率计算，当年出生人口数应该是：13,915,080 人。

可是，到了 1990 年国家进行了“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的数据：

1960 年出生，年满 30 岁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中国人，有 14,443,119 人！这就是说，1960 年出生的中国人，经过 30 年时间的死亡、出国等因素，到 1990 年进行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竟然不减反而多出了 528,039 人！这不是活见鬼了吗？

再经 5 年，1995 年 10 月 1 日，国家进行全国人口 1.04% 抽样调查。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数据：

1960 年出生，生活在境内年满 35 岁的中国人，有 14,491,481 人。这个数字比 1983 年版 1960 年出生的人口数还是增加了 576,401 人。

应该说，1990 年人口普查出来的数字是实打实的，1995 年人口抽样调查的数字也远比 1983 年的户籍统计人数可靠。

结论是清楚的：1983 版《中国统计年鉴》发布的 1960 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是有问题的，是不可信的。(什么原因？这里不作推论)既然是不可信的，又怎能作为史料依据呢？硬是凭不可信的东西，再去进行“数学模式”的推断，这样推算出来的东西能是“信史”吗？

常言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谣言千遍，便成真理。”辛子陵深谙此道，善于以各种不实之词攻击诽谤毛泽东。在《红太阳的陨落》中，据笔者统计，高叫毛泽东“饿死 3755 万人！”至少重复出现了近 30 次之多。他喋喋不休地反复不断地渲染、煽情，以求读者从“道德情感色彩”上引发人们对毛的憎恨。

其次，它不讲逻辑，自相矛盾。

谣言者，当然无须根据，因而一定不讲逻辑。造政治谣言者，出于政治目的——辛子陵为了反毛、反共，为了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必须要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直接目的就是要“污毛”，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才急不可耐地抛出毛泽东“活活饿死 3755 万人”政治谣言。谣言因为是假的，必然会留下一些无法弥补不合逻辑的尴尬。

先说辛氏提供的“内部公布的”“权威数据”。

1、“三年困难”时期(也就是“大饥荒时期”，一般专指 1959 年至 1961 年三年。可是在辛氏提供的“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材料却有四年：1959 年饿死 522 万；1960 年饿死 1155 万；1961 年饿死 1327 万；1962 年饿死 751.8 万，合计 4 年饿死 3755.8 万人。言下之意，应为四年大饥荒时期？显得逻辑混乱。

即使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期间也只有两年人口增长是负数：1960 年减少 1000 万，1961 年减少 348 万；1962 年更是比上一年增了 1436 万！

2、辛子陵一方面说：“1960 年是国家经济形势最糟的一年，是死人最多的一年”(见《红太阳的陨落》第 255 页)。可是在他提供的“材料”中，1960 年饿死是 1155 万，1961 年却饿死 1327 万！远远超过了“最糟的”1960 年。自相矛盾。

再谈 1983 年《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的数字。假如凭 1960 年全国人口确实比上一年不多不少正好“减少”了 1000 万。那又怎能断定这些人全是“饿死”的呢？辛子陵之流怎能凭此得出“活活饿死 3755 万人”的结论呢？

人口减少有多种因素，可能是死亡率高了，也可能是出生率低了。又凭什么断定都是属于死亡的人多了，而不是出生的人少了呢？

减少的人口中有正常死亡，也有非正常死亡。又怎么证明这 1000 万人都是非正常死亡的呢？

非正常死亡中也有多种原因，如因地震、火灾、溺水等自然灾害，或工伤、医疗事故、交通事故，或自杀、他杀、受伤害等人为事故致死，等等，又凭什么说这 1000 万人都是“饿死”的呢？

如果说，因为《中国统计年鉴》1960 年统计人口中少了 1000 万，辛子陵之流把它“理解”为都“饿死”了。那么，“年鉴”在 1959 年和 1961 年其他年份里，并没有人口锐减的记录，你凭什么要断定是“饿死了 3755 万人”的呢？

可见，辛子陵之流不仅给不出任何依据，更不会有符合逻辑的推理，只能武断。

下面是 1983 年《中国统计年鉴》1957 年到 1965 年人口变动的数字：

1957 年人口：64, 653 万

1958 年人口：65, 994 万，比上一年增 1341 万；

1959 年人口：67, 207 万，比上一年增 1213 万

1960 年人口：66, 207 万，比上一年减 1000 万

1961 年人口：65, 859 万，比上一年减 348 万

1962 年人口：67, 295 万，比上一年增 1436 万

1963 年人口：66, 172 万，比上一年减 1123 万

1964 年人口：70, 499 万，比上一年增 4327 万

1965 年人口：72, 538 万，比上一年增 2084 万

看了这些数字以后，人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既然 1962 年“大饥荒”年代已经过去，人口增长也已恢复正常(年增长达到 1436 万)，那么，为什么在经济发展已处正常的 1963 年，人口又锐减了 1123 万？凭什么 1963 年的人口要比最困难的 1960 年还要多减 123 万？

1964 年凭什么人口又猛增了 4327 万？一般正常年份年增长人口均为 1200 万左右，1965 年的人口增长数竟 3 倍超过年增长的平均数？

这种缺乏趋势性忽高忽低的统计数字，究竟是不是客观人口变化的真实反映？抑或有人为“修改”的痕迹？值得深思。

渲染“信阳事件”说明了什么？

在《红太阳的陨落》中，辛氏为了推销“共产主义地狱”论，还大肆渲染“信阳事件”，并详列了一张“信阳光山县十里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园子小队 120 人中饿死 72 人的名单”，据说这 72 人都是在 1959 年农历 10 月、11 月中饿死的；再配以“饿殍遍地”文艺小说笔法的描述，以强化人们对真实的感受。最后，再一次告诉读者：这一切都是毛泽东的罪恶！

信阳事件是指从 1959 年 10 月到 1960 年 4 月发生在当时的河南省信阳专区(当时的信阳专区包括今天的信阳市、驻马店市)出现大面积饥荒，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

前已叙述，信阳地区是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在大跃进期抓的“点”，它又受到中央一线领导刘邓的直接指导，是“浮夸风”、“共产风”的重要“风源”，是搞形左实右的恶果。

据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对“信阳事件”回忆，

“1958 年夏收中，当时在楂岬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 3200 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 7320 行的更大浮夸典型。他们是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说的，当时我就不相信。地委书记路宪文跟我说出现如此的高产典型时，我说那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可能。我想一亩晒场能晒多少，怎么会一亩产几千斤小麦呢。于是地委就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县实地调查，回来说是真的。然后我亲自到现场察看，证明并不真实。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以后，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批斗，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

约有 12000 多人次。”

注意，当张树藩亲自调查核实“小麦亩产 3200 斤”确实是浮夸风，正要提出纠正时，此时，《河南日报》、《人民日报》“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以后，“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批斗”，为此竟把 12000 多个敢讲真话的人都打了下去。

请问，那时控制《河南日报》与《人民日报》的是谁呀？是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是中央一线领导邓小平、刘少奇！谁有能耐行动这么迅速，一下就把 12000 多个干部、群众整下去，是控制全省党政系统的省委书记吴芝圃。

再看看吴芝圃是怎样征过头粮的吧：

“1959 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歉收或无收。”8 月初，省委要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地委 9 个常委中，8 个人认为 1959 年农业生产比 1958 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 72 亿斤”“我在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歉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 30 多亿斤最多起不过 40 亿斤(后来证实只有 20 多亿斤我说的也多了)”。结果，省委“把我定成严重右倾分子”。

“省委仍按 1958 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 16 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

可是，以路宪文为书记的“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先到西平县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县”。“我就下到两个公社看了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出现浮肿。我看到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征购已透底，人民生活无着落，已出现浮肿和外逃现象，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我说瞒产可能有，但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生活问题，然后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他们县超征购了 700 万斤粮食，就让他们先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人提出动用国库粮食需请示省里批准，我说来不及了，等请示批准后再拿出来会饿死人的，你们不要怕，一切问题由我负责。我跟县委商定后，一方面让我的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一方面开仓放粮，安排群众生活，使这个县基本上没有饿死人。后来戴帽批斗时，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余德鸿同志也受牵连挨了整。”

“由于我在地委常委批斗会上一直拒不认错，常委们就给我总结山了四条‘严重右倾错误：1、把 1959 年的特大丰收说成大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说，到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并在县委书记会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2、在 8 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得那么严重，否定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3、到遂平县进行反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一斤粮食，反而不请示报告省委，私自动用国库粮 700 多万斤。4、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的作风。路宪文带结论性地说：你老张每次下乡，回来都向我说消极方面的问题，对 1958 年小麦亩产 3200 斤和 7320 斤你不相信，对大办钢铁也不相信下边报的数字等等，这不是右倾又是什么？我劝你要老实检查，从此你也不要工作了。此后，我除参加地委和专署党组组织的大小批斗会外，就是在办公室看书报。”

“直到 1959 年 11、12 月间，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以路宪文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报告，要了粮食。当时省委并不是不知道信阳地区的问题，省委主管财贸的副书记宋致和就曾在信阳到潢川县的公路两侧看到过几个饿死的人；省纪委书记刘名榜是信阳地区新县人。他回老家时，也在路上看到过死的人没人埋和乡亲的饥饿情况。但那时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出来为人民说句实话。”

“地委召开大、小会议批斗我的过程，也正是信阳地区饿死人最严重的时期。由于我坚持不按省地委要求作检查，不承认错误，批斗了两个月也就停下来了。到 1960 年 2 月，大

量饿死人的问题总算制止了。路宪文有一天找我谈话，说你从今天起就开始工作吧，未再谈及检讨错误的事，并说中央内务部来了一个处长要到淮滨检查灾情，你可以陪这位处长下去看看情况。就这样。我的所谓严重右倾错误也不了了之，并从此开始了工作。”

“我跟内务部郭处长到了息县、淮滨两个县，郭处长看到灾荒十分严重，就问我到底饿死了人没有。我说有，而且还不少。郭处长问饿死了多少人，我说自己从去年九月底就开始挨批斗，你来了我才开始跟你第一次出门，对全区情况也不了解，只能估计一下，饿死的人可能在 20 万到 30 万之间。郭处长一听就感到问题太严重了，只待了两天，就回内务部了。事后得知，郭处长回去后即向部领导谈了我说的话，部领导马上就让他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同样感到问题严重，又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马上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他们经过三个月的调查了解，越查问题越严重，最后结论是饿死的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

“他们将调查结果向省委汇报后，省委不是正视错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掩盖。不仅未对信阳地委严厉批评处理，省委书记吴芝圃还对路宪文说，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1960 年 7 月中旬，省委还派副书记杨蔚屏、李立和纪委书记刘名榜等在鸡公山上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地委扩大会议，统一认识，缩小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肯定‘大好形势’，也就是贯彻省委捂盖子的精神。在这个会议上也说要发扬民主，让大家提意见。路宪文在总结性发言中，也做了一些轻描淡写的检讨，但根本没有涉及问题的实质。我当时认为，路的讲话实际是表达了省委的意图。”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问题查清报告党中央后，毛主席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来到信阳地区。这时省委才慌了手脚，也仓促组织了六七百人到信阳，全面改组各级领导班子。先派省农工部长赵定远任信阳地委书记，省统战部副部长赵子平任副书记，高祥辉、刘策分任地委组织兼宣传部长；中央派的干部分别到各县、社任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主任等。原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停职检查，其他副书记、部长靠边站检查，原有九个地委常委仅留下我和纪委书记邱进敏没有动。”

“就在地县委彻底改组之时，中央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陶铸、王任重两书记，在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地委决定让我负责在第五步兵学校招待所接待他们。在招待所会议室里坐下喝茶时，吴芝圃说话了。他的原话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吴芝圃指着我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的问题吗？’本来我事先没想对中央领导说什么，但在吴说了这样一番谎言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说话了。”

“我的原话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上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他敢批斗我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产时地委定的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产，又拿出 700 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才给扣上严重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谈什么？”

“这时，我看到吴芝圃的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我还想再具体谈谈时，陶铸同志阻止我说：不要再往下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判错了你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了。这样，我也就不说了。”（按：显然是陶对吴的“关照”）

“第二天，吴芝圃和戴苏理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为什么省委书记和秘书长没经过地委亲自到县里逮捕杨守绩呢？就因为杨

在一九五九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这显然又是为了捂盖子、掩盖省委错误而采取的行动。”

最后，张树藩认为，“其实不止信阳，全省各地都有饿死的人，只是信阳更多一些。因此，信阳事件，实际上也是河南省事件，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应负主要责任。”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了解了“信阳事件”的全过程，很明显，从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省委书记吴芝圃，中南局书记陶铸，直至中央一线领导刘、邓，确实是一条线的。他们上下一气，互相包庇，在整个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确实推行了一条欺上瞒下、形“左”而实右的路线。

吴芝圃多次受到过毛泽东批评而不改(见附件三)，紧跟刘邓。他全力坚挺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自己也在困难时期受过中南局书记陶铸的“关照”，但在信阳事件中终于倒了霉。以后调往中南局任职，文革中遭受到冲击。

然而，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如此崇高的评价，耐人寻味。

还原“饿死三千万人”的真相

就在“反毛”右派气势汹涌，“污毛”政治谣言泛滥的日子里，有一位新中国的同龄人、正直的共产党人杨松林先生，下决心要弄清关于“饿死三千万人”的真相。终于积数年学术研究之功，写下了一部40万字的专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2013年10月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以严谨的学术方式，还原了历史，从根本上揭示了所谓“饿死三千万”的真相。

《真相》全书分三编。

作者首先向读者讲了一件事：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说斯大林在1936——1938年进行了残酷的“大清洗”，很多人被处决和流放。但具体数字没有公布。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开始“重评苏联历史运动”，此后关于“大清洗”期间被镇压的人数开始“层层加码”：

先是从前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提出的450万起步；

后增加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提出的1000万；

再到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中断言：“尽管被斯大林处死的确切数字将永远无法获知，但估计在2000万到2500万的范围内，不会是夸大的”；

再往后，其他一些人又“研究”出不断更新的记录，出现了3000万，甚至7000万的说法。

可是，“上世纪末，俄罗斯对前苏联档案资料进行解密。整个斯大林时期被处决的人是78.6万，平均每年2.6万人被处死刑。加上各种原因死在古拉格群岛、感化营和监狱的犯人和流放人，总共96.3万人，这里包括刑事案件的犯人。那些所谓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的数字都是推测的。”(《真相》第15页)

但这只能是马后炮了——苏联已经解体。

遗憾的是，在苏联解体前，居然没有一个学者对从数百万到7000万被害人的数字提出过怀疑！要知道上世纪30年代苏联的总人口仅为1.9亿口。7000万占其总人口的36.8%，这意味着不到3个人中，就有1个人被斯大林处死！且大家都信以为真。即使按照“不会是夸大的”布氏2500万说，也意味着每13个人中必有1个被处决。

读了杨松林先生的《真相》，深感内心的震撼。

《真相》第一编的篇幅有185页，约15万字。作者对中外诸多散布“饿死三千万”说的

有关“权威”人士的著述，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客观公允的态度，从人口学、统计学的公认准则，对其进行抽丝剥茧的梳理，从而得出结论：

“几乎所有研究者都在试图证明有一个‘大数’存在，为此付出艰苦的努力，以至于几乎大家不约而同地违反了基本数理逻辑、统计学原理和科学研究精神。一些所犯错误用‘幼稚’形容有些不尊敬，但说‘太过马虎’总可以。”(《真相》第 185 页)

“笔者并不认为这些研究者是因为能力不足才出了这么多颠覆性错误，也不敢猜测研究者的人品。如果怪罪，只能怪罪这场‘猜大数’活动，冥冥之中大家似乎从苏联解体过程中那‘几千万’的数字功效那里得到某种‘启示’(按：让百姓对推行“暴政”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产生痛恨，从而发生颜色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进入到这个‘谁能论证出中共饿死过 3000 万以上中国人’的有奖竞猜活动里。”(同上)

《真相》第二编，是作者以严谨的态度论证自己的分析与推算，最终以两种公式计算得出“超线性死亡”(即超过平均死亡人数——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结论：

第一种，“是取 1958 年 883 万死亡人口和 1964 年 773 万死亡人口作为超线性死亡的基准点，计算 1959 年——1961 年各年线性死亡数字”。最后得出“三年总计超线性死亡 287 万，或约为 300 万”。(《真相》第 315 页)

第二种，“是取 1956 年——1958 年期间平均死亡 853 万作为超线性死亡的基准点，以 1957 年为起点。把 1964 年——1966 年平均死亡 734 万作为超线性死亡基准点，以 1965 年为终点，计算 1959 年——1961 年各年线性死亡数字”。最后得出“三年合计超线性死亡 404 万，或者 400 万。”(《真相》第 315 页)

另外，作者还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以往故意被一些人忽视的权威数据。这就是由民政部系统自下而上逐级上报统计出来的数据：1959 年——1961 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它是我国由官方公布的唯一数字，即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灾情报告》中的《1959 年——1963 年饥荒情况》，其中有一项“非正常死亡”：

1959 年：17853 人；1960 年：374890 人；1961 年：647010 人。三年总计：103.98 万人！(转引自《真相》第 184 页)

一句话，官方《中国灾情报告》认为，根据民政部的统计结果，1959 年——1961 年三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是 103.98 万。

奇怪的是，这么一个由官方公布的，与三年自然灾害对中国造成伤害最为直接的重要史料，却从来未被那些“研究者”所引用；却偏要对户籍资料——对研究三年自然灾害问题只能作间接考证的资料大感兴趣，且大做文章。说穿了，无非是因为 1983 年公布的户籍资料中，有一个 1960 年——1961 年的“人口凹陷”(1960 年、1961 年年末分别比上年年末减少 1000 万和 348 万人口)，给那些反共、反毛人士提供了可钻的“空子”罢了！

殊不知，户籍资料虽然是人口变动的“登记”记录，当因多种因素干扰“登记”时，这一记录就自然会失真。杨松林先生以科学的态度，经过调查、研究，终于对这一时期《中国统计年鉴》人口数据的矛盾和人口变动的规律，作出了科学的合理的解释，解决了这个“人口凹陷”的疑问，得到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真相》第三编，是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所作的评述。对“天灾”、“人祸”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总结了治国的历史经验。

读了杨松林先生的《真相》，人们就可彻底看清辛子陵绘声绘色、大肆渲染“活活饿死 3700 万人！”的“污毛”阴暗政治心理。

来源：<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3/09/305900.html>

“饿死三千万”质疑

作者：金小丁

1959-1961 年间发生在中国的饥荒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是多年以来世人普遍关注的问题。1964 年中国政府进行了建国后第二次人口普查,但结果没有公布。在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之后,两次普查结果和历年户籍统计资料一起在国家统计局 1983 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里公布。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根据户口统计,中国人口总数在 1960 年减少了整整一千万。

《年鉴》公布以后,中外学者以此为主要依据,对三年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作出了各种估计。与此有关的比较重要的数据和中外专家在学术杂志上发表的研究论文,都被收录在海外《新观察》中文网站主办的《大饥荒档案》里(见 <http://xgc.bbsindex.com/wh/famine/> 或 <https://3dlabes.game-host.org>)。本文所引用的数据和文献,除另外注明者外,都可以从该网页上查证。

根据这些材料和研究结果,经西方和海外中文媒体的广泛宣传,三年大饥荒“至少饿死三千万人”似乎已经成为主流共识,甚至得到一些中国官方媒体和机构非正式的认可。本文通过对《大饥荒档案》登录的所有七篇研究论文的分析说明,这个流行甚广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和逻辑合理性,是不可信的。

《大饥荒档案》收录的七篇论文中,有三篇得出接近或超过三千万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其他四篇低于三千万。我们将分别对这两组论文进行讨论。在具体分析这些研究结果之前,首先应当明确的是,专家们论证出来的是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这与饿死人是两回事。比如,一个老年癌症患者本来可以活到 1962 年,但由于饥荒期间营养不足,体质下降,1961 年就去世了。在医生和他家人眼里,他明显死于癌症,不是饿死的,但在统计数据和专家的论证结果里,他属于非正常死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59-1961 年的三年平均死亡率为 18.1%,与 1950-1952 三年的平均死亡率 17.6%相当接近。也就是说,三年饥荒中大部分死亡,在 1950-1952 年可能被当成正常的。可是没人认为五十年代初那三年有几千万人饿死。中国历史上记载的饥荒死亡人数指的是饿死人数,通常只占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一小部分。有人用这次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与历史上饥荒造成的饿死人数相比,是不恰当的。本文讨论的是非正常死亡人数,不是饿死人数。

1. 三千万及更高死亡数的结果分析:

《大饥荒档案》所列的接近和超过三千万非正常死亡的研究结果有: Ashton 等四位美国人口学家估计的 2947 万(1984),美国人口统计局 Banister 博士的三千万(1984)和上海大学金辉教授的 4060 万(1993)。除此之外,近年来还有其他人提出超过三千万甚至四千万的估计数。但其学术水平都不在这三家之上,漏洞更明显,《档案》也没有登录,我们就无须在此浪费读者时间了。科学不须民主投票,只要《档案》所列的这三家中任何一个站得住,三千万非正常死亡就可以成立。下面让我们逐个分析这三项研究结果。

(一) 让我们先看一下 Ashton 等人的研究结果。他们先分别算出 1958 年中—1962 年中十岁以下儿童和十岁以上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再把二者相加而得到四年非正常死亡 2947 万的估计数。估计十岁以下儿童的死亡数比估计死亡总人数难得多。户籍统计的总人口数和死亡率是不分年龄的,只有 1953 和 1964 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包括各年龄组人数。可大多数在饥荒期间死去的十岁以下儿童,1953 年还没出生,不会出现在普查数据里。而他们 1964 年都已死去,也无法登记在案。这些儿童生来无影死去无踪,他们的人数是怎么推算出来的呢?

Ashton 等人口学家先根据 1982 年中国千分之一人口抽样生育率调查的结果,算出 1964

以前历年的出生人口，再与 1964 年人口普查的相应年龄人数对比，得到这些年龄组到 1964 年的存活率。以这些存活率为基础，加上其他假设，推导出各年龄组儿童在 1964 年以前历年的死亡率。但这样算出的死亡率有的成了负数，明显不合理。为了消除这些漏洞，Ashton 等专家修改了三个年龄组到 1964 年的存活率，使死亡率皆为正数，最后算出十岁以下儿童的非正常死亡数（635-639 页）。按照这些美国专家的说法，死亡儿童的 70% 都被中国政府的统计遗漏了。

这些专家的研究方法很难令人信服。首先，当死亡率出现负数时，他们能看出不合理并做了调整，但数值为正数的死亡率，就肯定没有问题吗？其次，既然存活率不可靠，需要修改，那么，以存活率为基础算出来的死亡率能可靠吗？第三，死亡率出现负数，各年龄组的存活率都可能有问题，其他假设和数据也可能不准确，为什么仅仅修改那三个年龄组的存活率呢？如果修改其他年龄组的存活率，或修改其他假设，也可以消除死亡率为负数的不合理结果。因此，Ashton 等人算出的儿童非正常死亡数只是很多可能性当中的一种，却不是唯一的或最合理的估计。

下面的实例说明 Ashton 等专家的估计确实不合理。根据他们的推算（619 页表 3），1958 年中至 1959 年中，十岁以下儿童非正常死亡高达 427 万，而十岁以上人口非正常死亡数不到 22 万。两年后年忽然风水轮转，十岁以下儿童非正常死亡只有 55 万，而十岁以上的非正常死亡达 910 万。再过一年，风水轮又转回来，十岁以下非正常死亡突破 442 万，而十岁以上的非正常死亡现象竟然彻底消失了。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有谁见过或听说过这种老少轮流死亡现象呢？Ashton 等专家解释，这是因为饥荒开始阶段政府没实行粮食定量，大人只顾自己吃，小孩被饿死。然后，政府向儿童提供专项救济粮，救活了小的，饿死了老的。再后来，粮食定量没有严格执行，又是孩子饿死，大人没事。

谁听说过中国政府在饥荒期间专给儿童发配口粮？即使发了，还不是要经过父母的手到孩子的口吗？如果狠心的父母能在 1959 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饿死，1961 年就能乖乖地看着孩子吃救济粮自己饿死？这些美国专家做出那样的解释，太不体谅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天下父母心了吧。

既然 Ashton 等专家分别算出来的十岁以下和十岁以上非正常死亡人数难以置信，他们由此所得出的 2947 万估计数也明显可疑。

（二）其次，让我们看看 Banister 博士。在她的研究结果中，与其 1958-1961 四年三千万非正常死亡估计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还有：1960 年死亡率 44.6%，婴儿（一周岁以内）死亡率更高达 284%，平均预期寿命仅 24.6 岁。

这些结果与官方数据的巨大差异，Banister 博士的解释是因为后者对死亡率严重漏报。据她估计，1953-1961 年九年间平均死亡漏报率高达 42%。她说这是因为中国老百姓对亲属死亡隐瞒不报，以便继续从政府那冒领粮食。假如真是这样，这些人死不发丧可不能象秦始皇似的，只瞒个把月，甚至一年半载都不行。因为日后被发现的死亡人数将会加到下一年度，进出相抵，不会对平均漏报率有什么影响。所以，这 42% 的地下工作者必须长期隐蔽，不断从坟堆里伸手向政府要粮，拿共产党当冤大头。Banister 博士太小看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了吧。

据 Banister 博士在 1987 年出版的《中国变化中的人口》（114-115 页）介绍，她先根据 1982 年生育率抽样调查，算出 1953-1964 年历年出生人数，再用这些出生人数之和减去从 1953 年和 1964 年人口普查得到的总人口变化数，算出 1953 年至 1964 年的死亡人口总数。然后她把这些死亡总人数分配到 1953 至 1964 年期间，得出历年死亡率。她估算出的 1957 年死亡率为 18%，1962 年为 14%，并假设 1958 年至 1961 年的正常死亡率由前者向后者线性递减。最后，她用这四年估计的死亡率超过正常值的部分与总人口数相乘，得到 1958-1961

年三千万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其中仅 1960 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接近二千万。

假设 Banister 博士的出生人口数正确，其计算过程中最关键也最有争议的是如何将 1953 年至 1964 年的死亡人口总数分配到历年中去。显然，分配到饥荒年份的死亡数越多，算出的非正常死亡数也就越大。她对其分配死亡人数方法的解释是：“这个随意估计的过程得助于官方死亡率的升降趋势。我们可以假设，虽然历年的官方死亡率都太低，但他们所显示出的趋势还是代表了真实情况的。我们在此列出的大多数年份的死亡率估计，就是在这样的假设下得到的（115 页）”。

按照上述说法，最简单的办法应是假设历年死亡漏报率相同或漏报百分数相同。但 Banister 博士没有这样做。她估计 1960 年死亡漏报率为 43%，从而使她估计的该年死亡率比公布值高出 19%。而她估计 1957 年和 1962 年的死亡漏报率为 40% 和 28%，使得她对这两年死亡率的估计只比公布值高 7% 和 4%。这样的区别对待明显拉大了 1960 年死亡率与 1957 和 1962 年死亡率之间的差距，使她得出的 1960 年非正常死亡率几乎是按官方数据得到的两倍。这是她算出 1960 年近二千万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关键。她没有解释把 1960 年死亡率和漏报率估计那么高的原因。

那么，Banister 博士估计的 1960 年 44.6% 的死亡率能否自圆其说呢？可惜不能。按照她书中（42 页表 2.7）给出的她对《年鉴》数据调整后的估计，1959 年底和 1960 年底中国总人口数分别为 652,505 万和 647,665 万。而她估计的 1960 年出生率为 26.8%。由此，我们可以推出 1960 年的死亡率应为 34.2%，远远低于她自己在同一本书里给出的 44.6%。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

另外，根据 Banister 博士书中的数据（384、386 页表 A.1、A.2），我们可以用 1964 年普查时 3 岁和 4 岁儿童的平均数，计算出生于 1960 年并活到 1964 年的人数至少为 1292 万（如果按 4 岁儿童人数计算，则更高达 1430 万）。即使所有 1960 年出生者年满一岁以后到 1964 年普查时一个都没死，按照 284% 的婴儿死亡率，1960 年出生人数最少也得有：1292 万 / (1 - 0.284) = 1804 万。再遵照 Banister 博士估计的 1960 年 26.8% 出生率，我们应当得到 1959 年底全国总人口数为 1804 万 / 0.0268 = 673,309 万。这个数目比她估计的 652,505 万超出二千多万。如果考虑到 1960 年出生者一岁以后到 1964 年普查时死去的人数，差别会更大。Banister 博士这个二千多万人的误差不解决，她的三千万非正常死亡估计数能有多少意义呢？

（三）最后，轮到唯一的中国学者，估出 4060 万非正常死亡人数的金辉教授。出于对同胞的尊重，我们对金教授的研究做一点更认真详细的介绍。在得出这个最高死亡数之前，金辉教授先得出非正常死亡最低 2791 万和农村非正常死亡 3471 万两个结果。我们将对这三个数字分别进行讨论。

（1）非正常死亡至少 2791 万：金教授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算法是用出生人口 - 正常死亡人口 + 总人口减少值。对于出生人口，他“暂且利用公布的出生率”得出“1960 年出生了 1381 万人（66207 万 × 0.02086），1961 年出生了 1187 万人（65859 万 × 0.01802），两年中共出生了 2568 万人”。对于正常死亡人口，他“取 1956、1957 和 1962、1963 年的平均值 10.57 作为 1959-1961 年间的‘正常死亡率’的值”，得出“1960 年正常死亡数为 699 万（66207 × 0.01057），1961 年为 696 万（65859 × 0.01057），两年累计为 1395 万”。另外，“1960 年总人口净减 1000 万，1961 年又净减 348 万，两年累计 1348 万”。

根据其非正常死亡人口计算公式：“2568 万（出生人口） - 1395 万（正常死亡数） + 1348 万（净减总人口） = 2521 万（非正常死亡）”。由此，金教授下结论：“可见，1960 - 1961 年两年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达 2521 万”。金教授继续推论：“还有 1959 年。我们姑且相信公布的死亡率 14.59，其与前述平均死亡率之差为 4.02，即使这样，1959 年的非正常死亡数亦达 270 万（67207 × 0.00402）”。因此，“1959-1961 年三年灾难时期，中

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肯定不低于 2791 万（2521 万+270 万）”。

金教授没有解释为什么他“暂且利用”《年鉴》1960 和 1961 年的出生率，不利用死亡率，然后又“姑且相信”1959 年的死亡率，不相信出生率。听他的口气，好像反过来算会让他更高兴。那就让我们看看结果如何。依照 1959 年的出生率 24.78‰ 计算，当年出生人数为 $67207 \text{ 万} \times 0.0247 = 1660 \text{ 万}$ 。人口增长量为 $67207 \text{ 万} - 65994 \text{ 万} = 1213 \text{ 万}$ 。正常死亡数为 $67207 \text{ 万} \times 0.01057 = 710 \text{ 万}$ 。因此，按照金教授先生的公式，1959 年非正常死亡数为： $1660 \text{ 万} - 710 \text{ 万} - 1213 \text{ 万} = -263 \text{ 万}$ 。另外，1960 和 1961 年的死亡率为 25.43‰ 和 14.24‰，两年非正常死亡数是 $67207 \text{ 万} \times (0.02543 - 0.01057) + 66207 \text{ 万} \times (0.01424 - 0.01057) = 1242 \text{ 万}$ 。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1242 \text{ 万} - 263 \text{ 万} = 979 \text{ 万}$ ，远低于金教授的 2791 万。

我们未必相信 979 万的低估计数，但对金教授先“姑且相信”一种算法，接着又“暂且利用”另一种算法而得出的 2791 万，不能不怀疑其可靠性。

（2）农村非正常死亡 3471 万：在算出全国非正常死亡 2791 万的基础上，金教授进一步分析：“三年中市镇非正常死亡约为 157 万人，但市镇人口按公布增长率算仍增加了约 545 万人。而 1958 年底至 1961 年底，三年中全国总人口是负增长 135 万人，这即意味着仅仅中国农村那三年中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死亡的总数还要多出 680 万人”。这样，他的结论是：“三年灾难中，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 3471 万。”

让我们“姑且相信”金教授的 2791 万非正常死亡人数。既然“三年中市镇非正常死亡约为 157 万人”，农村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简单算法应当为 $2791 \text{ 万} - 157 \text{ 万} = 2634 \text{ 万}$ 。只有城市非正常死亡人数为负数时，农村非正常死亡人数才可能高于全国。金教授用城市增加人口 545 万+全国人口负增长 135 万所得的 680 万，应当是农村人口三年净减少数。参照金教授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计算公式，农村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当为：农村出生人口-农村正常死亡人口-农民进城净人口+680 万农村人口减少数。金教授把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 2791 万当成前三项之和，得到他的 3471 万农村非正常死亡人数，太有想象力了。

按理说，农村出生人口-农村正常死亡人口应当等于农村人口数 \times （农村出生率-正常死亡率）。按照金教授所列的数据，三年共计 $54836 \text{ 万} \times (0.02378 - 0.01057) + 53134 \text{ 万} \times (0.01935 - 0.01057) + 53152 \text{ 万} \times (0.01699 - 0.01057) = 1834 \text{ 万}$ 。忽略城乡人口移动，三年饥荒期间的农村非正常死亡人数应为 $1834 \text{ 万} + 680 \text{ 万} = 2514 \text{ 万}$ 。这个数字跟我们前面按简单算法得到的 2634 万基本吻合。

所以，即使“姑且相信”金教授的 2791 万非正常死亡数，他的 3471 万农村非正常死亡估计也完全是概念糊涂导致计算错误的结果。按照金教授的话讲，真是“误差太大了。大得令人难以置信”。

（3）全国非正常死亡 4060 万：让我们再次“姑且相信”金教授的 2791 万，看看他如何论证出全国 4060 万非正常死亡人数。首先，由于《年鉴》公布的人口数和人口增长率不吻合，金教授宣称他“可以断言，误差如此之大的数据，肯定不全部是原始数据，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真假相间虚实结合的信息，虽然我们目前也许尚未能精确地完全破译它”。因此，金教授当仁不让承担起“精确地完全破译它”的重任。他“经过反复正向和逆向的演算，发现这些数据虽然表面上充满了矛盾，但它们之间又确实有着自身的规律和内在的逻辑。……有些数据尽管明显是矛盾的虚假的，但是，它们却极为微妙地在暗中指点迷津，使人通过这些虚假数据搭起的桥，而最终能够寻找到原始的真实之所在”。

果然，经过这些“虚假数据”“极为微妙地在暗中指点迷津”，金教授发现 1961 年底的全国总人口数比《年鉴》公布的 65,859 万少 1278 万。这 1278 万被官方数据隐瞒的死亡人数，加上前面算出的 2791 万非正常死亡数，终于使金教授“寻找到原始的真实”：“中国在 1959-1961 年的三灾难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 4060 万”。

金教授发现的这些被隐瞒的死亡人数是从三个数的平均值得出来的。这三个数是：“1324万、1214万、1295万。三数平均为1278万”。第一个数是以1961年底公布人口数为基数，按照公布的人口增长率算出1964年底应有人口数，再减去1964年底实际人口数得到的。第二个数是以1964年底实际人口数为基数，按照公布的人口增长率反推出1961年底应有人口数，再用1961年底公布人口数与此数相减得到的。

让我们先看看这前两个数之间的关系。假设1961年底人口数为A，1964年底人口数为B，其间人口总增长倍数为r。显然，前述第一个数的表达式是 $rA-B$ ；第二个数为 $A-B/r$ ，二者相差r倍。1962-1964这三年人口增长率为26.99%、33.33%和27.64%，所以， $r=1.02699 \times 1.03333 \times 1.02764=1.09055$ 。因此，毫不奇怪， $1214 \div 1.09055=1324$ 万。可见，这两个数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是互相独立的计算结果，完全没有理由加在一起算平均值。第一个数1324万的含义是，假如1214万人在1961年没死，按增长率计算到1964年底的应有人数。这个数怎么能当成饥荒期间死亡人口跟1214万一起平均呢？

金教授第二个数1214万的根据是，他认为《年鉴》公布的1961—1963年底人口数均不可信，但1962-1964这三年的人口增长率是可信的，因为他“猜测，统计人员不是出于‘疏忽’，而是出于职业道德和良知，在公布的数据中保留下了这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让我们“姑且相信”金教授的猜测，接受1214万。

现在来欣赏一下金教授的第三个数字1295万。这个数字是金教授“以1959年底的公布总人口为基数，按1960年、1961年的公布增长率计算，得到的结果就比1961年的公布总人口多1295万人”。请读者注意，这里金教授得到的结果比“公布总人口多1295万”，也就是说，《年鉴》公布的官方数据低估了人口数，把1961年底仍然活着的1295万人漏掉了。这个结论与前面1214万的意义正好相反，显示非正常死亡人数有可能被高估了1295万。

遵循金教授平均值算法，略去那被错加的1324万，我们可以算出1961年底实际人口比《年鉴》公布值低多少，结果为 $(1214 \text{ 万} - 1295 \text{ 万}) / 2 = -40 \text{ 万}$ 。也就是说，《年鉴》把1961年底的人口数低估了40万，依此而得到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被高估了40万。调整后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应为 $2791 \text{ 万} - 40 \text{ 万} = 2751 \text{ 万}$ 。

莫名其妙的是，金教授却将这1295万当成跟1214万互为印证的同类，加在一起算平均值。一个一千多万的负数，只要绝对值近似，就被金教授看成是跟一个一千多万的正数代表着相同的含义，并且认定这些数字“指向同一个数值，它们显然不是什么‘误差’了，而分明是假中含真、由假寻真的路标”。金教授所以能得到1278万的平均值，靠的就是这种把负数当正数、减法变加法的“逆向的演算”。

我们跟着金教授，“通过这些虚假数据搭起的桥”，寻找到的这些“原始的真实”，用金教授的话说，“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除非谁能对这些‘一蹋糊涂’的数字另外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正如他所说：“如此巨大的误差当作何解释呢？笔者不相信这是统计中的疏忽，也不相信这是一种偶然的误差”。的确，金教授的误差用基本概念的“一蹋糊涂”都难以解释。我们不得不怀疑，也许他提供的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真假相间虚实结合的信息”，遗憾的是我们不会“反复正向和逆向的演算”，所以迄今“尚未能精确地完全破译它”。

总之，经过对三个研究结果的分析，我们看到三千万或更高的非正常死亡估计数，没有一个站得住脚。下面让我们看看超过二千万的估计数是否靠得住。

2. 低于三千万死亡数的结果分析：

除以上三项研究外，《大饥荒档案》收录的其他四项研究结果都得出低于三千万的非正常死亡估计数，其中有：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1997）、西安交通大学教授蒋正华和李楠（1986）、复旦大学教授彭西哲（1987）和中山大学教授李若建（1998）。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些研究成果。

（一）李成瑞老先生的文章首先质疑美国人口学会主席 Coale 教授（1984）所估计的 2680

万非正常死亡数。Coale 教授的估计也是利用 1982 年的生育调查,对《年鉴》公布的死亡率进行调整后得到的。李老先生指出:“(1)按科尔书中给出的户口登记 1957 年死亡人数 590 万,死亡率为 10.8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 54630 万人;(2)按科尔书中给出的他所估计的 1957 年死亡人数 1040 万,死亡率 19.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 54737 万人。这样倒推出来的两个 1957 年人口数比 1953 年全国人口普查的 58260 万人(这个数字是科尔所肯定的)还少 3500 至 3600 万人;而且把 1957 年与 1958 年的 65,324 万相比,一年内猛增 1 亿多人,这些都是难以设想的。因此,笔者认为科尔书中给出的 1957 年两个死亡人数与相关数字间存在着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至少在科尔作以新的解释前是这样的。”

李老先生对 Coale 教授的算法做了必要的修正以消除以上矛盾之后,得到的非正常死亡估计数为 2158 万。但这未必表明他本人完全赞同这个数字。事实上,他比较认同蒋正华和李楠教授的估计结果。

(二) 蒋正华和李楠教授估计 1959-1961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1858 万。这是对其原来 1697 万的估计数作了修正以后得到的。他们对《年鉴》公布的人口数、出生率和死亡率都作了重新估计,减少了三者之间的矛盾,但仍不能完全吻合。他们的结果是在《大饥荒档案》上列出的唯一低于二千万的估计数。(三) 复旦大学彭西哲教授估计 1958-1962 五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二千三百万。他首先分析人口变化资料较全的十四个省份,其中包括四川、河南、山东、湖南和贵州等死亡率较高的地区。由此他估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1420 万。然后,他在此基础上假设饥荒期间官方的死亡漏报率比饥荒前高 10%,又进一步假设占全国人口 40%的其他省份的非正常死亡率与这十四省类同,这样得到二千三百万的非正常死亡数(649 页)。他没有说明这些假设的根据是什么。这两个假设,尤其第二个明显有待商榷。如果对其做些修改,譬如,假设其他省份的非正常死亡率只是这十四省的一半,彭教授的估计值则与蒋正华和李楠教授很接近。

(四) 中山大学李若建教授对 1958-1961 四年非正常死亡的估计数在 1530 万~2470 万人之间。这个结果其实没有多少独立研究的学术内容。其下限依据《年鉴》公布的死亡率,上限采纳了 Banister 博士的死亡率。上限比 Banister 博士的估计数少了 530 万,主要原因是后者的正常死亡率是从 1957 年的 18%向 1962 年的 14%线性递减的,而李教授采用 1957 年的 18%为正常死亡率。Banister 博士死亡率估计的随意性与自相矛盾,我们已经在前面作了说明。所以,李教授的 2470 万估计数也不可靠。他的下限估计 1530 万比蒋正华和李楠教授还低 330 万,因为他用的是没经过修正的公布死亡率。由此推导出来的出生率与《年鉴》公布的出生率矛盾很大。他没有解释为什么片面相信公布的死亡率,却忽略出生率。这样任意取舍的算法也有问题。

通过对《大饥荒档案》收录的全部七项研究论文的讨论,可以看出,二千万以上的非正常死亡估计数也没有一个是完全可靠的。因此,根据现有的数据和分析结果,三年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可靠估计很难超过二千万。

3. 几项补充说明:

本文的目的不是为饥荒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提供答案。然而,为使读者对此有更多的了解,我们有必要针对几个相关问题做些说明解释。

(一) 政府是否隐瞒真相:西方媒体和华人精英阶层中,不少人怀疑中国政府的人口普查资料隐瞒真相,压低了死亡人数。这种怀疑的主要依据有两点:一是《年鉴》公布的 1960 年中国总人口净减整整一千万,有人怀疑真实数字高于此数,但在政治干预下只能报一千万;二是《年鉴》公布的总人口数与人口增长率不相符,有人怀疑也是政治干预的结果。

就以上两个问题,笔者于 2006 年初拜访了负责 1982 年中国人口普查和出版 1983 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对第一个整数一千万的问题,李老先生明确地说,那是一个巧合,在万位数以下是有零头的,但被略掉了,绝对没有任何政治干预。对第二个

总人数与增长率矛盾的问题,李老先生解释说,这是当时按照两种不同渠道得到的实际结果,确实表明数据不准确,但又无法确定哪个数字更准确,所以决定如实发表,同样没有受到任何政治干预。从笔者个人与李老先生交谈所得的印象来判断,他的这些话是完全可信的。当然,笔者的判断不足以作为证据。希望有热心人继续探讨,找出当年数据收集和处理的原始资料,给历史一个完满的交代。

除此之外,外界普遍存在的疑问是,中国政府是否掌握公开资料以外有关饥荒死亡人数的重要信息。比如,有人说刘少奇曾讲过三千万的饿死人数,杨尚昆认可过四川省至少一千万的饿死人数。我向李老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他回答说,当时不可能有这样的准确数字。饥荒期间,他是李先念副总理的秘书,住在中南海,邻居中有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那时中央很想知道各地的灾情,但得不到详细材料。统计局在大跃进时被撤销。即使当时有些估计数,也只能是猜测。除了已经公开发表的资料之外,他没听说其他权威性的统计资料。他问:如果有,是怎么来的?如果这么容易就能得到这些数据,还要我们统计局干吗?

(二) 1982 年生育率调查:从以上讨论我们看到,在接近或超过三千万非正常死亡的估计结果中,有三个出自美国专家(金辉教授不在此列),即 Ashton 等四位人口学家, Banister 博士和李成瑞老先生文中提到的 Coale 教授。他们的估计结果都导致明显的自相矛盾或者与实际情况相差太远。这里是否存在某种共同的原因呢?这三项研究的共同点是,根据 1982 年生育率抽样调查的结果,得出高于《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出生率。在确认 1964 年普查人口数量的前提下,在此之前出生人数越多,则死亡人口也越多。只要这些多出来的死亡人口不是平均分配到各个年份,必然提高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如果 1982 年生育率调查准确,这些专家按以上思路所做的研究出错的可能性应当较小。反过来说,他们的不合理结果,可能是 1982 年生育率调查不准确造成的。与人口普查不同,1982 年生育率调查不是由国家统计局,而是由计划生育委员会主持的。调查所覆盖的千分之一人口大约一百万,调查对象是 30 万左右 15-67 岁的女性,平均每个年龄组只有六千人,分到每个省平均二百人。抽样调查是以生产大队和街道为单位进行的,比个人抽样的随机性小得多。尤其重要的是,这次调查的目的是为以一胎化为中心的人口控制措施提供依据。而计划生育委员会本身又是人口政策的执行者,主观上有为强调控制人口的紧迫性而偏高估计生育率的可能。这种误差的产生,只要在抽样选择调查单位时,有很小一点倾向性就足够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今天,计划生育委员会所估计的出生率仍然高于其他人口专家和研究单位的结果,而且差距如此显著,甚至到了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步。1982 年的抽样调查夸大生育率是很有可能性的。

基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只要 1982 年生育率调查得出的结果稍微偏高一点,由此产生的多余出生人口就不是小数。这些幽灵人口必须“死”于 1964 年以前,经专家们的推理演算,大部都变成了非正常死亡。但这些错误假设下的演算跟现实对不上号,所以就出现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各位美国专家所得到的荒谬结果。

(三) 正常死亡率:以上所讨论的研究选取的正常死亡率,大都假设为从 1957 年的水平向 1962 年线性递减,或按与此原则类似的方法计算。许多人认为,既然 1950—1957 年的死亡率逐年下降,饥荒期的正常死亡率也应继续下降。所以,按此原则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乃是最低估计。这个结论是不对的。

第一,饥荒后的 1962 年,老弱病残者已大部死去,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即使各个年龄组的死亡率与 1957 年相同,总死亡率也会较低。因而以该年死亡率为正常标准可能高估非正常死亡数。

第二,由于 1950—1957 年死亡率逐年下降,人口平均年龄提高,老年人增多。即使其后几年各年龄组死亡率不变,总死亡率也可能上升。死亡率下降越多越快,反弹也会越明显。这种死亡率正常反弹现象就出现于 80 年代初。

1965—1979 年死亡率几乎年年下降，而 1979—1983 年却连续四年上升。

1965—1979 年死亡率由 9.50‰降到 6.21‰，年平均 0.24‰。1979—1983 年死亡率由 6.21‰回升到 7.08‰，每年平均上升 0.22‰，几乎与下降速度相同。这显然与饥荒等灾害无关。更没有人会认为“联产承包”等政策造成几百万人饿死。

相比之下，1950—1957 年死亡率下降更多更快，由 18.0‰降到 10.8‰，七年下降 7.2‰，平均每年 1.03‰。如果 1957 年以后四年死亡率也象 1979 年后那样出现与下降速度几乎相等的反弹，则应每年上升大约 0.9‰。由此算出的 1959-1961 三年非正常死亡数，与按照从 1957 年向 1962 年线性递减的正常死亡率得出的结果相比，差别超过五百万。所以，从后者得到的估计值，并不是最保守的。

（四）失踪的证据：最后，我们离开统计数据，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死亡人数问题。凡是比较准确的死亡估计数，不仅应与统计数据和分析结果相吻合，而且应能经受人证物证的检验。非正常死亡三千万的说法，不但缺乏学术研究的支持，而且跟人们的现实生活经验有很大的矛盾。

饥荒期间大量饿死人的现象主要发生在四川、河南、山东、湖南、安徽、贵州等地。如果二、三千万死亡人数在这些地区平均分布（基本上不可能），几乎每人都应有亲朋邻友遇难。如果是不平均分布，应有许多村、乡（公社）、县死亡过半，甚至十室九空。这些灾区应当留下大量集中掩埋的尸骨，大片抛荒的土地和无人村落，或有大批移民来填补。另外，普遍死亡应导致大量孤儿和鳏夫寡妇，导致广泛的家庭重新组合现象。这些证据几十年后都不会消失，而且应该不难找到。

饥荒结束不到五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大串联期间，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南几乎每个公社都有不少年轻人走向全国。当时信息交流基本上不受限制。受灾地区各级干部被打倒的不少，“三年困难时期不管人民死活”常常被作为他们的罪行。可即使在捕风捉影的揭发材料里也难找到与“饿死三千万”之说相符的证据。改革开放以来，诉大跃进之苦更成了政治时髦。连官方媒体上对饥荒的惨痛描写也已汗牛充栋。但涉及大范围饿死人的事件，除河南信阳外，大都语焉不详。甚至就连信阳地区，也未发现媒体宣传的饿死一百多万的充足证据。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日，全国范围内此类证据的数量实在难与“饿死三千万”的结论相符。古今中外恐怕还没发生过毁灭尸灭迹如此彻底的饥荒。

毋庸置疑，每一位受饥荒影响而死亡的同胞，都是中华民族的不幸，都值得我们这些幸运者深切的同情和哀悼。但我们在同情和哀悼的同时，也应当避免中国文人根深蒂固的那种人云亦云、跟风造势、甚至弄虚作假的风气。少点这种风气，近半个世纪前那场惨痛的民族灾难就不会发生了。

2007-07-24

来源：<http://www.wywxwk.com/Article/lishi/2009/09/18587.html>

“饿死三千万”，最后一根毒刺

作者：星逝夜潭

石仲泉，刚刚恶狠狠“17 大精神不包括毛泽东思想”，一转身假惺惺“毛泽东思想一贯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想起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一句台词：“嘿，这小子刚才还说过，转眼不认账，真不是个玩意儿！”。这等“翻脸像翻书”在土匪窝里也不待见，杨子荣代表祖国自是当仁不让。

石仲泉二次现身“强国论坛”，不为毛泽东思想来，为“饿死三千万”来。提问“饿死”，和回答“非正常死亡”唱双簧。提问在凳子后边说“饿死”，石仲泉在前边白粉擦鼻子演“非正常死亡”。

一、不正派，不老实

石仲泉的“非正常死亡”，就是“饿死”。石仲泉不说“饿死”，说“非正常死亡”，

搞阴莺诡诈，文字酱缸。石仲泉特意供出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也一样，也是“饿死”代名词。

“心不正，则眸必睨焉”；“眸不正，则其心蒙焉”。石仲泉闪烁其词，鬼祟左右，不正派。

是饿死，就说饿死；没有饿死，就说没有饿死，说“非正常死亡”，“人口变动”，不老实。

二、逻辑混乱，语无伦次

石仲泉说，“所以对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有两个材料，这是国家认准的，也是根据当时公布每年人口情况的增减计算出来的”；“这个材料在 1997 年中国大事研究，作为一个打头文章发表，当时我是主编，我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我去阅的稿，这是很负责任的”；“李成瑞这个老同志还在，他的思想观点我想网友都很熟悉，这是很负责任的”；“文章叫做‘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我们发表在《党史研究》1997 年，有兴趣的网友可以翻看这篇文章，这是公开负责任的”；“我所知道这个材料是我亲自阅稿的，亲自面谈的，是经过程序往上报了的”；“李成瑞的文章是受到党史研究室的认可，这个我可以负责任”；“这个数字我采访过他，他讲的情况我们领导也认可了”；“我是可以负责任的讲这个事”，等等。

石仲泉 600 多字回答，7 处“我”；1 处“我们”；6 处“很负责任”和“负责任”。

“我”，“我们”，石仲泉嘛。石仲泉太自以为是了。石仲泉就是 100 次，1000 次，更多次“很负责任”也没用。何况石仲泉的很负责任，到底是不是很负责任，石仲泉自己说的嘛。

“负责任”、“很负责任”，至多代表态度，代表过程，不代表结论正确。“南辕北辙”，越很负责任，越“南辕北辙”嘛。何况这里的“很负责任”仅仅是石仲泉个人。

而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些人，更多人“很负责任”，即使“党史研究室的认可”，即使“我们领导也认可”（谁“我们领导”了？这么说实在有点可笑，特别是现在。石仲泉真的没辙了，几乎到要供出幕后人的程度。），也可能得出很不正确，很不负责任的结论。历史研究是科学，不是打架，不是投票，也不是官场，不凭力气大，不靠人多、官大、权重。这么简单的道理，石仲泉应该明白。何况石仲泉还偷换概念，假话谎言。

三、偷换概念，假话谎言

石仲泉“所以对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有两个材料，这是国家认准的，也是根据当时公布每年人口情况的增减计算出来的”。这里的“所以对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有两个材料，这是国家认准的”是假话。国家什么时候认准了三年困难时期造成“非正常死亡”，还“两个材料”了？石仲泉作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这样颠三倒四，自说自话，说谎造假的遣词造句，不应该，不允许，不道德，很不负责任。

所谓材料，即国务院 1983 年公布的《中国 1949—1982 历年人口统计数字表》。

1、按照这个《人口数字统计数字表》，1959-1961 年的三年平均死亡率为 18.1%，与 1950-1952 三年的平均死亡率 17.6%相当接近。也就是说，这两个相当接近的死亡率，在 1950-1952 年是正常死亡；而在 1959-1961 年则是非正常死亡。石仲泉怎么就得出这样的“非正常死亡”的“认准”了？

2、后来的几次人口普查还对这个《人口数字统计数字表》的 1960 年人口统计数字，及以后年份的人口统计数字提出质疑。（就是说“饿死”人的专家也对这个《数字表》质疑。认为“隐瞒”“一塌糊涂”。当然，是因为得不出预定的饿死人数字而质疑。）

比如，按照这个《人口数字统计数字表》，1960 年的年末人口数，比年初人口数，少了整整 1000 万人，这个蹊跷的整整减少的 1000 万人，为以后所有的饿死 3000 万人，几千万人的“计算”提供了最原始的材料。

比如，按照这个《人口数字统计数字表》，1960 年出生人口数 13795007 人。但是，这个

数字，和 1982 年，1990 年，2000 年的三次全国人口普查，都出入甚多，错误明显。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计算，出生于 1960 年的人口，分别比《中国 1949—1982 历年人口统计数字表》中的人口数 13795007，多了 512189 人、648112 人、889719 人。

这就是说，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1960 年出生的人口不仅没有一人死亡或者出国出境，不仅没有比原来的数字减少，反而一次比一次都更增加。1982 年多出 51.22 万人；1990 年多出 64.81 万人；2000 年更多出 88.97 万人。证明原来“国家认准的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有很大的出入和错误，并质疑其特色年代的特色动机。这些多出来的人，和这几十年中死亡和出国出境的人，可能存在于 1960 年年末人口数比年初人口数被减少的 1000 万人里面。

而最关键的是，所有饿死 3000 万，4000 万，6000 万，8000 万，更多万，都是“计算”出来的。

四、这是什么“计算”？

石仲泉说“所以对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有两个材料，这是国家认准的，也是根据当时公布每年人口情况的增减计算出来的”。其中“所以对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有两个材料，这是国家认准的”云云，上面已经指出，是假话谎言，从来没有石仲泉所谓的“国家认准的”“非正常死亡”这个东西。石仲泉信誓旦旦的所谓的“非正常死亡”、“饿死”，完完全全是石仲泉自己“计算”出来的。

而即使同样是“国家认准的”材料，石仲泉就计算出了“饿死”2158 万、2200 万、2700 万、1700 万四个数字，其他人还计算出了其他五花八门，离奇古怪的数字。石仲泉拍胸部“很负责任”，石仲泉算术就特别好？比所有人都好？石仲泉实在是很不负责任。

这么重要的事件，凭后来几次全国普查证明有很大出入和错误，动机有很大主观性和随意性的材料进行“计算”，本身就荒谬和不负责任。而其计算设计也存在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凡是有利于统计出饿死人的计算设计，就肯定；凡是不利于统计出饿死人的计算设计，就否定；甚至同样一种计算设计，也去掉不利于统计出饿死人的结果，而采取有利于统计出饿死人的结果。

所以，石仲泉的“很负责任”，一切都只是为了“很负责任”的“计算”出“饿死人”，即使这种“计算”很不负责任。

五、事实胜于“计算”。

专家设计的“计算”有点复杂，一般人搞不太懂，本文可能也搞不太懂。其实一般人也没有必要搞太懂，因为就是专家自己也搞不太懂。一些专家设计的“计算”，另一些专家就搞不懂，就提出异议。而就是自己设计“计算”的专家，也对自己的“计算”设计搞不懂，要用“解释”解决，比如为什么计算出 1959 年、1960 年儿童死亡率高，1961 年大人死亡率高，再过一年，又儿童死亡率高？专家解释是，开始国家没有对儿童进行救济，大人只顾自己吃，小孩饿死了；后来国家对小孩救济了，大人看着小孩吃，自己饿死了；再后来，国家又不救济小孩了，大人又只顾自己吃，小孩又饿死了。有这样的大人，这样的父母吗？这就是专家的计算，荒唐。

当然，不是说石仲泉不能计算，只是石仲泉除了计算还是计算。三年困难时期生活的人现在还大量存世，石仲泉没有一句说到对这些还大量活着的当年的人们的调查，这是很不负责任的。

进行这样的调查很容易，找当时的人，找饿死人的地方，看看都是什么人饿死了？什么地方的人饿死了？埋在什么地方？埋葬的情况怎么样？什么人埋的？现在的亲属还有那些？等等。在和平时期，在三年时间，饿死二、三千万人，8 年抗日战争、3 年解放战争、为了新中国成立奋斗 28 年，又死了多少人？这么短的三年时间里，死了这么多人，而且时

间还离现在这么近，一定还留下许多可以见到，可以听到的充分翔实的证据。而现在是一个具体的饿死人的地点也没有，一份具体的饿死人的名单也没有，这就很不负责任，很难自圆其说，很难令人信服。

甚至连一张饿死人的照片，一张饿殍照片，一张饿死人尸体横陈堆积的照片都没有，这对于饿死二、三千万这么大的事件，是不可思议，不能说服人的。

凡是说饿死人，特别是说饿死 3000 万，几千万的人，无论是专家，还是其他人，首先要做的是，对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出生地，自己的生长地，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家族，自己工作的学校、单位、工厂、城市、乡镇、村庄，做一个调查，写一个材料，说说在这些地方，这些地点，这些人群，有没有人饿死？谁饿死了？饿死几千万这么重大的事件，需要 100 份，1000 份，10000 份这样的报告。太多吗？不多。太难吗？不难。要求太过分吗？不过分。

如果一个村庄 500 人，全部饿死，一万份报告，一万个村庄，一共 500 万人，这离 2200 万，3000 万，还差 1700 万人、2500 万人。这 1700 万人、2500 万人，将分布在其他多少个没有全村庄人都饿死的地方啊。所以说这样的要求不是太难，不会过分。但是，现在有几份这样的报告了？没有。都是文字来，文字去；数字来，数字去；“计算”来，“计算”去。连一个上台以亲身经历诉苦的人也没有，连一张饿死人的照片都没有。这么地缺乏史实，不可思议，无法理喻。

二战时期日本鬼子留下的万人坑，至今历历；二战被日本鬼子劫掠到日本去的中国劳工，至今还有本人，还有亲属在诉讼赔偿。三年饿死人的亲属，以及当年饿死人现场的亲历者更有人在。这些人那里？

石仲泉作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负责人，对这个问题又好大兴趣，有着很大很好的便利条件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研究。石仲泉一点也没有做，仅凭“计算”得出饿死“2200 万人”，很不负责任。石仲泉家里饿死人吗？石仲泉家族饿死人吗？石仲泉家乡饿死人吗？石仲泉的亲戚、邻居、同学、朋友饿死人吗？石仲泉劳动、学习、工作过的地方饿死人吗？石仲泉不说这些，即使排骨拍得再咣当响，也没有用的。这样的不可思议的缺乏史实，不应该，不允许。这么简单的道理，作为十分严肃的历史研究，党史研究的石仲泉，应该是要知道的，比其他人都应该更要知道。

六、最后一个毒刺。

“饿死 3000 万”的谣言，是党史上，新中国史上很重要的事件，是射向党、新中国、毛泽东同志的最后一个毒刺。毛泽东同志的“亿元稿费”，曾经是另一根毒刺，为一些人恶毒造谣污蔑攻击毛泽东同志反复使用。现在，因为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以详尽的事实，义正词严的驳斥，因为毛泽东同志无可辩驳的高尚廉洁，毛泽东同志“亿元稿费”的谎言破产了，很少见到人再提起了。只是“饿死 3000 万”，还反复的被一些人说道。

如果确有饿死人，对确有饿死人事实的地方的当时的党的领导人，追究责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现在服务出了“饿死人”，工作出了“饿死人”，这样的地方干部，要分清责任，严肃处理，现在不在世的，也不能因为死去了，就一死百了。历史不能，也不会因为人死去而死去。

毛泽东同志承担毛泽东同志的责任。但是，没有地方党的领导干部领导出饿死人的事实，没有地方党的领导人为所领导的地方饿死人承担责任，统而言之，笼而言之“饿死 3000 万”也好，“饿死 2200 万”也好，突然就莫须有的，无凭无据的直接算到毛泽东头上，让毛泽东一个人负责，这就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这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这很不负责任，也毫无说服力。

解放初期定家庭成分，保长、宪兵，直接定反革命，无论其中是不是偶然有“开明保长”“善良宪兵”。为什么？这些人绝大部分有直接民愤，民愤极大；这些人是黑暗反动政权的

基础政治力量，既得利益者。这些人的罪恶，最终都算到蒋介石头上，没有这些人的具体的罪恶，哪里去找蒋介石的罪恶了？当年是先开诉苦大会，一个一个受苦人上台控诉地主、恶霸、保长、保安团的罪恶，然后才“打倒蒋介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嘛。

而确实饿死人的地方领导，每一个都无一例外证据确凿，更是直接民愤，民愤极大。清算控诉饿死 3000 万人，这些人有着直接责任和血债。这些人是饿死 3000 万人的基础领导力量，生产大队队长、公社社长、村长、乡长、县长、省长；大队书记、公社书记、县委书记、省委书记等等，把这些人抬上历史台面，接受历史检验，很有必要，对当时很有必要，对后来很有必要。做了吗？没有。要先找这些人，再找毛主席。没有这些人的具体饿死人的罪恶证据，找毛主席没用。

我们的国家是负责任的国家，我们的党也是很负责任的党，对党负责，对毛泽东同志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饿死死难者及其家属负责，对饿死人的地方领导负责，对后来的同志负责，等等，无论那一个负责，党都有责任做出回答，不能无动于衷，不吭不声，听之任之。

而说饿死人，饿死 3000 万的人，可以先从自己的身边做起，说说自己家庭，自己地方的饿死人的事情。说出真实地点，说出真实人名。都什么时候了，都多少时间了，还需要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吗？

据说有一本书，书名《墓碑》，墓碑是要有名字的，把饿死 3000 万人的名字刻上墓碑，全国各地立几百块，几千块，每块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名字，每年清明鲜花敬献，时时刻刻警醒后人。可以吗？有吗？

“用事实说话”，没有这些基本数字，这些基本事实，光是嘴巴上嚷嚷饿死 3000 万，没用的，一个亿都没有用。还落一个疯狂造谣污蔑，恶毒诽谤攻击的嫌疑罪名。

2010-5-12

来源：<http://www.wywxwk.com/Article/lishi/2010/12/144557.html>

李锐在北大荒所谓“饿得快死了”凸现了什么？

作者：岳青山

李锐妄图用自己在北大荒“饿得快死了”的切身体会，来证实毛泽东饿死了几千万人，这是谎言重复千百遍也仍然是谎言！

改革开放以来，李锐不停地恶毒诋毁毛泽东，总是把所谓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当成“核武器”，不停地“射”向毛泽东，妄图将其“炸得粉碎”。2009 年，他在香港抛出的《何时宪政大开张》公然叫嚷毛泽东“罪恶滔天”，咬定大跃进“饿死 3755 万人”。这是弥天大谎！而李锐却把“谎言重复千百次就会变成真理”奉为信条，就在上个月抛出的《九九感怀》（《炎黄春秋》第 5 期），摆出自己在北大荒“快饿死了”的“切身体会”、北大荒“饿死人”的实例，妄图“实证”所谓毛泽东大跃进“饿死 3755 万人”。

只不过，谎言加谎言，结果只能更大的谎言！

鉴于李锐此文说的是“自己的切身体”，对于未曾经过那段农村“苦日子”的人，还有欺骗性，这就不能不略加分析、批驳，以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还毛泽东以公道！

一个老头“头一天还在一起干活，第二天死掉了”能说是“饿死”的吗？

李锐说什么，到北大荒，自己不能作饭，“吃公共食堂，开始伙食还可以。到 61 年粮食就很困难了，菜也没有，最后把玉米芯磨碎，加一点粮食做成饼，就吃那个东西。”“那个时候公社仓库里有公粮，老百姓不能私藏粮食，干部们到各家查存粮，翻箱倒柜，简直要把人饿死”。“北大荒当地农民也非常苦……跟我一起劳动的一个老头，头天还在一起干活，第二天就死掉了。最后的遗言是：真想喝一口稀饭啊！公社食堂那个时候已经基本没有吃的了。”

照李锐的说法，这个“老头”真是活活饿死的呀！但这种“活活饿死”的典型，只怕连三岁小孩也骗不了。

先看、公社食堂能不能“基本停伙”？

1960年10月后，全国都在贯彻落实中央12条《紧急指示信》，强调办好食堂，是巩固“社会主义的阵地”。李锐说，北大荒是由部队主管的。解放军是把中央指示视为“命令”，把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看成自己的唯一宗旨，又怎能坐视全社的人集中在公社吃食堂，“各家各户不准保存粮食”，公社食堂竟然“基本停伙”，而不闻不问？

如果说，公社食堂果真停伙，一个公社那么多人，为何不见广大社员也像李锐那样饿得到地里捡“土豆、野菜”救命？为什么更不像莫言文学胡诌的那样，先是挖野菜吃，野菜吃光，就吃树皮，树皮吃尽，学生见着煤块抢着吃？又为何只饿死了那“一个老头”一个人，而不都“饿死”？

李锐不是说，5月到北大荒，“开始食堂伙食还可以”，表明那里“五风”破坏不大，在“新黄不接”之时，也根本无所谓饥荒问题，怎么秋收刚刚几个月后，竟连“公社食堂都基本停伙”呢？

再看、那个“老头”，头天还在跟李锐一起干活，第二天就饿死了，这是不是自相矛盾？一方面，这个老头最后留下的遗言“真想喝一口稀饭啊”，说明断炊已久，不仅吃不上什么饭，而且连“一口稀饭”也喝不到了，老头确是“活活饿死”的。另一方面，这位“老头”饿得临死前却还能同李锐“在一起干活”，能“干活”总是或多或少吃了一些东西，决不会是很久连“一口稀饭”也吃不到！况且，任何有过农村工作经历的人都知道，“一个老头”既然好久喝不到“一口稀饭”，饿得快死了，那么，就算生产队长“惨无人道”，令其出工，也是绝对喊不动的。这个“老头”怎能那么老老实实，饿得临死还“抱死出工”？怎能若无其事地硬撑着同李锐“一起干活”？

还有、李锐一个外来干部“饿得要死”时，尚且晓得到地里捡“土豆、野菜”生着吃，救了自己的命，表明地里还到处有还有“土豆、野菜”可捡，但为何这个“老头”却宁肯饿死，也不愿意学李锐那样到地里捡点“土豆、野菜”生着吃，救自己的命呢？而李锐自称“为民作主”，竟眼睁睁看着一个总是同自己“一起干活”的老头快饿死了，居然也不“人道”一回，伸手到地里人捡“土豆、野菜”救其一命，“以胜过十级浮屠”？

所以，我以为，那个“老头”既然“头一天”还能同李锐“一起干活”，证明他至少还是或多或少吃了些东西，决非长期连“一口稀饭”都喝不上，他“第二天就死了”，只可能是突发了别的什么病而死，决非“饿死”的。如果搞不清死因，顶多也只能说是“非正常死亡”。在这里，李锐又一次玩弄荒唐的逻辑：“死亡”，就是“饿死”！把“死亡”、“非正常死亡”和“饿死”简单地等同起来，混为一谈。

最后，不能不指出，李锐玩弄“死亡”=“非正常死亡”=“饿死”的把戏，是其诬害毛泽东的一贯骗人的伎俩。

然而，“死亡”、“非正常死亡”与“饿死”毕竟各自有其确定的界限的，三者是不同的。比如，农村每年吃农药自杀死的人，只是“非正常死亡”，不能说是“饿死”。“死亡”包括“非正常死亡”与“饿死”，等等。怎能三者简单地混为一谈的。

这里，我就不嫌啰嗦，简略回顾一下，李锐三十年来对毛泽东“饿死几千人”的所谓“指控”，是如何不停地玩弄这种荒唐的逻辑的。他时而是这样说，时而又是那样说，出尔反尔、逻辑混乱。早在1980年10月25日，李锐在《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中，就一口咬定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几千万人，这是古今历史上太平盛世绝无仅有之事。”（《手记》第44页）但在同时的《四千人纵论毛泽东》中又把“饿死几千万人”，变成了“饿死的人何止千万！”（《手记》第61页）

然而，时过八年，李锐大约感到心虚起来，便在1988年8月抛出的《庐山会议的教训》

一文中，就又把所谓“饿死几千万人”、“饿死何上千万人”悄悄地收了起来，代之以“大量非正常死亡”。他说：“从1960年二季度开始，全国人民营养不良，体质下降，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据《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1959年，全国人口增加1113万，净增率为10·19%，1960年，人口减少1110万，净减率为-4·75%；1961年，继续减少348万，净减率为-3·87%。”) (《毛泽东秘书李锐手记》第177页)这是我收集到的资料中，李锐唯一的一次提出他对毛泽东的这种指控的“统计数据”依据。而这个《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早已被公认是矛盾的、失实的。而问题在于，为何要用“大量非正常死亡”取代“饿死几千万人”？那是不是承认此前的“指控”全系信口雌黄呢？在李锐那里，当然不是。“本人平生素来实事求是”，何错之有？

只是，再过四年，1993年李锐跑到美国某大学演讲，感到只说毛泽东“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指控“力度”不够，难以博得美国老爷高兴，就又重提大跃进“发生了大量饿死人的事情。” (《手记》第270、376页)原来那么肯定的“饿死何止上千万”、“饿死几千万人”修正成了“大量饿死人”。

到了2000年5月，李锐在河南郑州演讲中也就更是疯狂叫嚷：当时(指大跃进-引者注)我听说过，父亲饿得把儿子杀了吃，“全国饿死二千万人、三千万人，还有说四千万人的……就是希特勒德国也不曾发生这样的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转引自《中流》2000年第5期)李锐如果不是对毛泽东打倒帝、官、封，共了资产阶级的“产”，满怀阶级仇恨，那么，这样切齿痛恨的话，是肯定说不出来的！

我曾质问李锐：你的这些所谓“指控”究竟是“饿死”多少人？怎能时而这样，时而那样？究竟各“指控”怎么来的？客观根据是什么？所谓“几千万”、“上千万”、“何止千万”，同“二千万、三千万、四千万”究竟是多少？

而到2009年9月，李锐在香港抛出的《李锐新政见何时宪政大开张》公然叫嚣“毛泽东罪恶滔天”，终于提出了“确实数据”，说什么“大跃进三年，全国有3755万人活活饿死。”然而，在同一页上，他又把“活活饿死”的3755万人，说成是“非正常死亡”(第102、103页)。

其实，原本弥天大谎！何来客观依据！

李锐自己“饿得快死了”骗得了谁？

李锐说什么：“在兴华村自己不能做饭，吃公共食堂。开始伙食还可以，到1961年粮食就很困难了，菜也没有，最后把玉米芯磨碎，加一点粮食，做成饼，就吃那个东西。我寄了一块给范元甄，告诉她我的生存状况，她还是帮助了我一下，写了几封回信，寄了粮票给我。结果公社负责人把信和粮票都截下来了。那时最值钱的是粮票。后来范元甄发现我没收到粮票，就不再寄了。我饿得没办法，在地里头捡到一点土豆、野菜，立刻就生着吃了。后来我大姐从湖南寄了一点饼干给我，我放在一个布袋里，被那个同住的单身老汉偷吃了一半。”“大姐给我寄过一些吃的，都是救命的。”

直至田家英从刘澜波那里知道我快饿死了。田家英找到李富春。富春就把我调到虎林镇发电厂劳动。发电厂粮食也多一点，街上有卖鸡蛋的，5毛钱一个，“这就救了我的命。”如此说来，要真晚两天调走李锐，一定早就“投入火炉”了

然而，李锐的这种“饿得快死了”的“切身的体会”，又能骗上了谁呢？

众所周知，共和国从1954年起，就对城镇人口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国家工作人员下乡，不论职务高低，都要自己带粮票，凭粮票就餐。李虽然“一撸到底”，但还是“8级干部”，不是“吃皇粮”，北京的粮食定量，居高全国。在北大荒一年半，要说吃不饱，也挨了饿，甚至“饿出了水肿”，从未受过这样苦，那倒可能是真的。只是当时全国那么多国家干部在农村过“苦日子”，时间比李锐长得多，大家按定量吃饭，为什么唯独李锐一人饿得“几乎快死了”，岂非怪事！

原来，李锐杜撰的这些荒唐的“控拆”，是想借以蒙骗没有那段经历的年青人：你们看呀，我一个 8 级高干，下放“劳改”，都饿得“死了”，不是田家英“救命”，早就“活活饿死了”。而农民是跳不出“农门”的，还不都会饿死！所以，我断定全国饿死“3755 万人”，实际还不止呀！

然而，这是公开扯谎！

请问李锐：

你去北大荒，是不是理所当然地应自带粮票下去，凭粮票吃饭？何况，你又不是工作队，无须“三同”，完全可以自行开伙。那时，我们单位一个干部因生活腐化，屡教不改，也是“一撸到底”。而他下放农村时，就自己开伙，自煮自食。李锐懒得拿着粮票到粮店买粮，自行开伙，“自己不能做饭，食堂伙食又好”，要吃食堂，那是你的自由，无可厚非。但吃食堂只能交多少粮票，卖多少饭；多交多吃，少交少吃；不交无吃。这也照“市场法则”行事。你每月估计有三十来斤粮票，又仍有 120 块钱工资，哪能没饭吃，何来“饿得快死了”？此其一。

其二、从李锐的“控诉”来看，其所以“饿得快死了”，问题出在范元甄给“寄了粮票给我。结果公社负责人把信和粮票都截下来了。那时最值钱的是粮票。后来范元甄发现我没收到粮票，就不再寄了。”

此种“控诉”粗看似乎合理，实则大谬不然。

李锐在《直言》一书中，不是吹嘘自己大跃进中就给毛泽东“三次上书”，就敢于直谏毛泽东，还曾骄傲地说，我的“这些话都是直接对着毛的心态而言的”（第 71 页）。试问：一个“公社负责人”竟敢胡作非为，公然把你的“信和粮票都截下来”，对这种违纪、犯法的事情，你李锐为何如此忍气吞声，生怕与之面理，合理地令其退还“截下”的粮票？如果你怕强龙斗不过地头蛇，那又为何不投诉主管公社的部队？

再说，吃饭乃第一的大事，国家干部没有粮票不能“白吃”农民的饭。李锐与范元甄当时并未离婚，又怎么不要她不改用挂号、双挂号，或用别的办法继续寄去粮票？一个“从此不再寄了”，一个从此不再要了，难道范元甄是成心要把你“饿死”？而你是心甘情愿“饿死”于北大荒呢？

还有，“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李锐不是把在北大荒吃的“玉米蕊”黑粳，寄给了水电部长刘澜波，告诉他“我快饿死了”，但又为何不要求水电部，通过组织按月给你寄工资时一并把粮票同时寄来，或派人把粮票送来？

再退一万步说，这一切都不成，李锐自己为何不回去取粮票，硬要等着在农村“饿死”？

其三、范元甄不再给你“寄粮票”后，大约一年把时间，你真的就是靠“捡土豆、野菜”、再外加你老婆、姐姐寄来的饼干就能把活命下来了吗？谁人不知，北大荒漫长的冬季，“零下三十几摄氏度，滴水成冰”，哪能天天靠“捡土豆、野菜”救命？哪能够活到 61 年 11 月田家英、富春来“救命”之时？

说白了，李锐这一年半在北大荒，并没交过粮票，一直是吃农民或公社的“混饭”、“白饭”。却把国家发给自己的 4 几百斤粮票存放家里。李锐不是说，那个时候“粮票最富贵”、姐姐寄来吃的“都是救命的”，而自己却“混吃”、“白吃”农民这么多的“救命粮”！良心何在？

这种“混吃”、“白吃”违纪！违法！

奉劝李锐，在你行将“投入火炉”之前，应当“复归人性”，诚恳地向北大农民主动“退赔”“白吃”的那几百“粮票”。

可见，李锐作为国家干部，下到北大荒 18 个月，其所以“饿得快死了”，只是因为自己不带粮票，而将国家发给粮票几百粮票，统统库存家里。如果真是“饿得快死了”，这就只能是他自身和家里“私事”，咎有应得，与别人无关。如真“饿得快死了”，谁之过？谁之罪？说句不客气的话，这叫咎有应得，自己找的，只能怪自己！硬要栽到毛泽东头上，那是十足的造谣毁谤！想以之证实对毛泽东饿死 3755 人的“指控”，也是白日做梦！

所谓“歌唱家张权的丈夫莫桂新饿死了”是造谣污蔑的卑劣典型

李锐《九九感怀》还举出所谓“在北大荒劳改的歌唱家张权的丈夫莫桂新饿死了”，借以“指控”大跃进饿死了 3755 万人。

那么，莫桂新之死，真相如何？果真是李锐咬定“饿死”的吗？

其实，只要在百度搜索一下，大量资料毫不客气地揭穿李锐歪曲事实，移花接木、穿越时空，造谣诬害，真乃无所不用其极！

一篇题为《不该被遗忘的音乐家莫桂新》是这么说的：

今天，在这里发表了作者姚小平在《老照片》第三十七辑今天的文章《不该被遗忘的音乐家莫桂新》，为了纪念黄钟合唱

团的创始人莫桂新先生。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一位普通的右派、年仅四十一岁的音乐家莫桂新因食物中毒死在遥远的兴凯湖农场。四十五年以后，如果不是当年造册的一本《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流入到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微不足道的莫桂新早已被世界所遗忘。”

以“调查表”为基础，借助《张权纪念文集》等资料，我在采访了杜高以及北影导演巴鸿，北京人艺演员王宏韬、金昭夫妇等人后，莫桂新的影像方渐显清晰……

莫桂新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离开(北京某)收容所的，目的地是黑龙江密山县兴凯湖农场。

莫桂新一行到达总场后，被分到七分场，七分场离总场约几十里地，几百平米的范围里，矗立着几排营房一样的平房。每组三十人，睡在对面两排大通炕的屋子里。

“当时还未到三年困难时期，主食随便吃，菜一人一盆，一个礼拜还能吃一次细粮(馒头或米饭)。莫桂新所在的组仅七八个右派，剩下的二十多个都是流氓、小偷和无业游民……不过，莫桂新的威信很高，那些刑事犯倒没给他使过坏。他为人正直，劳动不惜力，待人和善，有时还会说上几句幽默的话来化解冲突。‘调查表’对他的表现有如下记录：‘该人来场后认罪认错。担任组长，主动搞好文艺活动，如教唱歌。劳动尽到主观努力，抬土抬双筐，遵守纪律较好。’”

据王宏韬回忆：“八月的一天，因为下雨，大家没出工。那天食堂改善伙食，晚上吃馒头和炖猪肉。大约是肉收拾的不干净，第二天就开始有人肚痛，拉稀，根本止不住。病号也越来越多，最后达上百人。于是管教干脆在厕所旁搭了个草棚，重病号全住在里边。我和莫桂新也住在草棚里，我最多一天拉七十次，而他几乎是上百次。当时农场初创，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医疗条件更谈不上。七分场虽然有医疗室，但医生水平很低，这个病起初未引起重视，等到发现后吃药，已经控制不住了。大概也就两三天的工夫，就先后死了六七个病号。后来我处于半昏迷状态，莫桂新什么时候走的，就不知道了。我侥幸地逃过了这一关，听说莫桂新被送往总场医院，到那就死了。”“‘调查表’记录下莫桂新的死亡原因：一、急性肠炎，严重脱水，酸中毒；二、继发性痢疾。”

据“调查表”记，莫桂新的死亡日期为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他的痛苦、屈辱、疑惑、无奈和希望，都随着生命的消逝划上了句号。

“调查表”记录下莫桂新的埋葬地点：“现为水泥碑标志，埋于太阳岗”……

(摘自《老照片》第三十七辑)

真相大白！

众所周知，1958 年 8 月 15 日以前，大跃进才刚拉开序幕，中央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还没有作出，那时明明是“甩开膀子做事，敞开肚皮吃饭”的时段，北大荒“还未到三年困难时期，主食随便吃，菜一人一盆，一个礼拜还能吃一次细粮(馒头或米饭)”，李锐却说成“公社食堂那个时候已经基本没有吃的了”，成心要把大家饿死。

莫桂新之死，明明是 1958 年 8 月 15 日，而李锐却“穿越时空”，后推二年，即“60 年开始困难时期”死的。

莫桂新的死因何明明是“因食物中毒”及“继发性痢疾”，

李锐却胡诌成歌唱家张权的丈夫莫桂新“饿死了”！

这是李锐造谣污蔑的卑劣典型！李锐如此胡作非为，信口开河，只窥一豹，亦可见一斑。

所谓农民“怀念日寇统治的年代”是对农民的莫大的污蔑

李锐胡说什么：北大荒非常苦，“当地老百姓甚至怀念日本人统治的时代：玉米喂牲口。日本人不吃肥肉，老百姓可以捡他们扔掉的肥肉吃”，活像人间天堂！还说：“日本人统治东北，没有把老百姓搞垮。解放后农民生活实在太苦了”！

这是以汉奸之心，度农民之腹，是对中国农民的莫大污蔑！

在这里，李锐所谓日本人用玉米喂牲口，只吃瘦肉，把肥肉扔掉，农民捡着吃，抑或是事实。但它又凸显了什么？无非尖锐地表明在日本强盗的统治下，百姓生活极度艰难困苦，万般无奈“捡日本人扔掉的肥肉吃”而已。

其实，广大农民深知，那些“玉米、肉类”并不是日本鬼从东京带来的，而是天天“打劫”，从中国老百姓家里掳抢来的，害得百姓民不聊生。除汉奸而外，哪个中国人不对日本强盗恨之入骨？所谓“怀念日本统治的时期”，只不过是反映中华民族极少数败类，即新、老汉奸们的心声！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强烈的民族气节著称于世的伟大民族。他们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屠刀，英勇抗击，从不屈服，不怕牺牲，前赴后继。《九一八》事变后二天，中国共产党就号召“组织东北抗日游击战”，把日本鬼子赶出东北。接着，沈阳兵工厂、本溪、抚顺和鞍山各企业工人、哈尔滨的工人、平沈、南满的铁路工人，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大批深入农村，组织“抗日游击队”。盘石县的中、朝农民，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了“盘石游击队”，并迅速发展壮大成杨靖宇将军抗日联军，等等。抗日烽火风起云涌，多少抗日烈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怎能胡诌“农民怀念日本人统治的时代”？

李锐所谓“怀念”云云，把自己置于何地？这不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更有甚者，李锐还胡说什么：“日本人统治东北，没有把老百姓搞垮，解放后农民生活实在太苦了”。言下之意，不就是说，建国后的三十年，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下，既比日本的统治还坏，竟“把老百姓搞垮”了，又比国民党统治还糟，弄得“解放后农民生活实在太苦了”！

照此逻辑，毛泽东真不应率领广大中国军民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让中国人民尽情享受“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满生活”！更不应当把蒋家王朝还赶走到台湾，使中国人民继续过着“三座大山”之下的“幸福生活”！

李锐如此露骨地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乃至国民党血腥统治，如此仇恨毛泽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位“老革命”、“老红军”，也就更彻底地现出了原形！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70周年。全国人民愤怒谴责日寇侵略中国的暴行，欢庆毛泽东领导全国军民奋起抗日，第一次夺取反抗外国侵略者的伟大胜利。而日本的安倍政府，却执意修改“和平宪法”，复活日本军国主义，重温“大东亚共荣”的美梦。此时此刻，李锐鼓吹东北农民“怀念日本统治的时代”，不是同安倍军国主义里应外合遥相呼应，一唱一和，还能是什么？

最近儿童节，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原国防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以一位老兵的身份，向少年儿童们讲述他在山东老家当“小八路”的故事。他尖锐指出：“现在有一些人，跟着帝国主义反动分子的调子，扮演着上窜下跳的小丑角色，丑化我们的党、丑化我们的领袖、丑化我们的英雄模范，我作为一个老兵，这是不能容忍的！”

李锐改开三十多年，就是扮演这样一个可耻的角色！

总上可知，李锐以自己在北大荒“饿得快死了”的切身的体会及北大荒饿死人的实例，只能证明，北大荒并没有饿死一个人，也只能证实所谓毛泽东大跃进“活活饿死3755万人”

乃世所罕见的弥天大谎！

李锐在《九九感怀》末尾，用一首诗表达自己的“心情”：“不久将投入火炉中，为民作主未宽松。何时宪政实行了，让我灵魂有笑容。”

然而，“宪政开张”之日，则正是红旗落地之时！

毛泽东说得好：“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必将取得胜利。”《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8页）就算有朝一日“宪政实行了”，中国彻底复辟了资本主义，让李锐“灵魂有笑容”了，那也只是的历史的暂时的倒退，但注定是“短命的”，李锐“灵魂有笑容”，也只能是“笑”一瞬间。而等着李锐的，则是“灵魂永痛哭”！

这乃是不依李锐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2015年6月26日

来源：<http://www.wywxwk.com/Article/lishi/2015/06/346644.html>

“饿死三千万”与阿 Q 画圈

作者：黎阳

“饿死三千万”是国内外各路反毛英雄好汉们最大最得意的王牌——只要混不下去了或觉得苗头不对，立刻就要祭出“饿死三千万”，仿佛凭此看家宝贝就能一举起死回生扭转乾坤：

——辛子陵觉得苗头不对了（“现在是30年改革开放以来最不好的政治形势，国家面临向毛泽东王朝复辟倒退的严重危机”），立刻祭出了“饿死三千万”：“毛泽东实践的那一段共产主义，是人间地狱呀！”“饿死37558000人”。（辛子陵：“走出两个误区——2009年12月27日在朋友聚会时的讲话”）

——吴敬琏觉得苗头不对了（“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煽情和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某种优势，在对医疗、教育、住房以及国企改革等具体问题的讨论中，通过蒙蔽蛊惑大众，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也立刻祭出了“饿死三千万”：“城镇地区广泛出现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病，农村地区则造成2000万至4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吴敬琏：中国经济六十年）

——茅于軾觉得苗头不对了（“这样的专政肯定是长不了的。其下场往往是群众性的造反，走人类历史已经重复上百次的革命，专政，反革命，再专政，反反革命……这是一条万劫不复的路，是生命涂炭的路”、“如果发生政权的更迭，是群众治理还是精英治理就很难说了”、“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或者继续三十年的辉煌，或者进入不稳定的摇摆期，甚至于发生骚乱。何去何从，要看中国人从上到下有没有智慧把握自己的命运。苍天保佑吧！”）同样立刻祭出了“饿死三千万”：“发生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1959和1960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抗战。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空前的，人为的大灾难。”（茅于軾：建国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和对世界的贡献）

……

“饿死三千万”这“精神原子弹”如此威力巨大，简直无往而不胜，反毛英雄们应该宝贝又宝贝，尊重再尊重了吧？可惜不，文匪“精英”们喜欢它，却并不尊重它，表现就是丝毫不把“三千万”这个数字当回事——吴敬琏说“2000万至4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两千万条人命，闹着玩似的说有就有，说没就没了）；辛子陵刚刚那么肯定、那么精确、那么不容置疑地宣布“饿死37558000人”，却马上又画蛇添足似地虚晃一枪：“实际饿死人的数字肯定在4000万以上”（倒底是多少？如果心中有数，为什么如此前后矛盾？如果自己也弄不清，为什么那么斩钉截铁地给出个“饿死37558000人”？同一篇文章就能自己搞自己大嘴巴，也算一大奇观）。茅于軾说“1959和1960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

抗战”，辛子陵说“毛泽东一朝一代饿死的人数比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和，还要多 750 万人”——怎么“总和”出来的？不愧是“精英”，根本不需要调查研究证据确凿，只要舌头一翻，几千年的历史多少亿条性命就能捏来捏去。如此满嘴里跑舌头，简直让人不知该信谁的好——这岂不是糟蹋了“饿死三千万”这“超级武器”的信用？

更滑稽的是文匪“精英”们对“饿死三千万”这“精神原子弹”离不开却又没信心，还嫌杀伤力还不够大，还不够耸人听闻，还要争先恐后“锦上添花”，却又彼此毫无配合，没串通好就你一言我一语添油加醋，结果饿死人的数字成了现代版的“大跃进放卫星”——加码加码再加码，升级升级再升级，“饿死三千万”嫌不够，加码到“饿死四千万”，四千万还嫌不过瘾，再升级到五千万，然后是六千万、七千万……最后连自己都不知道该说饿死多少万是好了，死人的数字从此就象“如意金箍棒”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如人意，随随便便就能再变出个几千万来：

——为了搞两弹，饿死 6 千万人口

<http://tieba.baidu.com/f?ct=335675392&tn=baiduPostBrowser&sc=6945984911&z=663204325#6945984911>

——看看你所在的由支共一党专政独裁的垃圾支那国，，，，一个“大跃进”饿死 6 千万愚民

<http://hi.baidu.com/%B8%DF%B9%F3%B5%C4%B9%FE%C8%D5%D7%E5/blog/item/ef7a35093e3e079c0a7b82da.html>

——国际地位有个屁用，国际地位世界第 1，老百姓饿死 6 千万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235000.shtml>

——现在世界上都知道毛太祖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变态狂和希特勒一样，犯下了反人类罪行，四清运动铲除异己中国与民主无缘，58.9 年饿死 6 千万中国人拿一个自然灾害掩饰了

<http://www.blogchina.com/20100102873029.html>

——四、五十岁的中国人都经历过凭票、证供应食物的那个年代，和活活的饿死近六千万人的可怕的大饥荒。《苏明评论》<http://www.soundofhope.org/programs/909/99135-1.asp>

——大诗人作国家领导人无疑是最典型的专业不对口，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如同写过《沁园春·雪》的我朝太祖那般，饿死六千万人 xiezhaofeng 的日志

<http://xiezhaofeng.blog.163.com/blog/static/52830503200911811537541/>

——这位绿林大学的毕业生在和平时期饿死六千万人，造成至少七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2/1/138978.shtml>

——饿死六千万到八千万善良人，那用刀？请不要忘记，特定每年的十月一号，是国难节！

http://www.9999cn.com/weblogs2/entry.php?u=ouzhou&e_id=3739

——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原载《炎黄春秋》2004 年第 6 期）

.....

在这点上美国人也来了个“国际接轨”，而且“就高不就低”：

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格林·贝克（Glenn Beck）：毛泽东，人类历史上最坏的杀人犯之一，也许是最坏的。我们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杀了多少人。通常的数字是五千万到七千万。也就是说，相当于阿道夫·希特勒的大屠杀人数的 10 到 12 倍。10 到 12 倍。

<http://spectator.org/blog/2009/10/16/anita-dunn-mao-tse-tung-fan>

如今已经没法弄清“饿死三千万”究竟有多少种“盗版”，饿死人的数字上限是多少，更没法一一评论，所以只好取“饿死三千万”与加一倍的“饿死六千万”这两个版本分析，

而且仿照反毛英雄们“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从“饿死六千万”开始——

饿死人的“三年经济困难”（1959—1961）时期中国人口是六亿。六亿人口里“饿死六千万”，也就是说社会总人口的 10%在三年内“非正常死亡”了。

一个社会短短几年内有 10%的总人口“非正常死亡”会是个什么样？

前苏联卫国战争时人口两亿多，在四年的战争中死亡 2000 多万，正好符合“短短几年内有 10%的总人口‘非正常死亡’”。随之而来的必然的社会效应呢？

——“最严重的是人力的损失。牺牲的人数有各种说法，从七百万到二千万。如果再加上平民中的额外死亡数，那就是二千多万。每一个家庭都有人牺牲。在我的丈夫的兄弟姐妹各家中，八个男性家长中死去了三个，包括我的丈夫在内；没有一个被算在战争伤亡的数字内，因为他们都是直接死于战争的平民。苏联的损失远比同盟国合起来的损失为大，比起美国的损失来大一百倍。在南方有一些村子里，可以同年轻姑娘结婚的男人一个也没剩下，占领期所留下的是没有父亲的孩子，无人管教。”（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第九章：第二次建设）

——“觉察得到，斯大林为自己的儿子而十分难过。他坐在桌旁，沉默了很久，一点东西也不吃。后来，他仿佛一面继续思考着这一问题，一面沉痛地说道：‘多么艰苦的战争。它夺去了我们多少人的生命。看来，我们很少有谁的家庭没有牺牲亲人……’”（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回忆与思考》第 348 页）

有这种感受决非少数人——从前苏联到如今的俄罗斯所有有关回忆都异口同声高度一致：前苏联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从最高统帅到普通老百姓概不例外。

如果瞧不上苏联人举的例子，那不妨看看美国人举的例子。

美国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著名小说《战争与回忆》描述了一段历史：纳粹德国党卫军决定从把犹太人聚集的特莱津市的五万居民中的五千人遣送到奥斯威辛死亡营，也就是说，去掉当地人口的 10%。小说对此是如此描述的：

——“在一个拥有五万居民的普通城市里，如果一场龙卷风的袭击消灭了五千人，人们或许多少会有犹太人遇到一次遣送后所有的那种心情。”

——“你根本无法习惯于这种间歇性的灾难。每一次，犹太区的结构总遭到彻底破坏。乐观的情绪和信心黯淡下去了。死亡的感觉又上升起来。虽然谁也不知道‘东方’实际上是什么意思，但它是一种恐怖的名称。不幸的人们惊恐万状地四下奔走，向亲友辞行，把他们无法收进一只手提皮箱去的那一点点物件分送掉。中央秘书处受到疯狂的申请人的包围，他们想方设法、无孔不入去取得豁免。然而数字这座钢铁舞台注定了这出悲剧：五千名。五千名犹太人必须搭上火车。要是有一人获得豁免，另一个人就必须去替代。要是有五十个人给放过了，另外五十个自认为安全的人就必然象触电那样收到灰色的征召通知。”

海地也许可以算最近的例子：“普雷瓦尔对 CNN 表示，相信已有超过十万人死亡，海地国会的一名参议员甚至表示这场该国 200 多年来最大的自然灾害会造成 50 万人丧生，但两人都承认并未取得确切数字。海地人口 900 多万，如果遇难者达 50 万人，那么将占总人口的 5.6%。”

这一切都证明一个社会总人口的百分之若干“非正常死亡”是个不得了的社会性事件。海地地震死亡 5.6%这个数字看来有些夸大，实际死亡率没有那么高，但就这样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了。如果一个社会损失了总人口的 10%那还得了？如此巨大的“非正常死亡”的社会性事件对整个社会不可避免要造成极大的冲击，不可避免使整个社会每个角落都能感受到震撼，不可避免使每个老百姓都能受到影响，决不可能瞒天过海——前苏联很长时间没有公开过卫国战争的死亡统计数字，纳粹德国严密封锁灭绝犹太人的一切消息，更谈不上公开统计数字。但这一切都瞒不过老百姓。对这种社会性事件官方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给出统计数字也好，不给出统计数字也好，给出的统计数字准确也好，不准确也好，瞎编乱造也好，

对老百姓来说效果统统为零——老百姓是从切身感受而不是从统计数字和“精英”的“报告文献”或“研究成果”得知这种社会性事件的存在。如果一个社会当真发生百分之若干的人“非正常死亡”，老百姓必然普遍有切身感受，必然不可避免发生“乐观的情绪和信心黯淡下去了。死亡的感觉又上升起来”、“不幸的人们惊恐万状地四下奔走”之类状况，不管如何严密封锁消息也徒劳。反过来呢？如果不曾发生过这种事，那么不管如何声嘶力竭添油加醋，老百姓照样必定不会有普遍的切身感受。

无论是前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实践还是欧洲犹太人经历纳粹德国统治的苦难历史实践都证明了一个很残酷但非常实在的经验公式：社会总人口的 10% “非正常死亡”意味着“每一个家庭都有人牺牲”。

根据这个经验公式，如果当年中国当真发生了社会总人口的 10% “非正常死亡”即“饿死六千万”，那中国也必然“每一个家庭都有人牺牲”，即每个中国家庭都必然至少有一个亲人饿死，必然“家家带孝，户户举哀”。既然如此，那么随便拦住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老百姓一问，人家就应该而且必然可以不加思索列举出自己家庭有什么什么亲人当时饿死了，何时何地，年龄几何，怎么个状况，等等等等，确凿肯定，毫不含糊，根本用不着少数专家“精英”象狗一样到处乱钻乱嗅乱刨乱拱乱挖乱搜“考证研究”，然后当成天大的发现让全社会“如梦方醒”——随便拦住个经历过卫国战争的前苏联老百姓或经历过纳粹德国统治的犹太人间他们是否有亲人死于战争，看人家可不可以不加思索地说出当年自己家庭里的什么什么亲人怎么怎么死的——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践证明了整个社会 10% 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必然的社会效应。

（“精英”说，当年 10% “非正常死亡”发生在农村，城市里没饿死人。既然如此，那就是说，饿死的人在农村，那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比率就应该比 10% 更高。也就是说，随便问一个来自农村的人，其家庭亲人中应该有不一个人当时被饿死。）

如果当年中国不是“饿死六千万”而是“饿死三千万”呢？“饿死三千万”是“饿死六千万”的一半，那涉及的家庭也顺理成章少一半，也就是说，“每两个家庭就有一个家庭有人牺牲”——“隔家带孝，邻户举哀”。换句话说，随便找个中国老百姓一问的结果，不是他的家庭当时有亲人饿死，就是他的熟人中的一半家庭当时有亲人饿死，概率是 50%。

历史真相只有一个，而关于这唯一的真相却可以有无穷多的“理论”和“说法”。在这无穷多的“理论”和“说法”中正确的只有一个，即符合事实的那一个，其他的都是胡说八道。这就是说，理论上胡说八道的概率几乎是无穷大，几乎全不可信。要从这无穷多的胡说八道中大海捞针般捞出那唯一正确的理论，唯一的办法是用事实筛选——理论要正确可信就必须有事实为后盾，而且这种后盾必须步步为营，处处有据，一处无据一处虚，哪点不实哪点假，一处有假全盘作废。

“饿死三千万”也好，“饿死六千万”也好，饿死若干亿也好，都是对中国 1959—1961 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这一重大社会性事件的描述。同一社会性事件，同一状况，真相只有一个，描述却可以无穷多。在这无穷多的描述中正确的只有一个，即符合事实的那一个。要从这无穷多的描述中大海捞针般捞出那唯一正确的一个，唯一的办法是用事实筛选，对任何描述和说法有资格举证的不是“精英”，而是百姓，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整个社会——对“精英”来说，人口的“x%”“非正常死亡”“饿死 x 万人”不过是个数字游戏，嘴巴动动笔杆摇摇就出来了。但对老百姓来说，这是不得了的严重现实，是个非常极端的社会事件。如果当真发生过这种事，全社会的每个家庭都会有不可磨灭的切身感受，不可能不影响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不可能不影响到每个家庭。所以对这种社会性事件的描述正确与否必须由经历过这个社会性事件的绝大多数老百姓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来判断：符合事实就必然有共鸣；不符合事实就必然格格不入。反之一样：对于重大的社会性事件的描述和说法，能引起绝大多数老百姓衷心共鸣的才符合事实，绝大多数老百姓对之毫无感受或感受格格不入甚至

截然相反的必然是胡说八道。没有的事，再拼命编造也得不到老百姓的共鸣。普遍存在的事，再拼命压制也堵不住老百姓的嘴——三鹿奶、拐卖儿童、蜗居之类倒是拼命压着封着不准讲，老百姓不是照样一清二楚？

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我在城市长大，经历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当时不曾见过听说过谁家有人饿死。长大后几十年走南闯北，接触过不少人，天南地北、城镇乡村、“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都打过交道，来自农村的朋友不少，大家在一起也没少谈论过那“三年经济困难”的日子。所有的朋友，包括来自农村的朋友，除了来自河南信阳的以外，没有一个说自己家里当时有人饿死，也没有一个说看到、听到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有谁饿死。如果“饿死 X 千万”这种 X% 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全国性社会性事件确有其事，那么不可能那么多人都毫无印象一无所知只字不提。来自河南信阳的几个朋友告诉我当时他们那里饿死了人——每个人都说得非常明确肯定：家里谁谁谁饿死了，是村干部把老百姓口粮拿走造成的，是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下令干的。（1979 年 1 月 24 日 xxx 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宣布吴芝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们还告诉我，“信阳事件”当年轰动全国，“中央领导说，抗美援朝三年战死了三十九万，你们信阳一次就饿死了三十九万，居然赶上了一场抗美援朝”。他们还告诉我，当时处理信阳事件撤了一大批干部，有些地区的村干部被老百姓打死了：为什么老百姓家家饿死人，而你们干部家里没饿死人？

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信阳事件”证明当年饿死人确有其事，但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走资派”为造“政绩”保权力，冷血动物般残忍地硬抢走了老百姓的活命粮导致饿死人。罪魁祸首是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以及当时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跃进”中为吴芝圃撑腰打气、后来又为吴芝圃平反主持追悼会的总书记。“信阳事件”当时轰动全国，被抓了典型，可见“信阳事件”不是全国普遍性事件，否则全国老百姓都会象信阳老百姓一样，见面一开口就能举出自己家里当年饿死了谁谁谁。这就是说，当年 X% 的“非正常死亡”是局部存在的问题，不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从全国绝大多数老百姓亲身经历中根本找不到支持所谓“饿死 X 千万”的证明。

网友“吴佑乡”于 2010-1-12 17:54:31 发表评论说：“我是 60 年代入伍的，当兵十九年在班排连营团师大军区机关都工作过，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上下级和同级战友来自全国的 18 个省份，他们除了一小部分来自城镇，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广大的农村和偏远地区，谈到自然灾害时期的困难虽然感触不同，也只是听说过有饿死人的，但是都只是听别人说过谁也没亲眼见过，本家族更没有饿死人的情况。再说文革时期 3000 万知青下乡如此庞大的阵容谁没见过呢？如果饿死了不要说 3000 万，在人口还不到 6 亿的时代就是饿死 300 万不也是非常庞大的数字吗？可是又有谁真正见到过呢？”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1/125218.html>）

网友“wenh”于 2010-1-12 16:05:46 评论说：“我在大城市长大，老家在河北农村，插队在山西农村。‘节粮度荒’时我上小学。那时我亲眼见到的最严重的情况是有人营养不良腿有浮肿，用手按腿，按下的指印不会马上反弹。对于验出有浮肿的人，当时政府特殊供应黄豆增加营养。至于说大量饿死人，我绝对不信。我亲自接触的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工厂同事，老家亲戚，插队地的村民，不只上千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亲身见过有饿死人的情况。3000 万，真是天方夜谭！上山下乡知青也不过 1000 多万。大家可以问问周边的人，有几个人没亲自见到过知青？谎言造得如此离谱，还振振有词，真是不要脸到了极点。”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1/125218.html>）

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公式，如果中国当年当真“饿死六千万”即 10% 的人口“非正常死亡”，那么必然出现全国性的“每个家庭都有亲人饿死”的情况。如果“饿死三千万”

即 5%的人口“非正常死亡”，那么必然出现全国性的“每两个家庭就有一亲人饿死”的情况。而经历过“三年经济困难”的中国老百姓的亲身经历证明：全国性的“每个家庭都有亲人死亡”或“每两个家庭就有一个亲人死亡”的情况根本不存在。这就证明所谓“饿死 x 千万”、“x%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等说法全是胡说八道。

（如果文匪“精英”们一口咬定“饿死六千万”确有其事，那他们应该能毫无困难、明确肯定地说出他们家里有谁当年饿死了。如果咬定的是“饿死三千万”，而他们自己家庭又没饿死人，那就应该能毫无困难、明确肯定地说出他们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里当年有谁饿死了。如果他们一个实际熟人也举不出来，那就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他们撒谎。第二，他们是参与制造“饿死 x 千万人”的凶手——夺走了别人的粮食，所以自己家里没人饿死，所有亲朋好友里也没人饿死。如果他们是制造大规模饿死人的凶手，那就必须新帐老帐一起算，追究他们的杀人罪行。）

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公式，从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可以判断出“饿死 x 千万”是弥天大谎。这种判断与统计数字完全相符。

网友“野草”文章“从《中国人口年鉴》看三年困难时期和毛时代计划生育”（见附录二）用中国人口年鉴的数字把旧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死亡率做了个对比。我把这些数字转换成图表，用更直观的方式对比表现出来。（见附录一）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算上婴儿死亡率，旧中国与毛泽东时代人口死亡率的差别是数量级的差别，是千分之几百与千分之十几的差别。即便不算婴儿死亡率，解放后最困难的 1960 年人口死亡率也才几乎是解放前人口死亡率的一半。而这里引用旧中国的死亡率数字还是“全国属于较富庶地区，交通也相对发达，且这几年并未受到战乱影响”、死亡率最低的地区。孰优孰劣，孰是孰非，孰功孰罪，一目了然。所谓“饿死 x 千万”、“1959 和 1960 两年和平时期死的人超过了八年抗战”、“毛泽东一朝一代饿死的人数比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和，还要多 750 万人”之类说法一看就知道是胡说八道凭空捏造。

“饿死 x 千万”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生事物”，而且是“精英”提出、“精英”调查、“精英”举证、“精英”总结、“精英”宣传、从头至尾“精英”一手包办的“精英科学”，根本没老百姓的份。老百姓的亲身经历老百姓自己居然没资格讲，要“精英”来告诉你“被饿死”了多少多少万——老百姓身边死没死人老百姓自己难道不知道？难道没你这“精英”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老百姓连活人死人都分不清？

“精英”用“饿死 x 千万”大做文章，当真是“以人为本”、“关心生命”吗？那为什么不关心关心近在眼前的生命？为什么不看看如今发生在眼皮底下的饿死人事件？

——“下岗女工饿死床上五年多变成一具白骨”、“‘厂花’死家中五年无人知”、“我已经几个月没吃肉了，好想吃烧白，好想吃回锅肉……”、“我已经一个月没吃主食了……”

（最后一篇日记写于 2000 年 7 月）（重庆晚报/都市频道/都市新闻 2005 年 11 月 08 日第 06 版）

<http://www.cqwb.com.cn/webnews/htm/2005/11/8/169637.shtml>

——“大头娃娃事件”——所谓“大头娃娃”不就是慢性饿死造成的吗？毒奶粉里没奶没营养，活活把婴儿饿成“大头娃娃”而死，这难道不是近在眼前、活生生的大规模饿死人？

“精英”们既然那么悲天悯人，那么“道德的血液”，那么“人道主义”，对饿死人那么义愤填膺，那么为什么只对几十年前的三年内饿死人感兴趣，对三十年来眼皮底下已经和正在被饿死的老百姓不感兴趣？为什么只有兴趣给几十年前的三年内饿死的人写《墓碑》，却没兴趣给三十年来眼皮底下被毒奶粉、“三鹿奶粉”、“毒大米”、“地沟油”之类造成的无数“大头娃娃”、“结石娃娃”、“下岗女工饿死床上五年多变成一具白骨”之类已经和正在被饿死的老百姓写《墓碑》？为什么对根本不存在的“饿死 x 千万”情有独钟，对眼前活生生的受害者视而不见？真有事有骨气有胆量，调查调查、研究研究、描写描写毒

奶粉、“三鹿奶粉”、“毒大米”、“地沟油”之类的牺牲者——“大头娃娃”、“下岗女工”们的现实状况和悲惨遭遇——真要珍惜生命，抢救比哭丧实际，帮助将死未死的比凭吊已死多年的实际，正视保护现实存在的比号淘编造根本不存在的实际。这一切，那些号称充满“知识分子的良心”、“道德的血液”、“普世价值”、“人道主义”的文匪“精英”们肯做吗？敢做吗？会做吗？我料定你们不肯做，不敢做，不会做——你们敢站出来证明我错吗？不敢，就证明你们的“以人为本”、“知识分子的良心”、“道德的血液”、“普世价值”、“人道主义”等等沁人心脾全是“儿媳妇大肚子——装孙子”。

文匪“精英”们编造“饿死x千万”不仅是造谣，而且是犯罪，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要害有二：

1.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捏造了“饿死x千万”，就在事实上给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扣了顶“反人类罪”的大帽子——蓄意饿死人，而且“饿死x千万”之多，用美国人的话说“相当于阿道夫·希特勒的大屠杀人数的10到12倍”——纽伦堡审判给纳粹党定了个“反人类罪”。“相当于阿道夫·希特勒的大屠杀人数的10到12倍”不是10到12倍的“反人类罪”又是什么？

犯了“反人类罪”的政党还有资格执政吗？别说执政，连存在都没资格——德国纳粹党被定了“反人类罪”，于是严厉取缔。不仅取缔，而且全党人人过关：从上到下，凡加入了纳粹党的，不管是一把手、二把手还是普通党员，全部都要清理。不管与“反人类罪”沾边的纳粹党徒们如何拼命声称自己不知情、仅仅是服从命令、没主动干过坏事……结果呢？诸如此类辩解概不认帐，全部清算，一个不饶。这就是历史的逻辑——只要沾上了“反人类罪”，如何定性评价处理就由不得你了。

就凭“饿死x千万”这一条，任何人都可以振振有词说你中共是“反人类”的“邪恶组织”，应该取缔，就象取缔德国纳粹党一样，说你中共政权是“反人类”的“罪恶政权”，应该推翻，就如同推翻希特勒政权一样——谁能说取缔纳粹党、推翻希特勒政权不对？难怪刘xx们那么理直气壮：“伪政府必须辞职，xx必须下台”、“必须在人民之中组织武装部队”、“今天在白色恐怖下，我们之所以站出来，是重新唤起全北京市民的自信。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主宰中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有罪，“饿死x千万”则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奠定了理论基础和舆论基础，换句话说“饿死x千万”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它妈。

辛子陵说：“我想奉劝身居高位的政治家们，要一心一意搞改革开放，特别是要支持政治体制改革，不要脚踩两只船，为复辟毛时代留下退路。真要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你们都是正在走的走资派。”“不要以为‘我当年是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在我主政的地区为毛主席立过像’，毛派就放过你，把你‘三结合’进去。”

不过辛子陵还有另一半话没说全：“真要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你们都是正在走的走资派”——那么“真要以‘民主化’、‘普世价值’的是非为是非”呢？你们都是犯了“反人类罪”的“邪恶组织”的继承人、同谋犯。“不要以为‘共产党不共产了’、‘改邪归正了’、‘痛改前非私有化’了，‘一心一意搞改革开放，特别是要支持政治体制改革’了，‘反人类罪’的帽子就不存在了，就可以仿佛象没有前科的没事人似的‘从零开始’、‘从头再来’了，就可以跟‘历史清白’的‘民主党团’平起平坐了”——当年纳粹德国的海军司令邓尼茨跟“反人类罪”几乎不沾边，但因为当了希特勒的继承人，那就照样按罪犯抓，按罪犯判，判了十年。继承了“反人类罪”的政党就必须继承“反人类罪”的历史包袱，想跑也跑不了。

有些人以为把自己的罪责嫁祸给毛泽东就可以蒙混过关了，可以继续大权在握唯我独尊了。辛子陵吴敬琏们早就堵死了这条路，明确告诉这些人：这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要证明“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可以，交出“投命状”来——“支持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改呢？吴敬琏的答案：“现在的进一步改革将不可避免地损害一部分既得利益，包括政府自身”。而后呢？“普世价值”、“民主化”、“民主是个好东西”、“自由选举”……只要

到了这一步，今天已经被用“饿死 x 千万”深谋远虑地扣上了“反人类罪”的中国共产党还想继续存在下去吗？一个有蓄意“饿死 x 千万”的“反人类罪”的“前科”的政党还想参加竞选吗？别说参选胜选，连存在都不可能——别看辛子陵吴敬琏们今天只骂毛泽东、不骂共产党，那仅仅是一时的策略，无非是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一旦成了气候、由不得你共产党说了算时，岂有不翻老帐之理？西方竞选谁的老底不被翻个底朝天？中国如果也到了那一步，辛子陵吴敬琏们今天强加的“反人类罪”的“罪行”哪有不炒破天之理？那时谁沾“中国共产党”谁等于是“罪犯”，想不“改名易帜”都由不得你。辛子陵吴敬琏们今天虽然对这种前景只字不提，却一直在不声不响为这种结局的出现创造充要条件，为将来彻底取缔共产党悄悄布闲棋、下冷子、奠定基础——“能做不能说”。

2. 反民族罪，卖国罪

当年丘吉尔坚决反对印度自治：

——“印度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确切地说，它是一个聚居着许多民族的大陆。能与印度相提并论的是欧洲，但欧洲不是一个政治实体。印度是一个地理上的抽象概念……，这种维系印度存在的观念上的统一，完全是通过英国在印度的中央集权政府才体现出来，其表现形式是印度的唯一通用语言——英语。”

——“在印度陷于异常严重的种族和宗教纠纷所折磨的时候，无疑是不能给予自治领地位的……，我们对印度 35,000 万人的幸福负有责任，而印度的政界人士仅代表了其中微不足道的少部分人，因而不可能赋予这种地位。”

——“只要英国权力有一刻的松懈，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旧有仇恨就会死灰复燃，并有变本加厉以致达到极其狠毒之势。他们这种仇恨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在印度，终生比邻相居的民众，一旦被这种情绪所支配，就会彼此厮杀，男女老幼都卷进去。自从人们认为英国即将失去其统治并相信只要提出要求就可使英国撤出以来，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关系的恶化，是一百年来所未有的。”

（以上见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第五章“被蝗虫吃光的年代”）

丘吉尔还说，让印度自治“最后的结果必定会使我们失去印度，而印度人民也一定会遭受到无法估计的祸害”、“或者是印度的专制主义……，或者是使残酷内战重新爆发”、“试图用猫肉来喂老虎是不会使其心满意足的”。

丘吉尔的立场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一贯立场：白种人是优秀人种，亚洲人是劣等人种，劣等人种不能自己治理自己，离开了白人的统治就要天下大乱死人无数。1948 年英国搞印巴分治后发生了种族大仇杀和印度巴基斯坦的大敌对，西方白人于是振振有词：我早说过劣等人不能自治，更不能独立，必须给我当殖民地，否则就要大规模死人，现在全应验了吧？——“防止发生大规模死人事件”一直是白人殖民主义者推行殖民主义的最大借口和理论根据。

在西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眼里，中国人与印度人没什么区别，同样是“劣等人”，同样“没能力自己治理自己”。

1943 年德黑兰会议上美英苏“三巨头”曾上有如此对话：

——“斯大林对于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评价很低。罗斯福总统‘提到了他喜欢谈论的题目之一，教育远东殖民地的人民，要他们学习自治的艺术。’”（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五卷《紧缩包围圈》第十九章“德黑兰：会议开幕”）

——“斯大林……不相信中国在战争结束时会变得强大，即使强大，欧洲国家也会对中国拥有对他们发号施令的权力而感到厌恶。在这一点上，苏联领袖确实表现得比罗斯福总统更有远见，更有切合实际的判断力。”（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五卷《紧缩包围圈》第二十章“谈话与会议”）

你看，“教育远东殖民地的人民，要他们学习自治的艺术”——如果承认“远东殖民地人民”如中国人有自治能力，哪用得着“教育”、“要他们学习自治的艺术”？这还算对中国客气的。要是不客气呢？“即使强大，欧洲国家也会对中国拥有对他们发号施令的权力而感到厌恶”，而丘吉尔完全赞同：“在这一点上，苏联领袖确实表现得比罗斯福总统更有远见，更有切合实际的判断力。”

一贯把中国人当劣等人当惯了的英国人毫不掩饰对中国人的轻蔑：“英国方面始终认为中国的军队是无法组织成任何战斗机构的”、“韦维尔上将飞抵重庆白市驿机场时，带来 20 几名衣饰鲜亮、趾高气扬的军事助手和参谋。这些狂傲的大不列颠军官从走下飞机的第一刻起，就以一种西方人的优越感俯视前来欢迎他们的中国主人，并且公开把中国的委员长称做‘酋长’，那意思是中国人还都是原始的部落民。”（《中国远征军》第 52 节）

所有这些都说明一个事实：在外国“优等民族”眼里，中国人是那样劣等：“原始的部落民”、“无法组织成任何战斗机构”、没有自治能力，必须“要他们学习自治的艺术”，中国人必须永远低人一等：“即使强大，欧洲国家也会对中国拥有对他们发号施令的权力而感到厌恶”。

捏造“饿死 x 千万”正好为西方种族主义者提供了人家最需要的东西：你中国人自己“证明”自己“劣等”，“劣等”得自己治理不了自己，一离开白人的统治就天下大乱，就死人无数，可见跟印度一样，只配当殖民地，不配独立。

“精英”可以争辩：一切都是毛泽东坏，共产党坏，不是我们“精英”的责任。

然而这是“精英”自己给自己吃开心丸的说法，不是西方“优等民族”的说法。刘亚洲不是说吗？“外地人听见这件事后，说，北京人真残忍。香港和台湾人听说这件事后说，大陆人真残忍。南朝鲜、日本人听说这件事后说，中国人真残忍。美国人和西方人听到后说，东方人真残忍。”——在中国“精英”眼里，“饿死 x 千万”是毛泽东共产党干的，在西方大老爷眼里，“饿死 x 千万”是中国人干的。一个民族自己对自己干出这种事，可见是“野蛮人”，是“劣等民族”，可见应该低人一等，可见一旦地球资源不够我挥霍时就应该优先淘汰掉这野蛮的“劣等民族”。

（不但捏造“饿死 x 千万”，中国“精英”更干脆公开宣称中国人“民智未开”，惟恐别人不以为中国人“劣等”——“民众，特别是当下民智未开的民众，常识经常是缺乏的。[《南方人物周刊》：“张维迎，长达 25 年的骂名”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傅小永、陈东 2007-07-16 11:25:00]）

（<http://www.infzm.com/content/4550>）

张宏良教授说：“因为文革是人类浩劫，所以中国人是野蛮人，是野蛮的印第安人，是野蛮的非洲黑人，是理应进行屠杀和灭绝的文明世界之外的人。奥巴马在最近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发言中公开声称，由于文革的种种残暴，尼克松放弃对中国实行军事打击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同样也是由于文革的种种残暴，所以就可以随便向中国一个省出售武器，就可以随便在中国政府之外再会见一个二个或者更多的政府首脑，就可以随便支持中国所有的分裂势力，就可以随便操控中国内部的汉奸势力，就可以随便以各种名义掠夺中国财富，以及随时都可以对中国进行各种打击。总之，文革已成为敌对势力毁灭中华民族的万能魔瓶，哪怕是明天将 13 亿中国人民彻底灭绝，只要一说中国人有文革，就会如同当初灭绝印第安人一样心安理得。”

把张教授这段话的“文革”换成“饿死 x 千万”同样成立：

“因为‘饿死 x 千万’是人类浩劫，所以中国人是野蛮人，是野蛮的印第安人，是野蛮的非洲黑人，是理应进行屠杀和灭绝的文明世界之外的人。由于‘饿死 x 千万’的种种残暴，尼克松放弃对中国实行军事打击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同样也是由于‘饿死 x 千万’的种种残暴，所以就可以随便向中国一个省出售武器，就可以随便在中国政府之外再会见一个二

个或者更多的政府首脑，就可以随便支持中国所有的分裂势力，就可以随便操控中国内部的汉奸势力，就可以随便以各种名义掠夺中国财富，以及随时都可以对中国进行各种打击。总之，‘饿死 X 千万’已成为敌对势力毁灭中华民族的万能魔瓶，哪怕是明天将 13 亿中国人民彻底灭绝，只要一说中国人有‘饿死 X 千万’，就会如同当初灭绝印第安人一样心安理得。”

同样，“把‘饿死 X 千万’作为毁灭中华民族的罪恶借口，并不是美国人发明的，而是中国人提供的。所以，究竟是美国人在利用买办汉奸来解体中国，还是买办汉奸在利用美国等北约国家来摧毁中国，已成为最令人困惑莫解的历史谜团。但无论这些内鬼外贼之间是谁利用谁，中华民族都将会面临一场真正的历史浩劫。中国历史上，凡是借用外来力量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其结果无不是或者内乱或者亡国，绝无任何一次例外。而这一次外来势力干预中国的借口，就是‘饿死 X 千万’”。

张宏良教授还指出：“美国对中国已彻底跨越了和平底线，除了还没有发动直接军事打击之外，其他所作所为几乎完全进入了敌对状态。连旁观的俄罗斯都被中国落入美国魔掌的悲惨状况震惊得不寒而栗，最近在匆忙立法，把所有胆敢妖魔化俄罗斯的亲美分子，统统定罪为法西斯分子。”

捏造“饿死 X 千万”为外部敌人灭绝中华民族提供了最好的理由和借口，为一切卖国贼提供了最好的卖国依据：“饿死 X 千万”证明中国人自己不能治理自己，理所当然该当外国殖民地。

难怪刘 xx 会那样理直气壮：

——“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难怪焦国标敢如此疯狂嚣张：

——如果有一天我执掌了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一分钱就把她卖给美国作它的第五十一个州。”

——“如果当年美军拿下朝鲜半岛，越过鸭绿江，直捣北京城，推翻毛泽东的政权，像满人赶走李自成那样，后来的一切灾难都可以免除，现在中国大陆人民幸福和富裕的程度应该与今天日本、韩国、台湾人民不相上下，根本无须几十年后来 xxx 再搞什么改革开放。”

——“我建议美国考虑把中国切分成七个国家，让她回到秦统一以前去。这有两个好处：一，这对世界安全，这对中国人民安全，免得再有像朱成虎这样的狂妄之子挟持大中国，抵御世界文明；二，到那时，河北小伙找个湖北媳妇，就可以自豪地说：不才找个外国妞，楚国的。你一听说一个德国人找个法国媳妇，肯定觉得很羡慕，实际上等于湖南小伙找个湖北妹子。中国人要过跨国婚姻的瘾，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中国分成欧洲那么多国家，四十多个吧。要实现这一梦想，还得等东亚恐怖主义被平定之后，就请未婚的中国男女们快快伸出援手吧。”

——“假如能再来一次，日本军队又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你猜我何以自处？我就会学习汪精卫先生和周作人先生，做千夫指的汉奸！曲线救国实在比直线救国好。”

——“假如中国做了日本的殖民地，咱北京故宫的珍宝还不都运他东京去呀？他想运就运吧，从北京运到东京，不过是换个地方，有什么呀？说不定比放北京还保险。”

——“谁说民主不可输出？民主不可输出，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流传了几十年的谬论。现在看来，民主不仅可以输出，而且应该用导弹输出。伊拉克战初发动时，我曾预言不出三五年，在人类文明最古老的区域之一，一个新生的民主伊拉克将绽放出来。”

——“对那些缺粮的国家，西方国家根本不应供应粮食，应该发射导弹，帮助建立起民意政府。”

——“鸦片战争前夕，英国有一派力量估计，不消几星期，就能把外强中乾的大清朝打下，后来事实正是如此。前不久，日本、美国都有声音说，一两个星期就能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法存在的问题。仿佛时光倒流，又回到鸦片战争以前。”

……

由此可见捏造“饿死 X 千万”是不折不扣的反民族罪行，彻头彻尾的汉奸卖国行为，罪大恶极。

顺便说一句：中国的 1954 年、1975 年、1978 年这三个版本宪法里都有“惩办一切卖国贼”的词句。而 1982 年的宪法条文中“惩办一切卖国贼”这句话被删除了。换句话说，从 1982 年起中国从法律上讲不再有“卖国”罪——卖国无罪，那爱国自然就有罪。难怪 1982 年之后中国只有“爱国贼”而没有“卖国贼”——卖国无罪，那叫“融入世界”、“与国际接轨”；而爱国有罪——那叫“极左”、“极端民族主义”、“疯狂”、“民粹”、“爱国贼”……

（写到这里不禁佩服“改革精英”们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实际早有准备，大规模下岗之前先取消罢工、四大、收缴民间一切武器；大规模卖国之前先修改宪法取消卖国罪，紧锣密鼓却又不动声色未雨绸缪，实在处心积虑老奸巨猾。）

宪法只有“叛国罪”而取消了“卖国罪”，那么卖国就无罪了吗？

卖国贼特指对外出卖本国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因为草民百姓是无资格与洋大人签属条约的。所以，卖国贼这个罪名，特指性极强，只有位高权重者才有可能担得起。

“卖国”是相对于全体人民而言。

“叛国”是相对于政权而言。

如果政权本身就是卖国政权，那“卖国”与“叛国”就不是一回事。一个人可以“卖国”而没有“叛国”，比如李鸿章，从中华民族的立场看是卖国贼，从满清政权太后老佛爷的立场看并没有“叛国”。但不论李鸿章怎样紧跟以老佛爷为核心的皇中央，不论主子如何抬举这位忠诚的奴助手，只要广大民众认为李鸿章是卖国贼，那他就是卖国贼。

什么是卖国，最具有解释权的还是广大民众。如果广大民众认为是卖国，那就是卖国。卖国不卖国到头来是广大人民群众说了算，而不是少数文匪“精英”官僚说了算。

捏造“饿死 X 千万”是不折不扣的反民族卖国罪行。对捏造“饿死 X 千万”的卖国罪行不坚决斗争，就是容忍卖国，容忍为民族灭绝做准备。只要不是死心塌地处心积虑灭绝中华民族的卖国巨恶，认同“饿死 X 千万”就等于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画押，如同阿 Q 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画圈一样。

阿 Q 最可悲之处在于明明是在为自己的死亡画圈却懵然无知，还极其郑重其事认真地想画得漂亮些：“阿 Q 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气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阿 Q 正羞愧自己画得不圆……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惟有圈而不圆，却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于是他睡着了。”——如此愚昧，可悲不可悲？

一本正经、十分虔诚地认同“饿死 X 千万”的中国人比那“使尽了平生的力气画圆圈”的阿 Q 又高明到哪里？捏造“饿死 X 千万”分明是为制造中国是“劣等民族”提供依据，为将来某一天彻底灭绝中华民族做准备布陷阱，你还煞有介事自以为是，还以为在行善积德，这不等同于阿 Q 恭恭敬敬地画自己的死亡圆圈吗？不认清这其中的厉害，迟早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至于处心积虑捏造“饿死 X 千万”的元凶巨恶如辛子陵、吴敬琏、茅于軾、杨继绳之类极其后台等大小汉奸，迟早要被中国人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对此正用得着陈老总的话：善有

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不信？走着瞧！

附录一，旧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死亡率对比图

附录二，野草：从《中国人口年鉴》看三年困难时期和毛时代计划生育

网友“野草”文章“从《中国人口年鉴》看三年困难时期和毛时代计划生育”（见附录）用中国人口年鉴的数字把旧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死亡率做了个对比。我把这些数字转换成图表，用更直观的方式对比表现出来。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旧中国与毛泽东时代人口死亡率的差别是数量级的差别，是千分之几百与千分之十几的差别。而这里引用旧中国的死亡率数字还是“全国属于较富庶地区，交通也相对发达，且这几年并未受到战乱影响”的地区。孰优孰劣，孰是孰非，孰功孰罪，一目了然。

附录：从《中国人口年鉴》看三年困难时期和毛时代计划生育

作者：野草(吴.村.赏.柏)

这里提供部分资料、文献，供朋友们参考。

一、中国不同时期的人口统计资料

表一 1931—1934 年江苏省江阴县农村人口贫富死亡率（千分比）

1、普通死亡率

年度	富有者	安舒者	贫穷者	总计
1931—1932	26.5	39.6	45.6	42.8
1932—1933	32.3	31.0	39.6	36.1
1933—1934	33.9	49.3	56.0	52.0
1931—1934 平均	30.9	39.9	47.4	

2、婴儿死亡率

年度	富有者	安舒者	贫穷者	总计
1931—1932	161.3	219.8	198.2	203.4
1932—1933	275.9	240.2	239.2	241.8
1933—1934	379.3	373.5	403.4	309.3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第叁编（1936 年）。

野草注：之所以选择 1931—1934 年的该地资料，原因在于手头没有全国性的资料（恐怕以当年政府的能力，也根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调查），而该地在全国属于较富庶地区，交通也相对发达，且这几年并未受到战乱影响。

表二 解放后历年（1949—1966）全国人口死亡率（千分比）

年度	全国	城市	农村
1949	20.00		
1950	18.00		
1951	17.80		
1952	17.00		
1953	14.00		
1954	13.18	8.07	13.71
1955	12.28	9.30	12.60
1956	11.40	7.43	11.84
1957	10.80	8.47	11.07
1958	11.98	9.22	12.50
1959	14.59	10.92	14.61
1960	25.43	13.77	28.58
1961	14.24	11.39	14.58
1962	10.02	8.28	10.32
1963	10.04	7.13	10.19
1964	11.50	7.27	12.17
1965	9.50	5.69	10.06
1966	8.89	5.59	9.4
1967	8.43		
1968	8.21		
1969	8.03		
1970	7.60		
1971	7.32	5.35	7.57
1972	3.61	5.29	7.93
1973	7.04	4.96	7.33
1974	7.34	5.24	7.63
1975	7.32	5.39	7.59
1976	7.25	6.60	7.35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年鉴》（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人口研究中心编）我想，根据上述资料，所谓“饿死叁千万”的妖言可以尘埃落定。按照《庐山会议实录》李锐提供的数字，59年人口净增长1113多万，1960年净减少1100万，1961年人口净减少348万。从表二中所列数据，以1959年与1961年相比，人口死亡率相差无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距？非正常死亡人数究竟是多少？如果一个相对客观的人，应当是不难得出正确结论的。我的计算方法是：将叁年困难时期总死亡率，减去此前叁年的总死亡率，所得即非正常死亡率。将这个非正常死亡率乘以人口总数，即叁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数。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依照我的计算方法得出的非正常死亡数（注意：非正常死亡并不完全等

于饿死），是以解放后取得的成就（即参照 1956—1958 年的死亡率）为基础的！如果参照 1949 年的死亡率，恐怕连 1959、1961 年都不能算作灾年。更别说如果参照以解放前的中国（以 1934 年的江苏江阴为参照，已经是相当乐观了！别忘记了，34 年已经接近旧中国经济最好的一年[1936 年]，江苏当年又是全国经济较发达地区），会得出什么结论。某些痞子说，不能将战乱与和平年代相提并论，甚至说什么中国不需要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战乱年代当然是不能与和平年代相提并论，但不妨问一句：战乱是谁造成的？是反抗者还是压迫者？解放前，人均寿命叁十五岁，文盲率高达 80%，这是战乱可以解释得通的？！中原大战后，国民党统治的大部分地区有战乱吗？那里情况怎样（表一就是明证！）？解放战争期间，直到渡江战役开始前，战场始终在长江以北，江南又何所谓战乱？！那里的情况怎样？本来，蒋介石那样早已经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唾弃的政治僵尸，根本就不必多言。但近年来，有不少“自由主义”精英之流的人物却很热衷于为其招魂，说什么国民党统治下的“自由”虽“少”，但比“无”好。对于他们这些精英而言，确实是有很多自由。但对于喜儿、芦花棒等底层民众而言，恐怕是无福消受这种“自由”吧？——且不说抗战前与抗战中，就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地方大员竞逐“五子登科”的劲头，掠夺民脂民膏的丑恶、无耻嘴脸，连你们的美国爸爸都认为不可救药！而且，这个所谓的“五大强国”之一，当年为了顺利“接收东北”，不仅出卖了外蒙古主权，并出租大连、旅顺港和中长铁路（租期 30 年，后在 1950 年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收回）；为了获得美国老子的“援助”，不仅纵容美军在中国为所欲为（甚至国民党交通次长之女被强奸，也被某些御用文人说成是“似非良家妇女”！——次长的女儿遇害尚且如此，遑论普通百姓！），更签订《中美友好通商条约》、《中美航海条约》等卖国条约；为维护独裁统治，不仅破坏政协会议，而且撕毁停战协定并挑起全面内战；在“改善民生”方面，不仅创下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通货膨胀记录，战败逃离前，还在大陆对普通百姓进行了大掠夺（我们不要忘记，台湾能够有今日的发展，其原始发展资金的绝大部分就来自这次掠夺）！这样的政府，还要指责人民不该反抗？！当然，在事实面前，这些荒谬绝伦的胡言乱语根本就站不住脚。比如所谓的战乱年代真能搪塞一切吗？从表二可以看出，被称作“全面内战”、“十年动乱”的文革，其人口平均死亡率，比此前的绝大部分年份都要低，而且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请问某些造谣生事之人，为什么毛泽东的“动乱年代”，人口死亡率会逐年下降，而“蒋公”的战乱年代却是另一幅光景？！

二、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

这里，我列出毛泽东时代一些关于计划生育的政策、社论以及领导人讲话目录，供朋友们参考。

- 1、《提倡节育》（刘少奇，1954 年 12 月 27 日）
- 2、《卫生部关于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的通知》（1956 年 3 月 30 日，）
- 3、《卫生部关于避孕工作的指示》（1956 年 8 月 6 日）
- 4、《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周恩来，1956 年 9 月 27 日）
- 5、《应该适当地节制生育》（《人民日报》1957 年 3 月 5 日社论）
- 6、《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1957 年 10 月 25 日）
- 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2 年 12 月 18 日）（以上皆转引自《中国人口年鉴》1985 年）
- 8、《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57 年 10 月 9 日[注：将“引蛇 出洞”与批马寅初相联系的人，且问反右何时开始的？]）
- 9、《农村卫生工作和计划生育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1965 年 11 月 1 日）这些年，由于某些别有用心者的造谣，许多原本明了的事实都成了一锅粥般的糊涂账。比如新中国人口的膨胀，许多人就片面地将新中国人口膨胀原因归咎于毛泽东。我在《关于“饿死叁千万”、毛泽东与今日某些右派》中已经指出，新中国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批判马寅初。我

认为真正原因是——新中国人均寿命大大延长、人口死亡率大大下降，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导致了中国人“多子多福”观念根深蒂固。实际上，从今天虽然采取了种种非人道手段来强制计划生育，却仍然难以遏制人口增长的势头，已经可以看出——当年真正缺的不是宣传和提倡，而是没有采取类似今天的手段而已（如果真采取这类手段，恐怕又要被某些人大肆攻击为“暴政”之类——真是说你坏，你就坏，不坏也坏）！关于此，在苏联、德国等欧洲国家也可以找到佐证——这些国家为鼓励人口增长，采取了“英雄母亲（苏联）”等措施，但其人口出生率却始终很低，德国二战后总人口甚至是负增长！有趣的是，这些年许多新右派分子往往以民主的守护神自居，可是一旦遇到具体问题，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脱下伪装。以批判马寅初为例，居然可以告诉大家，批判一个人可以“错增叁亿”！你倒是纠集帮人马批判一下，看看能否“正确地减少叁亿”？我认为，批判马寅初确实值得反思，但恐怕不是什么“错增叁亿”，而是那种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的粗暴作风。看看前面所列 1954—1965 时期社论、政策，所谓“批错一人，错增叁亿”这类的妖言惑众可以结束了吧！

2010 年 1 月 18 日

来源：<http://www.wywxwk.com/Article/shidai/2010/09/120760.html>

天问 人民公社的 1960 年饿死人是谁造成的

【艰难的毛泽东系列】

作者：康秀峰

饿死人，在长达 2500 年的剥削阶级制度下是再普通不过了。地主、官僚、资本家统治集团下饿死人的原因是：他们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广大的人民要么是佃农、要么是雇农、要么是贫下中农。那时也根本没有水利设施。因而在洪涝灾害和蝗旱灾害下严重欠收时，不仅没饭吃，而且租种了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田地交不了地租，此时只能再去地主或官僚资本家家里借高利贷，再进行生产。在那十年九灾的年代，只要一借高利贷，高利贷就会债上滚债，那么一生就还不清了。每当灾害再次来临，那就是卖儿女卖妻了。没东西可卖时，那只有去吃树皮、野菜，或乞讨为生。彭德怀元帅在年轻时，曾在年三十这天和奶奶及弟弟去乞讨，不仅没讨到一点点残羹剩饭，还被地主老财家放狗咬了。在树皮、野菜也全被吃光的情况下，就会饿死人。旱蝗灾这种事在北方更多。据中华史书记载，每当蝗灾、旱灾时就会赤地千里，导致人饿死。山东半岛的人闯关东，就是东北地广人少，还有深山密林多，不易饿死人。南方则乞丐多。因为南方山水多，深山密林多。涝灾只有淹死人和作物，大水过后仍可补种别的作物以度荒。这又往往发生在黄河中下游两岸区域内。本来，只要深山野林存在，山上就有野菜、树皮、山禽走兽；河中有水、有鱼虾，田里有鱼、虾、蛙，就不会饿死人。因为这些均可捕获而食。河中有水，就可以种各蔬菜及豆类而食，就不会饿死人。不过，在私有化剥削阶级统治时，深山山林是私人的，你不可以乱去。所以，太穷的人家是既无田地，也无山林的。或曾经祖上有后来卖掉了。还有，那时的大河里，也被地主恶霸霸占，你也不可去捕鱼捞虾。另外的出路呆向邻居及亲朋戚友家里借，只要还有邻居及亲朋戚友，就不会饿死人。

蒋介石时代及清朝饿死人，还发生于老弱病残，孤苦伶仃的人。因为在农村的各农户，家庭情况千差万别。有的只有孤老寡人，没有子女，有些只有孤儿孤女，没有双亲，有些则为单亲，有些则人多劳动力少。这些情况即使有土地田亩，在家庭耕作的制度下也无法正常耕种收割。在耕种收割时节人一生病，也就两眼巴巴无助。有些家庭甚至于因贫病交加而再次卖地卖田卖房，借高利贷，如白毛女所述，这样就必然会发生饿死人了。

饿而死人还是有因某些人根本不劳动，好逸恶劳。

新中国建立后，饿而死人的现象被杜绝了。因为人民通过土改分了土地、房屋即平均地权。其次是建立了互助合作社，再次是农村有了共产党工作队，那时的干部会管。所以从

1949 年建国后到 1958 年间，尽管发生了数次巨大洪涝灾害或干旱，再也没有发生饿死人和逃荒要饭、卖儿卖女、典妻的事了。虽然还在剿国民党军土匪，也没有劳苦人上山当土匪了。同时，对上百万妓女治病并改造，安排其工作生活，有些后来成为干部。这就是人民自发组建高级互助合作社的原因。

1958 年底建立的人民公社，则更进一步完善了高级互助合作社。变为集体所有制了。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则在于更能把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走集体化道路。集体化道路更能杜绝饿死人的事发生。原因在于老弱病残、孤苦伶仃的人、孤老寡人、孤儿孤女这些不能劳动的群体的人，其粮油生活物质由集体供应(和国家保证如五保户---)。孤儿孤女还会受到公社的特殊安排，如上学、工作。并且，在毛泽东时代的农村集体所有制下，男 60 岁，女 55 岁就不要下地种田了，其粮油等生活必须物质由集体供应。由于大兴水利设施，就可做到旱涝保收。还有，每当每个地方歉收时，不但 5% 的公粮不要交，而且公社干部向上反映情况，国家就会下拨回供粮给该地区或生产队，以保证群众的基本生活。毛泽东时代的农村，自产自销不要交税，各生产队有公积金制度，并且，各生产队每年都会抽出些人外出去找副业(即今天的打工、民工)，以充实生产队的公积金。公积金就是分红和救急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对于原来没有住房的人，农民则分到了地主等多余的房屋，城镇无产阶级工人、市民，则分到了没收资本家多余的房屋及西方资本家在华的房屋，以及旧社会政权的房子作为公房分给市民及职工居住。这种情况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住房得到很大改善。尤其工厂的职工及二三线城市里，由于各自单位可以自建房屋，故而每家每户都是二室一厅或三室一厅，人均住房面积达 20 多平方米以上。这就是后来称的福利房。每月一块到二块多钱的房租费，三线工厂职工则连房租水电费也不要交。

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城镇人口的公有制的优越性，远不止上述内容。其它的优越性此不赘述。

毛主席和刘少奇在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上的矛盾焦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958 年人民公社建立，是根据（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而建立的。也是七届六中全会所决定了的。同时，主席已退居二线，中央和国家工作已完全交由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处总书记为邓小平、常委书记为彭真等八九门的部个人)一线团体负责。其中周恩来又分管工业，工业部长归周恩来分管，其中刘少奇抓全面并主兼分管农业，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协助党的副主席刘少奇(1959 年下半年刘少奇又接任国家主席)工作。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除协助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外，实际上起勾通毛主席和中央的桥梁作用。

建立人民公社的背景是：

一、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已经在若干地方普遍发展起来，有的地方发展得很快，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且有不可阻挡之势。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基本上战胜了资本主义道路之后，发展了空前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创造了可以基本上免除水旱灾害、使农业生产比较稳定发展的新的基础，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更加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农村工业的发展也要求从农业生产战线上转移一部分劳动力，我国农村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要求已愈来愈迫切；在农田基本建设和争取丰收的斗争中，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为群众性的行动，进一步提高了五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

想。所有这些，都说明几十户、几百户的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这充分说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是人民的期望，是中共中央的集体决定，形成了决议。否定人民公社，就是否定当时的党中央，污蔑人民公社，就是污蔑共产党中央。

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后，主席的方针政策是：一是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二是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也不必忙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取酬”，并不是“各取所需”；三是人民公社建立时，对于自留地、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问题，不必急于处理，也不必来一次明文规定。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零星果树暂时仍归私有。

主席多次在各种会议上指出他们的问题：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

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刘少奇、彭真立即插话说：“农村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

主席说，“按照刘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总之，线是要划的，就是如何划，请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这里有个不可能，也有个不应该，（彭真：吃薯怎么进入共产主义。）一块钱工资怎么进入？毛泽东又说“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百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武昌会议上主席又讲：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

十二句话应再加两句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收入分配，由社决定，多劳多得，承认差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我这篇话不讲，就不足以掀起议论，这几个月许多地方实际上坏破了价值法则。今年你们要节制，尽最少放“卫星”，如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银行卫星等。我没有想到今年搞人民公社，也没有想到过农村搞公共食堂。帝国主义那边造谣，说这都是我出的主意。

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偿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

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讲：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超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我们不是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吗？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设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过去汉族同少数民族是不等价交换，剥削他们，那时不等价还出了一点价，现在一点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这是个大问题，民心不安，军心也就不安，甚至征购粮款也被公社拿走，国家出了钱，公社拦腰就抢。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不聪明呢？他们的政治水平那里去了。问题是省、地、县委没有教育他们。

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在武昌会议时，不感到这个问题，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着觉，九月就充分暴露了，大丰收！国家征购粮完不成，城市油吃不到了。赵紫阳的报告和内部参考中的材料你们看到没有？我就不相信长江、珠江流域马克思主义就那样多？我抓住赵紫阳把陶铸的辫子抓到了。

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没有钱嘛！不是抢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

劳动力到处流动，磨洋工，对这点我甚为欣赏，王任重很紧张无心跳舞，一夜才转过来，放一炮，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上千万队长级的干部很坚决，几万万社员拥护他们的领袖，所以立即下决心瞒产私分。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

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

人民公社正在发展，需要支持，不能拦路抢，李逵的办法，文明的办法叫做“剪径”，绿林豪杰叫“剪径”，现在绿林豪杰可多了，你们是否在内。对付剥削者无罪，绿林的理由叫“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如生辰纲，我们也干过，叫打土豪。后来者文明一点收税。成吉思汗，占了中国，不会收税。叫“打谷草”无代价抢劫人民，结果打走了他们自己。

专业体育、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苏联才有三个卫星呢。

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还是改变。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

城市办公社，我就想不通。

土地属谁所有，劳动力属谁所有，产品就属谁所有。

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

谁先进入共产主义？苏联先进入还是我国先进入？在我们这里成了问题。赫鲁晓夫提出在12年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他们很谨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谨慎一些。有人

说，两三年，三四年，五年七年进入共产主义，是否可能？要进，鞍钢先进，辽宁后进，（他们 2400 万人中有 800 万人在城市），而不是别省，再其次是老柯（庆施），上海。如果他们还要等待别人，不能单独进。那徐水，寿张、范县就要进，那不太快了吗？派了陈伯达同志去调查，说难于进，现在专区、省还没有人说先进，想谨慎，就是县有些打先锋的。整个中国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苏联四十一年，再加上十二年，共五十三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几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为好，也许在巴黎公社百年纪念时（1971 年）苏联进入共产主义，我们 12 年怎么样？也许可能，我看不可能。

上海召开的会议在 2 月 28 日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你们不赞成公开写文件，写所有制，我也可以让步，但是实际上要那么办，而且我们在会议上得把问题讲清楚。”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说：关于承认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是不是向农民让步这个问题，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只能这么发展，这是客观情况。“现在还不能讲基本上是大集体所有制，所有不了，一所有就危险，就跟那个小集体冲突。”为了防止公社积累过多而影响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毛泽东提出 1959 年要向农民宣布：在生产队的总产值中，公社的积累不要超过 18%，加上国家的农业税 7%，总共不超过 25%，生产队用于分配给社员的那部分应占 55%，使农民心中有个数，以安定人心，以利于提高生产积极性。

毛泽东严厉批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说它使得生产队人财两空。他提出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他说：“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他强调要承认差别，“社社可以不同，有差别；队队可以不同，有差别；人人可以不同，有差别”。

在 1959 年的会上，毛泽东讲了一段很激烈的话。他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不跟我来贯彻，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我犯了什么罪？无非是不要一平、二调、三收款，要基本的所有制还是生产队，部分的所有制在上面两级，要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来办事。”

主席指出：六中全会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没有执行，就是否定价值法则，所谓拥护中央是句空话，起码暂时还难说，其实是不通。无代价的上调是违反中央的，要搞工业，不搞农业，未到期的贷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两条腿走路？

武昌会议上，主席指出：成绩与虚假，要有个估计，到底有多少，要议一下。三七还是二八，可带回去与地委、县委同志研究一下。把假的估计多了，不相信群众，要犯错误，要泄气。不估计到假的也要犯错误。这是说一般，就个别来说，有全部是真的，有全部是假的。

毛泽东在 3 月 1 日会上又提出：“等价交换不要一句？”并说：“现在把等价交换一否定，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结果人家就恐慌。”关于等价交换问题，六中全会决议中只讲到人民公社社与社之间和人民公社同国营企业之间实行商品交换，而“没有说公社内社与队、队与队也要实行等价交换，这是一个缺点”。毛泽东提出要增加“等价交换”一条，就是要在人民公社内社与队、队与队之间在物资和劳动力两方面都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不允许无偿占用。

毛泽东还提出，应当将“多劳多得”改为“按劳分配”，“人民公社决议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你们想一想，这是个什么问题？”，“究竟所有制基本上是在哪个地方？不讲所有制，扳不过来的。所有制基本是队，而不是社。”

然而，他们对主席的意见根本不理。在政治局扩大会上，多数人也不同意毛泽东的队为基础，等价交换的意见，对毛泽东总结出的人民公社制度及政策的十四句话，他们强调十四句话要同六中全会决议衔接起来，要维持决议。他们所说的要衔接、要维持的，主要是指

决议关于人民公社内部体制的规定，即：“人民公社应当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公社的管理机构，一般可以分为公社管理委员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区（或生产大队）一般是分片管理工农商学兵、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毛泽东说“如果维持这一规定，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就无从谈起。因此，毛泽东提出：“三级所有是不是要写上？”刘少奇立即回答说：“就是分级管理，各计盈亏。”并且补上一句“不是各负盈亏”，作为“各计盈亏”的注脚。邓小平说得更直接了，他说：“还是公社所有制，公社所有制的内容是包括三级所有制，这样解释比较好。不同意采取主席那个“由队到社”的过程的说法。会议情况表明，与会者中相当多的一些人不赞成写上毛泽东提出的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所以最后反复讨论通过的十四句话中，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而不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在同年4月上海会议由毛主席又提出后，再经过讨论后才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中，才有了明确的表述。这就是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讲道：“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我以为主要地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答案就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而不是公社所有制。

1960年—1961年初，毛主席90次对农业及人民公社的问题批文和讲话。集中在批浮夸风和共产风，重点是关于“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十年总结”等等。

如：

主席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三日为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编印材料的批语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此件请各同志阅读，并请转发到县级党委。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睬。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发布了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说：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

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

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主席关于三面红旗、农业问题、人民公社制度的问题讲话、批示，在一九五八年计有 27 次份，即 27 天谈这个所有制问题。1959 年到 1960 年二年时间里关于农业问题、人民公社制度的问题、反浮夸风的讲话、批示，达百五六十次之多。如果刘邓认真执行了 1959 年 4 月 29 日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所指示，也根本不会发生 1960 年春荒时期信阳饿死了人的大事了。

到 1961 年，主席有 65 天还在谈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

1961 年 2 月下旬，毛泽东到了广州，亲自主持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3 月 10 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南、华东、西南三个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三南”会议。与此同时，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在北京召开主持“三北”（华北、东北、西北）会议。这两个会议都是为了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农村工作。

1961 年 3 月 22 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草案）。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一封信》，要求各地将条例一字不漏地讲给或读给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听，认真进行讨论，切实解决人民公社存在的许多问题。

《农业六十条》的公布实施，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在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国农村摆脱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迈向 60 年代中期新发展的转折点。

到十月，毛泽东就关于召集中央局书记讨论“队为基础”问题的批语（一九六一年十月四日）

小平、彭真同志：

索性请柯老、井泉、澜涛、任穷四同志，于五日来此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如同意，请彭真同志即办。五日到，晚上即可谈一下，六日会毕，七日他们即可回去。

毛 泽 东
十月四日晨五时

我们从主席的谈话、批示、批评、文稿中就可以完全知道，主席和刘少奇等人的分歧在那里了。

再看刘少奇在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

人民公社建立后，处于一线刘少奇，则在人民公社的制度上搞公社所有制，全民所有制。

他违背了主席的方针政策。正是由于刘少奇实行了公社所有制及公有制，才必然产生共产风，发生一平二调。由于刘少奇自己搞一套，必然要急于证明其正确性，搞政绩也必然发生浮夸。搞了浮夸必然虚报政绩，虚报政绩也必然产生高指标，因高指标与政绩有关，高征购也就自然产生。加上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结果干部违法乱纪的地方农民就没饭吃，严重的少数地方如信阳就发生人饿死。

刘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之前是反对搞农业合作化的。南宁会议以后，突然一反常态，处处表现出很“左”。在随后的大跃进中，由一个反对搞农业合作化，变成了极力搞“共产

主义大公社"的人。他不顾当时我国的客观实际情况，歪曲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实质，搞公社所有制，公社全民公有制。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大肆鼓吹高指标；大肆浮夸虚报；只讲敢想敢干，不讲科学分析；只要头脑热，不要头脑冷；搞挑灯夜战，苦干蛮干，不讲实干巧干和劳逸结合；只施行强迫命令，瞎指挥，不走群众路线和耐心的群众思想工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肆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社员的自留地、部分生产工具、树木、房屋等等一律归人民公社所有；大肆取消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混淆了社会主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这就是"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歪风。刘少奇是"五风"的鼓吹者，是"五风"的源头。其他人是"五风"的执行者。作为刘少奇主要助手的邓小平要负一定的责任。因为邓小平作为书记处总书记，有责任向党主席汇报并反映有关情况，可邓从来没有，并且从1959年刘少奇当国家主席起，邓小平就远离毛泽东七十余，从来不去主席那里汇报工作。这是主席公开说的情况。

证明刘少奇搞"五风"的证据还有：刘少奇在庐山会议结束后的第7天，8月24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这么几千万人上山，几亿人搞大跃进，大家动手搞，这样才会得到经验。我相信，这样我们进步快。这个出钱买不到的。而我们在很短时间取得这个经验的。我们取得这个经验，那怕是犯很多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还得犯。我们犯了，将来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错误，发生了问题，也要从积极方面看，犯错误也有好处哩"。（刘少奇：在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因此，从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为了推行资改，违背历史真相下作出《建国--决议》，以决议形式把他和刘少奇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而造成我国的严重经济困难这一事实栽赃给毛泽东，从而导致许多不明真相的人跟着黑知识分子一起反毛、中伤、污蔑主席32年，至今还在进行----

其次，刘少奇在《农业六十条》的公布实施后，农业取得了完全改观的形势下，又采取了与其前完全相反的做法，即解散人民公社，分田单干，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三和一少。推行分田单干，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积极分子就是广东等省。以上就是五六十年代毛、刘在制度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及争论的焦点。人民公社公社公有制和自然灾害、加上干部的严重违法乱纪，是造成部分地方饿死人的直接原因。

关于人民公社的制度，是毛泽东反反复复强调的、要求的、和中央决定的。是集体所有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队为基础是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而不是公社所有制。而刘邓是搞公社所有制公有制。即使如此，主席依然对他们的问题作为认识上的问题，而非政治路线上的企图。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重要因素"。因为政治路线要各级干部尤其高级干部去认真贯彻执行。发现并不是认识上的问题而是政治路线上的企图时，也就是主席所讲的在《二十三条》上才引起警觉。实际上应是源于刘少奇抛开前《十条》，他自己另搞个《后十条》。《二十三条》是毛主席和刘少奇关于人民共和国制度及政治路线上的重要的分歧上的表现。这是另外话题。

对于主席的人民公社的思想，王任重日记中说："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毛泽东纠"左"遇到了阻力，而阻力又主要来自一些协作区主任和省委第一书记，他们思想不通，政策就很难贯彻。

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所有制道路，还是停留在蒋介石时代的小农单独私有化？蒋介石时代的小农单独私有化，就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佃农、赤贫的社会。维持这种状态，与共产党建立时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

如果只给农民土改分田，依然让农民单干维持小农生产，就不会去关心农民丰产不丰产，也不会去关心农民有没有种田，就不会去关心要改良稻种，更不会去海南建立国家良种培育、

研究、试验基地，也就不会大办农业学院，也不可能调动民众去大修水利的积极性，也调动不了。也会不会有旱涝保收田、北大仓，今天也不可能会全国大多数省种水稻了。更不可能有杂交水稻、袁隆平的高产稻了。那也不是饿死几千万人的问题，而是今天大多数人根本不存在在这世界上的大问题了。

还有，老、弱、病、残、孤苦伶仃的人，没有双亲，有些则为单亲，有些则人多劳动力少的家庭，他们有田地也是没法去种，这些人又谁来给他们吃呢？势必重新卖田卖地，重新成为乞丐。

在农业上不去的情况下，你能去开矿办工厂吗？开矿办工厂要招工人去干，主席时代达近亿职工，这么多人又吃什么呢？工人只生产工业产品，那是用为主，即使副食品及油脂化工也是农业和粮食为基础。农民才生产吃的产品。工人的扩大化是建立在农业的发展上。

毛主席在重上井冈山时对张平化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主席说："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一个一六五〇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

人民公社建立之初出现浮夸和共产风，是违反主席思想及中央决定，搞政绩、显示能耐、虚报成绩所致的。刘少奇、邓小平如果按中央决定贯彻执行，是不会出错的。因为《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明确了制度和分配方针。集体所有制是制度，按劳取酬是分配方针，问题，不必急于处理，也不必来一次明文规定。

相反，刘少奇、邓小平则把人民公社以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改为公社所有制，公有制。把按劳取酬改成按需"各取所需"，变成共产主义了，就必然发生一平、二调、三收款、四共产，"剪径"、抢产、虚报、浮夸、争名，也就在共产主义的招牌下粉墨登场了。并且把自留地、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等称为资本主义尾巴。并把大跃进应用到制度及政策上。

对于大跃进，本来是总路线下的口号而不是政策，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是全民的事，力争上游，其中多、快、好、省，这是大跃进的实质。这是没有错。不可能慢慢吞吞，或停滞不前。人民公社是因群众自发下由党组织领导，由个人分散生产变为集中生产，力量肯定大，这也没有错。问题是下面执行人如何执行才是决定因素。刘邓一线领导和部、大区、协作区、各省主要领导人，在大题目之下另搞一套，按主席所说的他们是"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偿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主席这里所说的"他们"难道不是刘邓吗？

"他们"为出于各自的意图，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由此泛滥成灾。正是此，主席三番五次强调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了让刘邓一线领导和部、大区、协作区、各省主要领导人执行这政策，召开了多次会议，如南宁会议、成都会

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上海会议、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

主席责问那些与会领导人，去年郑州会议，就吵这个问题，拉死人来压活人。凡是瞒产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调、三提款。

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按理是不会也不该在1960年发生饿死人的现象。因为除中央外，还有省、地市、县、社、大队、小队计六级组织，均为共产党领导。均有共产党干部。如果只某个小队全部没饭吃，大队干部会坐视不救吗？如果只某个大队全部没饭吃，公社干部会坐视不救吗？如果只某个公社全部没饭吃，县委干部会坐视不救吗？如果只某个县全部没饭吃，地委干部会坐视不救吗？如果只某个省全部没饭吃，那么中央的领导人会坐视不救吗？还有，各级行政干部连向邻近地区、省借也不会吗？这是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我们知道，坐视不救只有发生在万恶的私有化的剥削制度下，发生在自私自利的官僚身上，私有化的剥削制度下是无奇不有会发生各种事件。比如喝水会死人，而且水还会打得年青人伤痕累累，上厕所也会死人，同样粪便会把人打得伤痕累累而亡。

今天有人连三年自然灾害也否定。长篇大论，妄加推测，把蒋介石统治的22年想象成繁荣富强，样样有了，天天是人人酒足饭饱，衣丰足食，到处是现代化世界了。这正是中国知识人导致中国人民灾难不断的根源。

1959年到1961年是三年自然灾害。我亲身经历过。至今记忆犹新。1959年下半年水稻扬花前开始无雨，我村前小河水流很小了，不足形成灌溉之势。所以，晚稻基本上绝收。本期望1960年开春会好转，殊不知1960年开春后也处无雨状态，早稻栽不下去。村前小河彻底干枯。父亲在江底上挖了1米多深的坑才有水，挑此水浇菜。到1961年春节后，才雨水丰沛起来。整个天旱是一年半。

从1959年下半年起由于晚稻绝收，只有靠夏收的早稻。5%的公粮是交不了了。进入1960年开春后依然栽不了秧，这时国家提供回供粮，每户每次只能分到百来斤谷子，这是远不够吃的，只能米和红薯拌在一起煮，到1960年下半年干旱延续，公社干部已动员各生产队组织劳动力种旱作物和挖芭蕉根、葛根、马铃薯了。民众自己也想方设法节省粮食了，如一天吃二岁，半干半稀、煮粥（粥里也加入蔬菜）、山里种点粟米，进深山采野菜等。那时没有机加米，农村还是用磨和用木锤打米，细米糠也就掺野菜做成果条蒸食，以前的野菜现在很少了，也很贵了。还有就是吃冬瓜、南瓜、各种豆角及豆子充饥。这种日子一直到1961年夏收丰产而结束。这一年半，粮食全靠国家的回供粮。回供粮制度由此而延续到1965年，只要有灾害粮食产量不多，就有回供粮。现在有人否定自然灾害，说没有大旱，那是胡说八道。我们永新山多水多树多，本来是很少能够发生灾害的，但那时却发生了。

在正常情况下，只要有人非正常死了，就会有人背后向上反映。按右派所说三年中每年要饿死二千万人，就是15个全部受灾的省分配这饿死的二千万人，每个省也要摊到接近200万人，不可能是全省每个地区都会饿死人吧，一年365天，近200万死人尸体，领导岂不天天组织大量劳动力去埋人吗？如只有受灾最严重的5个省饿死人，则每省要摊到400余万人了。这个省地县的书记们，长们，每天要去埋多少人？而且是连续埋三年呀！别说这些书记们，长们会吓死，别的人不会去上告吗？

毛泽东时代饿死“数千万”人，怎么会无人告状？

毛泽东时代是个火红的年代。翻身作主人及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一直持续到重新分田单干时为止。一心为公、大公无私的主人翁精神一直持续到反毛的《--决议》公布时为止，干部群众不分上下尊卑的态势也一直持续到反毛的《--决议》公布时为止，社会上弘扬正气、疾恶如仇的情绪也一直持续到反毛的《--决议》公布时为止，各级县社干部都有在农村驻点工作队也一直持续到反毛的《--决议》公布时为止。所以，对社会上发生的任何不公事情，均会有不少人上告或直书中央的。

三年灾害时有 15 个省受影响，五个省受灾严重。而且，这 5 个受灾严重的省并非全省整个省都是天灾人祸，怎么会在死亡了数千万人时也无人向上告状或反映情况呢？按右派所说的各种数据中取中间值，三年也有五六千万饿死，平分每年饿死一千七八百万以上，每省每年饿死近四百万以上，这饿死的近四百万又是该省哪几个行署呢？除饿死的近四百万人，还有生老病死，还有意外死亡，加在一起算五六百万，因那时旧社会留下的结核病、麻风病人、梅毒病人、血丝虫病、恶性疟疾、血吸虫病不少，二三类传染病也不少，青枚素等抗菌药还少，儿童及婴儿的百日咳、破伤风、伤寒、狂犬病、小儿脊髓灰质炎、麻疹等疫苗还在陆续研制及生产中，那岂不天天死人，天天埋人也埋不过来吗？饿死人的省有绝门绝户的吗？

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那时的群众是可以直接向上告状的，？直接向上告状是不会被精神病的，那时也有把上访的人关押吗？直接向上告状是毛泽东给予人民的特权！

如果真饿死了右派所说的“五六千万”人，必定有很多人向上告状。那怕是某村子某生产队饿死了五六个人，或某公社某县饿死了上百人，那都会是个大数！一定有人会向上书写某县或某地饿死了大量人！一下子饿死几十或几百人不是称大量又是称什么呢？在人民已觉悟了的六十年代初，干部（那时只称干部为某某，不叫官员）想阻制民众向上告状，那只能是徒劳的，也绝对不敢阻制民众向上告状。要想阻制民众向上告状，那他的下场是悲惨的。因此，5 个省饿死“五六千万”人，岂不会激发民众砸烂公社，砸烂县委及县人委（那时县政府称县人委，县人民委员会）吗？连那些书记、县长、社长都会被打死！这些干部能调警察来维稳吗？来保他们吗？那时没有警察，也不要维稳，反而各村民兵有枪有弹，还有手榴弹，饿死这么多人，民众岂不反了！

比如，1951 年 4 月武汉市市二医院发生的“纪凯夫事件”。事情原是医院监委 XX 故意诬陷职工纪凯夫盗窃，公安局抓了纪凯夫。职工不服，上告到中南局，中南局又汇报给毛主席，毛主席抓住这个典型事件开刀，揭开“三反五反”运动的盖子。中南局根据中央精神，严肃处理了武汉市与“纪凯夫事件”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多位领导同志。1952 年 1 月，1949 年 5 月起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也因此事牵连受到当面警告处分并降职为副书记，谢邦治、吴德峰都被撤了职。在那时候，领导干部工作出现失误。打击群众，都要追究责任，甚至是严厉地追究责任。当然对工作失误或严重失误的同志，中央并非一棍子打死。1954 年长江发大水，武汉建立防洪指挥部，王任重担任指挥长，张平化担任副指挥长，工作不分日夜，几十个夜晚没有睡一个好觉，发挥群众的力量，使武汉没有受一点损失。1954 年 5 月张平化“官复原职”，重新担任了武汉市委书记。从张平化也因此事牵连受到当面警告处分并降职为副书记，谢邦治、吴德峰都被撤了职。可见不管你官有多大，工作出现失误。打击群众，都要追究责任，甚至是严厉地追究责任。

一个市医院的普通职工遭到监委领导的诬陷，而导致市委书记等人的降职撤职处分，在今天简直是天方夜谭了。上述事实说明，毛泽东时代是干部由群众监督，提倡、允许群众向上告状。在那时，基层（县级）以上的重大事件均要上报到中央办公厅，并可直接上报到中央办公厅，是党中央所决定了的。其次，还有留底存档。要知道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或某省某地多少人饿死了，只要解密县档案也可大白天下！

李庆霖写给主席的信，他老人家不仅亲自回信，而且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呀！这说明毛泽东不会阻止群众上访和告状的。既然群众可以上访和告状，三年自然饿灾害时饿死了五六千万人，那还了得！怎会无人告状呢？你饿死了五六千万人，必定会有不少人向上告状，甚至于很多人进京上告。但是，没有资料和传说证明有人去 进京上告饿死了五六千万人的问题。

1980 年以来到当前无数群众冒死进京上告或上访，充分证明了主席年代的开明制度。今天把突破层层防线到京上告或上访的群众又是如何处置呢？如果主席年代不允许群众进

京上告或上访，也就没有现在的无数群众冒死进京上告或上访而被关押及说成精神病有 1 亿人的事了。当前受冤的群众冒死进京上告或上访确实是精神病，因为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毛主席的共产党为人民说话办事的状态，完全忘了当今已不是以前了，这不是精神病又是什么呢？

再则，不管何地饿死了多少人，出事的县地级都要向上汇报并自己也存档备案。最后，均要到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手上。如每年饿死二千来万人，杨尚昆有胆子不上报毛主席吗？今天要不要来公开中央办公厅收到的文件呀？

还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查了不少档案，某些人的叛徒案就是红卫兵查出来的。文化大革命是打倒走资派，重点是刘少奇，而刘少奇是那时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一线负责人，人民公社时饿死了 " 五六千万 " 人之巨，不管毛派的红卫兵还是保皇派的红卫兵，尤其这前二个月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保皇派为主的红卫兵得势，以及后来这两派的红卫兵互相揭露、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时期，任何人的历史上的污点都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时都会拿出来作武器！还有，毛泽东在历史上从来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反而在历史上从来都是遭反对处于极少数人境地，在和刘邓彭等人的斗争里，那是两个司令部，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斗争，刘邓及其他被打倒的人在中央各会上，不会拿这饿死了 " 五六千万 " 人之巨来打倒毛泽东吗？如果是毛泽东领导大跃进及人民公社，搞浮夸，放卫星，饿死了 " 五六千万 " 人之巨，党内不把毛泽东赶下台并追究其责任吗？尤其是在渴望最高位时，他会不利用此如此之好的机会？从九死一生，历经党内沉浮的人没有一个会是省油的灯！

事实恰恰相反，文化大革命时期并没有发现饿死 " 五六千万 " 人之巨的任何一点史料。只有因为毛刘的公社所有制之争，也有河南信阳饿死了人。也没任何人披露有六十年代的万人坑。这令右派失望。

还有的证据及解开办法是，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人了，那也见于主席文集中，也只是唯一的记载。并且也是群众告发的，是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所造成的。当时河南受灾最严重，历史上均如此，因黄河的原因，河南十年九灾非旱即涝。而信阳地区有多少人口呢？死光了吗？在 1966 年河南省有 10 个地区 14 个市，110 个县，计 5032 万人，是包括党政群及工厂市民在内的总人口。请问河南当时农民多少？党政群及工厂市民是多少？从 1960 年饿死人到 1966 年才 5 年余，河南省有 5032 万人，请问河南省饿死人之前有多少人呢？谢谢不要拿篡改后的统计局数据说事，那是政治目的需要的编造，狗屎不如。把今天已发黄了的原公安局的户籍及每年上报的人口就知道了，1960 年农村还发了布票，那是按真实人口发布票，不可缺一，也不可多发。人口数据就出来了。

如果今天有诬告罪或篡改历史罪，不管任何人任何职务，违法与民同罚，那么，还会有人以身试法吗？悲哀在于无此立法。

人民公社制度，难道不是比个体小农生产更先进的优越制度吗？结论是肯定的。既然是更先进的优越制度，为什么邓等人要在 30 年前否定并恢复数千年一贯的个体小农生产呢？精英们说人民公社制度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饿死了 " 数千万 " 人。我们要问的是，个体小农生产会使生产力得到发展，而集体生产会使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那么数千年一贯的个体小农生产的生产力在 1949 年时发展到了何程度的水平？个体小农生产既会使生产力得到发展，又为何在 1949 年前总是民不聊生，民众卖儿卖女？近九万座水库及很多的农场、垦殖场又是什么力发展起来的？北大荒为什么会荒无人烟？长江以北为何大多数地方从来没稻米生产，靠土豆、高粱、玉米为主粮？

中国今天大多数人能吃稻米、面粉为主粮，就得益于毛泽东的 28 年的人民公社制度，得益于大集体及公有制。

关于污蔑毛主席共产主义问题，倒底是谁提出刚解放才八九年就进入共产主义？殊不知在解放前中国还是个东亚病夫呀，连个象样的工业基础也没有呀，除有资本家办的几个面粉

厂、纺纱厂、火柴厂、船坞、侯德榜的制碱厂、及电报局、汉阳军械厂、贵阳飞机修理厂、小巢丝厂等外，还有什么工业呢？江南制造局也只修理小船而已。三大改造到 1957 年才完成工商业改造，柴油（洋油）还靠进口，就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岂不是疯了不成？！可肯定不是主席提出！对此，主席在会上严厉指出：自建立人民公社以后，虽然很多事情出在县、社一级。

出在县、社一级，与刘、邓的指导思想违背主席的政策方针是分不开的。如果一线刘、邓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政策，认真贯彻执行了主席的思想及批示，如果一线刘、邓没有别的思想，那么也就不会有在集体所有制下发生私有制下发生饿死人的事件了。我们随便看看从 1958 年底起的时间里，主席一直在批评刘、邓等人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穷过渡，浮夸风、放卫星风，而看不到同期有刘、邓等人有关于反对“一平二调”、“三”共产风”，穷过渡的任何一篇文章及指示，这又是说明了什么呢？

中国的那些文人为什么把刘、邓的言、行栽赃陷害到毛泽东身上呢？这些人又从刘邓身上得到了什么好处而要这样做呢？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反动派为什么要反毛栽赃陷害毛泽东而拥护 X、X，美化 X、X 呢？这些人反毛是赤裸裸，拥护 X、X，美化 X、X 也是赤裸裸。不过，恰恰充分说明了他们这些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反动派及走狗的利益的代理人，代表了反共、反社会主义和复辟剥削制度的政治目的。也符合了道不同则不足与谋，道同则与谋矣的古训。

说毛泽东建国有功是因为毛泽东为他们打下了天下！说毛泽东治国有过是毛泽东不让他们当官做老爷，说文革有罪是因为主席号召群众起来造反有理、打倒阎王、打倒皇帝、解放小鬼、解放小人物、人人平等。

人民公社的 1960 年饿死人的责任在于刘少奇推行他自己的公社公有制，否定等价交换。否定队为基础的集体三级所有制造成。

来源：<http://www.wywxwk.com/Article/lishi/2011/04/217544.html>

解开 60 年代人口变动真相，破解国家统计局户籍统计数据矛盾之谜

作者：孙景泽

（本文原文是一篇学术论文，使用了较多的数学语言和推导，篇幅也较长。为了便于更多的读者能够了解本文的观点，写了这篇压缩稿。）

本文提要

一、由于我国工业发展和生产大跃进，1956 年至 1959 年期间出现了从农村到城市人口大迁移，在大迁移中出现重报、虚报户籍人口 1144 万人。这些重报、虚报的户籍在 1960 年至 1964 年期间被注销。

由于遇上经济困难，我国在 1960 年 9 月至 1964 年期间进行了城市人口大精简工作，形成了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在大迁移中有 1510 万人口漏报了户籍。上述漏报户籍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在 1970 年至 1979 年补报了户籍。

由于上述原因，造成 1960 年至 1964 年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 2654 万，这是我国六十年代初户籍人口非正常大幅度减少的根本原因。这一减少与人口死亡无关。

二、1960 年我国户籍人口统计比 1959 年减少 1000 万人，其中 695 万是由人口户籍迁移的原因造成的，与人口死亡无关。由于 1960 年漏报出生人口 420 万，所以 1960 年实际人口比 1959 年至少增加 115 万。

三、1983 年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通过汇总全国户籍登记得到的真实数据，没有经过人为的修改和伪造。数据中的所有人口数字都是户籍数字，所出现的所有矛盾都只是表面上的，都可以用本文的方法加以合理的解释。六十年代初我国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包含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死亡率之中。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1960 年我国人口死亡率因出

生人数漏报应当下调，具体下调幅度有待进一步研究。

§1 引言

1983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1949—1982 年期间我国每个年度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以下简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我国六十年代初出现了人口大幅度非正常减少的情况，其中最突出的是 1960 年我国人口比 1959 年减少 1000 万人。

国内外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若干研究，其中一些人研究的结果认为我国六十年代初出现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现象。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对上述研究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那一时期人口出现数千万“非正常死亡”的观点在许多专著和文献中被采用。但也有许多人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以上研究结果提出了质疑，甚至有人指责 1983 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伪造”。

六十年代初我国是否有数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这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件重大的历史公案。这一历史事件虽然过去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但是，这一事件的真相应当在当代解决，我们不当把它留给历史，留给后人。

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我们的观点。

§2 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出现的重大矛盾

我们首先利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对我国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整个这一期间人口非正常变动的情况做一个初步的分析。由于这一时期我国国际移民人数极少，所以在本文中我们不考虑国际移民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在不考虑国际移民的情况下，当年岁末人口数减去上一年岁末人口数应当等于当年出生人口数减去当年死亡人口数。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出现的重大的令人难以解释的矛盾就是：在 1957 年到 1979 年期间中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我们把这一差异称为某年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这个数在本文的研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即

某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 = (当年岁末户籍人口数 - 上一年岁末户籍人口数) - (当年户籍出生人数 - 当年户籍死亡人数)。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大于 0 表示非正常增加，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小于 0 表示非正常减少。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们把 1954—1982 年期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按绝对值）超过 100 万的所有年度列表如下：

	岁末人口数 (万人)	自然增长率 (%)	人口非正常变动数 (万人)
1957	64653	23.23	344
1958	65994	17.24	215
1959	67207	10.19	534
1960	66207	-4.57	-695
1961	65859	3.78	-598
1962	67295	26.99	-361
1963	69172	33.33	-397
1964	70499	27.64	-603
1970	82992	25.83	207
1971	85299	23.33	344
1973	89211	20.89	192
1975	92420	15.69	123
1976	93717	12.66	119
1977	94974	12.06	119
1978	96259	12.00	138
1979	97542	11.61	158

表一

从表 1 可以看出，我国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期间大多数年度的人口数，都出现了数量很大的非正常增加或减少的情况。这就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出现的令人难以解释的重大矛盾。

§3 一个被忽视的关键因素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在我国，每一个户籍登记的基层单位，每年都要依据户籍登记的资料，统计出本辖区当年出生人数、死亡人数、迁出本地区人数和迁入本地区人数，并根据公式

$$\text{当年岁末人口数} = \text{上一年岁末人口数} + (\text{当年出生人口数} - \text{当年死亡人口数}) + (\text{当年迁入人口数} - \text{当年迁出人口数})$$

计算出本辖区当年岁末人口数，然后将以上数据在规定的时间内逐级上报，最后由国家统计部门汇总全国所有地区的以上资料，并计算出每个年度全国岁末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等数据。所以要根据这些数据研究我国六十年代人口非正常变动问题，就必须从“户籍登记”这个最基本的环节入手。

实际人口数指某时刻我国真实生存的人口总数。户籍人口数指某时刻我国通过户籍登记的方法汇总而得到的人口总数。

在理想的情况下，户籍人口数等于实际人口数。但是在实践中的情况却往往不是这样的。

例 1. 假定 1960 年底我国某城市一个工厂关闭，其来自农村的职工一万人被精简返回农村。他们都在当年 12 月下旬办理了城市户口迁出手续，又都在 1961 年 1 月初返回原籍，并在农村原籍办理了户口迁入手续。

显然，这一万人在 1960 年底（12 月 31 日 24 时）是没有户籍的，他们不会被计入到

1960 年底的我国户籍人口总数中。这样我国 1960 年底的户籍人口总数就会因此减少一万人，从而导致这一年我国人口非正常减少一万人！

由这一例子我们可以确认两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1.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显示的人口非正常减少，是指“户籍登记的人口数”非正常减少，正像例 1 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减少可能只是“户籍”上的“数字”减少，并不意味着一定存在着实际人口的真正减少。而这正是人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普遍存在的一个重大的盲区。

2. 国内户籍迁移可以对户籍人口数产生重大影响。国内外一些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使用了一个基本假定：国内户籍迁移对户籍人口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例 1 说明了这一基本假定是错误的。正是由于忽视了国内户籍迁移可以对户籍人口数产生重大影响这一关键因素，这些研究难以反映那一时期我国真实的人口变动情况。

§4 国内迁移、出生与死亡漏报对人口非正常变化的影响

按照我国法规规定，户籍登记与人口数有关的内容是：出生登记，死亡登记，迁移登记（迁出登记和迁入登记）。我们首先讨论由迁移登记产生的人口非正常变化。

例 2. 假定王×1963 年从某市迁出并注销户口，返回农村原籍；他没有立即办理户口迁入手续，而是直到 1970 年才办理这一手续。

这种情况称为迁移漏报。容易知道，这一事件导致我国户籍人口 1963 年底非正常减少 1 人，1970 年底非正常增加 1 人。

例 3. 假定张×在原籍有户籍，1957 年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在原籍没有注销户口的情况下又在迁移后的地方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即他在两个地方同时都有户籍）。到 1960 年，这两个户籍之一被注销。

这种情况称为迁移重报。容易知道，这一事件导致我国户籍人口 1957 年底非正常增加 1 人，1960 年底非正常减少 1 人。

例 4. 假定赵×为了某种需要，在 1957 年伪造了户口（即对根本不存在的人登记了户口），在 1960 年伪造的户口被注销。

这种情况称为迁移虚报。这种情况产生的作用与迁移重报完全一样。

我们再讨论户籍登记的另外两项内容——出生登记和死亡登记。

例 5. 假定某人 1962 年死亡，没有在当年注销户口，到了 1968 年才注销户口。

这种情况称为死亡漏报。

例 6. 假定某人 1962 年出生，没有在当年以出生登记户籍，到了 1964 年才以出生登记户籍。

这种情况称为出生漏报。

我们可以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下列重要结论：

基本结论：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纠正），与出生和死亡的漏报（及其补报）行为无关。

这一结论表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所出现的我国六十年代初人口非正常减少，不可能由人口的死亡漏报引起的。然而，这些数据中出现的那些“难以解释的矛盾”都可以用户籍迁移中的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解释。

§5 我国五十至七十年代人口非正常变动的理论分析

我们首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出 1954 年—1982 年期间每一年度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和每年年底的人口非正常变化累计数，这里每年年底的人口非正常变化累计数是指从 1954 年年底起，到这一年年底期间的每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之代数和。（因为 1954 年我国进行了首次人口普查，这一年的数据可以作为标准。）

	岁末户 籍人口 数 (万人)	人口自 然增长 率 (%)	人口正 常变 化数 (万人)	人口非正常变化累 计数(万人)
1954	60266	24.79		0
1955	61465	20.32	-38	-38
1956	62828	20.5	89	51
1957	64653	23.23	344	395
1958	65994	17.24	215	610
1959	67207	10.19	534	1144
1960	66207	-4.57	-695	449
1961	65859	3.78	-598	-149
1962	67295	26.99	-361	-510
1963	69172	33.33	-397	-907
1964	70499	27.64	-603	-1510
1965	72538	28.38	9	-1501
1966	74542	26.22	76	-1425
1967	76368	25.53	-100	-1525
1968	78534	27.38	45	-1480
1969	80671	26.08	61	-1419
1970	82992	25.83	207	-1212
1971	85299	23.33	344	-868
1972	87177	22.16	-33	-901
1973	89211	20.89	192	-709
1974	90859	17.48	74	-635
1975	92420	15.69	123	-512
1976	93717	12.66	119	-393
1977	94974	12.06	119	-274
1978	96259	12.00	138	-136
1979	97542	11.61	158	22
1980	98705	11.87	-2	20
1981	100072	14.55	-79	-59
1982	101541	14.49	8	-51

按照上表，我们把 1954 年至 1982 年期间每年年底的人口非正常变化累计数

绘制成如下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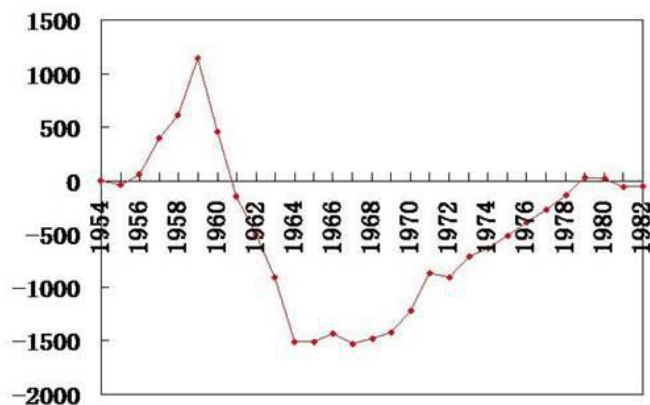


图 1

利用数学方法解读表 2 和图 1(解读方法用了较多的数学推导，从略)，可以得到以下推断(以下推断中的数据均以 1954 年底为 0 基准)。

推断 1. 1955 年—1959 年期间(主要是 1957 年—1959 年)，我国有 1144 万人在迁移中重报、虚报了户籍；

推断 2. 1960 年—1964 年期间上述 1144 万重报、虚报户籍人口的户籍被注销；

推断 3. 1960—1964 年期间我国有 1510 万人在迁移中漏报了户籍。

推断 2 和推断 3 所叙述的情况导致了这一期间我国户籍人口非正常减少 2654 万人。

推断 4. 1965—1979 年(主要在 1970—1979 年)期间推断 3 中漏报户籍的 1510 万人中的绝大多数重新申报了户籍。

这样我们从理论的角度，对我国五十至七十年代人口非正常变动问题做了一个回答。这里，我们完全没有涉及产生这些非正常变动的社会原因。在下一节中我们将简要论述我国这一时期产生人口非正常变动的社会原因。这些社会原因产生的作用，正好与我们上面从纯理论的角度做出的结论高度吻合。

§6 我国五十至七十年代人口非正常变动的社会原因探析

在本节中，我们以我国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为背景，简要论述了这一时期我国人口产生非正常变动的社会原因。需要指出，全面完整地论证这一问题，是需要一部长篇专著才能完成的。在目前这一篇幅不长的文章中，我们只能给出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个简要的叙述。

1. 1956—1959 年期间人口非正常增加的原因

1956 年—1960 年期间，由于我国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使得大批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市镇，成为工业战线的职工。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形成了一只数量巨大的从农村到市镇的户籍迁移大军。根据我国《1983 年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到 1956—1959 年市镇和农村人口的变化情况。

表 3 1956—1959 年市镇人口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市镇岁末 户籍人口 数	人口自然 增 长 率 (%)	人 口 自 然 增长数	户 籍 人 口 增长数	户籍迁 移人数
1956	9185	30.44	266	900	634
1957	9949	36.01	345	764	419
1958	10721	24.33	251	772	521
1959	12371	18.51	214	1650	1436

表 4 1956—1959 年农村人口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农村岁末 户籍人口 数	人口自然 增 长 率 (%)	人 口 自 然 增长数	户 籍 人 口 增长数	户籍迁 移人数
1956	53643	19.4	1036	463	-573
1957	54704	21.74	1178	1061	-117
1958	55273	15.91	875	569	-306
1959	54836	9.17	505	-437	-942

在表 3 和表 4 中，人口自然增长数是指用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出的人口数，户籍人口增长数是指当年岁末人口数与上一年岁末人口数之差，户籍迁移人数=人口户籍增长数-人口自然增长数，这也就是当年市镇与农村之间的户籍迁移人数，正数为迁入，负数为迁出。由此得到这四年市镇与农村之间的户籍迁移情况，见表 5，最后一列的含义我们下面即将说明。

表 5 1956—1959 年市镇与农村之间迁移情况（单位：万人）

	市镇户籍迁 移人数	农村户籍迁 移人数	
1956	634	-573	61
1957	419	-117	302
1958	521	-306	215
1959	1436	-942	494
合计	3010	-1938	1072

由表 3 可知，1956—1959 四年中，我国市镇人口增加合计 4086 万，其中自然增加（由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产生的增加）为 1076 万，这两个数之差 3010 万（表 5 第二列的合计数）就是这几年由农村迁入到市镇并且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口数。这与当时我国确实出现的大批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历史事实是相符的。

另一方面由表 5 知道，1956—1959 四年中，我国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农村办理了户籍迁出手续的人数合计为 1938 万人。这个数字与上面所述的同期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数 3010 万人之间出现了 1072 万人的差。这个差额说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在这四年中有 1072 万人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办理户籍迁出手续，即这些人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其中有些人是虚报户籍）。（表 5 最后一列是每年产生的这类人口的数字。）

以上是农村与市镇之间的户籍迁移造成重报、虚报户籍的情况，由于市镇与市镇之间、

农村与农村之间的户籍迁移也可以造成重报户籍的现象，所以全国这一期间产生的重报、虚报户籍的人数要大于 1072 万人。这与§5 推断 1 中这一期间重报，虚报户籍的人数为 1144 万人，是高度相符的。

这样我们知道，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使得 1956—1959 年期间共产生迁移重报、虚报人口 1144 万人。这就论证了§5 推断 1。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表 4 中 1959 年农村户籍人口增长数出现了负数（-437 万），该表最后一列的数字也全部是负数。这是由于户籍迁移的原因引起的，这绝不表明这些人已经“非正常死亡”了。但是一些文献在研究我国那一时期人口非正常变动时，却把类似这样的数据解释为多少万人“非正常死亡”了，这显然是荒谬的。

2. 1960 年—1964 年期间户籍人口非正常减少的社会原因

由于我国经济状况在 1960 年出现重大困难，中共中央做出精简市镇人口的重大决策。从 1960 年 9 月起，我国大规模精简职工和市镇人口的工作开始启动。

下表是 1961—1963 年我国市镇和农村人口迁移情况，这个表是用与表 5 同样的方法得到的。表 6 1961—1963 年市镇与农村之间迁移情况（单位：万人）

	市镇户籍迁移人数	农村户籍迁移人数	
1961	-498	-110	-608
1962	-1379	1018	-361
1963	-448	40	-408
合计	-2325	948	-1377

由表 6 可知，在 1961—1963 年这三年因为精简市镇人口而迁出市镇并办理了迁出手续的人口数合计 2325 万人。这与当时我国确实出现的大批市镇人口迁移到农村的历史事实是高度相符的。但是同期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口合计却只有 948 万人。这两个数据出现了 1377 万人的差。这个差额说明了：有 1377 万人已经迁出市镇并办理了户籍迁出手续，但并没有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

这仅仅是 1961—1963 年的情况，如果考虑到 1960 年和 1964 年，这五年中共有 1510 万人漏报户籍，就应该是可信的了。这样我们就论证了§5 推断 3。

由本节上面的讨论知道，1956—1959 年出现的迁移重报、虚报户籍人口产生于 1956—1959 年大批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 1960 到 1964 年大规模的精简市镇人口工作中，精简的重点恰恰就是 1956—1959 年这些从农村迁移到市镇的人口。随着这些人员返回农村，双重户籍现象在 1964 年就被基本消除了。这就论证了§5 推断 2。

1960—1964 年期间，既出现了大量漏报户籍的过程（漏报户籍总数 1510 万人），又出现了大量的重报、虚报户籍现象被逐步消除的过程（被消除的户籍总数 1144 万），这两方面合计 2654 万人。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和在一起，造成了这一时期我国户籍人口数大量非正常减少！

关于 1960 年的情况，我们将在§7 中特别讨论。

3. 1970—1979 年期间户籍人口非正常增加的社会原因

1964 年，虽然我国户籍人口大迁移基本结束，却留下了 1510 万漏报了户籍的人口，他们虽然从市镇迁移到农村，却没有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甚至可能人还留在市镇。

随着我国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工业战线和市镇其他部门又需要补充大量的职工，在 1960 年到 1964 年精简到农村的人员也希望返回市镇。这样在 1965 年—1979 年（主要是在 1970—1979 年）这漫长的时间内，各级政府部门拿出很大的精力解决这一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这样在 1960 年到 1964 年户籍大迁移期间漏报了户籍的那 1510 万的人口中的绝大

多数都在 1965—1979 年，主要是 1970 年到 1979 年期间或者返回了市镇，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这是主要的，大多数的），或者在农村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这些人的人数为 1532 万（即表 2 中所列出的这些年度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之代数和），这个数字与§5 推断 4 中的 1510 万是高度吻合的。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论证了在 1960—1964 年期间确实有 1510 万人漏报了户籍。这样我们论证了§5 推断 4。

1979 年以后，每年的户籍人口再也没有出现过大幅度非正常增加或减少的情况，这表明由 1956 年开始的户籍人口大幅度的非正常增加或减少的情况到 1979 年基本结束。

§7 1960 年户籍人口非正常减少的进一步分析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60 年我国人口（实质上是户籍人口）比上一年减少 1000 万。通过计算可知，这一年的非正常变化数为 -695 万人，这一部分数字是由户籍迁移登记中的原因产生的，另一部分（-305 万人）则是由户籍的出生和死亡登记产生的。在研究我国 1960 年户籍人口净减 1000 万的原因时，必须把这一数字分解成以上两部分，才能得到接近于历史真相的结论。下面我们分别讨论一下这两个数字。

1. 关于人口非正常变化数 -695 万人产生的原因

根据本文§4 的基本结论，这部分人口（实际上是户籍人口）减少只能是由于户籍迁移原因引起的，它不可能是由于死亡漏报引起的。

从人口迁移的角度讲，1960 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第一，1960 年 1 月我国开始了新的大跃进，又有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市镇。第二，由于经济遇到重大困难，1960 年 9 月起，精简职工和市镇人口的工作开始启动，人口又开始从城市迁移到农村。由于以上原因，这一年我国户籍迁移出现了复杂的局面。给出这个问题详细的研究，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这里我们只能给出一个轮廓性的叙述。

我们知道，在 1956—1959 年期间，在市镇和农村之间的户籍迁移中产生的大量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072 万人），由于 1958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落实，这些人中许多人的双重户籍或虚假户籍在 1960 年被注销。这些人的人数是 695 万的一部分。

由于我国经济遇到困难，从 1960 年 9 月起，开始启动精简市镇人口的工作，合计约有 1000 万左右的人以各种形式由市镇下放和精简到农村。这些人中有许多人的户籍迁出市镇，但是没有在当年办理农村户籍迁入手续（我们特别注意到，上述下放和精简工作是在 9 月份之后开始的，当他们被确定下放和精简，并办理市镇户口迁出手续后，时间已经接近年底，所以他们在当年没有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是很自然地事情，可以参见本文例 1）。这些人的数目也是 695 万的一部分。

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和其他与户籍迁移有关的原因联合作用，造成了我国 1960 年户籍人口非正常减少 695 万人。

2. 关于 1960 年户籍人口出生率应当调整的问题

在扣除了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之后，1960 年户籍人口比 1959 年的减少数只有 305 万。这一数字是由人口出生和死亡登记产生的。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1960 年我国人口出生率计算，1960 年我国出生人数为 1392 万人。但是，按照我国 2000 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 1960 年出生并且 2000 年仍然生存在国内的人数为 1468 万。这表明 1960 年有明显的出生漏报的现象。

按照 2000 年的数据，2000 年仍然生存在国内的出生于 1960 年的人数 1468 万人，出生于 1959 年的人数为 1306 万人，这两个数字之差为 162 万。由此可以合理的推出 1960 年实际出生人数比 1959 年应该多 162 万。

按照《1983 年统计年鉴》的数据，1959 年出生 1650 万人，如按照 1960 年实际出生的人数比 1959 年多 162 万调整 1960 年的出生人数，则 1960 年出生的人数应当为 1812 万，与《1983 年统计年鉴》计算出的 1392 万比较，漏报人数为 420 万。如果考虑到这一因素，

那么我国 1960 年人口数比 1959 年就不是减少 305 万，而是增加了 115 万！

关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1960 年我国户籍人口死亡率，我们认为应当向下调整(这一问题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予以讨论)。这样，我国 1960 年人口数比 1959 年增加的数量，就应当大于 115 万。

§8 关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我们认为，1983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即《1983 年统计年鉴》）是通过汇总全国户籍登记得到的真实数据，没有经过人为的修改和伪造。数据中的所有人口数字都是户籍数字，所出现的所有的矛盾都只是表面上的，都可以用本文的方法加以合理的解释。

本文中所使用的全部原始数据均取自国家统计局《1983 年统计年鉴》，除了在§7 中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对年鉴中的 1960 年出生人数作了调整外，我们没有对其余数据进行任何调整。

来源：<http://www.wywxwk.com/Article/lishi/2011/07/215649.html>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专题

第一个阶段：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

这个阶段可以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预备阶段，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文为起点，由前一阶段的学术批判转入政治批判。中心内容是批判彭真、陆定一搞的那个保护右派，压制左派的“二月提纲”。以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撤销彭、罗、陆杨的党内中央领导职务为结束。这一阶段的重要内容包括：

- （一）围绕批判《海瑞罢官》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 （二）处理罗瑞卿事件
- （三）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
- （四）中共中央批发《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第二个阶段：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六九年四月

这个阶段，是炮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阶段的阶段，以北京大学哲学系第一张大字报为起点，中心内容是批判刘少奇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二月

逆流”，掀起一九六七年一月的革命风暴，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以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为结束。这一阶段的重要内容包括：

- （一）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制订“十六条”
- （二）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各条战线各省市区的文革运动普遍开展
- （三）工矿农村文革运动兴起、中央制定工矿农村文革的两个十条
- （四）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上海等六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 （五）一九六七年二月的逆流，大闹怀仁堂，支持纵容一些省军区镇压群众运动

（六）一九六七年七月武汉军区部分官兵纠集武汉“百万雄师”扣押中央代表

（七）一九六七年七、八、九三个月，毛泽东巡视华北、中南和华东并作重要指示，促进革命大联合，批判极左思潮，推动青海、内蒙、天津、江西、甘

肃、河南、河北、湖北、广东、吉林、江苏、浙江、湖南、宁夏、安徽、陕西、辽宁等等十七个省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八）一九六八年七月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推动各省市加速成立革委会的步伐，云南、福建、广西、西藏、新疆等等五个边疆省市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九）一九六八年十月召开中共八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十）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批准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第三个阶段：一九七〇年九月至一九七三年十月

这个阶段是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阶段。以九届二中全会林彪集团发动突然袭击为起点，中心内容是批判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突然袭击，企图打倒一个中央常委和三个政治局委员，这个阴谋被揭露以后，他们又策划实施“五七一”反革命政变，并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叛逃国外，至一九七三年九月召开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结束。

这一阶段的重要内容包括：

- （一）九大前后，林彪集团逐渐形成，围绕修改宪法的斗争
- （二）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突然袭击毛泽东反潮流
- （三）批陈整风，中央召开华北会议、批陈整风汇报会
- （四）林彪集团策划实施“五七一”反革命阴谋
- （五）林彪等人叛逃国外
- （六）开展批林整风
- （七）召开中共第十次代表

第四个阶段：一九七〇年十月至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这个阶段是批评领导层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的阶段。以一九七〇年十月清查“五一六”为起点。中心内容是批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至一九七四年七月筹备四届人大结束。

这个阶段的重要内容有：

- （一）批评清查“五一六”搞扩大化
- （二）批评批林整风中强调批极左思潮
- （三）批评外交工作中出现的右倾错误
- （四）批评批林整风中滋长的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思潮

第五个阶段：一九七五年一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

这个阶段是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阶段。以一九七五年一月召开四届人大为起点。中心内容是批判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大搞全面整顿，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至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门事件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结束。

这个阶段的重要内容有：

- （一）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 （二）围绕批判经验主义问题的争论，右派借机整左派
- （三）邓小平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大搞全面整顿
- （四）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
- （五）处理天安门事件

关于毛泽东文革前有实权“一呼百应”的问题

评：

什么都不懂，却要出来指点江山。

驳：

请看这段《“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作者“六四”事件后流亡美国，是站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写的，但通过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我们仍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某些真相）摘录：

一九六二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向全党全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就在这一年，江青找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但当她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时，却遭到了拒绝。江青当然不甘心。一九六四年……毛泽东指示将用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三十九个《文学艺术资料》发到全党县一级单位，其中包括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兼副市长邓拓等人编写的《燕山夜话》等材料。然而，这一举动并没有推动起对《海瑞罢官》的批判。

江青一心要打开批判的缺口，但是她看出，在北京是攻不下《海瑞罢官》的。于是，她秘密到上海找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合作，借上海攻北京。一九六五年初，江青在上海市长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张春桥拍板成交，决定由上海《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执笔写作……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抛出了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最后一部分出言不逊地写道“《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但是由于《文汇报》的主要读者是文化人士，又受到发行范围的限制，因此，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接着，毛泽东要求各地报刊转载。

彭真当时是北京市市长。他对事先不打招呼就发表姚文元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文章表示不满。中宣部及新华社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则认为，姚文元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联系“单干风”、“翻案风”很勉强。……彭真针对张春桥、姚文元说：“对姚文元文章的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上海周信芳也演过《海瑞上疏》，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以攻为守，

拒绝转载姚文元文章。

两个星期过去了，北京等地报刊拒不转载姚文元文章。毛泽东为了驾驭局势，下令：出小册子！十一月二十四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征求订数。北京市新华书店奉市委之命不表态，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二十九日才在来自上面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征订，但是拒绝发行。

在双方僵持的局面下，身为总理的周恩来出面了。北京市委专门开会讨论了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彭真不得不表示同意转载……

按照彭真的意见，《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有意安排刊登了诸如北京市委书记兼副市长邓拓用笔名向阳生发表的《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化名李东石的文章《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等长篇文章……有些文章还尖锐地批评了姚文元无限上纲的错误做法。

彭真还利用北京市委宣传部办的《文艺战报》连出了几期增刊，刊登了某些学术权威反驳姚文元文章……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谈话时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次日，毛泽东将上述意思向康生、彭真等人说了。彭真对把吴晗同彭德怀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表示义愤，他说：“我们经过调查，未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并为此与毛泽东发生了顶撞。

……

此后，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彭真，说北京市委“一针也插不进去，一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

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彭真具体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

……

转“仇越”的评论：

看了上述《“文革”史》摘录，不由得发出一声叹息：毛泽东苦也！身为中央主席的他，为了推行革命路线，在中央所在地，竟连一篇文章也发表不了，一本小册子也发行不了，一个小小的北京市新华书店也掌控不了。回想抗日战争时期，在他的领导下，人民军队由二万多人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万人，消灭了五十多万日军和一百多万伪军，回想解放战争时期，在他的统帅下，仅用三年时间，击败了四倍于我军的四百多万国民党军队，可1965年的他竟如此举步艰难，当了二十二年中央主席的他，在共产党执政十六年后，却是那么个处境。何也？一个彭真竟敢不断地与他对抗？如没有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等人为他撑腰，他能如此？说是将《汇报提纲》向毛泽东汇报，而在毛泽东明确表态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后，还胡说“根据汇报中毛泽东讲话的精神以及自己对于汇报内容的理解”，起草中央批转《汇报提纲》的批语，电传北京，政治局在京的常委传阅同意后“当天便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到全党”。这是什么汇报？还不是装装样子，给毛泽东下套子？说白了，你毛泽东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还是照发。

彭真为何如此容不得姚文元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姚文元只不过提到“单干风”、“翻案风”而已，你干嘛害怕？你干嘛大动干戈，竟然发动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亲自写文章进行围剿？这只能说明你心中有鬼。你知道姚文元的文章触动着你那“一针也插不进，一水也滴不进”的北京市委“独立王国”，而且可能触动更大的。你那个由北京市领导人邓拓、吴晗、廖沫沙组成的“三家村”，用旁敲侧击、含沙射影的手法，炮制了《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多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你“对事先不打招呼就发表姚文元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文章表示不满”，而“三家村”发表了那么多文章，又跟谁打过招呼？毛泽东针对中宣部的同样言论说：“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你彭真口口声声说《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以毛泽东的洞察力还看不出“要害是罢官”，是反党吗？吴晗的《论海瑞》正好在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后发表，发表前送胡乔木审订，作为理论家的胡乔木一眼就看出不对劲，在结尾处加了一段骂“右倾机会主义”的话。《“文革”史》说：“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时，仍然以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结尾，用以划清海瑞与彭德怀的界线，并特别注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不是什么海瑞’。”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欲盖弥彰吗？海瑞是骂皇帝，不是骂官。而彭德怀是“官”，是国防部长。海瑞骂皇帝怎么变成骂官了？《“文革”史》说，不久，吴晗“破门而出”，写成了《海瑞罢官》的剧本。吴晗为什么对海瑞的“研究”那么感兴趣呢？当时，党内都很清楚，彭德怀问题关系到对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的评价问题。吴晗当然也很清楚，一旦为彭德怀翻了案，就让你毛泽东背上个大大的黑锅，直不起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你毛泽东进而靠边、打倒。而作为伟人的毛泽东更清楚，面对“翻案风”、“单干风”、“合二而一论”、“利润挂帅论”以及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文学等方面的封资修问题，认识到这些问题的根子所在，他选择了《海瑞罢官》作为突破口，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来源：<http://www.szhgh.com/Article/red-china/mzd/maoshidai/22310.html>

关于反右派运动的发展及其扩大化的问题

驳：

反右派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掌握的。是他们提出要求按比例打右派，主席说百分之一、二、三，他们说百分之五都不够，有百分之十。邓小平在中央党校讲话，提出按百分之十的比例打右派。后来不是每个单位都按百分之十的指标打右派吗？依据就在这里，这个是当时有文件的。现在有些人把反右扩大化的错误都归到主席身上，这是不对的。就是反右派，主席也没有想那么大规模，按指标打右派不是毛主席说的。这里面还有一个具体的执行操作问题。用后来划定的标准去衡量已经过线的一些鸣放，就已经难免出现一个扩大化的问题了，而有些具体操作的人还犯官僚主义作风，还借机打击报复正当给党组织和个别党的领导提合理意见的人。可以说，要是根据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原始讲话精神去衡量鸣放的言论，那么就没有扩大化的问题了。而要是具体操作者不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都像主席那样没有私心，那就更没有扩大化问题了。主席讲过一些人不能打成右派，可是邓小平还是把他们打成右派了。毛主席说的话都不管用了。所以，扩大化不能把责任都推给主席。毛主席当时说过，全国不过4、5千个右派。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搞，右派最多也就是这个数字。综合以上情况就是，标准出来晚了，其他具体执行人又搞打击报复，又搞官僚主义，又搞高指标按比例打……最后就搞成扩大化了。

（根据《戚本禹回忆录》精简得来）

理论时可引用的资料：

反右派总要一个指导文件吧？解铃还须系铃人，党中央就用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来做文章。毛主席是尊重党内其他同志意见的，也是遵守党内一贯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他也许是看到自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出来后，社会上出现那么多的言论，又受到周围各种材料和上下左右的人的影响，就把他原来的讲话，交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他们，吸收党内高层其他人意见进行修改。这个改了的东西就是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出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它成了反右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因为它提出了划右派的六条标准。这个文章不如主席自己原来的那个好。我听了主席的原始讲话，正式发表出来的文章与原始的讲话有很大的不同，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也是主席原始讲话里没有的（详见上一章）。

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原始讲话，是主席自己的意见，是他的真实思想，而发表出来的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中央集体的意见。这一点即使是现在最正规的说法也是不否定的。逢先知、金冲及他们搞的《毛泽东传 1949—1976》就在第702页承认发表出来的文章是“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是毛泽东的精心力作，也是党内集思广益的结晶”。这就是说反右派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党的意见。因此，后来说毛主席他一个人搞“引蛇出洞”，是没有道理的。这怎么是“引蛇出洞”呢？

右派是有的，辩论一下也是可以的，但用不着搞那么大的反右派运动，搞了几十万人。这个责任，毛主席有，他应该负领导责任，但反右派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掌握的，彭真也很积极。彭真那时候左得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那么右？是他们提出要求按比例打右派，主席说百分之一、二、三，他们说百分之五都不够，有百分之十。邓小平在中央党校讲话，提出按百分之十的比例打右派。后来不是每个单位都按百分之十的指标打右派吗？依据就在这里，这个是当时有文件的。现在有些人把反右扩大化的错误都归到主席身上，这是不对的。就是反右派，主席也没有想那么大规模，按指标打右派不是毛主席说的。

所谓扩大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整风运动在前，反右派运动在后，整风运动中的大鸣大放，没有一个具体的发言标准，等人家把话已经说了，再以反右派运动开始后划右派的六条标准去对号入座，那人家很多话就是说过头了，很多人就成右派了。后来有人说毛主席搞“引蛇出洞”，依据就是这个。这种说法是违背基本事实的，是没有对上面说的各种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主观看法。毛主席并不是有意先不设立标准，有意诱使人胡乱鸣放，等人家鸣放之后再故意找托词设立标准收拾人家，而是先就诚心诚意希望大家提意见，发现有的意见走得太远之后，就希望吸收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设立几个标准来规范鸣放行为，并纠正先前的鸣放方向，把整风运动引导到合理的轨道上去。

这里面还有一个具体的执行操作问题。用后来划定的标准去衡量已经过线的一些鸣放，就已经难免出现一个扩大化的问题了，而有些具体操作的人还犯官僚主义作风，还借机打击报复正当给党组织和个别党的领导提合理意见的人，就像中南海有人打击报复我们“八司马”那样（参见后一章）。这就把扩大化的问题搞得更加严重了。刚才提到的老共产党人葛佩琦就是这样被打成右派的，他根本就不该被打成右派[注释葛佩琦]。可以说，要是根据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原始讲话精神去衡量鸣放的言论，那么就没有扩大化的问题了。而要是具体操作者不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都像主席那样没有私心，那就更没有扩大化问题了。主席讲过李慎之、[王芳？]（新华社的）等一些人不能打成右派，可是邓小平还是把他们打成右派了。毛主席说的话都不管用了。所以，扩大化不能把责任都推给主席。毛主席当时说过，全国不过4、5千个右派。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搞，右派最多也就是这个数字。综合以上情况就是，标准出来晚了，其他具体执行人又搞打击报复，又搞官僚主义，又搞高指标按比例打……最后就搞成扩大化了。

江青还曾告诉过我，说主席在青岛的时候对她还说过这样的一番话：“别人说我引蛇出

动。我没有引蛇出洞，我搞的是阳谋。毒草出来了不要紧，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总会有些问题，不要紧。我都说了，农民种地也有毒草的嘛。花点药，除了就是了。我不是阴谋，我是阳谋。”主席这个意思是批判人家强加给他的，实际上是莫须有的“引蛇出洞”。可后来写历史的人，就说主席是自己都承认搞“引蛇出洞”、搞“阳谋”。实际上，主席是真要群众民主的。在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中，有人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主席就不同意。这也是他要群众讲话，要实行民主的一个证明。群众讲话了才能稳定，才能避免出现“匈牙利事件”，当时要不是主席的讲话出来，让群众的情绪有一个发出的地方，那群众就可能因为对官僚主义的不满上街去，真出现“匈牙利事件”也是难说的。哪知主席讲话，是在苏联 20 大以后，他一讲，群众动了，右派也动了，党内还就是利用这些事说主席把国家搞乱了。主席真是好心，刘少奇却不像话，不检讨，还把屎盆子扣给主席头上。“我是执行者，我是第一线的，负主要责任”，这话刘少奇该说却不说。主席都说了要负责任，他刘少奇就不说一声负责任的话，何况主席不同意打成右派的，他们也打了很多。

关于校园内的斗“牛鬼蛇神”的问题

驳：

当时被受到冲击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由所在单位的领导指定或授意的。后来刘少奇他们派出的工作组进驻学校以后，工作组只是千方百计地去制止学生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但没有去制止这种斗争知识分子的情况。相反，由工作组所组织的以“高干子弟”、“革干子弟”为主的各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把在校园里揪斗被他们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在揪斗中，出现了挂牌子、戴高帽子、游街等侮辱人格尊严的情况。后来这种情况就很快地蔓延开来，而且越来越扩大，特别在一些“高干子弟”、“革干子弟”的带头下，进一步出现了非法开押、剃阴阳头、甚至是严刑拷打的情况。这样武斗的批判、斗争方式不是毛主席的主张，而是毛主席明确表态反对的。

众所周知，第一起斗死老师的案件也是邓小平的儿女们干的，邓朴方之后因此被造反派抓起来，迫不得已跳楼落得残疾，然而就这样依然得到了治疗，后来倒卖彩电创立“康华”挣了万亿资产（中国有上万亿资产的不是我一家，至少有 17 家。上千亿资产的至少有 50 家。多数是靠勤劳致富的。希望人民不要嫉妒，有本事自己可以挣嘛。），邓榕也参加了斗死卞仲耘校长的活动，后来却担任过总政组织部副处长、驻美大使馆三秘、全国人大常委会政研室副主任、掌管教科书的编订……

理论时可引用的资料：

《戚本禹回忆录》：第十三章 知识分子在文革运动中受到的打击——1. 文革初期校园内的斗“牛鬼蛇神”

文化大革命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又是先在学校里面发动起来的。这使得当时一些学术界的“权威人士”，和学校里的一些教师与学校的领导，同时首当其冲地受到了群众运动的冲击。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曾经说过，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只有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否则，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牢固的。在文革前夕，根据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分子上台的历史教训和中国当时的情况，毛主席又提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无论从当时的情况或者从毛主席逝世以后的情况来看，都证明了毛主席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性。

开始的时候，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冲击，主要是通过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来进行的。从《人

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发表，和在同日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以后，许多大、中学校就掀起了斗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及一些历史上有这样那样问题的教师的热潮。但当时被受到冲击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由所在单位的领导指定或授意的。后来刘少奇他们派出的工作组进驻学校以后，工作组只是千方百计地去制止学生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但没有去制止这种斗争知识分子的情况。相反，由工作组所组织的以“高干子弟”、“革干子弟”为主的各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把在校园里揪斗被他们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在揪斗中，出现了挂牌子、戴高帽子、游街等侮辱人格尊严的情况。后来这种情况就很快地蔓延了开来，而且越来越扩大，特别在一些“高干子弟”、“革干子弟”的带头下，进一步出现了非法开押、剃阴阳头、甚至是严刑拷打的情况。这样武斗的批判、斗争方式不是毛主席的主张，而是毛主席明确表态反对的。

我自己在党时就曾亲自见过这种情况。一次我坐车出去办事，车顺着小胡同向大马路开去，就在出胡同的时候看见一位妇女，估计也就三四十岁左右，她一边哭一边用手捂着脑袋，一路小跑。我一看她脑袋半边没有头发了。我赶紧叫司机停车，走下去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看看我们穿着军装，就说，是被学校里的学生斗了，他们把我的头发都给剪了，我没脸见人了，我要赶紧回家。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斗你？她说，学生们说我搞资产阶级教育，可我就是按教科书教的，怎么是资产阶级教育。原来她是一位语文老师。看见她走路很难堪的样子，我说要不我们送你回去吧？她说不用，她家就在前面。

我回到钓鱼台的办公室，跟文革小组的人一说，大家也都知道这种情况，说不仅剪阴阳头，现在“红卫兵”在街上剪人家长头发和小裤腿的也很多。

我在家里经历的一件事也让我感触很深。我的女儿是1955年生的，那时就十一岁，还是个小学生。一次我回家去看看，见她正对着一张凳子，用皮带叭叭地抽打。我说，你这是干啥呢？她说，学校里的同学都批评我没有斗争性，说我不敢打老师，叫我回家练一练怎样打人。我说，你们在学校都打老师呀？她说，现在都在打老师，谁不打老师就说谁没有斗争性、不革命。我一听，觉得问题真是严重了。我说，你有没有打老师啊？她说，老师平时对我挺好的，我不愿意打老师。我说，中央文件里都明确说不准打人的，打人就是有斗争性啊？她给我背了毛主席的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我说，不对，这是在解放前斗地主时说的，你们的老师又不是地主，你们有意见，可以批评他，但不能打他们。

后来，我们把这些发生在校园里的暴力事件的情况，向江青、陈伯达和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就此作了明确的批示，打人、挂牌子、喷气式、剃阴阳头都属于武斗，统统禁止。在文革结束以后，把这些打人的事情都说成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进行的，这完全是谎言。中央文革小组从来都是坚决反对并制止打人的，而且1966年6、7月时，许多有关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决定，都是由刘少奇、邓小平在一线领导的常委会和书记处决定的，中央文革小组当时的发言权还很小。

还有人把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去学校，说成就是去制止打人的。真实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多数的工作组在学校里并没有去制止打人，他们只是不许学生起来反对领导。他们对起来反对领导的学生，和他们所抛出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般都是实施残酷斗争的。在毛主席批示之前，只有少部分的工作组遵循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在不同的范围内制止了武斗。

关于舒庆春（老舍）的问题

“1966年8月24日，‘文化大革命’中不屈辱，自沉于北京太平湖。”

“1966年8月23日，社会上的一部分红卫兵以‘破四旧’名义，闯进机关大院，扬言

要烧毁市文化局系统剧团所存的传统戏装，并勒令市文化局把揪出的“黑帮”送去陪烧。

下午，他们开始揪人，市文化局、市文联被揪出 29 人，其中属于市文联的有：老舍、田蓝、金紫光、张季纯、端木蕻良，骆宾基、江风 7 人，被用卡车送至孔庙，围着烧戏装的火堆，受到红卫兵的皮带抽打。

老舍因头部被打破，提前送回，在市文联，市文化局院内又遭揪斗，受尽凌辱 1966 年 8 月的一个早晨，北京德胜门豁口外的太平湖湖面上，静静地漂浮一位老人的尸体。

尸体被人波澜不惊地打捞起来，遗体于当天匆匆火化，骨灰遭到遗弃。一位“人民艺术家”的生命结局，就此老舍被定性为‘自绝于人民’。”

——百度百科

驳：

老舍死前的职务是“北京市文联（文革）革命委员会主任”也就是“造反派头头”且老舍 23 日被批斗前，正要去北京文联“参加运动”。（出自《联动覆灭记》）

据称，组织批斗老舍的是一名叫侯文正的人，是他当时联系了女八中的“联动”成员，在老舍去北京文联“参加运动”的半路上截下老舍，对老舍进行武装批斗。

江青在老舍死后，多次派人调查老舍死因，但因“阻力太大”，都毫无结果。

戚本禹曾在《戚本禹回忆录》里谈及，他质问过邓小平手下的人，老舍是谁弄死的，对方没回答，但从态度上看，他认为对方是知道的。

在 1984 年到 1985 年整党和核查“三种人”的过程中，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调查了 17 个月之久，基本查清了侯文正同志的问题。最后，在做出的审查结论材料中认为“八二三”事件不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事件，而是几件极“左”行动偶然发生在一天内的“巧合”。

其实，是否真是侯指使的并不重要。一个，老舍的职务说明老舍是支持毛的。一个，江和戚的行为说明其是把老舍当“自己人”的，而“批斗”老舍的那个组织，恰恰是一个反毛路线的组织。所以一说文格，就有人说毛发动的文格“逼死”老舍，也是搞笑。

来源：[【一刻 talks】文学巨匠老舍自杀的前夜，他后悔没有上前劝阻！](#) 评论区（修改过）

“老舍怎么死的”，这个问题非常值得仔细研究，必须认真阅读文革相关书籍。我就问几句话，回答出来就有资格对这件事发表看法，回答不出来，就不要扯淡：老舍被批斗的具体过程具体是如何？他是被哪一派别红卫兵批斗？又是跟哪些人一起被批斗？之后他给谁打了电话？他自杀后各派别反应如何？当年批斗他的那些红卫兵家境如何？背景如何？父母都是什么人？现如今那些批斗死老舍的红卫兵现在都在干什么？什么是“西纠”？什么是“联动”？

来源：[【一刻 talks】文学巨匠老舍自杀的前夜，他后悔没有上前劝阻！](#) 评论区（修改过）

也有传闻是说老舍自尽不是因为被批斗，他作为文联革委主任，参加了很多的文艺界批判活动，到他被批判是不可能受不了的。老舍二十多年婚外恋批斗会上被人揭发，斗完不让进门，一时想不开去跳湖了。也传闻说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来了，老舍抛妻弃子跑了。然后找个小三，等原配找到他了，他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怎么还没死？”于是后来老舍被他儿子、他老婆揭发。

理论时可引用的资料：

《戚本禹回忆录》：第十三章 知识分子在文革运动中受到的打击——2. 文革中一些“名人”遭到迫害的真相：

老舍的死在当时震动很大。毛主席很喜欢老舍，主席去看《龙须沟》时候，我也在场。演出刚结束，主席就站了起来，远远的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经常和老舍谈话。老舍有学问，二十四史他都熟悉。主席看到老舍总是很高兴。我看他对老舍的喜欢如同喜欢郭沫若一样。有一次主席跟老舍说，康熙是对中华民族有功之人。我们现在的国家版图还是康熙那时定下来的。老舍听了非常高兴，因为他是满族人。他说，这下好了，原先总觉得，满族人杀了那么多的汉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可以抬起头了，毛主席说康熙对中华民族也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欢老舍的戏。可是大家都喜欢的老舍，怎么就在文革中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我们好几次，究竟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还怀疑是不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我们都说不可能，我们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也没有这种必要。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她让我去查。我曾经怀疑是叶向真这些人搞的，但查无实据。江青又叫谢富治去查，也没有查出实据来。查了半天，有人把责任都推到他夫人胡洁青和他儿女的身上，说她们要和他划清界线。老舍在外面挨斗，回家又挨骂。他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他们来人审问我的时候，根本就不向我提老舍这件事，他们只提斗争王光美、刘少奇的事。我反过来质问他们，老舍是谁弄死的。他们却不回答。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但不好说。

《陈各庄上养猪多》[全文](#)不贴，可以自己百度到，说明老舍也是支持毛的路线的。

浩然访谈录：关于老舍之死的说法作者：郑实

来源：华夏文摘增刊 第四〇四期 2004-11-16

郑实：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冲击北京市文联，批斗了一大批文人作家，导致老舍自杀。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浩然：关于老舍之死，你是第一个找我谈的。其他任何人没和我谈过，大家众说纷纭，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郑：我听说是一个叫侯文正的打电话叫来的女八中红卫兵，您对这个了解多少？

浩：他是1966年应届大学毕业生，想到文联来。我和他是对立面。后来他去了山西文联，很红的。我当时就知道他到文联是想借机留在北京。他就是抱着这个目的。他写了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贴在一进文联大门那儿。他认为文联的权还没夺过来，被捂着盖着。

郑：有一种说法：当时文联造反派存在派系斗争，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所以叫来了女八中红卫兵，是吗？

浩：不是，是去找的侯文正。找女八中的原因是因为文化局要萧军劳动，萧军不服，他们便想找人来帮助镇压萧军。当时我正在办公室里写材料，不是写大字报那种东西，听到有人告诉我，侯文正带着红卫兵进了院子，大喊大叫让人们到院子里集合。

郑：当时文联的人有什么反应？

浩：我看见杨沫因为害怕高血压复发，瘫在屋里。在门口我遇到了草明，她也是非常害怕。我还记得她当时紧张地抓住我的手，问怎么办？我告诉她赶快躲起来，她“嗖”地一下就跑了。

郑：老舍这时在什么地方？

浩：在院子里。在这之前他吐血住了院。他打电话给我，说要来参加群众运动。

郑：他当时是抱着积极的态度要到文联参加运动，还是有点被迫不情愿来？

浩：很积极。我不希望他来。因为情况很乱。万一老舍出什么事，是很严重的。但他坚持要来。

郑：8月23日是“文革”开始后他第一天到文联吗？我第一眼见到他就是侯文正他们要大家去院子里时，老舍就站在人群中。造反派点名往外揪人。我当然希望老舍赶快走。当时已经有人被从人群中揪出来，有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荀慧生、裘盛荣。还有一个唱京剧的。

郑：然后老舍就被揪出来了吗？

浩：还没有。我一看这种情况就觉得不妙，就赶快上楼给文化部主管我们的办公室打电话。

郑：您是特意为老舍打的电话吗？

浩：对，老舍很重要，我怕出事。我就问他们老舍是保护对象我们该怎么办。他们的意思很模糊，什么群众起来了，什么的。他们很不耐烦。我问他们群众揪出老舍怎么办？也没说。

郑：然后您怎么办呢呢？

浩：我一看他们这种态度，我就挂了电话回到院子里。

郑：院子里的红卫兵已经动手打人了？

浩：没有很用力，也就是推搡，用皮带碰碰那些揪出来的人，偶尔抽一下。我一看就又回来打了个电话，问他们到底怎么办。他们说要接受群众冲击。我只得挂上电话又回到院子里，这时老舍已经被揪出来了。

郑：是谁把他揪出来的？

浩：是侯文正在那里喊：老舍出来！那些被揪出来的站成一排，好些人啊。每个人都给带牌子。

郑：牌子是准备好的吗？

浩：是现写的。用我们对面院子里的木板。

郑：当时怎么批斗的？

浩：好像是侯文正问他们都挣多少钱。我们造反派当时分成两派。一派人想把事情搞大。我就想说话，比如草明，我就让她躲起来。可是老舍已经站到外面了，没办法了。

郑：老舍当时的情况怎么样？他来的第一天就被揪斗，是不是毫无准备？

浩：对，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郑：给老舍挂牌子，他有什么表示？

浩：没有。什么也没说，就让挂了。他们都晕了。我站在门口，院子里都有人，我挤不过去。

郑：问他们挣多少钱是什么意思？

浩：挣得越多越反动。

郑：当时是侯文正指挥一切吗？

浩：对，没人管，就听他的。后来就来车了，要把他们带到孔庙去。上车慢的，红卫兵就抽。

郑：都有谁被押上车了？

浩：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还有文联被揪出来的。我当时就告诉我们那一派的周述曾跟着去。我们表面是一派，其实是对立面。我告诉他：你，赶快跟这车去。到哪你都跟着，老舍出了什么事，打电话给我，我在这里接电话。

郑：您让他去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老舍？

浩：对。过了两小时左右，周述曾给我打电话，说老舍受伤了。我就派车把他们俩接回来。

郑：您是想让他们离开那个是非之地？

浩：对。没想到他们坐车回文联，正赶上全国各地来串联的红卫兵聚在院子里，车一进来他们就把车围上了。

郑：他们是外面来的，也认识老舍吗？

浩：不认识。但老舍在孔庙受伤了，头上包着水袖，身上还有血，看着挺新鲜的。等老舍下了车，他身上挂着牌子，那些人就知道了。

郑：他们又接着斗老舍了吗？

浩：对，让他站在高台阶上。红卫兵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只知道有这么个人。这时草明出来说：我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税卖给美国人，不要人民币要美金。大伙儿一听就嚷：让他把牌子举起来！红卫兵从他头上摘牌子，这时老舍打了红卫兵。

郑：关于这点有一种说法，老舍自己从脖子上摘牌子，是想扔在地上，结果砸了红卫兵脚，是这样吗？

浩：不是。印象中大概红卫兵摘牌子时弄疼了他，所以他摘下牌子向身边的一个红卫兵打去。这时天已经黑了。

郑：老舍打了红卫兵，肯定会引起更厉害的批斗？

浩：对，人们都喊起来，往上围。这时候我就很紧张。但身边没有我们的人，都是看热闹的，我也不好说什么。一着急我就说：他打了红卫兵，是反革命，把他抓起来。

郑：这样说是为了保护他？

浩：对。然后就送到了派出所。我让人打的电话，通知的派出所，派出所来人弄走的。

郑：哪个派出所，您记得吗？有人说是二龙路派出所。

浩：不，是西长安街派出所。派出所派车把老舍接走的。

郑：派出所派车把老舍接走的？

浩：对。

郑：再后来您什么时候再见到的老舍？

浩：当天晚上我去了派出所

郑：大约什么时候，他被送到派出所后多长时间您去的？

浩：我处理完手头的事把骆宾基他们都打发回家了。大约到十一二点的时候，和文联的革委会副主任马连玉一起去的。

郑：老舍当时在派出所又被批斗，审查了吗？

浩：没有。

郑：有没有当时在文联院子里的红卫兵跟到派出所继续批斗他？

浩：没有。派出所的人也没有审他。我去时他就跟椅子上坐着。

郑：派出所的人为什么没审老舍？

浩：他们那时特别忙。都是死人的事，他们顾不上老舍。让我赶快把老舍接走。

郑：是派出所打电话让您去接人，还是您自己去的？

浩：他们没打电话。

郑：那您当时去的意图是什么呢？

浩：要处理这件事。我找老舍谈话，一是说他打红卫兵是不对的，回去要做检查，让家人给看看伤。二是第二天早上8：00到文联去。

郑：您打算让他回家，是您打电话让家里来接他吗？

浩：他的老伴态度很不好。我让她想办法来接，她说没办法。

郑：是因为当时夜深了，没车了？

浩：对，文联的司机已经不给老舍开车了。我就出去找车，街上的车都不肯拉。

郑：是因为您告诉他们拉的是老舍，所以他们拒绝了？

浩：是。

郑：您和老舍谈话时，他说什么？

浩：我说，他点头答应。

郑：您觉得他当时的情绪如何？在当天批斗之后，他便自杀了，您觉得他当时有什么反常吗？比如愤怒或绝望的样子。

浩：都没有。看不出什么来。

郑：您让他第二天去文联干什么呢？

浩：总要跟文联交待呀。

郑：有文章提到是舒乙去接的老舍（载《名家》1999年第六期《“浩然”正气笑傲文坛》），您见到他了吗？

浩：记不清了。我找舒乙谈过他父亲的事，是在老舍的尸体发现之后，我让他找老舍的其他子女处理后事。

郑：您什么时候得知老舍自杀的？

浩：我和马连玉回了文联。第二天半夜来了电话，说发现了死尸，有人认为是老舍。

郑：您这个时间记得确切吗？因为第二天老舍应当到文联，但没有露面。第三天他的尸体才可能被发现。

浩：反正是个晚上。

郑：是谁代表文联去处理的后事？

浩：文联办公室的李克，还有柯兴。

郑：您听到老舍去世的消息，有什么感觉？

浩：那时候都这样……完了，事情大了。

郑：谁通知的家属？

浩：我是得到通知的第二天找到舒乙。舒乙说他们不知怎么办。

郑：我看到陈徒手的文章中提到，您通知胡洁青老舍自杀的消息时，她反应很冷淡。

浩：对。她说死了就死了呗。

郑：这是她的原话？

浩：对。人好像都麻木了，说得很简单。（叹气）

郑：您刚才提到当晚在派出所给老舍家打电话，后来是谁来接的？

浩：后来知道是舒乙跟人好说歹说，雇人把他送回家的。

郑：草明当时揭发老舍是不是导致了事态更严重？

浩：是。（叹气）

郑：您以前和草明同在一个单位，对她有些了解，您料想到她会跳出来揭发老舍吗？

浩：在那种情况下她要洗清自己，但没想到会造成这样的后果，以为发泄一下就完了。

郑：草明本人认为“文革”中这种事太多了。她不认为自己应该为此事道歉，您怎么看？

浩：（叹气）不能说应该……这个人刁钻着呐，她特别傲气，厉害着呢。她没想到会有这种后果。

郑：您认为她并不存心要害老舍。但事实上确实是由于她的话，导致对老舍更大的迫害。

浩：这个事从此变模糊了，谁也不写这个问题。老舍的死至今没弄清楚。后来选举文联主席时，大家都不选她。

郑：就是说大家认为这件事不能原谅，对吗？

浩：是。我也有过这种事。“文革”中选举，大家说我不该对记者说话随便，应内外有别。

郑：现在有些人不愿谈及包括老舍自杀这样的“文革”历史，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浩：不知道。“文革”是很复杂的，谁也说不清楚。

郑：我听说您正打算写“文革”的回忆录？

浩：是，我要以自己的角度写，写我那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郑：您为什么要写？是希望大家了解真相吗？

浩：是这个目的。作为当事人我要让大家了解那段历史。

郑：您打算原原本本写出来，知道多少写多少，不隐瞒任何事情？

浩：对。

郑：其中会涉及到一些还健在的人，您把他们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公开出来，会不会引起他们的不快？

浩：我不管这个，我就如实写。

郑：有没有人给您施加压力，让您不要写？

浩：有人间接找过我。郑：您写这些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浩：我身体不好。

郑：您在《金光大道》、《艳阳天》中所描写的农村经济模式今天已经不存在了，您认为今天的新模式比您所写的进步了吗？

浩：（笑）真说不清楚了。现在形势变化很大。人们总要追求光明，追求幸福，这也是一种方式吧。经过实践证明以前的做法不对了，要走新的路子，试着来吧。

郑：您认为以前的探索是值得的？

浩：值得的。要是没有合作社，还是以前的小农经济，连密云水库都建不起来。怎么说呢，干了一些错事，也有好事，好事包括坏事，坏事包括好事。

郑：您认为好坏是事情的两个方面，不能说什么事都完全是错的。

浩：当时不应当组织起来，应当像现在这样，一家一户的。事实摆着，我得面对事实。所以现在写新东西，我就要考虑这个，人们怎么生活。

郑：现在对您有些非议，主要是认为您应当对过去作品中歌颂现在已经过时了的东西表示悔过。但您认为您当时是真诚的，不愿悔过。但无论您的愿望多么真诚，那段历史毕竟造成了这样多的惨剧。那么像老舍之死这样的悲剧的直接或间接责任者是否应当悔过呢？

浩：（叹气）比如草明，我认为她的确加剧了这件事，是犯了大错误。但是现在要算她个人的账，怎么……

郑：您认为她的动机不是要害老舍，但事实上的确这样，她是应当有个说法吧？

浩：是应当有个说法。老舍的事情发生之后，我写了个材料交上去。

郑：您当时的职务是？浩：文联革委会副主任，正主任是个长期病号。

郑：也就是说您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老舍死后有没有追究这件事？

浩：没有。

郑：那您为什么要打报告呢？

浩：我觉得有必要把事情说清楚。

郑：您的报告交上去有回音吗？

浩：没有。没有人再问我这件事。

郑：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您现在对老舍这件事有什么感想？

浩：太久了，我已经淡忘了。

郑：那您认为我现在进行这些采访要弄清真相有必要吗？

浩：有必要，但怎么弄呀！

郑：您认为自己当年的创作，在写作技巧上是成熟的吗？

浩：写《艳阳天》开始成熟了。

郑：您认为和同龄的作家比较起来，您的创作在什么水平？

浩：《艳阳天》代表了我的水平，也代表了当时的水平。

郑：老舍在解放后写的《西望长安》、《女店员》等也是出于真诚去写的，但不成功。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浩：他不熟悉生活。

郑：另一方面是不是因为老舍的创作思想完全为政治所左右？

浩：是。

郑：那么您认为文学家和政治应当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政治有利于文学创作吗？

浩：我认为离开政治不行。

郑：那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跟着政治走呢？

浩：“文革”中我在写作时也有意回避一些东西，那些不符合我思想的我就不写了。

郑：您现在是不是不太愿意回想“文革”这段事？

浩：不愿意。

郑：为什么？

浩：乱糟糟的，不愿意说。

郑：您当时为了保护老舍，叫来了派出所的人。但当时他已经受了很多罪，您为什么没早想起这个办法呢？

浩：当时太乱。也巧了，他正好那天来，如果再晚一天就不会碰到这件事了。我不让他来，他非要来。

郑：他为什么非去？

浩：要积极参加群众运动。

郑：现在有人要求您忏悔，您表示拒绝，为什么？

浩：要求我用现在眼光看那时候，不可能。我只能慢慢回忆，但回不去了。

郑：有人指责您当时自我膨胀，过分自信。您认为这种指责有道理吗？

浩：也就是草明那伙人。

郑：她当面对您说的吗？

浩：告诉陈徒手了，然后在《读书》上发表出来。

郑：您认为这种指责有道理吗？

浩：反正我那时给人这种印象。

郑：事实上您是这样吗？

浩：不是。

郑：您和草明有私人恩怨吗？

浩：（叹气）你知道“文革”这件事为什么不能说清楚吗？当时的红人下去了，剩下这些人……怎么说？

郑：您的意思是现在有些人通过贬低您来获利吗？

浩：证明自己。

郑：有人是通过攻击您表明自己与您不是一类人？

浩：（笑）有个别人。

郑：但也有人是为了弄清真相，主持正义对“文革”表态的。

浩：年轻人写文章指责我，但并不了解历史。

郑：您是说写文章攻击您的，都比较年轻。俗话说后生可畏，如果他们对您的攻击成为主导，会使后代都对您持否定态度。您不对此感到担心吗？

浩：担心。但不会成定论。

郑：为什么？

浩：因为他们的看法是片面的。如果全面了解了就不会这样了。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加深，看问题会有变化。

郑：您打算对这些您认为片面的指责回击吗？

浩：不打算针锋相对，只把我的经历写出来，如实地把我当时的生活写下来，一点假的没有。

郑：您指的具体是哪些东西？

浩：我现在想不出来。

郑：您所描写的那些“高大全”的人物存在于现实中还是存在于您的想象中？

浩：存在于生活。我把美好的东西综合起来了。

郑：您认为这些人物是英雄。但随着时间推移，今天的人们不再认为他们身上的那些东西是好的了。您认为今天的英雄是什么样的人呢？

浩：（指窗外）住在这些小楼中的人。

郑：是经济实力的人？大款？

浩：对。（叹气）

郑：对于当前人们的指责，您是否感到不快？

浩：不如意。（笑）

郑：您对他们的攻击怎么看？

浩：他们说不到点上。

所以当时出现这种情况（知识分子在文革运动中受到的打击）进行保护和制止没有呢？

有的。

可以引用的资料：

《戚本禹回忆录》：第十三章 知识分子在文革运动中受到的打击——3. 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保护

1966年8月29日章士钊的家被抄了，章士钊给毛主席写信，请求主席帮助。8月30日主席立即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而且主席同时还告诉总理，看看还有哪些人需要采取保护措施的，赶紧保护起来。总理马上按主席指示去办了这件事。

我听总理讲，章士钊家是聂元梓下面的人去抄的。聂元梓听了总理的指示，赶紧叫人把抄走的东西一件不少地还了回去。后来，根据主席的指示，列了一份需要保护的人的名单，并派部队去切实保护。名单中第一位是宋庆龄，接着是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期、沙千里、张奚若以及李宗仁等。在李宗仁之后就是国务院几位副总理，还有好多部长、副部长。江青一看有意见了，说，总理，名单里名人没几个，怎么都是你国务院的人？国务院副总理就不用说了，还那么多部长、副部长？

不管怎么样，通过这件事情，主席不仅仅保护了章士钊，而且把其他应急须保护的人也都保护了。冲击名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也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布置，都是一些偏激分子甚至是一些对文革别有用心的人胡搞的。

江青是个爱才的人，而且她有眼光。她在文革中保了很多，尤其是那些有才能的人。在《红色娘子军》演吴清华的白淑湘，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高级人员，有血债，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了。江青还是保她。我在会上就听江青讲了好几次了。那时文革小组的文艺组组长是金敬迈，他那时威信很高，所有的样板戏剧团都归他管。江青说，我让你们把白淑湘争取过来，你们怎么老不把她争取过来。于是金敬迈赶紧找中央芭蕾舞团的刘庆棠去做工作。

后来让她在红色娘子军中担任了B角。这在当时的样板戏剧团里是一件大事。后来毛主席逝世，江青被抓，白淑湘站出来控诉说江青迫害她。白淑湘如果真是这样说的，那要么她是受人利用，要么就是她把刘庆棠错误对待她当成江青对她的迫害。刘庆棠艺术上有成就，但为人不是很完善，不象钱浩亮、于会泳那样严于律己。像白淑湘那样的情况，当时如果没有江青保护，她的命运是很难预料的。

有一次，我向江青反映，广东把红线女斗得很厉害。给她剃阴阳头，让她去了农场养鸡。江青说，那怎么行。她还想叫红线女把样板戏移植到粤剧里去呢。她让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吴法宪说，江青要保红线女，还要她去移植样板戏。吴法宪马上去跟黄永胜说了，把红线女保护了起来。

江青还保了作曲家李劫夫。文革一开始，东北音乐学院就把李劫夫定为黑线人物，学生要批斗他。江青跟我说，你把他弄到北京保护起来，让他住北京饭店，由国家出钱。我马上写了个报告，江青在上面作了批示。江青所作的这个批示的原件，被夹在一本我出狱时归还给我的书里。我根据江青的批示，专门去和沈阳音乐学院的造反派讲了话，做了他们的工作。后来李劫夫给我写来了几封信，表示感谢。“9.13”事件之后，有人揭发李劫夫写过歌颂林彪四野的歌曲，江青反过来又批判了李劫夫，但林彪那时是四野的司令员，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这不能算是什么问题。所以江青也没再深究。

体委的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徐寅生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江青也让我去保护他们。她说，他们都是为国争光的小英雄，去斗人家干什么。有人说他们是跟刘少奇黑线的。江青驳斥道，他们都是孩子，懂什么路线？又有人说他们是跟着贺龙的，是贺龙的人。江青说，他们跟贺龙能有什么关系？他们又没打过仗，没有卷入军队的内部斗争，怎么能是贺龙的人呢？总理知道我要去保护他们，非常高兴。他就叫荣高棠来钓鱼台找我，荣高棠原来是我在中央团校学习时的老领导，他就到钓鱼台来找我，见了面大家都很高兴。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关于红卫兵砸岳飞墓的问题

岳飞墓被捣毁，两个原因：一是那个时候民族思想非常激进，受到民族平等的影响，二是岳飞在南宋的时候镇压过农民起义军，也是反动的，所以被砸了。

被砸的时间是1966年秋，未能查证到是《十六条》出台之前还是出台之后，也有可能是受到官僚引导的效果。

关于各种坟墓（陵墓）被砸烂、主人被焚骨扬灰、文物被摧毁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道：“共产主义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这就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彻底性，没有什么任何东西是超阶级的、全民的。文革的确毁了很多传统的文化文物，但是也从根本上解放了人民的思想，消灭了绝大部分的封建迷信。

况且这一情况也很复杂，有很多情况是走资派转移斗争方向：在《十六条》出台前，工作组和老红卫兵把破四旧（旧思想 旧文化 旧风俗 旧习惯）搞成了打砸抄，文革里的各种疯狂行为离不开官僚的引导，官僚不想被斗，就怂恿人民斗一些其他东西。

谁来砸呢？保皇派红卫兵，这些高干子弟无所事事，在他们父母的引导下，就去干这些

转移注意力的行为。普通人谁还能搞到炸药去炸坟？不是所谓的饭都吃不饱的年代吗？普通人还能吃饱了撑着没事干去搞这种事情？

所以当时出现这种情况进行保护和制止没有呢？

有的。

可以引用的资料：

《戚本禹回忆录》：第十三章 知识分子在文革运动中受到的打击——4. 中央文革在文革中保护国家文物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人实际上人人都是积极保护文物、书画、典籍的。因为我们都懂点文化，知道那些东西的珍贵，不能随便就毁了。我那时一听到哪里有人在破坏文物，就心疼得不得了。一次我拉上关锋，一起去向江青专门汇报了关于文物被破坏的情况，江青又去报告主席。当时康生、陈伯达也都是很支持我这样做的。毛主席对一些人不认真搞“斗、批、改”，却喜欢去破坏文物，感到很不满。

1967年1月27日，主席叫我去与一些保管图书、文物以及考古和博物馆等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开座谈会。我在会上讲了话，要坚决保护文物，并要求制定出具体的措施来。我的讲话公开发表后，日本通讯社马上就进行了报道，其他国家也有报道的。毛主席从《参考消息》上看了这些报道后，很高兴。他肯定了我的讲话和提出的办法，说这些做法都是对的。我那个讲话后来还出了个纪要，详细规定和引导有关人员，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书画、典籍。王力在他的“反思录”里也说到了这件事。

在1966年8月文革中的“破四旧”期间，确实还是有一些古旧的东西遭受破坏。这一直是国内外的一些人对文革不满的原因。可是有些人明明是知道内情的，知道破坏文物主要是运动初期各地那批所谓的“老红卫兵”带有盲目性的偏激行为，而且不久即被中央文革所制止。但他们为了否定文革，就对当时的一些真实的情况闭口不谈。事实上，中央文革小组当时没有发出过任何一个破坏文物的指示或者讲话。

就拿批孔、清理孔庙、挖孔子坟的事情来说，最初是由曲阜当地的造反派提出来的，他们给中央文革写信反映当地文革运动的情况。毛主席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造反有理”，是文革运动的指导思想；而孔子的道理，归根到底，也是一句话：“造反无理”。因此，我们觉得，批孔是文革应有之义。但这是件大事，让群众自发去搞，不如由中央文革主动加以引导，防止造成不应有的破坏。当时北师大的学生造反派谭厚兰他们听说此事，反应很积极。陈伯达表示支持谭厚兰她们的革命精神。这个事当时就放到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来讨论了，这个会总理和康生都参加了。总理在会上讲了话，康生、江青也关心这个事。关锋是批判孔子的专家，他对批判孔子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但他对清理孔庙，挖孔子坟是持谨慎态度的。不过他也说了，孔庙、孔子坟是几千年封建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象征，乘文革的东风，清理一下也好。但要有专家参加，不可乱挖、乱毁。康生在会上分析说，孔子坟里可能是没有什么东西的。孔子是穷教授，没有钱财，顶多有几捆竹简。陈伯达说，有竹简挖出来也好，可以弥补学术研究。他估计尸体早腐烂了，孔子的后人又不能像秦始皇那样保存墓葬。所以挖不挖只是个形式问题。我当然是积极拥护清理的，我提议，不妨由国家派出考古人员和他们一起去，这样既可以满足群众挖坟的愿望，又可以进行考古发掘。最后，总理综合各方面看法，拿出了意见：与考古所相结合，作科学的清理。

在得到中央同意后，由陈伯达、关锋和我向《红旗》杂志的林杰作了传达，要林杰去北师大作动员报告。随后谭厚兰组织了一个队伍，在1966年11月浩浩荡荡地开到曲阜，结合当地

院校的师生，成立一个“全国红卫兵彻底砸烂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在曲阜市大造了孔夫子的反。

红卫兵在曲阜造反，山东省委马上给中央文革打来电话请示。我即根据总理在中央文革会上的指示精神，代表中央文革电话回复山东省委，要求他们告诉红卫兵，孔庙里的牌匾，明代以前的都不能砸、不能损坏，要保护好。清代的可以砸，但康熙、乾隆的不能砸。孔庙可以改造，象收租院那样改造。**孔坟可以挖掉，但要有懂文物的考古人员在场参与，对墓中文物要保护。**陈伯达亦将上述精神直接告诉了谭厚兰他们。后来听谭厚兰汇报，根据陈伯达传达的总理指示精神，对孔庙的碑匾、文物要保护的都写上了红字保护，并留有照片。

考古队和学生们的去了之后，主要是当地贫下中农的造反队伍动手挖开了孔子的墓，发现里面全是黄土，什么东西也没有，连竹筒也没一片，更谈不上什么珍贵文物了。实际上，那是不是孔子的墓也不一定，说不定就是后人随意堆起的一个土包包。孔子当时没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他最高的官职只是个司寇，而鲁国又是个弹丸之地，能有多少东西留给他。孔子死的时候，他弟子还没有整理出《论语》呢，所以也不可能把《论语》放在里面。他一生是述而不作的，没有自己的专著。而《诗》、《书》、《礼》、《乐》各种典籍也不可能放在里面。

所以，所谓的孔子墓，只是在他被捧为“万人师表”以后，才由后人重新给他重修的一个墓。而孔子死时为他造墓的人都不是官僚、富亲，墓里没放什么殉葬品也是合乎情理的。实际上，几千年来，孔子的思想对帮助封建统治牢固自己统治阶级地位有利，他的墓实际上只是个糊弄人的象征。关于对孔庙里碑、匾等文物的清理，谭厚兰他们是根据陈伯达传达的总理指示精神，清朝康、雍、乾之前的碑、匾等东西，都是文物，不能破坏，以后的可以清理处理。谭厚兰她们当时就是按这个原则清理孔庙的文物碑、匾等东西的。

在我和关锋被打倒后，曲阜市里的一些人自己又起来造孔子的反了，叫做彻底反孔。他们批判我们包庇孔子，还不准砸康熙、雍正和乾隆的东西。他们要重新砸，于是有一块很大的康熙时修的碑被砸出了一条裂纹。文革结束后，有人说这些事情都是谭厚兰他们干的，其实不是，是曲阜市第二次大造孔子反的人干的。

在中南海里也有文物保护的问题。中南海的警卫战士说中南海里有很多都是皇帝的御碑什么的，要搬走。总理说，中南海里的文物要保存，清三代（即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东西要保存，1840年以后的东西，有许多也是文物，也要保存。我向战士们传达了总理的意见，战士们都执行了，他们知道，康熙、雍正、乾隆的东西不能搬，也不能砸。所以，历代皇帝们在中南海立的那些石碑都保留了下来。

关于华罗庚“图书馆也不让进，十几年看不到文献”的问题

“华罗庚曾说，早年在抗战时期虽然遇有劫难，条件艰苦，为数学读书做研究还是光荣的事；但文革的劫难却使他“图书馆也不让进，十几年看不到文献”，因为无法割舍对数学的热爱，文革中华罗庚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了要用数学方法给群众带来经济效益、“牢记把方法交给群众”的主张。这成为此后20多年间华罗庚放弃纯粹数学研究、投入数学普及工作的指导思想。他心甘情愿下基层，甚至还有许多当年的工人记得华罗庚边折纸条边讲黄金分割的情景。文革结束后，他仍然不遗余力地坚持推广数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选法和统筹法。”

——《文史参考——慷慨掷此身》

评：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驳：

我在网络绞尽脑汁地去查找有关华罗庚文革时期“图书馆也不让进，十几年看不到文献”的有关例证，但是出来的一篇一篇都是同一个文章《慷慨掷此身》，甚至也没百度到有什么科学家学者不让看书的事迹。

这种阅读题就和《智慧背囊》差不多，尽是一些“名人轶事”。话说回来，华罗庚在文革时期担任了竞赛委员会主任，“图书馆也不让进，十几年看不到文献”纯粹是无稽之谈。

可以引用的资料：

不仅如此，华罗庚还成为中国中学生数学竞赛的首创者。从 1956 年到 1978 年，他亲自担任竞赛委员会主任，培养中学生对数学的兴趣。“直到今天，‘华赛’依旧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青少年数学竞赛。”

来源：http://edu.china.com.cn/2011-04/06/content_22299129.htm

关于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因上报获奖人数太多而不能获奖的问题

谣言：“这个结晶牛胰岛素，是咱们中国唯一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结果诺贝尔奖委员会给咱们发来邀请函，让咱们往上报，你有几个人能够获奖啊，应该有几个啊，报几个啊。单项奖，至多三个，我们报了二百多人，我们把研究所扫地的，做饭的，刷厕所的全报上去了。我们是社会主义，我们只有集体主义，没有个人主义，没有工人给你扫地，做饭，刷厕所，你臭知识分子你结晶什么牛啊你，结晶耗子去吧，就报上去了。那报上去了，那你想人家能批准吗？瑞典国王跟扫地的刷厕所的握手？你侮辱的是瑞典民族！对吧！那咱这事就吹了。”

评：

袁腾飞这傻逼造的谣。

驳：

事实：当时我国是“以钮经义同志一人名义，代表我国参加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工作的全体人员申请诺贝尔奖金”根本没有什么“我们报了二百多人，我们把研究所扫地的，做饭的，刷厕所的全报上去了”。

曾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办公室副主任、生物学部副主任的薛攀皋研究员，在 2005 年 9 月 16 日的《科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我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成果的历史真相》(<http://www.ebiotrade.com/newsf/2005-9/2005919101814.htm>)的文章，以亲身经历澄清了这一问题，其中明确说到：

“1978 年 9 月，杨振宁向邓小平提出他准备提名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中国科学家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王应睐收到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主席 B·乌尔姆斯特洛姆等 6 位教授的来信，要他在 1979 年 1 月 31 日前推

荐 1979 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候选人。

“在得到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方毅、副书记李昌的同意后，钱三强便开始运作，向杨振宁发去电报和信函。1978 年 11 月 3 日，国家科委党组与中科院党组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认为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科学家，可以作为候选人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

“为此，1978 年 12 月 11 日至 13 日，钱三强组织并主持召开了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总结评选会议。与会的有 3 个单位参加合成工作的主要研究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 30 人，以及通过协商组成的评选委员会委员 17 人，他们是童第周(主任委员)、周培源、于光远、严济兹、华罗庚、钱三强、杨石先、黄家驷、贝时璋、张龙翔、王应睐、汪猷、冯德培、梁植权、柳大纲、邢其毅、过兴先。评选委员会的任务是对会议最后推出的候选人进行无记名投票。

“会议初步选出在合成工作中 4 名成绩突出者：钮经义(生物化学研究所)、邹承鲁(原生生物化学研究所，1970 年调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季爱雪(北京大学化学系，女)和汪猷(有机化学研究所)。

“会议认为，如以 4 人申请难以被接受；出 3 人，矛盾较多，而且联邦德国、美国在胰岛素人工合成方面也取得较好成绩，有可能此奖将由两国或三国科学家共同获得。据此，我国以一名代表申请为宜。北京大学和有机化学研究所认为，如出一名代表，理应由生物化学研究所选出。生物化学研究所则推荐钮经义为代表，认为他自始至终参加 B 链合成，成绩突出，也有一定学术水平。最后，评选委员会表示赞同。”

事实：中国没有因人工合成胰岛素获得诺贝尔奖，因为中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用的方法都是已知的、没有创新的方法，而诺贝尔奖要求则必须是完全创新的成果。据当时参与这一课题的北京大学化学系研究组组长张滂教授，几年前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就这个问题专门作了说明 (<http://ks.cn.yahoo.com/question/1306090210713.html>):

新京报：现在，对于人工合成胰岛素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有许多种猜测，因为 1958 年，英国化学家桑格就因测定了胰岛素的氨基酸序列而获得了诺贝尔奖。您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张滂：中国没有因人工合成胰岛素获得诺贝尔奖，不过也没有其他国家因为合成胰岛素而获奖。因为诺贝尔奖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必须完全创新的成果。1958 年，英国化学家桑格获奖的原因是他的发现完全是新的，前无古人。但为什么胰岛素这么一个复杂的东西合成了没有获诺贝尔奖，因为你用的方法都是已知的、没有创新的方法，所以就无缘诺贝尔奖了。中国想得也得不到。需要完全创新的成果才行。因为每个国家的研究方法都是应用多肽合成的方法，没有创新。获得诺贝尔奖的必须是完全创新的成果。

关于“鸡血疗法”的问题

会死人吗？是什么原理

我想不会。因为打鸡血疗法是将鸡血进行肌肉注射的而不是静脉注射。那自然就不会引起溶血反应了。而打入肌肉组织的鸡血会被吸收，当然由于是异体蛋白，异物进入会启动免疫系统清除，然而顺手治疗一些症状。（有的人说死人了，但是又没有干货证明）

这样看起来这么反智的治疗方法没人提出意见？

有的。不过我认为这也不是特别反智的治疗方法，就想针灸、中医没有科学道理证明一样。这种偏方，有一定的风险性。说白了，拔火罐，刮痧等也有风险，只是比打鸡血风险更小。都是利用身体本身的应激反应来，比如刮痧，把你皮下弄得大面积出血，再靠身体自动修复，提升免疫力。当时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安全的事情：“1965 年 6 月 12 日，上海市卫生局召开了专家座谈会，讨论后认为：鲜鸡血是有异性蛋白过敏性血清反应存在，不安全，“目

前虽未发生死亡事故，但如继续应用下去，意外事故势所难免，特别鲜鸡血治疗对象均为慢性病，该病本身无多大危险性，而治疗却冒着危险更值得考虑。”半月后，上海市卫生局写了《关于鸡血疗法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呈送卫生部，称将限令俞昌时立即停止私自给病人注射鲜鸡血试验的行为。

1965年7月23日，国家卫生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同意上海市卫生局调查报告的看法和处理意见，通知强调，“今后，应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以免发生过敏危险。群众要求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予治疗者，应加以劝阻。对于群众中流行的各种传说，应进行必要的澄清和解释。”

由于鲜鸡血过敏性血清反应严重，静安区卫生局与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协作，将鲜鸡血制成脱敏鸡血粉，“经试用观察，未见任何反应”。于是，在1962年下半年开始，该局就停止使用鲜鸡血，改用鸡血粉。”

那么究竟有效果吗？

效果是有的，副作用也是存在的。《二十世纪上海大博览》夏东元主编 上海文汇出版社 1995 871页：10月20日，文汇、解放两报同时发表关于“鸡血疗法”的答读者问。文章说，根据过去几年的临床试用情况，鸡血疗法对功能性月经过多、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等疾病，近期有改善症状作用；对慢性肝炎、高血压等其他疾病，尚未其确实疗效，有关单位正在试用研究。由于鲜鸡血注射反应较多（一般为发热、局部红肿、腹股沟淋巴结肿大、皮疹，个别严重者可过敏性休克），鸡的疾病是否会传染给人等问题尚未解决，为对人民健康负责起见，报道称不宜普遍使用。

静安区卫生局调查证实，俞的确用“鸡血疗法”治过203例，“由病人口述所得的资料分析：对月经过多、胃溃疡、偏头痛等主觉症状有改善者达65%”，但同时也指出，“其中有36%发生高热、寻麻疹、淋巴结肿大等反应”。

上海市卫生局的调查报告显示，根据两年多试验积累的688个病例分析，近期内疗效较好的是：月经过多，有效率达97.8%；其次是消化系统溃疡，有效率78%。大部分病人注射后食欲增加，睡眠改善，精神好转等。但是不良反应也较严重。打过4针以上鸡血的980例病人中，发生反应165例，占16.6%，大都在接受鸡血治疗后第五至七天发生反应，包括畏寒、发热、腹泻、淋巴结肿大、寻麻疹、局部红肿疼痛、休克等。其中大多数为发热反应。反应程度与注射剂量成正比。而且，还出现了6例休克反应。病人注射鸡血后，立即发生胸闷、气促、头晕、眼花、四肢无力、面色苍白、两眼球结膜充血、心率增速等情况。但报告特别强调，“经急救恢复”。

2008年，北京收藏家赵庆伟得到一本《鸡血疗法》小册子，是1967年7月由“小汤山革命造反大队”翻印。这本册子里提到，首都红卫兵和上海红卫兵合组“鸡血疗法”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核实其疗效，称这一疗法对“备战、备荒、为人民”将是最大的贡献。

那为什么当时那么有名呢？

官方对此一直保持保留态度。这么一个方便的方法，在《赤脚医生手册》（上海版）、《“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培训参考使用）、《“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北方地区培训参考使用）中都没有提到。得到《赤脚医生手册》、《赤脚医生培训教材》推广的有新针疗法、卤碱疗法、穴位结扎疗法及埋线疗法、经穴注射疗法等，不知为何反而不如“打鸡血”有名，喷的人也少……

上海卫生局后来的调查报告称，俞昌时让病人到他家中治疗。打着“技术革命”的旗号，俞昌时听不进任何劝阻，他说：“陈中伟断手再植接血管算不了什么，我也会做，鸡血疗法才是真正超国际水平的！”俞昌时向全国各地印发大量宣传“鸡血疗法”的资料。据统计，有

二十七个省、市（县）的医疗单位或个人收到了“鸡血疗法”资料，一是标榜“鸡血疗法国际领先”，所以中央指示要“秘密研究”；二是宣扬有很多“老干部”私下使用，“能治六十几种痼疾的神药”。在他印制于 1964 年 8 月的《鸡血疗法》一书中，辑录了一百多个病例，宣传方式与现今充斥电视和报刊的各类神奇“秘方”如出一辙。在信息闭塞的年代，“中央指示”和“老干部”私下享用的“秘密”之说具有很强的蛊惑性。上海卫生局后来的调查报告说：“在全国各地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有的群众抱着鸡求医注射甚至自己注射。各地卫生部门也纷纷来信或者派人来沪了解求治，情况相当混乱”。

我的观点

我觉得这就像文革时期着力研究针灸麻醉手术一样，只不过针灸麻醉手术成功了，鸡血疗法失败了。“捧得越高摔得越惨”，它失败的原因大概就是如此。如果俞昌时一开始就不那么夸大鸡血疗法的作用、接受脱敏鸡血粉，我想也许现在它也可能成功并作为治疗慢性病的药物的一种。

引用资料来源：关于鸡血疗法 - 夏三月 <https://zhuanlan.zhihu.com/p/40408296>
百度知道 <https://zhidao.baidu.com/>
https://www.sohu.com/a/34097057_189717

关于“八亿人民八部戏”文革时期文艺作品匮乏的问题

评&驳：

上百部电影(不算记录片)、上千种小说(长中短篇不算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上万本连环画，在那个东风浩荡的十年——谁跟我说只有 8 个样板戏？？？（样板戏事实上有 23 个好不好！）

毛主席教导我们：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平呢？”（《反对本本主义》），

可以引用的资料：

记得我当初在 B 站投稿文革时期拍的电影就是为了驳有些人的“八亿人民八部戏”说法，有些人说什么“1966 年到 1976 年十年间，中国人在银幕舞台上只有八部样板戏可以看”，这个说法是相当荒谬的，这说法以前很有市场，现在信的人少了点，不过还是有人信。

很简单的反例，非常有名的电影《闪闪的红星》是几几年的？1974 年的，这不就是十年里的年份么。然后我投稿那十年里出的电影让别人看到，这就能直接证明那会绝不止八个戏看。

事实上，从 1970 年到 1976 年间，单是电影就拍了至少 90 多部，一年平均十几部，而且都是公开放映的，期间还引进了几十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比如很有名的有《卖

花姑娘》，期间部分经典老片也不断重映，比如《地道战》等片。1967-1969 年没新拍电影，但纪录片一直在拍，当时电影院文化室不单放电影，还放纪录片和科教片，有资料显示 1967-1976 年间除新闻简报外的纪录片就拍了 500 多部，连新闻杂志片有千余部。所以综上所述，十年间人们能看的东西，绝没某些人张口就来的那么少，而且十年间除了样板戏外，还出了不少经典电影，除了上面的说的《闪闪的红星》，还有《南海风云》《南海长城》《渡江侦察记》等电影。

下面以一个由文革时期群众能看的部分电影名字组成的段子作结尾：

“我是一个《卖花姑娘》，出生在《劳动家庭》，住在《鲜花盛开的村庄》，爸爸是《轧钢工人》，妈妈是《南江村的妇女》，姑姑是《金刚山的姑娘》，弟弟叫《阿福》。为了《打击侵略者》，我参加了《地下游击队》，首长给我戴上了《闪闪的红星》。我和这些《勇敢的人们》点燃了《森林之火》，迎来了一个个《战斗的早晨》。在《摘苹果的时候》，我们登上了《青松岭》，仿佛听到《前方再召唤》，于是，我们迎着《海岸风雷》，涉过《多瑙河之波》，朝着《广阔的地平线》前进。在路过《琛姑娘的松林》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敌人的《脚印》，立刻派《侦察兵》侦察。我们利用《伏击战》《奇袭》敌人，在《铁道卫士》的帮助下，打破敌人《看不见的战线》，终于使敌人《原形毕露》了。

后来，我和《战友》组建了《平原游击队》，我们学习《永生的战士》《宁死不屈》的精神，利用《地道战》《地雷战》，取得了《九号公路大捷》。以后，又经过艰苦卓绝的《南征北战》，终于打出了《火红的年代》，走上了《金光大道》，迎来了《艳阳天》。所以，我们被祖国人民称为《英雄儿女》。故事就讲到这里，下次再讲《向阳院的故事》”

以上这些都是文革时期群众能看的电影

来源：<https://weibo.com/5672145550/J3tLpkzQn>

为什么说“八亿人民八部戏”？因为最有名的就那八部戏，而且有名并不单单只是样板，艺术成就也极高的。之后 40 年了还没有艺术成就高于这几部戏的戏剧作品出现。

文革时期以群众文艺为主，从省到大队都有文艺宣传队，各级会演调演频繁，所以小戏非常繁荣。除了地方戏移植样板戏之外，还有无数群众自己创作或和专业人员三结合创作的小戏，著名的有越剧《半篮花生》、花鼓戏《送货路上》、湘剧《园丁之歌》、淮剧《拣煤渣》、《一副保险带》等等，这些提到的都是拍了戏曲电影的。

当时重视地方戏，各村县的正式与非正式剧团会结合地方戏的形式重拍样板戏，或创造新戏。但基本没有留下影像，所以现在难看到。可参见沙垚和赵月枝二位近来发表在杭州师大学报上的文章，以浙江缙云县地方戏为例的研究，这里现在仍保留一定传统。以及《高家村》对文革地方戏发展的记录，以及改开后的崩坏。

那现在这样的电影一部和 100 部有区别么，到现在这几十年了，京剧有超越《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的吗，舞蹈剧有超越《红色娘子军》的吗，这样的好戏当然是多多益善。

早在 2000 多年前杨朱的失败就已经证明了个人自由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鼓吹个人自由、英雄史观，无非就是想表达历史是由关键人物推动改变的跟泥腿子们无关，他们愚昧无知活该被领导。别吹了，鼓吹个人主义的文艺作品即使形式再好也不过是裹着奶油的大便而已。

文革期间的社会主义文艺是要反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指导人民推翻反动阶级的压迫剥削，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如果人民连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都推翻不了，片面追求多元有什么作用呢？况且社会主义文学就真的单一吗，《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红岩》等优秀的革命文学著作，真的都千篇一律吗？

资产阶级文艺不都记录着资产阶级站在占据着工农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的花天酒地和风花雪月吗？对工农的记录不都是用慈善这种欺骗性的手段来掩盖其剥削的本质吗？至于社

会主义文学艺术单一、片面、洗脑一说，这是非常片面的一个观点。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消灭阶级差别，实现无产阶级的共同富裕生活。

什么样的社会文艺为什么样的经济基础服务，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文艺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社会主义社会下的文艺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没有超阶级的艺术。至于你所说资产阶级文艺为何“多元”，那是资本主义社会下不同阶级的多元，在于资本注意社会下存在的贫富差距和阶级格差，且这种本质是作为其发展运作的目标存在的

你们很多对江青的认知只来源于 80 年代后的批判资料，江青曾经多次用笔名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对资产阶级文学艺术进行批判，并非你口中最爱看小资产阶级的电影，您也可以多翻阅一下她和杜近芳、袁世海和当年上京国京院团和地方剧团的交流谈话，指导意见来判断一下她的文艺水平。

人家针对小资产阶级文学艺术作品的确研究了不少，只不过是看一部批判一部，被人家当做批判资料来看有点好笑了。以静静的顿河为例，不管是在女儿还上学的时候还是在对京剧团工作指导意见里都会批判这部小说。哦，对了，64 年人专门多次找过邓小平夫人卓琳让她和某人谈毛的“双百方针”没执行，结果卓琳置之不理。可见这些责任不该由江青和文革来背锅。

来源：<https://weibo.com/5672145550/J3tLpkzQn> 的评论区（我还是对这些评论进行了一些编辑调整但仅仅是为了方便阅读）

在“样板戏”的带动下，以江青为首的在毛泽东文艺革命思想路线下的群众性文艺革命和革命文艺，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文化现象

其实，我们左派队伍里，许多人是搞文艺的，或是懂得文艺的。为什么不能在一起搞一些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呢？

什么是“样板戏”？就是人民大众都能够传唱的、通俗易懂的、又有一定的文艺水平的贴近工农生活的大众戏剧。样板戏那时人人会唱，处处上演，不但丰富群众的文艺生活，而且从中得到政治的滋养。丰富了群众多采的文艺生活。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根据样板戏的基本原则，创作一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呢？为什么？有什么问题吗？！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中只有“八个样板戏”，那是胡说八道，那个时代的文艺，在“样板戏”的带动下，先不要说文革初期的各地区、各种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文革中后期的年年全国文艺调演，就是从各省市、各地区丰富多采的群众文艺创作的作品中汇集、演出的，再回到各地的文艺团体，为丰富广大的人民群众文艺生活服务的。那时不但有深入社会生活的专业创作队伍，而且有着更为广大、普遍的群众业余创作队伍。因此，那时有大量的反映工、农、兵的文艺作品出现。“草原英雄小姐妹”、“草原小学”、“草原门巴”，仅草原上的歌舞就能一口气说上几个，那些美妙的音乐至今也难忘记。还有“阿妹上大学”、“送粮路上”……、各种文艺形式的作品层出不穷，诗歌、文学、演唱、小话剧、电影、地方戏。音乐上更是五彩缤纷，独唱、合唱、各种乐器的独奏、协奏、民族管弦乐在编织上的扩展，西洋管弦乐队纳入中国乐器，更具有了中国气派。甚至对民族乐器的改良，文艺的改革、创新触及到各个层面……。就不用再说那个著名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了吧，它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名曲。有谁还记得那个革命文响乐《沙家浜》的宏伟气势吗？

文革初期的三军演出的大型历史歌舞、海政文工团的《毛主席来到我们兵舰上》、空政文工团的《井冈山的道路》、战友文工团的《长征组歌》……。各派红卫兵们的革命组歌，大联唱《红卫兵组歌》，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编演的大型歌舞史诗剧《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首都中学红代会红卫兵编演的歌舞《红卫兵战歌》。各地区、有各种人群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连街道的老头、老太太们都上街跳舞、扭秧歌。那时还有一个极有艺术天赋的盲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活跃在午台上。

有一首中央音乐学院的老红卫兵们创作的钢琴协奏曲《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令人至今难忘，描写了红卫兵从诞生、造反、反刘邓工作组、毛主席接见、红八月、全国大串连、整个运动的全过程。它开创了中国钢琴协奏曲的先河，只是不被人提起，但我坚信终有再排演的一天。因为，它真实地记录、反映了一个革命时代的史实，艺术上也是很有水准的，那些创作者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教育的，其中又参与了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创作。

一年出一本“战地新歌”，人民群众年年有新歌唱，年年有新感觉。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生活在一个笑语欢歌的年代。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时代吸引了全世界友好国家、爱国人士关注中国的原因。

可以这样说，一个时期的文艺，可以看到这个时期人民的精神风貌。而一个时期的文艺又代表着一个时期的政治状况。这个时期的文艺革命，反映了人民群众、各个兄弟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涨热情、反映了国家欣欣向荣的崭新气象。说明了人民群众的文艺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翻身，说明了文艺革命的大众方向。说明了人民群众的大众文艺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群众基础。

在“样板戏”的带动下，以江青为首的在毛泽东文艺革命思想路线下的群众性文艺革命和革命文艺，在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文化现象。

革命文艺，是中国共产党从红军“根据地”时期，到延安的抗日“解放区”时期，又到解放全中国的各个战场、抗美援朝，建设社会主义，在全部革命历史中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打倒一切内外反动派的有力武器。文艺的革命和革命文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达到了高潮，今天怎么能弃之南山呢？

有一些人，在那个时代个人受过刺激，不让唱“样板戏”，听不得“样板戏”，一听到“样板戏”就浑身不舒服、就浑身打哆嗦，这是为什么呢？！问一问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工农大众，看一看今天的人民群众在令人沮丧的影视文艺氛围下，对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凶杀作乐、荒淫无耻的生活场景的冷漠与蔑视的情绪，也就知道了。这两种根本不同的文艺观不是表达的泾渭分明吗？！

人民群众如今还是喜爱“革命样板戏”。因为“革命样板戏”是在毛泽东文艺革命思想路线下的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革命文艺！

（《说文化革命中只有“八个样板戏”，那是胡说八道》 作者：醉禅）

【八亿人民八部戏吗？】 1966年-1976年中国国产电影目录

现在网络上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八亿人民八部戏”，由于现在大多数人往往不喜欢查，人云亦云，就想当然的把这话理解为1966年-1976年的中国只有八部样板戏陪着八亿人民，很多人都是理解的，本质实事求是的原则，本专栏贴出了目录，看看历史中的十年是否仅有八部样板戏。首先声明，从1966下半年到1969年的三年半的时间里，电影界除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和其他厂纪录拍摄的纪录片以外，好像是没有拍摄出一部故事片，算是故事片的空白期。但是，从1970年开始，李进为了扩大八个样板戏（在被拍成电影前，许多戏自66年后就已被灌制成唱片供人听）的影响，开始组织创作人员对八个样板戏进行电影拍摄，随后陆续开始了电影拍摄工作。下面是从那以后的国产电影目录。

1970年-1976年中国国产电影目录

1970年2部北京电影制片厂

1部：《智取威虎山》（京剧）

八一电影制片厂1部：《红灯记》（京剧）

1971年2部北京电影制片厂1部：《红色娘子军》（舞剧）

长春电影制片厂1部：《沙家浜》（京剧）

1972 年 5 部北影厂与上影厂合拍 1 部：《海港》（京剧）
 北影厂 1 部：《龙江颂》（京剧）
 上影厂 1 部：《白毛女》（舞剧）
 八一厂 1 部：《红色娘子军》（京剧）
 长影厂 1 部：《奇袭白虎团》（京剧）
 1973 年 4 部北影厂与上影厂合拍 1 部：《海港》（京剧，重拍）
 长影厂 3 部：《艳阳天》《战洪图》《青松岭》
 1974 年 17 部北影厂 4 部：《杜鹃山》（京剧）《侦察兵》《南征北战》（重拍）《送货路上》（湖南花鼓戏）
 上影厂 4 部：《火红的年代》《无影灯下颂银针》《渡江侦察记》（重拍）《一副保险带》
 八一厂 2 部：《平原作战》（京剧）《闪闪的红星》
 长影厂 5 部：《创业》《钢铁巨人》《平原游击队》（重拍）《向阳院的故事》《半篮花生》（越剧）珠江电影制片厂 1 部：《沙家浜》（粤剧）1975 年 24 部
 北影厂 6 部：《海霞》《红雨》《决裂》《草原儿女》（舞剧）《烽火少年》《渡口》（河北梆子）
 上影厂 6 部：《战船台》《春苗》《第二个春天》《小将》《人老心红》（淮剧）《拣煤渣》（淮剧）
 八一厂 4 部：《沂蒙颂》（舞剧）《激战无名川》《红灯记》（维吾尔语歌剧）《雷雨之前》
 长影厂 5 部：《金光大道（上集）》《车轮滚滚》《长城新曲》《黄河少年》《沙漠的春天》
 西安电影制片厂 2 部：《碧海红波》《阿勇》
 珠影厂 1 部：《小螺号》
 1976 年 38 部
 北影厂 7 部：《反击》《山花》《沸腾的群山》《宝莲灯》（上、下集，河北梆子）《青春似火》《牛角石》《海上明珠》
 上影厂 13 部：《欢腾的小凉河》《年轻的一代》（重拍）《磐石湾》（京剧）《征途》《难忘的战斗》《江水滔滔》《审椅子》（京剧）《新风歌》《金锁》《阿夏河的秘密》《管得好》（吕剧）《三定桩》（莱芜梆子）《小店春早》（黄梅戏）
 八一厂 4 部：《红军不怕远征南——长征组歌》（舞台艺术片）《南海风云》《红云冈》（京剧）《南海长城》
 长影厂 7 部：《雁鸣湖畔》《芒果之歌》《长空雄鹰》《锁龙湖》《山村新人》《金光大道》（中集）
 西影厂 1 部：《开山的人》
 珠影厂 3 部：《枫树湾》《山里红梅》《红霞万朵》（黄梅戏）峨嵋电影制片厂 2 部：《寄托》《春潮急》
 广西地区 1 部：《主课》
 所贴名单共有 92 部
 1970 年-1976 年期间复映的国产故事片 .
 ----1970 年 6 月 25 日复映----
 《打击侵略者》（八一 65 年）
 《英雄儿女》（长影 64 年）
 《铁道卫士》（长影 60 年）

《奇袭》（八一 60 年）。

---1971 年复映---

《地雷战》（八一 62 年）。

---几乎一直复映的---

《南征北战》（上影 52 年）

《地道战》（八一 65 年）

《平原游击队》（长影 55 年）

重拍片（指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公映后，老片一度停映。

美术片在 1966 年-1976 年中一直放映的有《草原英雄小姐妹》、《红军桥》和《半夜鸡叫》三部。

1966 年-1972 年间拍摄的美术片名单如下：

1972 年 《放学以后》 动画 严定宪 上海美影厂

1972 年 《万吨水压机战歌》 剪纸 胡进庆 邬强 上海美影厂

1973 年 《小号手》 动画 王树忱 严定宪 上海美影厂

1973 年 《东海小哨兵》 剪纸 胡雄华 上海美影厂

1974 年 《带响的弓箭》 剪纸 胡进庆 上海美影厂

1974 年 《小八路》 木偶 尤磊 上海美影厂

1975 年 《出发之前》 剪纸 周克勤 钱家辛 上海美影厂

1975 年 《大潮汛之夜》 动画 唐澄 邬强 上海美影厂

1975 年 《渡口》 动画 何玉门 上海美影厂

1975 年 《骏马飞腾》 木偶 靳夕 刘惠仪 上海美影厂

1976 年 《长在屋里的竹笋》 剪纸 胡进庆 周克勤 上海美影厂

1976 年 《大櫓的故事》 木偶 尤磊 上海美影厂

1976 年 《金色的大雁》 剪纸 特伟 沈祖慰 上海美影厂

1966 年到 1976 年国内发行的外国影片 36 部

据资料显示，1967-1976 年，中央新影厂和八一厂共摄制长短纪录片 509 部，连同新闻杂志片共 2037 本。各地科影厂拍摄科教片也达上百部。

综上，把“八亿人民八部戏”理解为 1966 年-1976 年十年间，中国人只有八部样板戏可以看，是无知且错误的。那么这句话本身是不是错误的呢？实事求是的讲，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句话是正确的，那就是单论故事片的话，在 1966-1969 年只好听样板戏，看纪录片，没有其他的电影看，放其他方面其他历史时期的话这句话就是不对的。70 年-72 年大部分样板戏为主，但仍有复映的其他片子看。73 年后，片子就多起来了。

作者：林苑风清来源：<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385973? from=search>

关于《相对论批判》、“打倒反动学说相对论”的问题

评：

政治语言是时代赋予的，并不是这篇批判性文章的根本内容。所以以那些有政治斗争色彩的语言为根据，对文章做出的判断是被带歪了的判断。

每个补充了时代困惑的理论都是这样的；被拥戴的代价是修正其他概念，让所有相关概念与之相互衔接、互为补充。

哲学包括数学都是必须付出代价的；在盛行理论面前，哲学和数学都被要求对理论做出相应的解读。于是新的哲学思想和新的数学概念就会应用而生、应用而变。不仅如此，一个

理论的盛行不仅影响其他学科,而且也会催生新的科学文化。所以批判一个盛行理论的过程,不仅仅是面对其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或一个数学公式,而是面对着所有相关概念,以及为其服务的哲学、数学和更为庞大的科学文化。

如果哲学和数学都能够像形式逻辑一样具有自身独立的发展,而不是去追求与盛行理论达成相互契合,那么科学理论就只能是一个不断发展与进步的过程,而不会是一个形成终结的过程。

(来源: <https://tieba.baidu.com/p/4742209264> 27 楼)

温暖阳光网友近日在乌有之乡发了《精英嘲笑文革批相对论,却闹了大笑话》一帖。

(<http://www.wyxxwk.com/Article/zatan/2014/12/334386.html>) 众所周知,这种“嘲笑”从文革被“彻底否定”之后不久就出炉了,目的是为了证明毛主席的“荒唐”、文革的“极左”。那么,文革中有同志批相对论,究竟批了相对论的什么问题,怎么批的,同爱因斯坦有什么关系呢?对此,这些精英要么浑然无知,要么故意隐瞒,要么装疯卖傻。

其实,文革时发表的《相对论批判》,主要批的是爱因斯坦的哲学观点,以及这些哲学观点是如何渗透到相对论的物理学内容中去的。爱因斯坦的主观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哲学观点,为什么不能批?批了这些哲学观点,就等于全部否定了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和在社会活动中建立的功绩吗?

反过来,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以及现时中国的所谓公知精英们,为什么口口声声“言论自由”、“科学无禁区”,却把相对论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禁脔,把爱因斯坦当作必须顶礼膜拜的偶像,不许人们有半点质疑和批判呢?

列宁早就深刻地揭示了其中的奥秘:“只要回顾一下欧洲各国经常出现的时髦哲学流派中的多数流派,哪怕只回顾一下由于镭的发现而兴起的哲学流派,直到目前正在竭力抓住爱因斯坦学说的哲学流派,就可以知道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阶级立场及其对各种宗教的扶持,同各种时髦哲学流派的思想内容之间的联系了。”[《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12日)]

(来源: <https://tieba.baidu.com/p/4742209264>)

可以引用的:

我觉得那篇文章没问题,相对论在哲学解释上本来就有错误。这涉及到参考系问题,里面详细批判了光速不变原理在参考系方面的“狡辩”

光速不变原理指的是任意参考系下光速不变,这是至今也未被证实的假设。

相对论中有真理,可是爱因斯坦作为马赫主义者,却对这种物理现象进行了错误的哲学解释,导致相对论中包含了唯心主义成分,比如爱因斯坦否定“绝对的运动”,认为一切运动都是相对的,还说出了一个“电梯案例”,特斯拉就讽刺他,如果我在电梯里向上或者下发射火箭,难道电梯的引力变大了?这些都是爱因斯坦不能解释的,爱因斯坦从来没有对光速不变原理做出解释,直接把这个假设当成真理。

光速不变原理是由联立求解麦克斯韦方程组得到的——麦克斯韦方程组的大前提是什么?麦克斯韦的方程组大前提是有“以太”在19世纪,人们认为宇宙空间还存在一种物质叫“以太”麦克斯韦正是用这个绝对静止的“以太”当做参考系,写出的方程,可是爱因斯坦时代已经否定了以太,却直接把方程组的结论拿来用,也就是说,爱因斯坦是没有任何确定参考系的。(补充问题:后来用引力波代替了以太?——这是两码事一个有一个确定的参考系,一个没有,光速不变原理说的是什么?任意参考系,光速不变)

关于广义相对论,在非惯性系上,洛伦兹变换这几个定理不能用。爱因斯坦也不知道为啥非惯性系光速不变,但他拿光速不变放进去一推理得出的广义相对论刚好和实验观察的现象符合,所以就不管他了。而且广义相对论里光速不变只局限于部分时空区域,而不是全部

时空。他就是蒙的，不过恰好蒙的比较符合实验现象。局部时-空区域光速不变是广义相对论的基础假设。例如双缝实验,每次只发射一个光子，还能干涉，就是我干涉我自己。

（根据咨询“可怜儿”和“Backtolife”的回答进行了整合）

列宁者在 1905 年至 1908 年间，第一个批判了相对论，指出相对论的要害是马赫主义，是感觉的复合。《自然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的奇迹。

1971 年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提出要读点马列。我就读了点马列。1972 年春节回上海，看到普通物理学上对相对论的介绍，一眼就看出普通物理学在利用相对论宣传马赫主义的感觉的复合，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在绝对时空里推导出了洛伦兹变换。

反相不是文革的首创。早在爱因斯坦刚刚发表《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不久，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就撰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哲学上对相对论进行了批判。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又写了《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直接点了相对论的名。

毛主席作为一个哲学爱好者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者，早在 1937 年，就在抗大发表了“辩证唯物主义提纲”，《实践论》、《矛盾论》是其中的两章。未正式发表的还有喜多章。其中有一章为《真理论》，里面直接指出：唯心论的相对论是实验主义。

所以，毛主席在文革中提出批判相对论是必然的。

但是，在文革的条件下，各参与批判相对论者动机各异，水平也参差不齐。由陈伯达发起的批判相对论，很快就偃旗息鼓了。

而四人帮则在 1972 年左右参与了进来。四人帮在复旦大学成立了李柯写作班。负责人王知常就是一个自以为是，不把革命导师放在眼里的维相者。他曾经叫嚣，要贴恩格斯 100 张大字报。而复旦大学一批教师，则利用这个机会，把文革对他们们的错误冲击，发泄在革命导师身上，上演了一场拙劣的假批判真包庇的评爱丑剧。

这出戏的主角是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自然辩证法杂志》是面向大众的以口号式批判为主的普及型杂志。

所以，Incinc 贴出的该杂志的文章错误并不是很多。而复旦学报上的评爱文章，假批判，真宣扬的地方就很多。

关于李柯的错误，我在本吧也早就贴出来过。正因为四人帮的阻挠，中国科学在文革中没有刊登我的反相文章。文革后，中国科学一度打算登我的批判四人帮对相对论假批判真宣传的文章，可是又在周培源的反对下泡了汤。

有人说哲学归哲学，科学归科学。这是不可能的。科学是从现实的客观现象总结知识。可是怎么分析客观现象，唯物和唯心主义就要在这里战斗起来。

狭义相对论的适用范围是“惯性参考系”，可是广义相对论却认为在惯性参考系中成立的“相对性”，在其他任何参考系中都成立。他们便说，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是没有区别的（我们知道在一个假想的静止参考系下，双方是围绕质点旋转的）。也就是说，加速度场和引力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等效的。

对于同时性，爱因斯坦举了闪电击中两处铁轨的例子。他说，如果观察者站在中点，那么他会看到闪电同时击中两处铁轨，但是如果有列车在上面行驶过，由于距离不一样，他看到两处闪电前后击中铁轨。所以，同时性也是相对的，一切取决于观察者。把一切归结为关系。

（来源自贴吧，链接 <https://tieba.baidu.com/p/4742209264>）

温暖阳光：精英嘲笑文革批相对论，却闹了大笑话

那天有个蒋右说：文革还批相对论，太荒唐了！

我回答：现在很多科学家研究相对论有错，比如研究可能超光速，量子力学跟爱因斯坦

理论矛盾的地方也证明量子力学对。科学研究难道不能怀疑？文革时候教科书认同相对论、也能批，这不是科学态度？现在不让批相对论，这不是错的？

蒋右：那用毛泽东思想领导科学研究也不对！

我回答：现在说改开思想让科学发展，你们说资本家领导的公司如何促进科技，这不是说某些领导思想领导科研？毛泽东思想组织者，科研是具体研究，科研需要组织，这领导有错吗？

接着我去查文革时候批相对论的文章，看到现在某大报讽刺文革表示：“文革陈伯达要批相对论，周培源当时说狭义相对论早已经被事实证明(同一件事情就有好几种说法，有的大报说“周培源说狭义相对论已经被事实证明，批不倒”，有的说“周培源说狭义相对论搞不动。”，有的说什么周培源说要闹大笑话)这个嘲笑逻辑等于说，相对论是绝对正确的，不能怀疑，否则是国际笑话；作者认为相对论绝对权威，根本是不可置疑的绝对真理，质疑就是笑话。这句话就证明作者自己无知，还把自己的编造的东西放到周培源身上(周培源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会说这样的话？)。改开这不等于是说不让以后科学家去怀疑相对论，通过自己的政治树立物理的绝对真理，树立学霸？

相对论部分被实验证明(比如时间变慢、大质量物体导致时空弯曲。且相对论解释不了为什么会这样，本质是什么)，部分没有实验证明，有的证明相对论是正确的实验是在文革以后做的，(怎么可能周培源文革时候说狭义相对论已经被事实证明？)。这也证明改开嘲笑文革批相对论很无知，自己才是个笑话，且满嘴谎言。

当时让批相对论，课本里也教相对论，所谓的批就是允许怀疑反驳，根本不是说批相对论就是官方确定相对论错了(如果是官方认定相对论错了，那为啥让那么多教授发表言论反驳对方，教学也以相对论正确为基础教学生？)。嘲笑的等于说相对论是绝对真理，不能怀疑，这才是笑话。批相对论的文章在报纸发表是陈伯达下台之后，这说明所谓陈伯达让批相对论根本是谎言。至于说有造反派认为相对论错了，那是基层群众，根本没在任何大报上发表，你嘲笑人家就等于说不让群众怀疑？

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量子缠绕”都跟爱因斯坦的理论矛盾，量子力学跟相对论有些矛盾地方不能统一，后来证明量子力学有很多是对的。爱因斯坦的理论基础是认为“世界有绝对能测准的物理规则，只要掌握了就能预测到各种粒子以后的状态”，量子力学认为“粒子同时保持几种状态，可能出现在好几个位置，粒子什么状态出现在什么位置是测不准的，只能是出现在某个位置的可能性大(概率也是根据这个)”，爱因斯坦和波尔通过实验和辩论(爱因斯坦质疑量子力学这不像上帝掷骰子？)、加上后来的实验，证明量子力学的这个理论是对的，不可能测准粒子的位置。量子缠绕说的是“两个成对的粒子，不管距离多远，你对一个粒子施加影响，另一个粒子几乎是瞬间、几乎是超光速的就会感觉到，好像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爱因斯坦认为这个理论比较荒唐，现在量子缠绕已经被实验证明。有的量子力学的正确结果爱因斯坦也算出来了，他这不合他“世界有完美能测准”的理论，因此他把自己正确的否定了。相对论认为“不能超光速”，现在很多科学家就要否定这点，且有了一些可疑的超光速的例子(后来被否定)，这也说明全世界都是可以怀疑相对论的，不是说批评相对论就是笑话。

上面的事实说明，一直有理论证明爱因斯坦的理论有问题，实验证明爱因斯坦的理论有错，并不是全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现在也没被实验完全证明，有的是在文革之后才被实验证明(时间变慢)，那么所谓周培源说“相对论被实验证明，批就会闹笑话”是作者编造的，周培源作为物理学家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上面的那些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争证明全世界科学家都可以质疑相对论，(不管怎么说，相对论的很多部分也是争论的)，从来没什么全世界科学家认为质疑相对论就是笑话，周培源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怎么可能不知道物理学的这些往事，怎么可能认为批相对论是笑话？后来陈伯达回忆录也证明周培源没说过那样的话，是编

造的。

此文说“随着 79 年纪念爱因斯坦大会召开，质疑相对论闹剧结束了”，就表现了作者极为可笑：没被实验完全证明，难道你纪念爱因斯坦了，之后别人就不能质疑了？作者不觉得自己这逻辑极为可笑？这不等于说改开很专制，不用实验，自己官方宣布不让质疑了就不能了？爱因斯坦自己也没说过不能质疑批评他的理论，此文的逻辑“79 年纪念爱因斯坦大会召开就停止质疑相对论了”等于违反了爱因斯坦自己的原则。

文革那篇批相对论的文章有几个方面，其中一个就是说辩证法是对的，用辩证法论证一些相对论的问题。辩证法认为“世界没有绝对的，不是静止的”，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也证明世界不是绝对的。辩证法认为世界事务是对立统一，量子力学的实验也证明正反粒子等等是成对的、正反粒子碰撞会导致湮灭，这也符合世界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总之，文革怀疑相对论，量子力学证明辩证法是对的，说明人家文革批相对论没啥不科学的。至于有人说什么文革群众质疑多荒唐刚，这就更可笑：群众能质疑本来就是一种言论自由，群众可以议论，很多人思考这问题，总有想到正确的，这就为国家造就了更多的科学家基础。

改开嘲笑文革相对论的文章反而证明自己愚昧和谎言满嘴，也证明改开到处树立科学权威，制造绝对真理，不让别人质疑怀疑。文革时期只是毛主席看到有人批相对论，就问科学家相对论能不能批，科学家认为相对论有的方面不好说，有的方面能批。嘲笑什么文革有群众说“相对论主观，这本身就可笑：现代很多理论就算计算很正确，但无法实验证明，就被认为是主观的，不能认为它是正确理论(弦论就似乎能完美解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但它现在没法实验证明，只被认为只是主观的)，这说明嘲笑文革的那人无知。这本这梦批相对论说明文革科技民主——即能教科书教你相对论，也让人批，没有树立谁是绝对权威。毛主席也没说相对论就错，也没说不能批。

现在的实验证明现在可能改变过去(一个光子穿过双缝的时候，因为预先设置的观察方式不同，导致光子的形态也不同，说明现在改变了过去光子的走向)，这实验证明时间是什么不好说，过去和现代、因果关系也不是绝对的(现在的果可以是因，果可以改变因，可能现在的果是因，因果可能只是不同的位置变化)。这种实验本身就对相对论有动摇。比如认为不可能回到过去，因为破坏因果律，但多重宇宙理论就可以不破坏因果律回到过去。总之，科研就是可以怀疑任何理论的(有人说，毛泽东思想怀疑吗？当然反人民的势力要自己暴富骑到人民头上，当然认为是错的，多数人愿意共产剥削财富就认为是对的，这是立场问题。毛泽东思想不是谁树立的，而是经过毛泽东领导党取得巨大胜利证明的。再说，没人不让你怀疑，只是别人也可以认同，对着来。不让别人质疑改开，这不是很奇怪？)。

再说，这事本来就证明文革学术自由，文革普通老百姓也有了言论自由：文革科技民主，普通人员也敢质疑权威，也可批、也可认同；现在什么导师剽窃学生论文，一个个砖家成了学霸权不让质疑。资本主义社会大资本家办媒体、民国文盲多也没地方发表这种意见，普通群众根本没办法发表自己意见让很多人看到；文革会写字就能写大字报，很多造反派都办了小报，这些造反派的小报本来就是言论自由，所以当时才有些造反派组织批相对论。周光召也说过文革有科技民主。

大家可以去看量子力学的书籍，可以看一些现代物理学发展的历史，看看是不是那个作者闹笑话。

(来源：<http://www.wywxwk.com/Article/zatan/2014/12/334386.html>)

辩证唯物主义与相对论的哲学是矛盾的。到底谁是谁非？光引用几条语录来压人是没有用的。我对相对论的驳斥主要集中在物理上。几十年来，我只有遇到那些对相对论的盲目信仰者的无理压制，却从没有人指出我的数理推导在什么地方有错或有瑕疵。这些人是唯革命导师要对着干。他们没有物理，只有莫名的仇视。。革命导师之伟大，就在于他们对相对论的见解完全符合实践。反相者们引用革命导师的著作，无非是证明了英雄所见略同。也是

对革命导师的英明予以由衷的赞叹！维相者对反相者的攻击是无孔不入，鸡蛋里挑骨头的。如果我的观点和数学推导有什么错误，他们早就把我奚落到一钱不值了。他们只能在阴暗角落里删除在贴出的爱因斯坦关于光速可以是 $c \pm v$ 的语录。没有人把我的说法当一回事？十二年前我在相对论吧贴出爱因斯坦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和我的评注。他们慌了，又无法驳斥，只好另外把这篇文章再贴出一次。对我贴出的爱因斯坦语录，如果他们不当一回事，为什么要删，还要把我封掉？有本事就与我辩个明白！我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过，没有人能够驳斥。包括被我批评的中科院院士和国防科大教授。

我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毛泽东批判相对论，我研究下来觉得他们是有道理的，所以我按照列宁的指示重点在物理上修正相对论。当然你们这些根本不懂相对论却硬着头皮维相的人不会信仰列宁主义，但是不信仰真理也是一种信仰。就是信仰相对论的胡说八道。我没有见过杨振宁，倒是见过吴健雄。杨振宁第一次回国到复旦作报告，我赶到复旦，找到他的司机。托他将预先写好的观点交杨振宁一阅。第二天司机到我家，说杨振宁在华东医院看牙齿时看了，说绝不是没有道理的，叫我到复旦去找倪光炯。倪光炯说绝不是没有道理不等于有道理。吴健雄则叫我去找李政道。报上说吴健雄那天到科学会堂去，我也就到南昌路科学会堂去找她了。报上说杨振宁那天到复旦大学去，我就赶到复旦大学去找他了。他们是科学家，也是普通人，并没有保镖。

两弹元勋中钱学森就是反相的。他支持国防大学都谭暑生教授反相。他带的唯一的研究生范良藻支持季灏老师通过实验质疑相对论。季灏文章发表需要有推荐者，范良藻是推荐人之一。我当然也是反相的，但是不等于我就认同谭暑生的观点。我在前沿科学上的文章就批评了谭暑生的错误，他也没有任何辩解。对季灏实验我这两天也已经做出了解释，证明这些实验并不能推翻洛伦兹变换。

（来源自贴吧，链接 <https://tieba.baidu.com/p/4742209264>）

（我没有研究过相对论，我做这一问题仅仅是为了证明文革时期批判相对论，并不是什么无稽之谈。德国学界有《一百位教授证明爱因斯坦错了》，列宁也批判过 2 次相对论，苏联 50 年代也批判过，其他国家到现在也有批判相对论的。）

苏联专题

关于“卡廷惨案”的问题

评：

撒谎的一种就是只说出真相的片段。卡廷事件不是孤立存在的，俄波两国的仇恨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即使就近论，苏俄内战（苏波战争）时期，波兰屠杀的红军战俘也以万计。冤冤相报，被很多人说成是单方面的施暴。

波兰我觉得一点都不冤枉，当时俄国革命的时候波兰白军屠杀红军来着，直接活埋枪毙。而且波兰白军成立的政府和法西斯眉来眼去一起瓜分捷克斯洛伐克，这你见过西方说嘛？

只知道卡廷森林不知道波兰白军屠杀苏俄红军，只知道苏德瓜分波兰不知道德波协定瓜分捷克斯洛伐克，只知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知道德波互不侵犯条约。

波兰人夹在苏联和德国人之间，左右不讨好，和苏联有世仇。特别是在 1920 年的波苏战争期间，波兰人不但侵占了苏联西部的部分领土，也屠杀过苏联战俘。苏联为了报仇，虐杀波兰战俘似乎也说得过去。

但是，苏联当时俘虏的波兰战俘远不止 2 万人，如果是纯粹为了报仇，干脆把 25 万俘虏全部枪杀不是更解气？为何要放掉众多的普通士兵，而有选择性地杀掉其中的 2 万精英呢？

显然，苏联人有更长远的打算。苏联在斯大林的统治期间，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无产阶级政府，任何反对苏维埃政权，阻碍这个计划的势力，都必定会被清除。尤其是在 1920 年波苏战争以后，苏联更是将波兰视为敌对阵营。为了扼杀波兰的重生，消除波兰给苏联带来的威胁，苏联选择了屠杀波兰的精英阶层，日后好吞并波兰。

若是用唯物史观以阶级斗争来看待这个问题，就可以看得很明白，“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正如地上的灰尘。扫帚不到，灰尘是不会自己跑掉的”。

关于二战苏军打赢德军靠美援的问题

.....

关于二战苏军的莫辛纳甘步枪 X 人一把的问题

评：

信这个的纯属脑瘫。

苏联只算二战中莫辛纳甘的产量都有 1700w 多了，加上战前的装备储备，更是不知道多少了，波波沙都有 600w，更别说其他装备凑起来算了。而苏联军队最大规模也就 1200 万人，所以苏联根本不缺枪。

不过，战争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个别部队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获得足够武器的事也有可能，所以武器装备不足的事也许会有，但不会普遍。

关于二战转折点的问题

.....

关于“生于不义，死于不耻”

.....

苏联问题研究的不多，需要专业人士帮忙。

人物专题

关于刘少奇的问题

“刘少奇死前没有医疗医护”

驳：

刘少奇同志去世前，享有充分地、高规格地医疗医护

历史是平面镜，但中国公知只照哈哈镜。没有人希望历史悲剧重演，但也不能肆意歪曲历史。思历史的时候，首先不能发明历史。尊重历史，就是尊重你自己；你不尊重历史，历史就打你的脸。

简单说几条，有时间，有地点，有名有姓。（这一点很重要，生编乱造你不敢编这么详细，编出来这么多医疗专家。不然，他们站出来一个打脸怎么办？）

1、1967年1月，恩来总理和中央办公厅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指示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医院的医生、护士必须出诊治疗；药品还是照常从保健药房发给。

2、北医参加会诊的专家有：内科陶桓乐教授、外科吴蔚然教授、眼科左克明主任、口腔科李善荣主任、口腔科朱洪荫教授、五官科王淑云主任、放射科李果珍教授、岳辉南主任；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张晓楼教授、北京第一人民医院五官科姜泗长教授等。

3、1968年4月，刘少奇语言逐渐减少，有时出现糊涂，小便失禁，手颤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等专家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血管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

4、1968年5月3日，刘少奇医护组发现给刘少奇做饭的师傅马文全患痢疾迹象，便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位优秀厨师师傅。同时把他的厨房、餐厅、住所、餐具都做了彻底消毒，以保护刘少奇同志的健康。

5、1968年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专家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个鸡蛋进行了调整。改为每天2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减少些过多的猪肉，增加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

6、1968年6月初刘少奇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1968年7月6日起病情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会诊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当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专属昼夜24小时护理。

7、刘少奇诊断为肺炎后，情况上报中央。毛主席、周总理都马上明确指示：“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好病。”根据这一指示，组成强大阵容的医疗组。陶桓乐、黄宛、顾英奇、董长城住在刘少奇家里守护救治。顾英奇和董长城搭地铺昼夜24小时守护施救。同时安排四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24小时值班。

8、1968年7月12日，刘少奇同志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医疗组立即将情况上报。情况

上报后，毛主席、周总理立即指示：“如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

10、刘少奇医疗组。中南海门诊部参加的：卞志强、顾英奇、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韩世泉(男)、301医院董洁秋、卿喜珍等著名教授专家。

11、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对刘少奇医疗组的评价：“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调查、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如实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查组认为门诊部牵头对刘少奇同志的医疗、保健、救护工作是认真负责的。”综上，不难看出，刘少奇医疗组规格之高，医疗医护之细是充分尊重了刘少奇同志的。可以说在刘少奇同志病重的两年，从中央到地方，是竭尽全力，不折不扣的执行毛泽东周恩来的“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好病”的指示。

（作者：无为李爷 原发布地址未找到）

关于刘少奇个人的行为理论的问题

我是想不到还会有人给刘少奇洗白吗？但是还是写一写给大家普及一下反革命刘少奇的滔天罪行。

驳：

恶毒攻击毛主席，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背叛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全民党、抹煞阶级斗争，鼓吹“党内和平”、在统一战线上的投降主义路线、大肆宣扬叛徒哲学，竭力为叛徒辩护、极力美化地主资本家，丑化劳动人民、刘氏“修养”之道，就是和平演变之道、脱离三大革命，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宣扬吃小亏，占大便宜，贩卖个人主义、歪曲党的民主集中制，鼓吹奴隶主义

（引自《红炮兵彻底清算刘少奇的反革命滔天罪行》）

可以引用的资料：

刘少奇宣扬“剥制有理”的谬论，千方百计地为地主资本家寻找“剥制有理”的根据，妄图把中国拉回老路，复辟资本主义。刘少奇在华北第一次职工代表会上说什么：“现在工人、工会怕资本家赚钱多了，怕什么呢？应该让他赚钱，他赚了钱或赚得多些，那才会开工厂，人家一赚钱你就想搞掉他，那谁还办工厂，……钱赚得多，生产扩大，开新工厂越多越好，你替他(指资本家)打这个主意他才高兴。”刘少奇还恐怕别人不懂他的意思，又举了一个例子：“宋裘卿(天津原东亚毛纺厂的大资本家，极端反动，深受刘少奇的宠爱-编者注)说他对工人是剥削。我说你剥削一千人，若二千人就更好了，我们愿请你多剥削些工人。”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还更加疯狂地叫嚣：“工厂赚钱是正当的，不赚钱开工厂干什么？私人工厂如此，国营工厂也如此。”看！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不是公开散布“剥削有理”吗？！“剥倒有理”，这是地地道道的反动逻辑。

.....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却和毛主席大唱反调，他大喊大叫要“和资本家拉好关系”，胡说什么“和资本家拉好关系而不失掉立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在一九四七年刘少奇对石家庄工作指示中说：“关于工资、工厂管理等方面，资产阶级是我们的老师，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要接受他们的遗产……”。“我们拟定的三、四、

五、六、七斤的标准太不懂事了，……我们要好好学习资本家那一套”，“我们管理工厂不如资本家，资本家要学徒学三年就可以了，我们的学十年也不一定赶得上……”

够了！看，刘少奇把资本家捧到了何等地步，工厂里的哪一种东西不是工人制造的，哪一台机器不是工人开的，资本家整天吃喝玩乐，靠剥倒工人血汗过活，他连机器摸都没摸过，他懂个屁！“和资本家拉好关系”，对刘少奇自己来说，本来就是一丘之貉，根本不用拉，对于工人来说，这是极大的诬蔑！工人阶级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资本家剥削了工人，刘少奇反过来要工人拜他们为老师，要工人接受他们的遗产，这不是让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重新同服于资产阶级，受其剥削，受其蹂躏，受其摧残，又是什么？！

刘少奇的这种想偷，就是否认了工人阶级同资本家的斗争，否定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否认了两条道路的斗争。一句话，就是否认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专政：非但不专政，而且还要把他们奉若神明。刘少奇挖空心思地想把我们的新中国拱手送给资产阶级，让他们来主宰广大劳动人民的命运，是可忍，孰不可忍！

刘少奇不但肉麻地吹捧资本家，还大肆宣损要依靠资本家办工厂，胡说：“把资本家搞垮了，如果把工资提得过高，资方恐慌，不利正就要犯错误(天津最近发生过此种现象)。”还说什么“……否则资本家关了门，国家现在还不能接管过来。”“工人接收后办合作社，大体既：是办不好的，办不好就不如不接收。”毛主席早就英明指出。“我们必须全力依靠工人阶级”，没有工人阶级革命必然不能取得胜利，只有依靠工人阶级革命才能胜利！可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明目张胆地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唱反调，诬蔑工人“办不好”工厂，“办不好不如不接收”，又胡说什么“资本家关了门，问题就难办了”，其用心何在，不是昭然若揭，不打自招了哪！

一九五七年，正是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为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努力奋斗，并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取得新的胜利的时期。与此同时，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网罗了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大举进攻，向社会主义大举进攻，兴是群魔乱舞，乌烟瘴气。就在这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这二月二十七日发表了他的伟大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的发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前后，大野心家刘少奇心怀鬼胎，急急忙忙跑到河北、河南、上海等地，大肆放毒，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妄图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与我们伟大领袖唱对台戏，从而达到他篡党篡政的卑鄙目的。

在此期间，刘少奇亲自出马，在石家庄速罐召开了五个汇报会、座谈会，紧跟着又在当年四月十四日在保定听了一次汇报。此间，他对石家庄地、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面授机宜，妄图把石家庄地区变成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基地。他们串通一气，巧妙配合，狼狈为奸。

……

在刘少奇的黑指示下，华北药厂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追名夺利，大搞“名牌”，刘少奇走后立即办起了一个“红专大学”要“生产大学生了”，并定了“七年规划”，“十年方针”，从全厂各部门抽了百余人脱离生产，大搞“进修”，所谓“红专大学”实则是“白专大学”全部课程完全是数理化没有一堂政治课，更谈不到学习毛主席著作了。这样，厂内本来政治波挂帅的人和一些资产阶级思想较严重的人对政治更加不闻不问，整天现头于业务，为个人名利而奋斗。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攻业务书”，以便早日捞个“大学生”交凭。厂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肆宣扬毕业后与正式大学生同样待遇，毕业后实习一年，工资起码五十一元，再过三年五载就是几级技术员，几级工程师。在这股“生产大学生”

的妖风下，什么“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等等单炮技术现点的论调盛行起来。致使不少人严重地脱离政治、脱离生产实际。在职工中一些水平低的人感到自己“生产”成为“大学生”没希望，闹情绪，甚至想离职求学，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企业搞得乌烟瘴气。在 61 年提拔的二十名工程师全部是知识分子，没有一个工人。

（引自《红炮兵彻底清算刘少奇的反革命滔天罪行》）

历史的铁证——1947 年刘少奇在平山土改与整党运动中时“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情况调查，不贴，百度就有

赫鲁少奇的罪行罄竹难书，太多太多，我就仅举出几个典型事迹，他的更多的罪行可详见《红炮兵彻底清算刘少奇的反革命滔天罪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汇编》、《彻底清算农业科学领域内的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摧毁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关于彭德怀的问题

（一）关于大跃进

1956 年，有人提出反冒进，毛泽东予以否定。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57 年，也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钢产量达 535 万吨，是 1949 年的 15.8 万吨的 33.8 倍；煤产量达 1.31 亿吨，是 1949 年的 0.32 亿吨的 4.1 倍；粮食产量达 19505 万吨，是 1949 年的 11318 万吨的 1.72 倍；棉花产量达 164 万吨，是 1949 年 44.4 万吨的 3.69 倍。（浙江教育出版社《新编读报手册》1986 年 10 月出版）

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包括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都充满信心。全国人民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很快，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

1958 年 1 月 6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在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奋勇前进》具有代表性。社论指出：从 1953 年开始的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全面的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结果证明，我国国民经济完全有可能以较高的速度发展。为了取得更高的发展速度，要集中力量发展工农业生产，做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1958 年，毛泽东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出现了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问题。很快，毛泽东觉察到问题，他耐心地做一些干部的工作，但处于热火朝天中的干部一下子转不过弯来。1958 年 11 月 2 日至 10 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会议，提出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面所有制的界限。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0 日，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全会提出既要有冲天的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提出经济计划要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能够保持适当的比例。1959 年 6 月 15 日，毛泽东召集中央领导参加的会议，他指出大跃进中主要问题是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抓得不够。接下去是庐山会议，虽然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借纠“左”发难的彭德怀作了处理，但此后继续纠“左”。终于，在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导下，国民经济得到更好发展。

天不随愿，大跃进后的 1959 年至 1961 年，我国发生了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带来人民生活困难。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说“七分人祸，三分天灾”。并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事实究竟如何？请看，竭力扭曲毛泽东、美化彭德怀的《“乌托邦”祭：1959 年庐山之夏》（《华人世界》1989 年第 1 期，作者苏晓康、罗时叙、陈政，以下简称《“乌托邦”祭》）提到：“粮食产量曾经估计 1958 年约 8200 亿斤，于是粮食征购量高达 1175 亿斤，比上年增长 22.3%，而同期粮食实际只增长 2.5%”。这里说得很清楚：1958 年的粮食产量是增长 2.5%的，并没有减产，是继续丰收，这就否认了三年困难时期是 1958 年大跃进造成的人祸。再请看，1960 年 12 月 28 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农业生产 1960 年遭受了近百年来没有过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 9 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一半以上。1960 年的灾害是在 1959 年 6 亿亩农田受灾后继续发生的。1960 年受旱灾面积达 6 亿亩，受台风和洪涝灾害的有 22 个省、区。许多省份还发生严重的病虫害，还有的省受了频繁和严重的霜冻。

（可惜笔者手头没有 1961 年受灾资料）这就肯定了三年困难时期是天灾造成的。饿死几千万的说法又是怎么来的？2010 年 12 月 13 日的《学习时报》刊登周承恩的《龚育之与〈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文说：“在三年经济严重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具体人数，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我在起草初稿时，依据专家们的估计，大着胆子写了这三年中非正常死亡大约有两三千万人。我原以为统改时，这一数字可能会被删去。但老龚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只是要求数字更加准确，要有正式出处。他亲自动手查阅资料后改写为：‘据正式统计，1960 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后来的《党史二卷》也是这么写的）这么大的事怎么能凭估计呢，太不严肃了吧？可以肯定，龚育之查阅的资料是不可靠的。笔者查过，1959 年、1960 年均没有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人口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涉及到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迁移等好多问题，没有经过全国人口普查搞出来的资料都是不全面不准确的。退一步，就算真的人口减少，应考虑诸种因素，如老死多、病死多、出生少等等，怎么妄断都是饿死的？（注：龚育之，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据《新编读报手册》载，1958 年至 1962 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尽管遭受了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粮、棉产量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分别减少 10.4%和 8%，而钢、煤、电力、汽车等产量是大幅度增长的。“二五”钢产量达 5590 万吨，是“一五”的 1667 万吨的 3.35 倍；煤产量达 15.3 亿吨，是“一五”的 4.9 亿吨的 3.12 倍；发电量达 2230 亿度，是“一五”的 684 亿度的 3.26 倍；汽车产量达 7.15 万辆，是“一五”的 0.97 万辆的 7.3 倍。

另外，两弹一星和人工胰岛素也是那时开始研制的。在短短的时间里，两弹一星的成功，人工胰岛素的合成，证明人类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飞跃的。当然，我们要的是科学的飞跃，反对不切实际的盲进。

就我国来说，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前人从未经历过的事业，在前进道路上出现一些问题是在所难免的。有的人抓住大跃进中高指标等问题大肆炒作是别有用心。有人提出的在二十世纪末把我国建成小康社会不是放空炮了？至今，光国家级贫困县还有 592 个呢。（注：全国共有 2000 多个县市）

（二）关于庐山会议

现在不少人，一提起庐山会议，总以为那是个迫害彭德怀的会议，总以为彭德怀是刚正不阿，为国为民说话的。其实不然。从会议一开始，彭德怀就带着个人情绪发泄的。会议的第三天，1959 年 7 月 4 日上午，“彭德怀在西北组继续放炮：‘我犯过四次错误：打赣州，百团大战，至今还没有什么结论……’”（《“乌托邦”祭》）7 月 26 日晚，彭德怀以上情绪暴露无余，当毛泽东说他，“你骂了 20 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呢？”“我——”彭德怀气得站了起来，扯开嗓门吼道：“在延安你操了我 40 天娘，我操你 20

天的娘不行？”（《乌托邦》祭）彭德怀这里说的“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指的1942年延安整风时西北组大部分人就“百团大战”问题批评了彭德怀，毛泽东本人根本无意整他。庐山会议主要是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与“百团大战”有什么关系？

在此，有必要说明“百团大战”的情况：1937年8月召开的中央洛川会议，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确定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作战方针，而彭德怀于1940年发动的“百团大战”违背了这一方针，虽然歼敌较多，但我军伤亡也较大，同时，过早地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使以后的斗争增加困难。当时，日军抓捕杀害了我党的一些高级干部。

正因为彭德怀是带着个人情绪的，在庐山会议上急于追究个人责任，尽管他说“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但紧接着说：“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乌托邦”祭》描写道：他“连珠炮似的‘砰砰’放，手里握着一支红蓝铅笔，情绪激动地舞着。”“第二次发言依然涉及毛泽东，而且直呼其名了。”“庐山会议近30年后的今天，我们来评价彭德怀直言‘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这句听似平淡的老实话，便可窥见它那光彩。”由彭德怀口述，“秀才”执笔的给毛泽东的上书中巧妙地写道：“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请注意这里的“一般”字眼！言外之音就是要追究个别人的责任，这个别人当然是毛泽东。上书中说，1958年的错误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界层之间和农民各界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请看，性质是“政治性的”，明显是指责毛泽东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乌托邦”祭》描写道：“西南一位‘封疆大吏’首先发难。他说，彭德怀信的矛头是针对主席的，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等于说前一段路线错了，路线错了就要更换领导了。”这次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定时间是1959年7月2日至15日，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上书。第二天会议就要结束了，干嘛还要上书？自然是他觉得目的未达到。毛泽东当然看得出彭德怀的用意，他觉得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的预期目的尚未达到，在彭德怀的上书上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决定延长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间，并于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接着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统一思想。毛泽东这样做，决不是为个人利益考虑，是为党为国为民考虑，他看到了彭德怀思想的危险性：彭德怀不但把大跃进说得一团漆黑，还反对人民公社，说“人民公社办得太早”，（李锐《彭德怀为什么要上书》），甚至说“要请苏联红军来”。《“乌托邦”祭》写道：“在南京南下的专列上，几个人谈起浮夸风、急过渡所造成的今年粮食恐慌，彭德怀接着别人的话茬冲口一句‘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红军来喽’这种经不起分析的戏言，也被一一‘钩沉’出来了。”这样的话，且出自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口，能是“戏言”吗？林彪点了他：“彭德怀同志前不久访问了东欧各国。上山你急于发难，是不是有背景？赫鲁晓夫对你评价那么高，你答应了他什么？”（《“乌托邦”祭》）（注：庐山会议期间，苏联大使尤金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说：“现在你可以搞政变了。”）我们可不去理会林彪的话，但大家都知道，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搞修正主义，我党已与苏共产生了重大分歧，1959年的彭德怀还说“要请苏联红军来”，不是说明了他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与党中央唱反调吗？不是说明他认为党中央毛泽东不行了吗？

那个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批判的李锐于1989年第1期《文汇报》上发表的《彭德怀为什么要上书》一文中说：“1958年初，‘大跃进’口号刚提出时，彭德怀是有怀疑的，当时他在文章中使用的字眼是‘大发展’。（注：既然有怀疑，当时为什么不提出来？‘大发展’与‘大跃进’有多大区别？这是李锐为彭开脱）3月成都会议，听了毛主席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等一系列讲话后，他接受了‘大跃进’的提法，……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钢要翻一番，农村人民公社化。全国顿时热气腾腾，到处出现群众‘干劲冲天’的场面。中央和各级领导同志纷纷下去视察，或亲自督阵。彭德怀深入部队和农村，先后到

东北、西北和华中十多个省，他也为当时的气氛所感染，很是乐观，在他给中央的信中也反映出来了”。而用彭德怀自己的话说，“北戴河会议，我也赞成了共产风。”（《“乌托邦”祭》）既然如此，为什么彭德怀不在庐山会议上和党中央一起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却一个劲地放“连珠炮”、“骂娘”？居心何在？不是昭然如揭吗？

虽然庐山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但毛泽东本着一贯坚持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只是调离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保留他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虽然毛泽东反对了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但没有停止纠“左”的脚步。